北京市民族事务委员会古籍整理办公室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资助出版

中国的多种民族文字及文献

魏 忠 编著

民族出版社

ZhongGuo De DuoZhong MinZu WenZi Ji WenXian

ZhongGuo De DuoZhong MinZu WenZi Ji WenXian

责任编辑　虞　农
封面设计　金　一

ISBN 7-105-06285-1

9 787105 062850 >

ISBN 7-105-06285-1/H · 470
(汉 119)　定价：18.00元

中国的多种民族文字及文献

ZhongGuo De DuoZhong MinZu WenZi Ji WenXian

● 魏 忠 编著

民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的多种民族文字及文献/魏忠著.—北京:民族出版社,2004.10

ISBN 7-105-06285-1

Ⅰ.中… Ⅱ.魏… Ⅲ.①少数民族—文字—研究—中国②少数民族—文献—研究—中国 Ⅳ.①H2②K2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104804 号

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和平里北街 14 号 邮编 100013)

http://www.e56.com.cn

北京绿冬青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微机照排 北京市迪鑫印刷厂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2004 年 10 月第 1 版 2004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9.25 字数:230 千字

印数:0001-2000 册 定价:18.00 元

序　言

这本小册子可以算是一本语言文字学领域的科普读物，旨在向读者介绍我国古今少数民族文字及文献的情况。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各个民族都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文化，它们共同构成、丰富和发展了中华民族的文化园地，为这一园地增添了璀璨的光辉。很多少数民族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都创制并使用了自己的民族文字，产生了大量的少数民族文字文献。这些文字是人类文明演进到重要阶段的产物，它记录了各个少数民族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历史，是人们认识世界的一个重要窗口。现在，这些文字有的已消亡，成为无人能识的死文字，只有少数专家还在研究；有的还在继续使用，在不断改进的过程中为人们服务；有的是在研究实践中，适应当时当地情况创制的新文字。对这些文字、文献的了解和研究，对促进民族文化的发展，加强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有着重要意义。我国的多种少数民族文字，作为各民族文明发展的重要载体，有力地推动着各族人民为建设繁荣昌盛的祖国而前进。

据专家20世纪90年代统计，我国已知的少数民族语言有80余种，此外还有一些语言需要进一步调查和研究，看它们究竟是一种方言，还是独立的语言。最近据统计认为，我国56个民族使用的语言已达100多种。我国民族文字的情况也比较复杂，古代少数民族文字除受汉字影响创制了一些方块字外，大多是拼音文字，还有少数音节文字。20世纪50—80年代，政府又先后为12个民

族创制了16种文字。除民族古文字以外，在56个民族中，现在汉、回、满3个民族通用汉文。蒙古、藏、维吾尔、哈萨克、柯尔克孜、朝鲜、彝、傣、拉祜、景颇、锡伯等民族各有自己的文字，有的还有两种以上的文字，如蒙古文（2种）、傣文（4种）、傈僳文（2种）等。新中国建立前，一些民族还使用过在汉字影响下创制的方块字，如壮族方块字、白文、水书等。据专家统计，我国古代各民族创制的文字总数不少于30种。不算已经“死亡”的，我国现行的民族文字有39种之多。

我国古代的少数民族文字除受汉字影响外，大多是拼音文字，少数是音节文字。它们的形成大致可分为受腓尼基字母和汉字影响两大类。腓尼基字母系统的文字又分阿拉米字母，如佉卢文、粟特文、突厥文、回鹘文、回鹘式蒙古文、满文等；婆罗米字母，如焉耆－龟兹文（吐火罗文）、于阗文、八思巴字、古藏文、傣文（4种）等；阿拉伯字母，如察合台文、维吾尔文、哈萨克文等。汉文系统的文字有：契丹字（大、小）、女真字（大、小）、西夏文；方块白文、水书、方块壮字、方块苗文、方块瑶文；侗字、布依字、仫佬字、哈尼字；还有朝鲜族“吏读”文、傈僳文、女书等。属于其他系统的文字有：图画——象形文字东巴文、尔苏沙巴文；属音节文字的有彝文、哥巴文；独创字母的有滇东北老苗文、朝鲜族的“训民正音”文字。新中国建立后新创制的以拉丁字母为基础的文字有：壮文、布依文、侗文、苗文（4种）、傈僳文、纳西文、佤文、哈尼文、载瓦文、白文、瑶文、土文等。

文字的产生、使用、发展有着深刻的社会政治、经济原因。在政权更迭、新旧交替的时候，常常会有两种或是多种文字并用的状况。地域、方言的不同，也会造成多种文字的出现。随着社会统一的进程，现代交际媒体的发达，一些文字不会长期并存下去，人们在实践中要做出选择，如满文、女书等，已逐渐消亡，这也是社会前进的一种表现。尽管如此，认识研究这些文字，了解这些文献记载

的历史，应该是现代人类的一种责任。

本书在介绍一般少数民族文字知识的时候，也兼及一些文化学、历史学、宗教学、民族学的知识，作为一种知识普及，以便读者能够更加方便地了解我们伟大祖国源远流长、丰富多彩的多民族文化。这本书还可以作为一种资料性的手册，供人们翻检，查找相关知识。同时，也希望这本书能对增强年轻人中华文化的素养有所裨益。我国是多民族国家，由于人文科学知识普及不够，一般群众特别是青年对民族知识了解甚少，甚至电视台的知识竞赛类节目也缺乏此类内容，情况严重可见一斑。应该让青年人知道，这世界上除了英文、法文、德文、日文以外，我们祖国还有藏文、维吾尔文、蒙古文、傣文等。

考虑到将我国少数民族文字分类表述，情况比较复杂，标准也比较多，不同标准有不同分类。如按新老文字、语言属系、民族(有的一个民族使用几种文字，有的几个民族共用一种文字)、国家承认与民间文字等等，这些都会出现分类交叉的现象，很难做到尽善尽美。因此，本书章节的划分，主要以地域为主，再辅之以文字的新老情况。这样有共同的历史文化背景，行文、阅读都比较方便。有的地方叙述可能会有交叉的情况，请读者谅解。好在文种不多，检索起来也还方便。

这本书能够得以完成，利用了很多该领域专家学者的研究成果，章节后已列举了参考书目，特表示感谢，希望这本小册子能够得到专家学者的理解和支持。

本书最终能够得以出版，首先得到了北京市民委金毓嶂主任的大力支持，特此表示深深的感谢。本书还得到史金波、黄润华、张炳宇几位先生的支持和指正，特此表示感谢。同时，还要对饶涛同志表示感谢。还要对本书责任编辑虞农同志表示感谢，由于他的认真，使本书更加完整。本书出版得到了北京市民委古籍办和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的资助。

目　录

第一章 沙漠残卷——已经"死亡"的西域古文字

中国古代史籍把玉门关以西和帕米尔以东的广大地区称为西域,罗马史家称这里为 Serindia——意为中国和印度之间的地方。在古代,这里水草丰茂、气候宜人,非常适于游牧、农耕部落的生存,这里还是东西方商业往来的通道。长期以来,我国古代很多少数民族在这里生息繁衍迁徙,形成了光彩夺目的文化。同时,这里又是东西方文化交流的重要枢纽,成为中国、印度、西亚、埃及、希腊五大古代文明的荟萃之地,从而产生了西域古文明。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西方的探险队陆续进入这一地区。他们深入沙漠腹地,探险搜寻,找到大量文物,可以说是唤醒了沉睡的大地,揭开了西域古代文明的一角。他们在这里发现了已经死亡的多种古文字和由这些文字记录的大量文献。1889 年,英国陆军中尉鲍威尔(H. Bower)在塔里木盆地北部的库车偶然得到一部婆罗米文的贝叶写经,经英国梵学家霍恩勒鉴定,它的学术价值立刻得到西方社会的认可。1895 年 1 月,瑞典人斯文赫定(Sven A. Hedin)在塔克拉玛干大沙漠中发现了一座被流沙掩埋的古城,当地人称其为"丹丹乌里克"。1900 年 3 月,他又在罗布泊西岸发现了一座已成废墟的古城。他把在这里发现的写卷、文物等带回欧洲,经研究证实,前者是历史上非常有名的西域古国于阗的城镇,后者则是楼兰(即鄯善)的城镇,它们距今都有一千多年的历史。

他们的发现在世界上引起极大震动,荒僻偏远的戈壁沙漠居

然埋藏着如此灿烂辉煌的古代文化。至此,欧美各国和日本纷纷派遣探险队到新疆访古寻宝,西方列强的探险队开始在我国西部地区劫掠文物,数以万计的古代写卷在埋藏了千百年后重新问世,又被打包装车,运往海外。探险队中比较著名的人物有瑞典的斯文赫定,英国的斯坦因,德国的格威尔德、勒柯克和特林克勒,美国的亨廷顿,法国的伯希和、德兰,日本的大谷光瑞、桔瑞超等。这些探险队在塔克拉玛干及周围地区活动,于阗、鄯善、疏勒、龟兹、焉耆、高昌等古代王国的城址和寺院相继被发现。

旧中国积贫积弱,在新疆发现的古代写卷和文物,被西方列强肆意劫掠,以致西域文明的发现史,成了当时国人学术文化的伤心史。这些探险队,以德国人斩获最多,有些大型壁画也被锯下运回柏林,而柏林国家博物馆收藏的壁画,很多在“二战”期间毁于炮火。今天,这些古物宝藏分散在世界上至少 13 个国家的博物馆里,使国人想起就有忿忿不平之情。另一方面,文献散失世界各地,又在客观上把对西域文明的研究推向了世界,使这一领域的研究受到世界上著名学者的关注和参与,并不断取得优秀成果。西方探险家顽强的精神、敏锐的学术触觉,也足以惊醒当时的国人。

新疆自古就是多民族聚居之地,这里历史上曾有过塞人、月氏、乌孙、汉、羌、鲜卑、柔然、突厥、粟特、回鹘、吐蕃、蒙古等部族或民族活动,他们使用的语言分属印欧语系、阿尔泰语系、汉藏语系和闪-含语系,这些语言各不相同,又在新疆汇合、相互影响。新疆经考古发现的古文字分为三大文字系统,即汉文字系统、阿拉米文字系统和婆罗米文字系统。这其中有“死文字”和“半死文字”。

这里发现的汉文字系统的文字有:汉文、西夏文、契丹文、日文;阿拉米文字系统的古文字有:佉卢文、帕赫列维文、粟特文、摩尼文、突厥卢尼文、回鹘文、阿拉伯文、喀什汗文、波斯文、回鹘式蒙古文、叙利亚文、察合台文、满文、托忒蒙古文;婆罗米文字系统的古文字有梵文、焉耆-龟兹文(亦称吐火罗文)、于阗文(亦称于阗

塞文)、吐蕃文、吐火罗式回鹘文、八思巴字。此外,还发现了少量的希腊文和拉丁文。发现量较大的古文字文物有汉文、佉卢文、回鹘文、察合台文等,发现较少的有西夏文、契丹文、希腊文、拉丁文及日文等。

古代西域与中国内地早已发生关系,其语言文字的交流,见于史书记载的自汉代开始。《汉书》曾称:“自宛以西至安息国,虽颇异言,然大同,互相知晓也。”据专家考证认为:古代新疆的语言文字可分为南北两路。南路文字大都源于印度婆罗米文字系统,一个是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北边的焉耆、龟兹、疏勒语;一个是沙漠南边的于阗语;在葱岭西北,是撒马尔罕一带的粟特语和铁门南边的吐火罗语。此已为中外学术界所公认。新疆北路,史无明文记载,但其历史上为突厥所统治,文字多源于阿拉米文字系统。

这里发现的每一种古文字,都对研究西域古代社会乃至当时世界的政治、经济发展和文化交流有着重要意义,都可以帮助我们揭开一个个人类进步的千年之谜。每一种文字都是人类认识和发现世界的一种方法和一个窗口,对于这些文字文献的研究,正是对人类文明的深入开掘和发扬光大。分析和解读这些已经“死亡”的文字,成了当前古文字学家、考古学家、历史学家相当重要的任务。

第一节　佉卢文字(Kharosthi)

佉卢文字是我国新疆最早的民族古文字之一。在新疆最先发现这一文字的是英国人福塞斯(T. D. Forsyth)。早年,大英帝国为了实现自己日不落的梦想,一直觊觎我国新疆,一为分裂清帝国,二为阻止沙俄势力南下。1867年,原中亚浩罕汗国的高级官吏阿古柏,侵入南疆,在喀什噶尔(今喀什)建立了伪政权,号称"七城汗国"。1874年,福塞斯受英国派遣,作为大使,率领使团前往新疆叶尔羌,企图与阿古柏伪政权取得联系。福塞斯一行到达新疆和田后,并没能和阿古柏政权取得联系。

一天,福塞斯等在克里雅河谷干涸的沙地上跋涉,在躲避烈日的时候,从附近的废墟里发现了两枚汉佉二体钱。这种钱币的正面铸着汉字,背面铸着佉卢文字。他回国后把这两枚钱带到了大英博物馆,这就是佉卢文字在我国新疆首次被发现的情况。

1890年,法国莱茵考察团抵达于阗。1892年,法国人杜特雷依等人从和田当地村民手中收购到了佉卢文字写成的3张《法句经》残叶,还弄到4枚汉佉二体钱。1895年,俄罗斯驻喀什噶尔的总领事彼得罗夫斯基(N. Petrovsky)在于阗故地又搜罗到了上述《法句经》的另一张残叶。这些经文都是写在桦树皮上的。英国驻新疆的外交官,从1893年到1901年先后搜走97枚这样的汉佉二体钱。

1901年3月,瑞典人斯文赫定从塔克拉玛干沙漠东缘的一座古城废墟中发掘出大批文物。其中有很多魏晋至前凉时期的汉文木简和残纸,一同出土的还有100多件写有佉卢文字的木简和两件佉卢文书。这之前,在和田、喀什的古物市场上,也有人出售过

佉卢文的佛经残叶,但在沙漠遗址发掘出土这还是头一次。斯文赫定把这些东西带回瑞典,经学者研究发现,这座古城就是古楼兰城。斯文赫定在罗布泊探险,发现楼兰古城的消息,当时轰动了世界。

1901 年,英国人斯坦因(Mark Aurel Stein)(1862—1943)首次闯入古鄯善国境内的尼雅遗址。他在这里发现了大批佉卢文书,经编号整理、解读并刊出者已达 728 件。其中包括国王敕谕、官府文书、契约、公私往来书信和佛教文学作品等。1906 年和 1914 年,斯坦因又两次来到楼兰,获取了佉卢文书 48 件。他获得的这批佉卢文书史料价值最高,其中有纸书、绢书、驴皮书和木牍等。

斯坦因生于匈牙利的布达佩斯,1904 年入英国籍,曾就读于牛津大学和伦敦大学。1888 年赴印度,先后任拉合尔东方学院、加尔各答伊斯兰经学院院长。1904 年任职于印度古迹调查局。他曾于 1900—1901 年、1906—1908 年、1913—1916 年,三次来我国西北“考察”,到过新疆、甘肃、内蒙古等地。1930 年,他企图再次来华考察,行至哈密时,因遭我国文化界人士的坚决反对,只得作罢。青年时代的斯坦因有三个崇拜偶像,一个是公元前 4 世纪的世界征服者亚历山大,一个是 7 世纪中国去西土取经的玄奘,一个是 13 世纪的威尼斯旅行家马可·波罗。他一生探险成癖,终身未娶,直到 80 多岁还热衷于此道,直到把生命最后一息留在这条路上。有人说他是伟大的考古学家、探险家,也有人说他是丝绸之路上的盗贼和魔鬼。

1901 年 1 月的一天,斯坦因结束了对塔克拉玛干沙漠克里雅河流域丹丹乌里克的探险后,回到绿洲。就在当天,一位当地老人向他介绍说沙漠中有一处被掩埋的房屋遗址。他得知后异常兴奋,马上派人四处打听,终于在一个磨坊主人那里发现有从遗址处拾来的 6 块木板。斯坦因一眼就认出木板上是罕见的印度北部地区遥远的古代使用的一种文字,这种文字只在印度很少的石刻中

能见到，这就是后来学术界所称的佉卢文。他立刻买下木板，并出钱请磨坊主人带路，直奔沙漠中的遗址——尼雅。

到达尼雅的当天清晨，斯坦因走出寒冷的帐篷活动活动，很快就捡到3块木板文书，当天即获得几百片这样的木板文书。此外，他还发现了大量文物，如陶器、铜镜、金耳饰、铁器、玻璃、木器、织物等。斯坦因发现尼雅时，敦煌藏经洞还未打开。他的发现超过了以前人们所知这类文献的总和，这当然是天大的收获。

斯坦因一生的荣耀和唾骂都和尼雅紧密联系在一起。在中国"考察"期间，他先后4次进入尼雅，在那里发现、绘图和记录了41处遗址，掠走大量文物，都没有清单。文书类包佉卢文、梵文、于阗文、汉文、藏文文书和木简、宗教经卷以及壁画、版画等，这些现都收藏于伦敦的不列颠博物馆。斯坦因生前还留下很多有关西域考古的著述，在书中绘声绘色地讲述了他在大漠中的发现和在"死亡之海"中的生死搏斗。1920年至1929年间，上述佉卢文书被波义耳等欧洲学者合作转写，陆续出版于《斯坦因爵士在中国突厥斯坦发现的佉卢文献》三卷书中，共收文书764件。这其中也包括美国亨廷顿1905年进入新疆，在尼雅遗址所得的6件佉卢文书。这之后，日本大谷考察队的桔瑞超也接踵而至，古鄯善王国的尼雅成为佉卢文书的主要发现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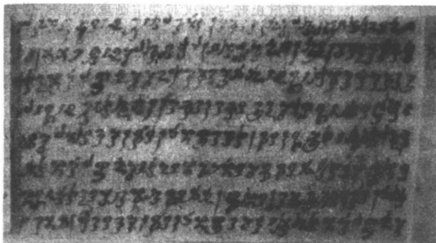
不久，写有佉卢文的各种文物在塔里木盆地的许多古城、寺院遗址、敦煌等地被相继发现，甚至洛阳也有发现。在中国境内发现的书写有佉卢文字的资料，按性质大体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汉佉两体钱，一类是与社会经济生活密切相关的各种文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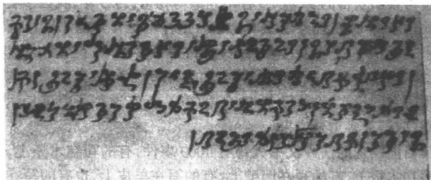
截止到1987年，总共发现了352枚汉佉二体钱。这些钱币大都出自西域古国于阗，所以又叫"于阗马钱"，是铜币。主要为大钱、小钱两种，大钱重量为小钱的4倍，还有个别特殊类型的钱币。这种钱币用于东汉时期，使用年代大约在公元73年至公元270年间。大钱上的汉字铭文一般为"重廿四铢铜钱"。小钱上的汉字一

般为“六铢钱”。钱币重量正好与东汉时期币制重量相等，想是为与中原王朝交流方便所铸。大钱上最常见的佉卢铭文翻译过来的意思是“大王、众王之王、太上秋仁之币”。小钱上佉卢铭文的意思是“大王、都尉之王、秋仁之币”。据专家考证，秋仁是一位于阗国王，大约于公元175年至公元220年之间在位。

据不完全统计，这些钱币现分藏于以下十多个国家的博物馆中。1874年，赛福特获得的2枚，和1910—1916年斯坦因获得的187枚，现存大英博物馆；1895年，俄罗斯驻喀什噶尔总领事彼得罗夫斯基获得的21枚，现存圣彼得堡埃米塔日国立博物馆；1890年，法国莱茵考察队获得的4枚，现存巴黎；1890年前后，英国赫恩雷考察团获得的97枚，现存不列颠博物馆；1929年，我国学者黄文弼也获得1枚，现存新疆博物馆。这种不足4克的小铜币面世以来，吸引了世界上众多学者的注意，一百多年来，英、法、俄、美、日、印、巴基斯坦及我国等8个国家的30多位学者，发表关于这种钱币研究的论文、论著已有40余篇（卷），近年这种研究更是达到高潮，取得很多重要成果。

目前发现的佉卢文书大约有1000多件，有的写在木条上，有的写在木板上，有的写在墙壁上，有的写在羊皮上，也有的写在纸张上。最早发现的佉卢文献是佛经《法句经》残叶，共4张。1945年，英国人贝利曾将《法句经》全部词汇加以转写，发表在《东方和非洲研究学院院报》第11卷第3期上，据认为，此经译自印度古巴利文，年代在公元2世纪。20世纪60年代中叶，西方学者布腊夫著《犍陀罗语〈法句经〉》，全面系统地整理了这部佛经写卷，取得一系列重大研究成果。研究证明，这是于阗人使用的佉卢文，并且判定于阗佉卢文使用的年代早于鄯善佉卢文。写在木板上的佉卢文书又叫木牍文书，这种文书由两件矩形木牍重合而成，其中带封泥槽的，可称为“封牍”，另外一件称为“底牍”，阅读时要将封牍嵌在底牍上，因此也有学者称此应为“矩形泥封木牍”。





佉卢文 《征税文书》

新中国建立前发现的佉卢文献绝大多数已流散海外，分别收藏于伦敦、巴黎、柏林、斯德哥尔摩、圣彼得堡、新德里和京都各地。新中国建立后新发现的 200 余件佉卢文资料，主要收藏于新疆博物馆内，另外，则分藏于我国和田、兰州、北京、西安和旅顺等地。可能还有一些文献在当地民间收藏。

据我国学者马雍先生研究，佉卢文的"佉卢"二字是"佉卢虱吒"一词的简称。原词系梵文词，汉译名及其简称均出自古代佛经汉译本，是音译，意译为"驴唇"，与佛经中"驴唇仙人"的传说有关。

佉卢文又名“佉卢书”、“佉楼书”、“驴仙书”、“驴唇书”，西方学者称之为高附字、大夏字、雅利安字、驴皮书等。这种文字原流行于印度西北部地区，用以书写印度俗语，与梵文(雅语)并行，最后被当时的另一种印度文字婆罗米文字所取代。现存最早的佉卢文字，是公元前 251 年阿育王的碑铭。公元 5 世纪后这种文字废止，再也没有国家和地区使用过，成为一种死文字，前后约存在了七百余年。它先后流行于巴基斯坦、阿富汗、中亚各国。至少在公元 2 世纪中叶即传入我国新疆南部的古于阗，3 世纪中叶传入古鄯善地区。

佉卢文是拼音文字的一种，字母从右到左横行书写，与阿拉伯文相同。佉卢文字为草体，书写时，字母不连写，字与字之间无间隔，也没有标点符号。现在知道，用这种字母拼写的语言有多种，如印度语、巴基斯坦语、犍陀罗语、吐火罗语、粟特语、于阗语和鄯善语等。用佉卢字母书写的这些语言，语法结构基本相同，又有明显差异，因地域和时间关系，文字字形也略有差异。总的来说，用佉卢文字书写的语言，统属于印度语支中的西北俗语。

据专家推断，这种文字大约是公元前 5 世纪波斯人统治印度西北部时，从阿拉米字母派生而来的。1854 年，英国学者托马斯最先主张佉卢字源于阿拉米文字，这一观点得到以后西方一些学者的认同。阿拉米文字是亚洲许多文字的基础，阿拉米语言曾是近东的通用语言，文字则是波斯王国的官方文字。

阿拉米文字源于地中海东岸的腓尼基文字，腓尼基文字是迄今为止已经解读的最古的文字。公元前 2000 年至公元前 6 世纪，腓尼基的商业贸易以及文化相当发达，他们发明了腓尼基文字。这是一种有 22 个辅音字母的文字，带有不写出和不固定的元音，自右而左书写。公元前 6 世纪，波斯帝国兼并了腓尼基，由于自己没有文字，便参照腓尼基文字，形成了能表述自己语言的阿拉米文字。公元前 5 世纪，波斯征服了中亚细亚和印度西北部，这一文字

随官吏、商人又进入这一地区，并被确定为官方文字。

阿拉米文字是典型的拼音文字，完全借用了腓尼基字母的22个辅音，并和腓尼基字母一样没有元音。佉卢文字则是音节文字，除增加了一些辅音字母、5个元音和一些合体字外，还用252个不同的符号表示辅音和元音的组合。

阿拉米语言曾在近东流行，基督教《圣经》的《旧约全书》，有一部分即是用阿拉米语写的，历史传说认为耶稣也使用阿拉米语的一种方言。阿拉米方言很多，主要分东西两支。叙利亚大马士革北部的一些小社团里，现在还有人在使用东部方言，黎巴嫩的一些偏僻村庄，也有少数人仍在使用西部方言。正因如此，在19世纪、20世纪之交时，辨认佉卢文字并无太大困难。斯坦因第一次在尼雅发现佉卢字木牍时，他立刻便认出木牍上所写的王号。

佉卢文字书写的本来语言原称印度西北俗语、中亚俗语等，后来证实这种语言起源于犍陀罗地区（今巴基斯坦白沙瓦），所以，英国语言学家贝利建议将其定名为"犍陀罗语"，此命名现为学界广泛采用。公元前3世纪，印度孔雀王朝阿育王统治犍陀罗时即已使用这种文字。公元2世纪初，与中国、罗马、安息并列四大帝国之一的贵霜王国迁都至布路沙布罗（今巴基斯坦白沙瓦），因当时此地称犍陀罗，故该国也叫犍陀罗国。他们把佉卢文作为官方文字之一，使其流行于中亚广大地区。

佉卢文字退出历史舞台后，逐渐被人们忘记。18世纪初叶，为了追寻印度古代文明的起源，西方探险家进入印度旁遮普省，在对各种遗迹进行调查时，发现了这种文字。由于这种文字首先发现于印度古代的巴克特里亚地区，故而当时有人称其为巴克特里亚文字，也称之为印度—巴克特里亚文字、巴克特里亚—巴利文字、雅利安—巴利文字或阿富汗文字。1886年，法国学者拉古贝里才将其定名为"佉卢虱吒"。

古代传说中，认为世界上共流行三种文字。梵文主要流行于

古印度地区，仓颉文流行于中国，佉卢文则流行于中国和印度之间的广大地区。可见古代居民也知道这一文字流传的广远。按照古代拼法，参考印度北部方言，目前学术界将佉卢文字拼写为"Kharosthi"。确定这一拼法的是著名语言学家毕攸勒。

这种文字名称的原意是什么呢？学界有较大争议，有认为是梵文对阿拉米文的转译，有认为是古代地名、人名等，也有认为是"写在驴皮上的文字"等。法国学者拉古贝里的意见是，该词来自波斯文，是波斯帝国阿赫美尼德王朝一位国王的名字，这位国王名字的意译为"驴唇"，所以佉卢文字最原始的意思就是"像驴唇形状的文字"。这一意见为大多数学者所接受。

目前发现最早的佉卢文献是刻在旁遮普和印德一带岩石和石板上的诏书和告示。这些诏书和告示是公元前3世纪，孔雀王朝征服旁遮普和吐火罗斯坦之后刻于交通路口和商业中心的。孔雀王朝的政治中心在印度河流域，主要使用婆罗米文字，其势力进入中亚细亚后，考虑到当地习惯，便使用佉卢文字书写王朝的诏书和告示。后孔雀王朝势力渐衰，便退出上述地区。公元5世纪末，生活在漠北草原的厌哒人受柔然人排挤，西迁中亚细亚，攻灭了盘踞在中亚两河流域的贵霜王朝和昭武九姓国家，以及固守在巴克特里亚的后贵霜王朝，确立了自己在中亚细亚和印度次大陆北部的统治地位。厌哒是个落后的游牧部落，在征服地区推行游牧政策，从此，佉卢文字开始消失。

我国境内流行的佉卢文字，最早大约可以追溯至公元前1世纪。最初，学者们将其视作吐火罗语的一种，没有加以重视。稍后，发现它和吐火罗语有着根本的不同，但却仍将其视作中国境内的统一文字。最后学术界才发现，在中国境内有着表示两种不同语言的佉卢文字系统，即表示于阗语的佉卢文字和表示鄯善语的佉卢文字。新疆出土的佉卢文献资料，分属古代的于阗王国和鄯善王国。

目前在我国发现的佉卢字文献文物多于其他古代民族文字的文献文物，而且大多数都可以释读。这有助于我们弄清西域古国于阗、鄯善的历史，以及它们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对研究当时社会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宗教有重要意义。但文献本身还有许多问题悬而未决，一些专有名词的释读还有困难，因此也留下了很多谜团。譬如人们一直对罗布泊附近地区的楼兰古国心存神秘之感，于阗和鄯善何以流行佉卢文字，并用这种文字书写自己国家民族的语言，这种文字又是如何突然在新疆境内消失的，塔里木盆地南北两个带状绿洲，彼此相邻，交通便利，何以北缘绿洲的龟兹、焉耆和疏勒古国流行婆罗米文字，而南缘绿洲的于阗、鄯善却流行佉卢文字，这也缺少合理的解释。这些问题都有待于在进一步研究中获得解决。

本节参考文献：

1. 马雍．新疆所出佉卢文书的断代问题．文史，第7辑，1979
2. 黄振华．佉卢字．见：中国民族古文字图录．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
3. 林梅村．西域文明．北京：东方出版社，1995
4. 陈良伟．寻觅消失的古代民族文字．见：历史考古卷．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01
5. 斯坦因．踏勘尼雅遗址．南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
6. 中国大百科全书·语言文字卷．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8
7. 不列颠百科全书．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
8. 齐东方．走进死亡之海．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0
9. 齐东方．尼雅的追溯．北京晚报，2003年1月23日
10. 马雍．佉卢文．见：中国民族古文字．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
11. 热扎克·买提尼牙孜主编．西域翻译史．乌鲁木齐：新疆大学出

版社,1997
12. 佘太山主编. 西域文化史. 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6

第二节　焉耆－龟兹文字(Tocharian)

19世纪末叶,西方探险队相继进入新疆。他们考虑到当时南疆上层贵族中通行阿拉伯语,便于沟通,而且那里的少量分裂主义分子渴望得到英、俄、浩罕等国家的支持,对西方人十分“友好”,于是这批探险家便把考察重点放在了南疆和东疆地区。他们先是在吐鲁番和和田地区转了一圈,掠走了一批关于于阗和鄯善的古代文献资料,然后就进入了塔里木盆地的北沿。

这里在汉唐时期有两个著名的西域古国——焉耆和龟兹。在塔里木盆地东北部,今天的焉耆和吐鲁番地区是焉耆古国故地,古龟兹则在今新疆库车一带。在那里,探险家发现了一批古代文书,这些文书大多属公元3至8世纪,它们使用的是一种从未见过的文字。这些文字不同于佉卢文,却和流行于印度河流域的婆罗米文字十分相似。探险家尽管有冒险精神,却不能识读这些文字,只好将这些文献资料分类打包,运回国内,请欧洲学者研究辨认。

德国语言学家洛伊曼最先得到这批资料,经过分析,他吃惊地发现这种文字的一些字母竟然与古代欧洲的某些文字十分相近,便称其为“第一种语言”、“北雅利安语”、“喀什噶尔语”等。后来,德国的语言学家缪勒在吐火罗语《弥勒会见记》的回鹘文译本中发现一条题记,其中提到这部回鹘文写经译自Torri(吐火罗语),缪勒便将这种未名文字定名为“吐火罗文”。德国学者泽格和泽格林在做进一步的研究后发现,焉耆和龟兹两地出土的文字实际上有相当大的差别,他们提出,北疆发现的这种吐火罗文字描写的语言

应分为甲乙两种方言,分布在焉耆—高昌(今吐鲁番)一带的叫"甲种吐火罗语",分布在龟兹一带的叫"乙种吐火罗语"。

德国语言学家的意见在引起世界同行注意的同时,也带来了一些反对意见。俄国著名学者钢和泰以及挪威著名学者柯诺威都不同意上述看法,他们认为,吐火罗语主要分布于于阗地区,并没有波及到塔里木盆地的北沿,这种文字的字源应当在吐火罗地区更北的某个地方。法国学者烈维研究了伯希和从龟兹带回的大量木简,提出甲种吐火罗语应当称作"东安西语",乙种吐火罗语应称作"龟兹语"或"西安西语"。英国学者基本支持他的意见,指出甲种吐火罗语实际上应当是"喀喇沙尔语"或"焉耆语"。在语言形态上,龟兹方言要较焉耆方言为早。根据国内外研究成果,1980年10月,在北京举办的中国民族古文字展览会上,我国学者正式将这种语言定名为焉耆-龟兹语,这种文字则是焉耆-龟兹文字。最近又有人认为,还是吐火罗这个名称正确。

早在16世纪,欧洲的传教士、商人、探险家先后进入印度。他们开始学习梵语后,就慢慢发现,印度的梵语与伊朗的阿维斯塔语有亲属关系。这两种语言又和欧洲的拉丁语、希腊语之间有着广泛的相似性,它们不仅在语法结构,甚至在发音上都有着密切的联系。对这一发现提出理论认识的首先是18世纪英国的东方学家W·琼斯爵士。1786年,他在印度的一次演讲中指出,梵语跟拉丁语和希腊语以及古英语之间,无论是在动词词根还是在语法形式方面都显示出系统的相似点,这种现象绝不会是偶然的。任何语言学家都不能不承认这些语言衍生自同一原始母语,这种母语就是原始印欧语。这就是有名的印欧语假说。这种原始印欧语被假设为原始印欧人的口头语言,并无任何文字记录,学者们只是根据这种语言的若干后裔语言进行比较研究。关于原始印欧语的分布、范围、文化类型以及语言结构等,一直还没有令人信服的解释,主要是无文字记录,并且缺少原始印欧社会的文化遗物。

按照这种假说，印度、伊朗和欧洲人在历史上曾经使用同一种语言，它们有共同的祖先。印度最古老的诗篇《梨俱吠陀》称印欧人为“雅利安人”，这种印欧语又被称为“雅利安语”。雅利安人是古代游牧民族，由于人口增长，分化为许多部落，公元前 2000 年，他们开始远离家乡，寻找牧场。一支来到希腊和意大利，一支进入伊朗高原，另一支经中亚阿姆河和锡尔河远徙印度。新疆古代语言的发现，说明雅利安人此时也曾迁入塔里木盆地。按语言学家的归类，迁入塔里木地区的雅利安人可分为两大部落集团：吐火罗语集团和塞语集团。

语言学家经研究，发现了一个令人惊奇的现象：吐火罗语虽然流行于东方，但它和印欧语系东支的语言，如梵语、钵罗婆语存在较大差异。相反，它却和印欧语系西支的语言，如凯尔特语、意大利语很相似。此外，吐火罗语和公元前 1400 年左右流行于小亚细亚的赫梯语关系尤为密切，所以它有可能是最古老的印欧语系的语言之一。

这支操吐火罗语的雅利安人是如何进入新疆的，历史学家还不是很清楚。近年考古发现证明，公元前 2000 年左右，我国商周时期，他们就在塔里木盆地一带生活。一些学者认为古代新疆的月氏就是吐火罗人的一支。他们曾征服中国西北草原，并进逼河套地区。公元前 177 年，月氏被匈奴击败，他们向西来到伊犁河谷，进入塞人地区。塞人被向西驱逐，于公元前 135 年占据了巴克特利亚（古国名，故地在今阿富汗北部），结束了希腊人在那里的统治。接着月氏人也来了，他们在巴克特利亚和印度西北部建立了庞大帝国，到公元 5 世纪，塞人与月氏都皈依了佛教。还有一支月氏人没有西迁，留在了祁连山一带，与羌人杂居，称小月氏。

有学者把这些进入我国北部，操吐火罗语的原始印欧人群称为吐火罗人。在古代汉文、希腊文、梵文、粟特文、吐蕃文、于阗文、回鹘文等文献中均有他们活动、影响的零星记载，他们的故乡在今

中欧或东欧一带。吐火罗人不断地向东迁徙,他们进入塔里木盆地后就分为南北两支,沿盆地的南北缘继续向东发展。北支在焉耆、吐鲁番和库车一带停留,其主体构成了后来的焉耆人和龟兹人,操吐火罗语的甲种和乙种方言。南支吐火罗人大部分东徙河西走廊和中国北部,留下的主要分布在于阗以东、罗布泊以西的诸绿洲上,其主体构成了后来的精绝、小宛、且末、月氏、楼兰等国人,操吐火罗语的第三种方言。南支吐火罗人还曾一度向北发展到哈密地区。由于文献资料的缺乏,吐火罗人在历史上活动的情况一直是令中外学者感到困惑的问题。对于他们的迁徙,学术界也是众说不一,难有定论。

焉耆-龟兹文(即旧称吐火罗文),是公元3至9世纪居住在新疆地区操印欧语言的民族所使用的一种文字,它是由一种印度婆罗米文字的变形——中亚斜体字母所组成的,记录的语言属于印欧语系伊朗语族的东支。婆罗米字母(Brahmi)是印度古代最重要、使用最广的字母。古代印度的婆罗门为了给这种字母罩上一层圣光,使用Brahmi,原意是说它是“来自大梵天的”。婆罗米字母与古代腓尼基字母有一些渊源关系。它是一种音节字母,自左向右横行书写。每一个字母代表一个元音或者后面带-a的辅音,如果辅音后面不是-a的元音,则在字母上、左或右另加不同的符号表示。如果辅音不带任何元音,则用涅槃点来标明。这种字母在公元前6世纪已开始使用,变体颇多。焉耆-龟兹文就是用中亚婆罗米斜体字母书写的。其他如梵文、吐火罗式回鹘文也用这种字母书写,不过,为了适应以上语言,字母的数目有所增加。

焉耆-龟兹语的语法状态非常完备,目前发现的词汇已达数千个。词类有名词、代词、数词、动词、副词、前置词、后置词等十多类。名词、代词、数词、形容词四类都有性、数、格的变化。动词有人称、时态和式的形式。前、后[illegible]广泛应用。名词分阳性与阴性,单数和复数,包括有主、宾、属、用、方位、呼六格,变格形式较为繁

琐。形容词与名词的区分不很明确。动词结构复杂，有人称的单、复数变化，有时和态的变位交替，个别时态还有阴性、阳性的区分。甲乙两种方言中，动词的词义与变化各成体系，差异很大。

焉耆－龟兹文字大约于公元前3世纪至公元5世纪流行于新疆上述地区，稍后，厌哒人的入侵使这种文字慢慢退出历史舞台，成为“死亡”文字。现在这些文字已基本可以译出，很多文献都已刊布，种类和内容十分丰富。这些文字的资料以佛教经卷为主，还有剧本、演唱故事、民间传说、诗歌、字书、公文账册以及一些医学、史料和题识等。大体情况如下：

1. 佛教经典：《法句经》、《佛所行赞》、《一百五十赞颂》、《杂阿含经》、《十二因缘经》、《十诵律比丘戒本》、《脱胎经》、《辨业经》、《饿鬼经》等，其中有的经卷已成孤本，弥足珍贵。

2. 剧本：著名剧本是《弥勒会见记》。该剧长达27幕，每幕前都标出地点、出场人物及演唱曲调，后来该剧本被译成回鹘文。还有一个剧本是《佛弟子难陀生平》。它们是中国现存最早的两个古代剧本，对研究戏剧发展史具有重大价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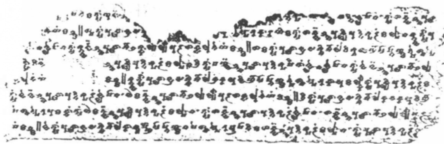
3. 演唱故事：《六牙象本生故事》、《阿离念弥长者本生故事》、《须大拿太子故事》、《福力太子故事》、《木匠与画师故事》、《画家的传说》、《国王的故事》等。其中有些与佛教本生故事体裁相同，有些是民间传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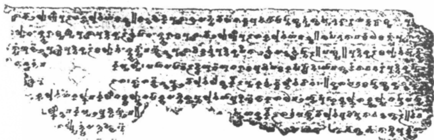
4. 诗歌：最著名的有《箴言诗集》、《摩尼赞美诗》，此外还有一些爱情诗片断。

5. 字书：主要有“古龟兹语—回鹘语”、“梵语—龟兹语”对译字书。

6. 公文账册：主要有《商旅通行简》、政令残片、寺院出纳账目、经济往来账单等。

7. 其他：医学有龟兹医术与咒语等；史料多见于一些简刻；题识则主要是壁画题记和石窟铭刻，大约有200余款。





焉耆－龟兹文　弥勒会见记

通过这些古文献，使我们知道了几个焉耆－龟兹文古代重要学者、作家的名字。如龟兹王子、翻译大师鸠摩罗什、作家勿提羼鱼、焉耆人圣月、高昌人鸠摩罗佛提等。

鸠摩罗什(344—413)，原籍天竺，世为国相。他的父亲娶了龟兹王妹，生下罗什。罗什 9 岁便随母游学于今克什米尔一带以及月氏、疏勒等国，先后学习了小乘、大乘佛教，旁通婆罗门哲学，学识十分渊博。20 岁后回到龟兹，开坛讲经，受到四方学者的尊崇。公元 383 年，苻坚的大将吕光攻破龟兹，罗什被掳到凉州，在那里住了 18 年，得以通晓汉文。公元 401 年，罗什到达长安，在那里开辟译场，最多时有 800 多僧人襄助翻译，译出大量经文，共 74 部、384 卷，首开集体译经之先例。他与真谛、玄奘并称为中国佛教三大翻译家。

由于历史原因，焉耆－龟兹语文献大都藏于柏林、巴黎、伦敦、

彼得堡、新德里、东京、乌鲁木齐等地，各国现已刊布的文献有数十种之多。西方学者依靠他们20世纪初得到的资料，取得了一系列研究成果。德国人在刊布原始文献方面起步最早，泽格和泽格林于1921年合作发表了《吐火罗语残卷A》两卷。"二战"前，国外对焉耆－龟兹文的研究大都偏重于语言方面，主要是焉耆语文，战后这一研究逐渐转向龟兹语文。1976年以后，比利时的温德金斯先后出版的《焉耆－龟兹语与印欧语对照手册》和《吐火罗语方言字源词典》是两部重要的工具书。有关论著还有：施文特纳编了《吐火罗语著述目录(1890—1958)》，齐默出了续编。我国学者陈寅恪曾有笔记《土货罗文》，季羡林先生在此领域也有重要成果，他于1943年在德国东方学会杂志上发表了《吐火罗文本福力太子本生故事》，1982年又发表重要论文《吐火罗文A中的三十二相》。近年我国学者在这一领域的研究也取得丰硕成果。

本节参考文献：

1. 裴特生著．钱晋华译．十九世纪欧洲语言学史．北京：科学出版社，1958．308～339
2. 季羡林．中印文化关系史论集．北京：三联书店，1982．103～106
3. 李铁．焉耆－龟兹文．中国史研究动态．1981(4)
4. 李铁．焉耆－龟兹文．见：中国民族古文字图录．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
5. 林梅村．西域文明．北京：东方出版社，1995
6. 陈良伟．寻觅消失的古代民族文字．见：历史考古卷．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01
7. 王欣．吐火罗史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

第三节　于阗文(Khotan script)

19世纪末叶,西方列强开始在我国强占“租借地”和划分“势力范围”。沙皇俄国为了自身的政治和商务需要,在我国新疆重镇喀什噶尔设立了领事馆,并派遣十分了解新疆情况的彼得罗夫斯基主持领事馆的工作。英国不甘落后,也马上派遣马继业担任驻喀什噶尔的领事。这两个人都是古代文物的爱好者,他们在新疆十分注意古文献的收集工作,经常深入民间和古迹遗址附近去寻觅。他们两人可以说是在我国最先搜集于阗文文献的人。一次偶然的情况下,他们发现了一批古老的卷子,都是用一种从未见过的文字写成。他们把这批卷子运回欧洲,辗转请德籍著名梵文学家霍恩勒进行研究,最终证实这是一种已经失传多年的“死文字”。

彼得罗夫斯基等人的发现引起了西方探险家的注意,他们随后相继拥入和田地区。于阗古国,大体就在现在的新疆和田。探险家们在那里四处发掘,进行“卓有成效”的工作,很快就搜罗了一大批有关这种文字的资料和文献。这里要说的一个人物是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Sven Anders Hedin)(1865—1952),他出生于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的一个名门望族,他的家族与王室有密切关系。他年轻时曾去俄国巴库任家庭教师,1886年回国后,入斯德哥尔摩大学学习地质地理专业,获硕士学位后,又入柏林大学,学习地理学。1890年,他参加了瑞典王廷的波斯使团,受到土耳其皇帝和波斯国王的接见,这些经历使他对亚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当年,他在瑞典国王的支持下,开始了中亚的考察之行,并第一次从俄国进入我国新疆。

1893—1935年间,斯文赫定曾多次到我国新疆、内蒙古、宁夏、

西藏等地进行考察，搜集了大量有关地质、古生物、考古、动物、气象、古文字的资料，他发现了古楼兰遗址，并对塔里木河改道与罗布泊迁徙进行观测，提出罗布泊是以 1500 年为周期而东西移动的游移湖学说。他生前留下大量著述。

1927 年 4 月，中国学术团体协会与瑞典有关方面联合组成西北科学考察团。北京大学教授徐炳昶和斯文赫定分别担任中瑞双方团长，考察团赴内蒙古、甘肃和新疆考察。1930 年 4—5 月间，瑞方两名成员安博特和诺林在新疆阿克苏会合。他们由此出发，穿越塔克拉玛干沙漠，经麻扎塔格抵达和田，在那里考察了一年左右。他们在和田搜集到大批于阗古物和文书，这些文物全被他们带回瑞典，以“赫定收集品”为名，入藏了瑞典民族学博物馆。这批文书中最为珍贵的是，有一组汉文—于阗文双语文书，一共有 7 件。这批双语文书对于阗文字的识别、文献的年代，对研究中原王朝与于阗古国的关系，以及塔克拉玛干沙漠的变迁等都至关重要。

斯文赫定 1952 年去世，他生前委托英国语言学家贝利帮助解读“赫定收集品”中的于阗文文书。这批文书 1961 年才在贝利的《于阗语文献》卷 4 上公之于世。汉文部分由德国汉学家哈隆释读，英国汉学家蒲立本讨论了文书的年代。20 世纪 80 年代初，有关于阗文写卷的年代学问题成为学界讨论的热点，同时这一问题也开始引起我国学者的关注。1981 年，黄振华先生撰写了《于阗文及其文献》一文，详细介绍了国外于阗文写卷研究的情况。目前国内对这批双语文献研究作出重要贡献的学者当推北京大学的张广达和荣新江，他们发表的《关于和田出土于阗文献的年代及其相关问题》，将这一研究推向深入。荣新江 1985 年曾到瑞典民族学博物馆调查，他从该馆的一份《瑞典所获新疆出土文献草目》中查到，这批双语文书主要是 1929—1932 年间，安博特在新疆考察时所获，它们主要来自策勒县东北沙漠的老达玛沟遗址。汉堡大学的格罗普博士、张广达、荣新江等人经考证，认为这批双语文书的

年代约在公元7或8世纪，相当于于阗王尉迟曜统治时期。

根据已发表的材料可知，于阗文文献的出土地点主要在今新疆和田、巴楚、图姆舒克、木头沟和甘肃敦煌等地，年代约在5—10世纪。在于阗地区，还曾发现约属3世纪的一种汉佉二体钱，也发现过佉卢文文献和佛经。现有的于阗文文献，有不少文书掺用汉文，使用汉文年号，甚至是汉文和于阗文共同书写。于阗文书中还有许多名称使用汉语，如长史、节度使、宰相、都督、判官、夫人、大德、世尊等，说明当时于阗地区与内地政府的政治文化关系相当密切。

经过系统深入的研究，古文字学家们基本达成共识，于阗文确实是一种已经死亡多年的未知文字，它是继佉卢文之后在于阗地区通行的文字，大约流行于5—10世纪之间。由此可知，最早在古代于阗地区通行的是佉卢文和汉文，其后才是于阗文，而且也是和汉文并用。与佉卢文字略有不同的是，于阗文并非源自阿拉米文字，而是一种源自印度婆罗米字母笈多王朝字体的音节文字。古代时期，这种文字有三种写法：楷书、草书和行书，字多合体连写。同印度的婆罗米文字一样，于阗文也是采用附加符号表示元音。

于阗文是一种相当成熟的文字，词类有名词、代词、动词、数词、形容词、副词、前置词、后置词、连接词等。名词都有性、数、格的变化，代词可细分为人称代词、物主代词、指示代词、疑问代词。形容词和名词的界限不十分清楚，也有格的变化。形容词还有比较级和最高级的区别。动词有人称、时、式和态的变位，此外还有后缀。于阗文因发现于中国新疆于阗地区而得名。玄奘在《大唐西域记》中称于阗国“仪形有礼，风则有纪，文字宪章，聿遵印度，微改体势，粗有沿革，语异诸国”，这是关于于阗文字的最早记述。吐蕃文《于阗国悬记》亦谓“其文字悉同身毒（印度），习尚大有华风”。可见印度文化对于阗地区有着深远的影响。

于阗文也叫于阗塞文，是古代“塞人”使用的一种拼音文字，用

来记录古代塞人的语言。于阗文所记录的语言今称于阗语，也叫于阗塞语。此外还有北雅利安语、东伊朗语、印度斯基泰语等名称。于阗语属印欧语系伊朗语族东伊朗语支东南语组，现阿富汗边境的瓦罕走廊有一支民族使用的瓦罕语，与于阗语有很多共同点。

塞人又叫“塞种”，西方古典作家称其为斯基泰人，波斯人称之为“塞卡人”，是分布于中亚、西亚广大地区的古代游牧民族，其中一部分曾散居于中国西部，游牧于今伊犁河流域和伊塞克湖一带。塞人属伊朗族，语言属东伊朗语。公元前 2 世纪，居住在敦煌、祁连之间的大月氏人受匈奴攻击西迁，进入塞人地区，塞人战败四散而逃。一部分南下，越过葱岭后，进入印度。一部分进入天山以南各地，他们与月氏、乌孙、吐火罗等族有血缘联系，长期以来接受伊朗和希腊文化的影响，对当时东西方经济、文化的交流起了促进作用。还有一部分进入帕米尔高原，与当地的土著羌人杂居，成为当地的重要部落。考古发现与语言学资料和文献资料的记载基本吻合。

于阗文对当地周边和以后帕米尔高原的语言文字产生过重要影响。后来定居于葱岭地区的古代少数民族部落的语言文字，如阿富汗语、识匿语、雅兹古列姆语、伊什卡什姆语、瓦罕语都与于阗语有着密切的关系。于阗文字还对当时活跃于葱岭和阿里之间的藏人文字产生过深刻影响，于阗文有很多字母与古藏文相似，附加的元音符号也与古藏文完全相同。有些古文字学家认为：于阗文字很可能是古藏文之所本。

于阗文何时“死亡”，目前学术界尚无定论。一种传统的意见认为，随着回鹘人，特别是蒙古人入居新疆，他们开始大范围接受阿拉伯文化和宗教的时候，这种语言开始退出历史舞台。近年的考古发现也证明，于阗文退出于阗地区后，那里开始流行察合台文。某一地区的民族征服、政权更迭，都会引起语言文字的改变。

目前发现的于阗文文献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佛教典籍，一类是非佛教典籍。两种文献的资料价值都比较高。佛教典籍的数量比较多，著名佛经有《金光明经》、《妙法莲华经》、《金刚般若经》、《般若婆罗蜜多经》、《佛说无量寿经》、《贤劫经》等。这些可以反映出当时于阗国佛教之盛，同时为我们研究于阗国史和佛经版本流传史提供了重要的文献例证。

非佛教文献方面，主要有敕令、奏报、书信、医书、文学、词汇集等。最具影响力的是《钢和泰藏卷》，因原件为钢和泰所得而获此名。这件文书一面是于阗文，另一面是古藏文。于阗文共有 73 行，1～51行的内容为于阗使臣所写的沙洲行记，主要记述沿途的城镇村落，以及在沙州佛寺施财建塔、装饰金身的情况。学者就文中内容推断出当时的于阗王为李圣天。这件文书的主要价值，在于说明于阗在李圣天统治时期还通行于阗语，居民仍主要为塞人，尚未伊斯兰化。此外，于阗文中有关世俗的文书，比较重要的还有《七王子伴使致于阗王奏报》、《七王子致于阗王书》、《使臣奏甘州突厥动乱》、《使臣致于阗王奏报》。这几件文书内容密切相关，均出自敦煌，主要是两位使臣向于阗王报告伴送七位王子出使的经过以及七位王子致于阗王的书信。这些书信解读后，使我们了解了如下的一个历史故事。

大约在北宋端拱二年(989)，在西北茫茫的戈壁滩上，一行人正忍受着恶劣的自然条件，向东南方向艰难跋涉。这些人就是于阗使臣带领的队伍，他们奉于阗王之命伴送七位王子去天朝(即宋朝)进贡。行进途中，他们遭到仲云部落的抢掠，驼、马遭到损失，只好步行到沙州(今敦煌)。继续前行，又值甘州(今张掖)发生兵变，可汗被杀，道路受阻，只得绕道而行。13 位于阗使臣与 3 位来迎接的天朝使臣共携带了向天朝进贡的宝玉 600 斤。七王子致于阗王的书信，也是报告在沙州受困和到达朔方的情况。

这些信件反映出当时于阗对宋朝有纳贡关系。甘州事变不久，

于阗文　《于阗使臣致于阗王报》

甘州新汗登基。此时于阗老王退位、新王即位。甘州新汗致书于阗新王，要求重修旧好。就在此后数年，大约 11 世纪之初，于阗便为穆斯林所攻占，尉迟王系遂绝。这些文书很多反映了当时于阗与沙州之间政治、经济交往的情况，可补汉文文献未载之阙。

于阗文文献多为外国探险家所得，现分藏于英国、印度、俄罗斯、法国、瑞典、德国、美国、日本等国。最先研究于阗文献的是德国梵文学家霍恩勒，此后的研究者则有德国的洛伊曼、挪威的科诺、英国的贝利等学者。贝利教授潜心研究于阗文献四十余年，他从1945年起就将各国所藏的大部分于阗文文献转写发表，并将原件陆续影印刊布、汇辑成册。这些著作有《于阗文文献》(KT)6册(1945—1967)，《于阗文佛教文献》(KBT)1册(1951)，影印原件《塞克文献》6册(1960—1973)，《于阗文抄本》1册(1938)，《塞克文献译释》1册(1968)，《塞语字典》1册(1979)。贝利的学生厄麦里克，1979年著有《于阗文文献指南》，简述了于阗文献的研究概况。我国学者黄振华、岑仲勉、黄盛璋、张广达、荣新江等也在这方面取得一些重要研究成果。

本节参考文献：

1. 黄振华.于阗文及其文献.中国史研究动态.1981(3)
2. 黄振华.于阗文.见：中国民族古文字图录.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
3. 林梅村.西域文明.北京：东方出版社，1995
4. 陈良伟.寻觅消失的古代民族文字.见：历史考古卷.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01
5. 甘肃省社会科学学会联合会，甘肃省图书馆合编.丝绸之路文献叙录.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1989
6. 斯文赫定.亚洲腹地旅行记.上海：上海书店.1984
7. 斯文赫定.我的探险生涯.海口：南海出版公司，2002

第四节　突厥文(Turkic script)

突厥曾经是生活在我国西北的一个古老强悍的民族，相传他们的祖先与狼有着密切的关系。据说他们先祖的部落在与匈奴人的一次血战之后，几乎伤亡殆尽，只剩下一个几岁的小男孩。战后的暮色里，烟雾弥漫空中，小孩的哭声引来了狼群，为首的一只母狼用自己的奶汁将小孩喂养大。这小孩就成了后来突厥人的祖先。以后突厥的部落就用狼做自己的图腾。

突厥是古族名、国名，有广狭两义。广义包括铁勒、丁零、突厥各部，匈奴、月氏、柔然、乌孙也直接间接地参与了突厥民族的形成。狭义则专指6—8世纪在我国北方和西北建立的突厥汗国。突厥在6世纪兴起于金山(今阿尔泰山)西南麓，起先是柔然的锻工，为柔然打造武器和生产工具。因金山形似兜鍪(古战盔)，兜鍪发音为突厥，便以此为族号。

突厥曾发展得十分强盛，疆域最广时东起辽水，西抵里海，北越贝加尔湖，南达阿姆河，甚至有问鼎中原的力量。北齐、北周都争着与其结为姻好，厚输财物，博其欢心。隋末北边群雄蜂起，争事突厥，都想借其力量完成立国大业。雁北的刘武周就被突厥封为可汗，李渊亦在臣事突厥之列。唐朝的大将哥舒翰、藩镇史思明等著名人物都是突厥人。唐末李克用即为西突厥沙陀部人，他镇压黄巢起义，攻破长安，被封为河东节度使，后又封为晋王，其子建立后唐。后晋的石敬瑭，北汉的刘知远，都是沙陀人，他们与李克用并称沙陀三族。

突厥曾创制了自己的文字、官制、刑法、税法等。公元8—9世纪，突厥由于内讧等原因，渐渐衰亡，在漠北的势力为回纥所取代。

突厥失去政治上的力量，又不是一个经济共同体，它的文字语言便慢慢退出了历史舞台，文献也逐渐散失，不为人知，突厥文字随后成了一种死文字。我国史籍《周书》有："其书字类胡"的记载，《北齐书》有"后主命世清作突厥语翻《涅槃经》，以遗突厥可汗。"但并未见这种文字的具体材料。

1692年，20岁的彼得大帝推动俄罗斯向东发展，拓展俄国的领土。随着俄军越过乌拉尔山，进入西伯利亚的，有一位叫魏津的年轻的荷兰医生。后来，他在自己的游记《北部和东部的鞑靼利亚》一书中，首次提出，在西伯利亚广袤的荒原中，有很多古老的石碑，上面刻有许多难以辨认的文字。这一发现当时并没有引起重视。

1730年，瑞典人斯特拉连贝尔格(P.J.von)在《欧亚的北部和东部》一书中，又公布了在叶尼塞河上游发现的这种特殊的碑刻。1818年，俄罗斯人斯帕斯基在《西伯利亚通讯》杂志上发表了《西伯利亚古物札记》的长篇文章，再次提到西伯利亚的这种有特殊铭文的石碑，并将原文和图片都翻译成拉丁文，这次引起了西方学者的注意。不久，法国东方学者雷缪札著文指出：解读这种无法辨认的古文字，对于了解西伯利亚古代史具有重要意义。1884年，芬兰考古学家阿斯佩林出版了《叶尼塞碑文》，对这种文字进行了初步研究。

1889—1892年间，西方各国组成了很多探险队，深入西伯利亚，寻找刻有此种文字的石碑。外国探险队由于受到俄方的限制，并没有取得什么令人满意的成果。而俄国考古学家雅德林采夫率领的探险队则收获最大，1889年，他们来到了鄂尔浑河流域的和硕柴达木湖畔，在蒙古故都哈拉如林发现了唐开元二十年(732)建立的《阙特勤碑》和唐开元二十三年(735)建立的《毗伽可汗碑》，1891年，在翁金河畔的回鹘汗国故都哈拉巴拉哈逊(黑虎城)发现了《翁金碑》。这三块石碑，正面是那种人们无法辨认的文字，背面和侧面则是汉文。1890年，芬兰学者海凯勒也前往考察，他在唐代漠北回鹘首府哈拉巴拉哈逊，发现了唐元和九年(814)建立的《九姓回鹘可汗碑》，

该碑刻有突厥文、粟特文和汉文。这以后陆续还有一些发现，加上那些较短小的石碑，总数有七十余通。



突厥文　《翁金碑》

各碑虽刻有汉字，但与突厥文字的内容并不相同，不论怎样，这些汉文还是为解读碑文提供了重要的便利条件。1892 年，俄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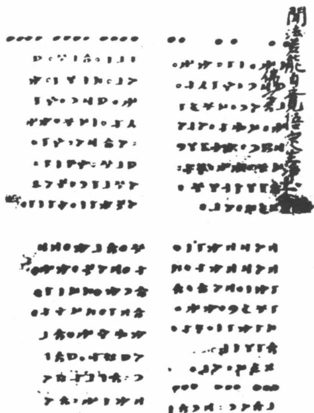
语言学家拉德洛夫和丹麦语言学家汤姆森分别开始解读这种文字,他们终于获得成功。经研究发现,这些文字正是人们已经忘却,却极想知道的突厥文字。1894年,汤姆森在哥本哈根刊行了自己的研究报告《鄂尔浑和叶尼塞碑文的释读——初步成果》,同年,拉德洛夫刊布了《蒙古古突厥文碑铭》,此时碑中的古代突厥文才为人们所知晓。

拉德洛夫曾将发现的突厥石碑刊布为《蒙古古物图录》。清光绪十九年(1893),俄国驻北京公使喀西尼将《图录》送清廷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请代为考释。当时总理衙门章京沈曾植即为《阙特勤碑》、《毗伽可汗碑》、《九姓回鹘可汗碑》三碑作跋,答复俄使,这是中国学者研究突厥文碑铭的开始。上述碑铭属于突厥汗国,文字主要记录的是突厥可汗或其大臣的生平事迹及武功。

其实,早在一千多年以前成书的新旧唐书中,就记载了《阙特勤碑》和《毗伽可汗碑》的立碑过程,及唐王朝派人参加建碑的史实。13世纪诗人耶律铸在《双溪醉饮集》中《取和林》一诗的自注中也明确提到过《阙特勤碑》,而且亲眼见过此碑。元代的陈宜甫也在诗中提及此碑,《四库全书》内《秋严诗集》中收有此诗。当时的文人学者尚不大了解此碑的学术价值,所以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

《阙特勤碑》建于732年,有汉文和突厥文,但内容不同。突厥文部分正文共66行。内容是以毗伽可汗的语气记述其弟阙特勤的功绩。毗伽可汗开头回顾了突厥汗国的兴亡史,描述了建国和复国之难。号召人民警惕,勉励贵族、大臣奋发图强。其次略述自己登位以来的功劳。接着记述阙特勤的生平事迹。最后叙述自己对其弟去世的悲痛心情,及各国前来吊唁的情况。《毗伽可汗碑》也是用汉文、突厥文书写的,突厥文部分共80行,建于735年。主要内容是毗伽可汗自述他的功绩,其中有两大段与《阙特勤碑》内容相同。讲述立国的艰辛,要人民汲取历史教训。最后说明立碑是为了让突厥人民长期看到他的这些话。

除了石刻碑铭以外，突厥文字的写本也有发现。主要是斯坦因在敦煌千佛洞发现的《占卜书》，在新疆米兰出土的一些军事文件，在吐鲁番等地也发现过一些写本。这些碑铭和写本，现均保存在国外。国外对突厥文字的研究有较长的历史，获得很多成果，研究目前还在向深入发展。通过系统研究，人们已经能够基本释读突厥文字。我国学者亦有王国维、韩儒林、岑仲勉、王静如、耿世民等参与研究。1977 年，中央民族学院编印了《古突厥文献选读》，其中就有耿世民关于古突厥文碑铭的译文。



突厥文 《占卜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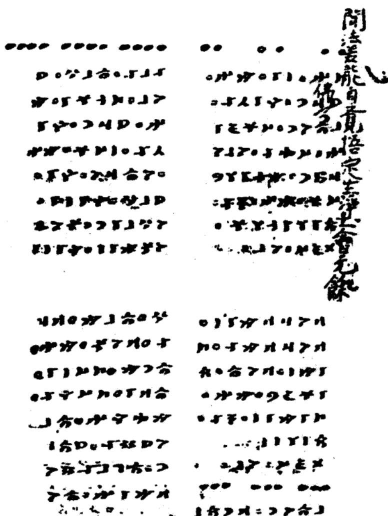
突厥文是古代突厥民族使用的一种拼音文字，由于它与古代北欧日耳曼民族使用的如尼文外形相似，所以又被称为“如尼文”或“鲁尼克文”，也有人称之为“突厥如尼文”。根据这种文字的发现地，也有称它为“鄂尔浑—叶尼塞文”的。此外，它还有“蓝突厥文”、“西伯利亚文”等名称。

突厥文是一种音素、音节混合型文字，在不同地区和不同时期所使用的字母数目和形体也不完全相同。一般为 38 至 40 个字母，其中许多字母在不同文献中有变异，有时一个字母的变体多达五六种。它由 4 个元音和 34 至 36 个辅音组成。元音字母在一定条件下常被省略，34 或 36 个辅音字母中，23 个源于阿拉米文字字母，其余的来自突厥人使用的氏族或部族标志，及一些现实生活中的表意符号，如半月、箭镞、毡房等等。突厥文通常是从右向左横写，但也有从左向右横写的。字母不连写。词与词之间用类似冒号的两点隔开，有时词组也写成一个词。

突厥文字的主体字母使用阿拉米文字字母，表明它是以阿拉米文字作基础的。同时辅音中又有源自本民族生活中的一些因素，说明它在融入外来文化的同时，也吸收了本民族的文化。突厥文字是以阿拉米文字为基础形成的符合本民族语言习惯的一种新文字。活跃于漠北草原的突厥民族，何以与远在伊朗的阿拉米文字发生直接联系？突厥民族何时开始使用这些文字？这些尚为千古之谜，由于资料缺乏，至今无从考据，学界为此也争论不休。有人认为，突厥人最初生活在高昌国之北，经常与前来经商的粟特人交往，由于粟特人使用阿拉米文字，于是突厥人也在 5 世纪前后开始受到这种文字的影响。还有人认为，大约在 6 世纪中叶，统治突厥的木杆可汗征服了中亚细亚的七河流域，在那个时候接触并使用了阿拉米文字。

突厥文退出历史舞台的时间目前也还没有确定。这种文字起初只在突厥人中使用，随着突厥势力的扩大，开始在被征服的黠戛

斯和回鹘等民族中广泛使用。8世纪中叶，突厥逐渐衰落，回鹘人建立起强大的汗国，取代了突厥的统治。9至10世纪，突厥文字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



突厥文　《解梦书》

历史上，突厥人曾先后使用过粟特文字、突厥文字、回鹘文字和阿拉伯字母等多种文字。我国古代有一部著名的《突厥语大词

典》,是由中国古代的突厥语文学家马合木德·喀什噶里于回历466年(1074)编写的。作者出生于喀什噶尔(今新疆喀什)的一个乡村——乌帕尔。乌帕尔这个地名现今还保留着,属新疆疏附县。马合木德·喀什噶里在喀什噶尔受过系统教育,年轻时游历了今新疆、中亚各地,考察记录了从伊犁河、阿姆河到锡尔河之间广大区域中突厥各部的分布和社会情况以及语言上的差异,最后来到当时伊斯兰文化的中心哈里发阿拔斯的都城巴格达编成此书。

《突厥语大词典》是一部用阿拉伯字母拼写突厥语,并用阿拉伯文解释的词典。全书收词7000多条,根据词的语音结构分为8卷。这是世界上第一部突厥语词典。全书各部分的词按语音结构类型和阿拉伯字母的顺序排列,例句丰富,注释详细。内容涉及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和自然环境诸方面。除对每个突厥语词进行诠释外,还记录了天文、地理、历史、宗教、民俗、哲学、艺术等多学科的珍贵资料,成为研究古代突厥语言和喀喇汗王朝的宝贵资料。《突厥语大词典》最早以手抄本流传,现存的最早抄本,是1266年波斯人穆罕默德·柏克尔根据原件所抄,抄本现藏土耳其伊斯坦布尔的民族图书馆。1917—1941年由土耳其铅印刊布,迄今已有各种译本问世。1981年以来,我国也陆续出版了维吾尔文的三卷译本。学术界对这部巨著评价甚高,称其为突厥语族古代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并从多方面对其进行研究,同时也利用它写出了很多研究著作。

现代突厥语族语言分布在西起巴尔干半岛,东至西伯利亚东部的勒纳河,南临阿拉伯半岛,北到新西伯利亚群岛这一广大地区,包括中国、俄罗斯、土耳其、哈萨克、吉尔吉斯、土库曼、乌兹别克、阿塞拜疆、塞浦路斯、伊朗、伊拉克、阿富汗、保加利亚、南斯拉夫、罗马尼亚、蒙古及地中海沿岸一些国家。全世界使用突厥语的总人数已经超过1亿。分布在国外的有30余个突厥语民族。我国有维吾尔、哈萨克、柯尔克孜、乌孜别克、塔塔尔、撒拉、裕固等7个突厥语民族,

他们居住在新疆、青海、甘肃、黑龙江等地。土耳其语是突厥语族中使用人数最多的语言，使用人口大约有5600多万，它也是最早成为独立国家国语的一种突厥语。西方突厥语学家，多是从学习研究土耳其语开始，进入突厥语文的研究。

本节参考文献：

1. 中国大百科全书·民族卷. 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
2. 陈宗振. 突厥文. 见：中国民族古文字图录.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
3. 岑仲勉. 突厥集史. 上下册. 北京：中华书局，1958
4. 王远新. 突厥历史语言学研究. 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5
5. 田继周等. 少数民族与中华文化.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
6. 李德洙主编. 中国少数民族文化史. 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
7. 陈宗振. 突厥文. 见：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会编. 中国民族古文字. 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
8. 陈宗振等. 20世纪我国阿尔泰语系语言研究概述. 见：中国民族研究年鉴2001年卷. 北京：民族出版社，2002

第五节　粟特文(Sogdian)

大约公元前6世纪，生活在中亚阿姆河和锡尔河之间的粟特人即建立了自己的国家，首都是阿弗拉西雅卜(在今撒马尔罕)。粟特人建立的国家位于今塔吉克斯坦北部和乌兹别克斯坦南部，在希萨尔山以北，以撒马尔罕、布哈拉为中心的地区。古时与花剌子模、帕提亚同属波斯阿契门尼德帝国，后归亚历山大帝国和塞琉古帝国(公元前3世纪)统治。汉时为康居属国，《后汉书·西域传》

所述康居属国粟弋即粟特。《魏书》始称粟特，谓其国商人先多诣凉土贩货，其王曾于魏文成帝初年遣使朝献。又谓北魏太延元年(435)至太和三年(479)粟特曾九度遣使朝贡。《周书》则谓其王曾于保定四年(564)遣使献方物。隋唐时期，中国史籍统称其为“昭武九姓”。8世纪上半叶，阿拉伯人入侵粟特，俘其王德瓦什梯奇，焚毁粟特都市喷赤干，其国遂亡。

粟特古国在汉文史籍中又叫“粟弋”、“速利”、“孙邻”、“苏哩”、“修利”或“窣利”等。粟特之称亦见于希罗多德的《史记》，匈牙利学者曾撰文论证“粟特”为古代伊朗语，意为“圣地”。

粟特人是使用东部伊朗方言的中亚古代民族，属于伊朗人种。他们是一个独具特色的商业民族，通过漫长的丝绸之路频繁往来于中亚与中国之间，成为中世纪东西方贸易的承担者。他们组成商团，东来贩货，许多人逐渐在经商之地留居下来，甚至建立起许多绿洲城邦。早在张骞通西域之前，他们就已经活跃在从撒马尔罕到楼兰的古代商道上。东汉初年，粟特人已深入黄河流域，开始在长安和洛阳经商。有的商人甚至在中国内地安家落户，置业经营。在南北朝到唐朝时期，沿丝绸之路及周边的于阗、楼兰、高昌、敦煌、武威、长安、洛阳、太原、柳城等大小城市，形成了一个个移民聚落。

学术大师陈寅恪先生早在五十多年前就考证元稹《西厢记》中的崔莺莺原型即是中亚粟特移民的“酒家胡”女子。最近《文物》主编葛承雍先生又为此提出五点新证。据语言学家考证，古希腊和罗马的作家称中国为Seres(赛里斯)，即源于粟特商人对东汉首都洛阳宫殿的称呼。

丝绸之路是我国古代中西方经济文化交流的重要通道，粟特人主要活动于此。他们以经营我国丝绸为主，足迹东至我国内地，西至东罗马帝国，南达印度，北到漠北。粟特人在从事丝绸中转贸易的同时，还在欧亚内陆扮演着传播多元文化和多种宗教的角色，

对中西文化的沟通、交流起过至关重要的作用。他们主要信仰祆教。在敦煌长城烽燧下发现的粟特文古信札里，即可以确证祆教早在公元4世纪初就由粟特人带到了中国。粟特语大概是丝绸之路上最早通用的国际商语。由于粟特语通行于康居一带，所以也叫康居语，粟特人也称康居人。据语言学家研究，粟特人曾用粟特文、摩尼文和叙利亚文三种文字书写。后两种文字用于书写摩尼教、基督教文献。

随着粟特商人的活动，粟特语和粟特文字的影响日益扩大，粟特文还被用来创制回鹘文。祆教和摩尼教也用这种文字传到东方。也有人称粟特文为窣利文。古代突厥人在本民族文字尚不成熟的时候，也主要使用粟特文字。大部分专家都认为突厥第一汗国(552—630)的书面语就是粟特文字。回纥统治蒙古草原时，粟特文仍是官方文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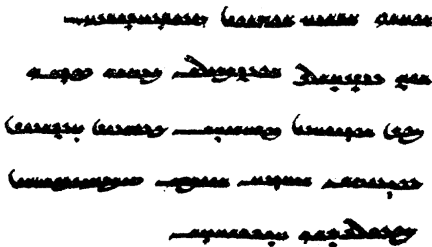
关于粟特及其语言文字，《大唐西域记》中即有说明：“自素叶水城至羯霜那国，地名窣利，人亦谓焉。文字语言，即随称矣。字源简略，本二十余言，转而相生，其流浸广。粗有书记，竖读其文，递相传授，师资无替。”

唐时，回纥极盛，其高级官吏，多为摩尼教士。摩尼教士又多为粟特人，其教徒在长安经营商业甚盛。由于教徒布道，商贸往来，粟特语及其文字在丝绸之路上广为应用。很多宗教都有粟特文译本。从伯希和、斯坦因所获之粟特文书中，可知粟特人曾于公元7世纪初，在罗布泊之南建立过一个政权组织，历经一个世纪之久。可见粟特人行迹之广，语言文字流行范围之大。

8世纪阿拉伯人侵入中亚后，粟特人逐渐伊斯兰化。1220年，成吉思汗西征中亚，粟特国亡，粟特文字随之消失。现存伊朗语与粟特语最相近者为雅格诺布语，操使此种语言的人口约有2000人，居于雅格诺布河和瓦尔佐布河地区(在塔吉克斯坦首府杜尚别之北)，似为粟特遗裔。现中亚乌兹别克斯坦泽拉夫善一带居民的

语言中,也保存有少数粟特语。

粟特人在中国境内翻译了大量佛教、景教、摩尼教经典,在中西文化交流上起了重要作用。大量的粟特文文献,也为研究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宗教提供了有用的资料。在我国发现迄今所知年代最早的粟特文文献,是斯坦因1906年在敦煌附近汉代长城烽火台遗址所获的一批信件。此即后世聚讼纷纭的《粟特古书简》,这批信件共有8封,极有历史价值。其中一封记述了洛阳遭大火焚烧及许多天竺人和粟特人因饥荒饿死洛阳之事。这究竟指洛阳史上的哪个事件,目前学界还未形成一致意见。有人认为是东汉末年董卓之乱,还有人认为是西晋永嘉之乱。



粟特文 《回鹘语文献残片》

斯坦因在楼兰到和田的古代遗址中发现的粟特文书,大都为商业文书。敦煌藏经洞的粟特文献主要是佛经。吐鲁番发现的粟特文献最为丰富,有佛教、摩尼教、景教写经,买卖契约等。佛教文献一般为8—9世纪的,其中篇幅最长的是《须大拿太子本生经》,

有34页，约1500行，直接从梵文译出。其余《佛说善恶因果经》、《维摩诘经》等，是从汉文佛典译出。摩尼教经典产生年代约为8—10世纪，是从钵罗婆语（即中期波斯语）或安息语经典译出，重要的有《巨人书》、《福音书》。景教经典均译自古叙利亚经典，最早的属6世纪，最晚的不迟于11世纪，重要的有《新约》残卷。高昌古城郊外的一处景教遗址曾出土用古叙利亚文体拼写粟特语的景教文献。这些文献现分藏于英、法、德、俄诸国。近年我国新疆也有一些粟特文文献被发现。

随着东西方贸易的增长，粟特人经商的足迹几乎遍及丝绸之路的各条路线。然而，在粟特人的家乡撒马尔罕仅发现很少的粟特铭文。1933年，终于在塔吉克斯坦的穆格山发现了一大批8世纪的粟特语文献，这便是著名的穆格山文书，据说是被阿拉伯人俘杀的喷赤干统治者粟特王德瓦什梯奇的档案。20世纪80年代初，在印度河上游丝绸古道旁的山崖上发现了数以百计的粟特文题记。此外，在南西伯利亚、蒙古草原和天山北麓昭苏地区的突厥石人及石碑上不断发现长篇粟特文铭文。

粟特文铭文中最为重要的是1890年由芬兰考古学家海凯勒在黑虎城附近柴达木河畔发现的九姓回鹘可汗碑。此碑立于唐元和九年（814），碑上刻有汉、突厥、粟特三种文字。这座碑是古代漠北回鹘政权第9世毗伽可汗在位时所立的纪念碑，因年代久远，碑面损坏严重，保留下来的粟特文仅剩下半块多一点，而汉文部分保留比较完整。碑文内容大意是追述先世葛勒可汗、牟羽可汗参加平定安史之乱的功绩；颂扬牟羽可汗将摩尼教从内地传入回鹘地区；赞扬保义可汗出兵西域的事迹。此碑对研究回鹘民族历史有重要价值。

再有就是1956年在蒙古人民共和国后杭爱省呼尼河流域布古特附近发现的6世纪时突厥第一汗国碑铭，碑上铭刻的是粟特文字，这块突厥可汗纪功碑，是我们目前所知突厥人最早的文字材

料，它记录了一千四百多年前称雄蒙古草原的突厥汗国政治、宗教、语言和文化的真实风貌。布古特碑呈长方体，四面均刻有铭文，碑体已断为三节。碑上方雕有表现突厥王族图腾的母狼，碑三面为粟特文，直书29行，一面为婆罗米文，横书20余行。这些说明粟特语当时是我国西北的重要语言之一，突厥人也使用过粟特的语言和文字。

粟特语属印欧语系伊朗语族东伊朗语支，文字则是在古波斯安息王朝的官方文字阿拉米文草书的基础上，根据粟特语发音特点创制的。玄奘在《大唐西域记》中曾对粟特文字作过简要记述，指出它是一种拼音文字，有20多个字母，竖读其文。粟特文起源于阿拉米字母，是在波斯-阿拉米文字的基础上产生的。波斯-阿拉米文字是东线阿拉米文字体系中四支文字的第三支，第一支是希伯来方形文字，第二支是巴利米拉文字，第四支是那巴泰文字。尽管粟特文属于第三支，它与第二支巴利米拉文字，即叙利亚、巴勒斯坦文字的亲缘关系也十分密切。在东方，阿拉米文字是在腓尼基字母的基础上创制出来的，大部分亚洲的字母——音素文字及某些音节文字都源于阿拉米文字。所以，大部分东方的拼音文字体系，在某种程度上还保留了腓尼基文字的辅音原则。

中国境内发现的粟特文献主要有三种字体，即佛经体（也叫标准体）、古叙利亚体和摩尼体。佛经体与安息语字体最近似。古叙利亚体为景教徒所用，为适应粟特语音，字母略有增删，基督教经典使用这个字体。摩尼体与中期波斯摩尼体相同，用于书写摩尼教经典，摩尼教经典也有用其他字体的。此外还有一种老粟特体，近似佛经体，斯坦因在敦煌发现的那批信件，就是使用的这种字体。

粟特文因字体不同，字母数及音值也各异。佛经体字母有17个，古叙利亚体字母有22个，摩尼体有字母29个。粟特文献中还常见一些阿拉米语借词，这些词转写时都大写。粟特文一般是自右向左横写，后来受汉文化的影响，也改成自上而下竖写，如布古

粟特文　《青颈观自在菩萨心陀罗尼经》

特铭文。

粟特文对回鹘文字的创制产生过重要影响。粟特人长期在东西方之间奔走经商,他们的语言文字为漠北各民族所熟知。摩尼教传入回鹘后,粟特文字在回鹘民族中的使用很快扩大了,先是摩尼教师使用粟特字母拼写回鹘语言,再经回鹘民族的使用发展,最后创制了回鹘文字。在回鹘民族西迁的时候,回鹘文字最终定型,并开始大规模使用。

对粟特文的研究是从 20 世纪初开始的。1904 年,德国人缪勒即对摩尼教经卷展开研究,认为这是一种钵罗婆语方言,后来安德累斯确认其为粟特语。1907 年,俄国人萨立曼公布了自己对景教经典的研究成果,举出了粟特语的语法特征及其与现代雅格诺布语的关系。1910 年,法国人哥底奥确认粟特字母起源于阿拉米字母。自从 1906 年,斯坦因在敦煌获取粟特信件后,西方一批学者对这种文

字进行了考释,并陆续出版了一批研究成果,这种文字已能够被释读。中国近年也有人在研究这一文字。

近年来,有关粟特人进入中国的出土文献资料和考古文物实证不断被发现。特别是西安北周安伽墓、史君墓、太原隋虞弘墓所出石刻图像,内容涉及多层次胡汉文化交融,内容丰富,内涵深刻,对深入研究粟特人的信仰、艺术和生活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这些发现进一步推动了国际学术界研究的热潮,并使粟特文化研究成为当前最受关注的前沿领域之一。

本节参考文献:

1. 龚方震.粟特文.见:中国民族古文字图录.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
2. 中国大百科全书·语言文字卷.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8
3. 王远新.突厥历史语言学研究.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5
4. 甘肃省社会科学学会联合会,甘肃省图书馆合编.丝绸之路文献叙录.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1989
5. 黄振华.粟特文.见:中国民族古文字.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

第六节　回鹘文(Uighur script)

回鹘是维吾尔族的祖先。回鹘原为我国古代北方与西北操突厥语的一支民族,同时也是这一民族在漠北建立的游牧汗国的名字。回鹘在北魏时期是铁勒的一部,为九姓铁勒之一。其先世可以追溯到汉魏时期的丁零和春秋以前的狄。回鹘在北魏时称袁

纥、乌护，隋代作韦纥，唐初名回纥，又作乌纥。还有的史书上称畏兀儿。这些都是维吾尔的汉译名。公元 788 年，回纥可汗在给唐朝的文书中，请改称回鹘，取"回旋轻捷如鹘"之意。至此便有了回鹘的正式称呼。

回鹘早先游牧于鄂尔浑河和色楞格河流域，处于突厥贵族的统治之下。唐大业年间，605—618 年，回鹘逐渐强大，联合周边部落仆固、同罗、拔野古等，建立同盟，总称回纥。他们先是联合南面的铁勒另一大部落薛延陀，与唐军共同攻灭了东突厥，后又助唐攻灭薛延陀。656 年，回纥又动员 5 万铁骑助唐灭西突厥，从此回纥即占有原来东、西突厥的广大土地。8 世纪中叶，回纥在唐朝帮助下消灭了后突厥的残余势力，建立起游牧封建汗国，从 744 年到 840 年，享国近百年。回纥与唐朝关系密切，可汗接受唐朝封号，从唐朝内地传入的摩尼教成为回纥国教，文字主要使用突厥文和粟特文。

9 世纪中叶，因内乱、天灾、瘟疫，回鹘国势衰落，被漠北的另外一支少数民族黠戛斯所破。回鹘一部分人归附唐朝，其余 15 部由贵族率领，分三支向西迁徙，和西域原住的同族人汇合，先后建成三个政权，即高昌回鹘、河西回鹘（甘州回鹘）和喀喇汗王朝（黑汗王朝）。

高昌回鹘是回鹘西迁、汇合后主要的一支。直到元代，它都自认是回鹘的嫡系。高昌回鹘王国（约 850—1250）的疆域东至哈密乌纳格什河，西抵天山西部，南接酒泉，北达天山北麓。它在具有较高文化的原住民（如古代龟兹人、焉耆—高昌人和汉人）的影响下，逐渐从游牧转向定居的农耕生活，商业、文化都取得长足进步。这时，原来在部落里流行的突厥文已经无法使用了，因为突厥已经衰亡，这种文字缺少生命力，新融进回鹘的少数民族和当地土著都不能使用这种文字。高昌回鹘汗国为适应自身经济文化的发展，就要创制适合新形势的文字系统。于是，在原来使用的文字基础上，高昌汗国创制了回鹘文字。

回鹘文 《乌兰浩木碑》

对回鹘文的起源有不同说法，俄国考古学家、语言学家拉德洛夫认为回鹘字母来源于叙利亚文字。因为景教徒使用叙利亚文，唐朝时使这种文字通过西域东传，回鹘人信仰景教，于是据叙利亚文创制了回鹘文字。景教属于基督教的聂斯脱利派，唐太宗贞观年间(627－649)传入我国内地，后中断，但仍在契丹、蒙古等地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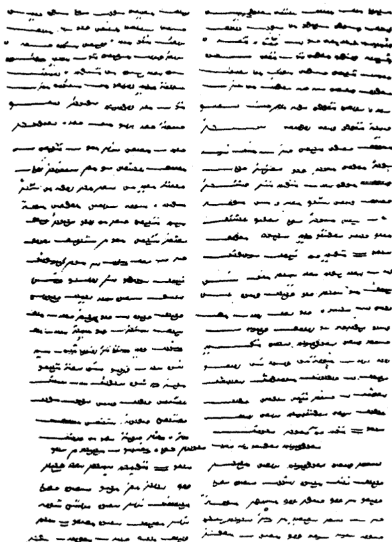
行。元代蒙古入主中原,该教重又进入,并与当时的天主教合称为也里可温教,元亡后中断。我国学者李符桐1944年在《边政公论》上撰文认为,回鹘文是摩尼教徒从索格特(Sogd)文字合并出来的。而索格特文字,现仍流行于中亚撒马尔罕一带。回鹘统治新疆建畏兀儿王朝时,其高级官吏多为摩尼教徒,故作者认为回鹘文仿自索格特文字,中介者为摩尼教徒。德国东方学家米勒等则认为,回鹘文是根据粟特文(窣利文)创制的。公元初,在波斯－阿拉米文的基础上产生的粟特文,是回鹘文的基础,此说已为学术界所接受。

回鹘文何时产生,目前尚无定论。据专家分析,大约在8世纪,回鹘文开始广泛使用。10世纪下半叶,伊斯兰教传入新疆南部,那里的回鹘人开始使用阿拉伯字母。14、15世纪时,在伊斯兰教影响下,回鹘文逐渐废弃不用,而代之以阿拉伯字母的文字。但回鹘文并未完全退出历史舞台,在吐鲁番地区出土的一些文书,还有明代的《高昌馆来文》,表明回鹘文的使用在吐鲁番、哈密一带延续到14、15世纪。在甘肃酒泉附近发现的回鹘文译本《金光明最胜王经》,成书于清康熙二十六年(1687),证明回鹘文的使用延续到17世纪。

回鹘文是在粟特文的基础上形成的,但由于回鹘人此前也曾大量使用突厥文,所以也在一定程度上参考和吸收了突厥文的某些因素。粟特文和突厥文都源于阿拉米文字,有很多共同特点。回鹘文兼收了它们的优点,又适合本民族的文化传统。它一方面承袭了过去回鹘贵族使用突厥文字的历史因素,一方面又适应了当地土著使用粟特文字的习惯,所以一经推行,很容易就普及开来。

回鹘文很快成为高昌回鹘汗国境内的流行文字,并且影响越来越大。稍后13—15世纪的察合台汗国、钦察汗国(金帐汗国)和帖木儿帝国都曾经将这种文字当作官方文字使用。例如现存金帐汗国时代的《铁木耳库特鲁扎令》、《托赫塔迷失扎令》都是用回鹘

文写成的。在帖木儿王朝时代，许多原来用突厥语写成的伊斯兰时期的著作，都用回鹘文重新抄写过。回鹘文《福乐智慧》一书的维也纳本就属于这一时代。



回鹘文 《福乐智慧》维也纳抄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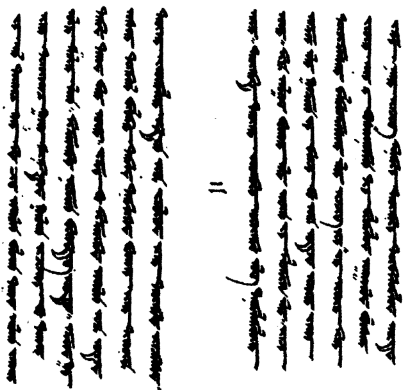
以后契丹人曾用回鹘文字母创制契丹小字。女真文(形仿汉字而音仿回鹘文)也受到回鹘文的影响。13世纪,雄踞漠北拥有中亚细亚辽阔土地的蒙古人,在回鹘文的影响下,创制了自己的文字,称回鹘式蒙古文,经过若干变化,形成现代蒙古文,至今仍在蒙古族中使用。16世纪,满文、锡伯文也在回鹘文的间接影响、蒙古文的直接影响下形成。在吐鲁番、哈密一带,回鹘文一直使用到15世纪。

回鹘文是一种音素文字,因年代不同,各时期字母的数目也不尽相同。最少时有18个字母,最多时达23个字母。23个字母中,有5个表示8个元音,18个表示22个辅音。早期文献中,有的字母表示两个以上的语音,后期文献中,在相应字母的左方或右方加一个或两个点予以区别。字母分词首、词中、词末等形式。以一至两个点作句读符号。在摩尼教文献中,还在句读符号上加红色圆圈。段落用对称菱形的四个点隔开。字体分印刷体和书写体两种,书写体又分楷书和草书,楷书用于写经,草书用于一般文书。行款起初从右往左横写,后改为从左往右竖写,即我们通常所见的回鹘文献。

回鹘文是中亚操突厥语诸民族在采用阿拉伯字母文字之前使用最广、保留文献最多的一种文字。回鹘文文献主要有贝叶式、卷子式、折子式和册子式四种形式,内容主要是宗教、文学、医学、公文、契约、碑铭等。

回鹘人本来信仰萨满教,也有部分信仰景教,后来从唐朝内地传入的摩尼教成为回鹘的国教。摩尼教是波斯古代宗教之一,公元3世纪由摩尼创立,吸取琐罗亚斯德教、基督教、佛教以及诸斯替教部分思想形成教义。曾在我国内地流传,旧译明教。再后回鹘人又改信佛教,最后为伊斯兰教所代替。回鹘文留下的宗教文献很多。景教的有《福音书》、《圣乔治殉难记》等。摩尼教的有著名的《摩尼教徒忏悔词》、《二宗经》等。佛教文献分为大乘教佛典

和小乘教佛典，属于大乘教的有《金光明经》、《俱舍论》等；属于小乘教的有《阿含部诸经》，此外还从藏文译出一部分密教文献，如《阿弥陀经》等。早期回鹘文佛经和摩尼教文献一样，属于 n 方言，保存了较多古语特点。后期的大多数佛经则属于 y 方言。早期伊斯兰教的文献有《帖木耳世系谱》、《圣徒传》、《升天记》、《心之烛》、《幸福书》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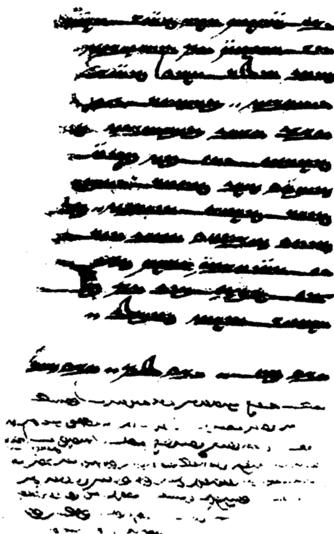
回鹘文 《金刚经》

说起回鹘佛教文献的发现，还有着一段惊心动魄的历史。11 世纪初，已经完全伊斯兰化的喀喇汗王朝，以南疆喀什为跳板，经长期“圣战”，在 14—15 世纪时，完成了对天山南北地区的征服。

随着伊斯兰教的传入,阿拉伯字母逐渐取代回鹘文,形成了后世所谓的察哈台文。长期的圣战使佛经遭到严重的人为破坏。近代以来,考古学家在对吐鲁番、库车等地的古代佛寺遗址进行清理时,常常看到大量被撕碎的佛经浸满鲜血压在被屠杀的僧侣身下,那些尸骨缺头断臂,其状甚惨。经过几百年的岁月,经文、尸骨、泥块混在一起,现在我们还可以看到高昌故城西北角的墙壁上残留的焚烧痕迹,据认为这可能就是当年最后一批回鹘佛教寺院。焚毁后的寺院墙倒屋塌,一小部分未被烧尽的文献压在下面,才得以保存至今。当然,在敦煌、哈密、库车等地还出土了一些保存比较完好的大部头回鹘文佛典。

回鹘文译出的佛教经典很多。9—15世纪之间,回鹘人差不多将《大藏经》经、论两部分的重要经典都译成了回鹘文。回鹘文佛经中有多种本生故事、譬喻故事、因缘故事,极富文学价值。其中《弥勒会见记》是目前所存篇幅最大、数量最多的佛典之一。它可以说是我国最早的原始剧本,由1幕序文和25幕正文组成。《弥勒会见记》最先在上个世纪初,由勒柯克率领的德国考察队发现。他们在吐鲁番的木头沟和胜金口发现了不少这部佛典的残叶。这些文献现均藏于德国。1959年4月在哈密又发现较完整的写本。学者对这部佛教故事剧本成书的年代有多种意见,认为在8、9、10世纪的都有。《弥勒会见记》不靠说教,而是运用舞台表演形式,通过剧中塑造的典型人物和充实完美的情节,把佛教理论变成让人赏心悦目的故事来进行宣传。剧本原为梵文,后被译为吐火罗文,再后被译为回鹘文。现存世的吐火罗文《弥勒会见记》也有好几种写本,长达27幕,比回鹘文的多了两幕。剧本也为我们研究古代文字提供了重要的互证参考。

回鹘文重要的翻译家有生活于10世纪的回鹘僧人胜光法师、诗人安藏、必兰纳识里等。胜光法师不仅翻译了大量佛经,如《金光明最胜王经》等,还曾翻译有重要唐代文献《玄奘传》。唐玄奘法



回鹘文 《妙法莲花经文赞》

师西行求法,周游五天竺,前后17年,亲历100余国,回国后口述,由其弟子辩机整理成《大唐西域记》12卷。玄奘去世后,他的弟子慧立于665年根据其西行印度的传奇经历,著成传记5卷。

三年后，大师的另一弟子彦悰又补缀5卷，增述大师归国后的生活，合为10卷，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说《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简称《玄奘传》。由于书中有很多内容不见于《大唐西域记》，故十分重要，成为前书的姊妹篇。时过三个世纪，想不到这部书被译成回鹘文流行于世。

回鹘文公文中最有代表性的是《高昌馆来文》，这是明代四夷馆编辑的一部新疆各地（以吐鲁番地区为主）向明廷朝贡的公文集，回鹘文和汉文对照书写。此书版本很多。与此相关联的还有一部《高昌馆杂字》。这是一部收录奏折用语编成的分类词汇集，也是汉文、回鹘文对照书写，有明清两代的抄本。

回鹘文写成的文学作品有《福乐智慧》、《真理的入门》、《乌古斯可汗传说》、《伊索寓言》、《古代吐鲁番民歌》以及花剌子米、鲁特非等人的诗篇等。

用回鹘文写成的医学文献有《细达撒拉》等。还有一些碑铭，如乌兰浩木碑等。此外还有200多件出土的社会经济文书。20世纪初出土的大量回鹘文献多存于欧洲各国。

早在19世纪上半期，德国学者克拉普罗特就根据我国明代编写的回鹘文《高昌馆杂字》抄本，对回鹘语文进行了研究，并于1820年出版了《回鹘语言文字考》。这之后，德国、法国、俄罗斯（包括前苏联）、土耳其、日本、美国等国的学者在回鹘文这一领域的研究相继取得重大成果，他们也先后刊布了多种回鹘文文献。中国以冯家升、耿世民为代表的一批学者也对回鹘文献的研究作出了重要贡献。在国内开创这一研究领域的是袁复礼先生，他1930年在新疆考察，发现了回鹘文写本《菩萨大唐三藏法师传》（残本），并有所考订，为后来冯家生先生的研究提供了素材。

1204年，蒙古在征服乃蛮部的战争中，俘获其掌印官塔塔统阿，成吉思汗令其用回鹘文拼写蒙古语，这种文字便形成了后来的回鹘式蒙古文，回鹘文本身的应用逐渐衰落。伊斯兰教在新疆取

代佛教之后，回鹘文遂逐渐为阿拉伯文所代替，回鹘文最后消亡。回鹘文虽然为阿拉伯文所替代，但与语言关系不大，只是以阿拉伯字母拼写回鹘语言而已，这就是文字虽易、语言仍旧的现象。

15世纪前后，随着察合台汗国势力的扩大以及察合台贵族后裔改奉伊斯兰教，一种深受伊斯兰文化影响的文字——察合台文产生，并逐渐取代了回鹘文成为西域流行的主要文字，回鹘文随之退出历史舞台。回鹘文在西域流布的时间虽然不长，但却产生过重要的影响。

本节参考文献：

1. 耿世民．回鹘文．见：中国民族古文字图录．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
2. 陈良伟．寻觅消失的古代民族文字．见：世纪存疑·历史考古卷．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01
3. 中国大百科全书·民族卷．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
4. 中国大百科全书·语言文字卷．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
5. 杨富学．回鹘之佛教．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8
6. 甘肃省社会科学学会联合会，甘肃省图书馆合编．丝绸之路文献叙录．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1989
7. 黄润华，胡振华．回鹘文．见：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会编．中国民族古文字．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
8. 李经纬．回鹘文社会经济文书研究．乌鲁木齐：新疆大学出版社，1996
9. 杨富学．回鹘文献与回鹘文化．北京：民族出版社，2003

第七节　察合台文(Chagatay script)

13世纪初,蒙古民族在漠北草原逐渐强大起来。1206年,成吉思汗建立了蒙古国。短短几十年,蒙古贵族以血缘为纽带,凭借武力向外扩张,蒙古骑兵暴风雨般席卷欧亚大陆,经过三次大规模西征,很快创建了一个疆域辽阔、横跨两洲的蒙古大帝国。由于没有共同的经济基础,蒙古帝国只是一个不稳定的军事政治联盟,不久就分裂成几个独立的汗国,即窝阔台汗国、察合台汗国、钦察汗国(金帐汗国)、伊儿汗国这四大汗国。

察合台是成吉思汗的次子,骁勇善战,他与其兄术赤一起,随父参与了攻金、西征等多次战役,战功卓著。1223年,第一次西征结束后,他得到西辽旧境为封地,在此基础上建立了察合台汗国。汗国东起新疆东部,西至七河流域,北起阿尔泰山,南抵帕米尔高原。现今我国新疆,域外的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以及哈萨克斯坦的绝大部分领土,都归于察合台汗国。成吉思汗死后,察合台谨遵遗命,力排众议,推窝阔台即大汗位。由此他备受尊信,成为诸王之长。在其辅佐下,取得灭金和西征的胜利。窝阔台死后,他又扶持皇后脱列哥纳摄政,保持了政权的稳定过渡。

察合台汗国统治时期,是西域经济最为发达的时期。由于所处地理位置,也使它成为东西文化交流的荟萃之地。察合台汗国鼎盛时期,术赤后裔所统治的中亚西北部、南俄草原,帖木儿后裔所统治的今阿富汗、伊朗东部及东北部、印度地区的突厥诸族,都使用察合台语。察合台汗国崛起后,为了加强统治,开始在境内推行统一的文字——察合台文。察合台文字的形成,受多种文化因

素的影响。这种文字是以阿拉伯字母为基础的音素文字,是现行维吾尔文的前身,用来记录察合台语。它的使用大约从中世纪到20世纪20年代,在帖木儿帝国时期(1336—1405)得到大发展,影响广泛,甚至曾流行于莫卧儿王国和埃及。

察合台语属于突厥语族的东部语组,是察合台汗国的突厥人和突厥化的蒙古人使用的语言。它也是维吾尔和乌兹别克等突厥语民族从14到20世纪共同使用的书面文学语言。一般说来,在8到9世纪时,回鹘人建立的喀喇汗王朝,最早接受伊斯兰教,他们开始使用阿拉伯字母拼写回鹘语,这种语言叫哈喀尼耶语(即喀什噶尔语)。察合台语是在喀喇汗王朝(10—13世纪)的官方语言哈喀尼耶语和诸突厥民族使用的回鹘语言的基础上发展形成的。它吸收了西部突厥语的某些成分,又保留了东部突厥语的基本特点,并且从阿拉伯语和波斯语中借用了大量词汇和一些语法格式,在风格上受波斯语很大影响。察合台文即察合台语的书面形式。鉴于以上情况,专家们对察合台语文的定义有不同看法,也有把它称为"突厥语"、"老乌兹别克语"等等。在帖木儿时期,察合台文字作为察合台汗国的官方书面语,被称为"察合台文",这一名称目前在学术界比较通用。

察合台文共有32个字母,其中采用阿拉伯文的有28个字母,还从波斯文中借用了4个难以书写的字母。这其中有11个字母主要用于拼写阿拉伯—波斯语源的词语。除基本字母外,还使用阿拉伯文的辅助符号,使用较广的有5个。字母依据在词中的位置,分词首、词中、词末、独用等形式,书写时以单词为单位,其中凡是能相连的字母都要连接起来。大部分字母有四种形式,即单式、后连式、前后连式和前连式。部分字母只有单式和前连式。行款自右向左横写,一般不用标点符号。因书法需要,字体有多种写法,如印刷体、手写体、草体等。

察合台文主要采用阿拉伯字母,这种字母源出那巴泰文字,那

察合台文　《塔依尔与祖合拉》

巴泰文又源出阿拉米文，再溯源则源于腓尼基文或字母。按文化圈划分，察合台文属于阿拉伯文化圈，代表伊斯兰文化。若以腓尼基字母作基型，察合台文与其他三类文化圈——印度字母文化圈，代表印度文化；拉丁字母文化圈，代表天主教和新教文化；斯拉夫字母文化圈，代表东正教文化——都有些渊源关系，因为它们大都

源出腓尼基字母。

察合台汗国时期,文化十分繁荣,境内出现了许多文学家、历史学家、科学家和宗教学者。他们一方面继承了诸突厥民族及其他少数民族写作大量的文字文献和流传口头文学的传统,一方面从阿拉伯、波斯等民族的伊斯兰文化中汲取精华,写出大量著作,奠定了丰富的察合台文献的基础。察合台文字由于长期使用,产生的文献也是内容庞杂,数量众多。

察合台文献大致可以分成两类。一类是察合台人自己用这种文字书写的著作,这其中也包括一些重要抄本。比较重要的文献有《福乐智慧》的抄本。

此外还有古代喀什噶尔维吾尔族盲诗人阿合买提·尤格纳克的名著《真理之入门》,原书成于 12 世纪末 13 世纪初,是维吾尔族劝喻性长诗,主要阐述维吾尔等突厥民族的伊斯兰教伦理学。在当时社会战乱频仍、人们生活困苦的情况下,长诗劝诫世人遵守教规和公德,恢复社会秩序和安宁。现存较为完整的有三种抄本,一种是回鹘文本,一种是回鹘文和察合台文合璧的本子,一种就是察合台文的本子。还有阿合买提·雅撒纬的名著《科学的钥匙》等。

主要的古典文学作品还有 14 世纪的拉布古孜的长篇散文《先知的故事》,花拉孜米的诗作《情愫录》。15—16 世纪的文献主要有阿塔依的诗集、赛卡克的诗集、鲁特菲的诗集和长诗《花与春》等。这时期最重要的作家之一,懂得波斯语和察合台语的伟大诗人和思想家纳瓦依的《四部抒情诗集》(约 24000 多行)、《五部长诗集》(约 54000 行),在西域古代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此外他还有《鸟语》、《名人集》、《对两种语言的探讨》等 30 余种诗作和散文集。帖木儿的第五代直系后裔,莫卧儿帝国的创建人巴卑尔著有《巴卑尔回忆录》和诗集,前者是一部文学历史名著。还有穆哈麦德·撒力赫的《谢巴尼传》。17—18 世纪的主要文献,有成吉思汗长子术赤后裔阿布勒·阿兹·巴哈杜尔的《突厥世系》,喀什人海尔

察合台文　《纳瓦依诗集》

克特的长诗《爱情与苦难》，沙依尔阿洪的历史著作《伊斯兰之书》，阿布都热依木·那扎尔写的控诉不合理社会制度的长诗《热碧亚—赛丁》等。19—20世纪初的文献，主要有喀什人尼札里等三人合著的《爱情长诗集》（约33000行），还有毛拉·比拉勒的《抒情诗集》、毛拉比拉力宾·毛拉玉素甫的反抗清王朝起义的叙事长诗《中国土地上的战争》，以及木沙·萨依拉米的《安宁史》等等。这些著名文献为我国的文化史增添了光辉的篇章。

另一类是用察合台文翻译的大量外族文献，有些文献原文种版本已经失传，由于被察合台文翻译得以保存。如波斯史学家沙拉法德·雅兹地的《帖木儿武功录》、波斯诗人萨迪的《果园》和《蔷

薇园》,都有察合台文译本。这其中比较重要的还有赛德丁·玛斯武德·本·奥马尔·泰福塔札尼翻译的波斯文名著《绿洲之颂》、赛非·撒拉依翻译的《花园之颂》和《辛的巴特纳玛》等。

14世纪初,察合台汗国分裂为东西两部。东部复又分裂为若干小国,汗权旁落,国势日衰。到1362年,藩王跋扈,汗王已空有其名。1370年,察合台汗国为帖木儿帝国所灭。1500年,帖木儿帝国覆灭。1514年,东部察合台后裔萨亦德,在莫卧儿帝国的巴卑尔支持下,建立了叶尔羌汗国。叶尔羌汗国时期是新疆各民族发展的重要时期,统治民族蒙古人这时最终完成了突厥化和伊斯兰化,融入维吾尔民族中。在这一时期,新疆各民族历史发展中形成的两个文化政治区,以喀什噶尔为中心的伊斯兰文化政治区和以吐鲁番为中心的佛教文化政治区终于统一起来,完成了全民族的伊斯兰过程。

叶尔羌汗国时期,是一个文化复兴发展的时期,对察合台文献的搜集、整理、使用作出了重要贡献。当时大量中亚细亚的学者,包括伊拉克、伊朗、土耳其、花剌子模、撒马尔罕、安集延等地的学者,都来到叶尔羌汗国的两个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叶尔羌和喀什噶尔,以求获取科学、文化和艺术的知识。这时也出现了一些重要作家和世界级名著,如米尔扎·海答儿(1499—1551)的《拉失德史》,及其续编沙·马合木·楚剌思病的《编年史》。两位著者都是叶尔羌汗国人,这两部书是在现在新疆境内编纂并流传下来最早最完整的历史著作。当时,《拉失德史》的作者看到进入中亚的蒙古部族正在衰落,正在融入当地民族,如不把这段历史记录下来,口头传说的祖先业绩就会湮灭,于是他创作了《拉失德史》。他在书中记述了从1347年到1541年东察合台汗国的历史概貌及叶尔羌汗国的创建史,填补了世界历史记录上的一段空白。对此书的评价,历来很高。作者用波斯文写成此书,这部书先后两次被译为察合台文,在中亚也有很多抄本。《编年史》叙事起自1432年,下至

17世纪70年代中期，被认为是《拉失德史》的续篇。《编年史》传世的目前只存波斯文抄本。

察合台文的文献，内容广泛，涉及政治、经济、文学、艺术、历史、地理、哲学、宗教、法律、民族、语言、医药、天文、历法等诸多方面。20世纪20年代以后，我国新疆及中亚各国使用突厥语族语言的民族，他们的现代文学语言得到发展，察合台语文的作品成为古典文学的范畴。经过文字改革，我国维吾尔等民族也不再使用察合台文，察合台文从此成为一种濒临灭绝的文字。它的大量文献除较晚时期的铅印本外，多用各种手写体书写，以“纳斯塔里克”体（正字体）传抄本为多，也还有一些石印本。

本节参考文献：

1. 余太山. 西域文化史. 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6
2. 冯家升. 维吾尔族史料简编. 北京：民族出版社，1981
3. 中国大百科全书·民族卷. 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
4. 中国大百科全书·语言文字卷. 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
5. 刘志霄主编. 中国维吾尔历史文化研究论丛. 第1、2辑. 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0
6. 郎樱主编. 中国维吾尔历史文化研究论丛. 北京：民族出版社，2003
7. 哈米提. 察合台文. 见：中国民族古文字图录.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
8. 耿世民. 维吾尔族古代文化和文献概论. 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83
9. 田继周等. 少数民族与中华文化.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
10. 刘迎胜. 西北民族史与察合台汗国史研究.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4

第二章　新疆诸民族文字

我国的维吾尔族、哈萨克族、柯尔克孜族、乌孜别克族、塔塔尔族、撒拉族、裕固族、塔吉克族和俄罗斯族9个民族，主要居住在新疆、甘肃和青海等西北地区，生活在古丝绸之路上，在全国其他地方也有一些分布。这9个民族的文化除了相似的历史传承和共同的地域特点外，还分别形成很多各自的特色。但就语言文字而论，前7个民族同属阿尔泰语系突厥语族，语言上有许多共同之处，族源上有亲缘关系。后两个民族同属印欧语系，但所属语族不同，塔吉克语属伊朗语族帕米尔语支，俄罗斯语属斯拉夫语族。

在文字上，维吾尔、哈萨克、柯尔克孜有自己的民族文字，其他民族目前尚没有。乌孜别克语属阿尔泰语系突厥语族西匈语支，其语言和维吾尔语很接近，语音、词汇、语法等方面共同点达80%，两种语言大体可以互通。乌孜别克人历史上使用过粟特文、回鹘文、察合台文。20世纪30年代，中亚的乌兹别克人使用过以拉丁字母为基础的新文字，40年代，改用以斯拉夫字母为基础的新文字。我国的乌孜别克族散居在维吾尔、哈萨克族之间，大多数人兼通维吾尔语、哈萨克语，一般使用维吾尔文或哈萨克文。

塔塔尔族由于人少又是散居，他们大多通晓相邻民族的语言。居住在城市和农村的，一般懂维吾尔语；居住在牧区的，都会说哈萨克语。有不少人会说好几种语言，一些年长的还通俄语。现在塔塔尔族只在本民族内部和家庭中使用塔塔尔语。塔塔尔族有以阿拉伯字母为基础的文字。1925年起，苏联境内的鞑靼人使用了

经过改革的阿拉伯文字，1929年，以拉丁字母代替阿拉伯字母，1933年，采用以斯拉夫字母为基础的文字。我国的塔塔尔族主要使用汉文、维吾尔文或哈萨克文。

撒拉族有自己的语言——撒拉语，属阿尔泰语系突厥语族西匈语支。撒拉语内部比较一致，没有明显方言差别。他们目前没有本民族文字，一般以汉文作为书面交际工具。

裕固族分别使用3种语言，东部裕固语、西部裕固语和汉语。西部裕固语亦称“尧乎尔语”，属阿尔泰语系突厥语族东匈语支。一些专家认为，西部裕固语属于保存古代突厥语特点较多的上古突厥语，并指出它是回鹘文献语言的“嫡语”。裕固族先民曾使用过古代回鹘文，现在他们普遍使用汉文。

塔吉克族由于长期与维吾尔等突厥语民族交往，语言受维吾尔语影响很大，引入大量维吾尔语词汇，此外还吸收了不少汉语借词。很多塔吉克人都以维吾尔语作为交际工具，有的在家中也使用维吾尔语。塔吉克族在20世纪30年代以前，使用过波斯文，后塔吉克青年多到学校学习维吾尔文，逐渐有了改变。现在，塔吉克族主要使用维吾尔文和汉文。

俄罗斯族使用俄语，俄语也是国际通用语言之一。中国的俄罗斯族使用的俄语属南部方言，但受到汉语、维吾尔语、哈萨克语的影响，在语音和词汇上都有自己的一些特点。我国的俄罗斯族除了掌握俄语外，还精通汉语。俄语主要在本民族和家庭内部使用，在社会上都讲汉语，使用汉文。

第一节 维吾尔文

维吾尔族人口现有8399393人(2000)，大部分聚居在天山以

南的各个绿洲，伊犁等北疆各地也有散居，还有少数分布在湖南的常德市，以及桃源和汉寿等县。1955年10月1日成立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维吾尔是本民族的自称，有“团结”、“联合”、“协助”的意思。维吾尔先民在汉文史籍中有不同称呼，最早称为“丁令”（即丁零）；3世纪以后，又被称为“高车”、“狄历”、“敕勒”、“乌护”等；6—7世纪汉籍里写作“袁纥”、“韦纥”；8—13世纪写作“回纥”、“回鹘”；13世纪后半叶被写作“畏兀儿”；17世纪中期以后，维吾尔人则被称为“缠回”、“回人”、“回部”。1934年，新疆省政府正式公布使用汉译写法“维吾尔”为族称。

一千多年前，维吾尔族的先世铁勒是西突厥汗国的一部分。7世纪，居住在蒙古和西域境内的铁勒人均受突厥汗国的统治。公元744年，铁勒人打败突厥，建立了回纥汗国。788年回纥改称回鹘。回鹘与当地各族居民长期发展融合，其中增进了吐蕃、契丹和蒙古的成分，最终形成了维吾尔族。回鹘汗国灭亡后，南迁的回鹘后来大部分融于汉族之中。西迁的回鹘，一支迁河西走廊，称甘州回鹘或河西回鹘；一支迁吐鲁番盆地，称高昌回鹘或西州回鹘；一支迁葱岭，称葱岭西回鹘。10世纪中叶，回鹘人和其他突厥语部族建立了喀喇汗王朝（942—1211），又称黑汗王朝。13世纪中叶，喀喇汗王朝为察合台汗国兼并。此时，伊斯兰教开始传入，并以喀什噶尔（今喀什）为中心，形成了伊斯兰文化区。东部则以吐鲁番为中心，依然保持佛教文化区。16世纪初，维吾尔人民经历了叶尔羌汗国时期（1514—1678）。1678年，漠西厄鲁特蒙古准噶尔部攻灭叶尔羌汗国，并统治其属地，直至1755年清军平定准噶尔汗国为止。1884年，清廷在新疆改设行省，建立了府、州、县制度。

维吾尔族主要从事农业生产，擅长植棉和园艺，手工业也有悠久的历史和精湛的技术，新中国建立后新疆各行业都有巨大发展。维吾尔族有灿烂的民族文化，文学艺术、音乐舞蹈、建筑艺术都有鲜明的民族特色。维吾尔族信奉伊斯兰教，家庭、婚姻及丧葬都深

受宗教影响。主要节日有诺鲁孜节、肉孜节(开斋节)、古尔邦节(宰牲节)。日常食品有馕、面条、抓饭、茶、奶、瓜果等。

维吾尔语属阿尔泰语系突厥语族西匈语支,分为中心、和田、罗布3个方言。维吾尔族总人口的80%使用中心方言,19%使用和田方言。中心方言与和田方言区别不大,与罗布方言则有较大区别。标准语以中心方言为基础,以伊犁—乌鲁木齐语音为标准音。

维吾尔族使用的文字,随着本民族的历史变迁发生过多次变化。8世纪在鄂尔浑河流域建立政权的回纥人,曾使用突厥文。突厥文是一种横写的拼音文字。由于这种拼音文字的碑铭发现于蒙古高原的鄂尔浑河流域以及西伯利亚的叶尼塞河流域,所以又叫鄂尔浑—叶尼塞文,再因这种文字字形类似古代北欧哥特人使用的如尼文,故又称突厥如尼文。突厥文写成的碑铭可以追溯到7世纪。9—15世纪之间,今新疆和甘肃河西走廊以及葱岭西的回鹘人都曾使用过以粟特字母为基础的回鹘文,各地区使用的时间长短不同,东部回鹘佛教徒使用的时间最长。

10世纪末11世纪初,葱岭西回鹘和葛逻禄等部建立的喀喇汗王朝开始信奉伊斯兰教,阿拉伯字母随着伊斯兰教的传播进入我国新疆地区。喀喇汗王朝开始使用以阿拉伯字母为基础的文字,这种文字早先称为王朝突厥文。这一文字先从喀喇汗王朝的首都喀什噶尔传入叶尔羌(今莎车县),再传入和田,最后传遍全新疆,随着伊斯兰教的传播不断扩大使用范围。

15世纪,阿拉伯字母的文字基本上取代了回鹘文,成为维吾尔族统一使用的文字,同时也成为新疆、中亚一带突厥语诸族通用的文字。由于该文字起初主要使用在察合台汗国的领地,故被称为察合台文。察合台文在使用过程中,也不断发生变化。阿拉伯字母共有28个,都是辅音,元音用附加符号表示,自右向左书写,每个字母又分单写、字头、字中、字尾等几种形式。阿拉伯文首先是根据闪语支的语音系统和语法结构创立的文字,所以不能充分

表达维吾尔语的语音结构。维吾尔人最初是全部接受了这 28 个字母,但在使用这种文字记录自己的语言时,感到 28 个阿拉伯字母并不能充分表达自己的语音系统,于是又增加了 4 个波斯文字母,故察合台文共有 32 个字母。晚期察合台文显著地反映了维吾尔语的特征。

现行维吾尔文是在晚期察合台文的基础上形成的。现行维吾尔文在使用时,也曾进行过多次的改进和补充。1937 年,从维吾尔文字母表中取消了 8 个反映阿拉伯语音的特殊字母,又增添了几个区别元音和辅音的字母,字母的数目仍然是 32 个。新中国建立后,党和政府十分重视维吾尔文的改革问题。1954 年,维吾尔族的语文工作者经研究,废弃了原来阿拉伯文字母表中 8 个不必要的辅音字母,又增添了 6 个元音字母,还改动了 1 个字母的写法,并制定了新的正字法规则。那时修订的 30 个维吾尔文字母中,有 6 个元音,24 个辅音。1983 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重新公布了由 32 个字母组成的现行维吾尔文字母表。这套字母表比原先使用的多了两个字母,个别字母的排列顺序也有所调整,把相似的字母排列在一起。现行维吾尔文的 32 个字母中,有 8 个元音字母,24 个辅音字母,一个字母表示一个音。现行维吾尔文自右向左横写。每个字母按照出现的位置具有单独、前、中、后等几种不同的形式。单式除表示该字母的独立形式外,一般出现在词末不可连字母之后;前式出现在可连字母之前;中式出现在词中两个可连字母中间;后式出现在词末可连字母之后。有些字母没有前式和中式,只有单式和后式。正字法以语音原则为基础,以形态原则和传统原则为补充。词根的写法一般反映语音变化,所以同一个词根可以因音变而有不同的写法。

现在使用的维吾尔文,后来因实行文字改革,曾同以拉丁字母为基础的新维吾尔文并用,故又称"老维吾尔文"或"老维文"。1959 年进行文字改革,设计了以拉丁字母为基础的新文字方案。

这套新文字共有36个字母，试行了一段时间之后，于1965年正式推行，新老两种维吾尔文开始同时使用。1982年9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五届人大常委会第17次会议认为，在全区推行维吾尔、哈萨克新文字的条件尚不成熟，两种文字并用也不利于民族文化的发展。会议批准了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在自治区全面使用维吾尔、哈萨克老文字的报告。会议认为，在全面使用老文字后，新文字停用，但仍可作为一种拼音符号保留，并在必要场合使用。同时继续对新文字进行研究，使其完善。

前苏联境内的维吾尔文过去也以阿拉伯字母为基础，1947年开始改用俄文字母。按文字的来源和所受的影响可以看出，维吾尔人古代使用的突厥文、粟特文、回鹘文是受阿拉米文字影响创制的。后来的维吾尔文、哈萨克文、柯尔克孜文大都源出察合台文，是受阿拉伯字母影响创制的，是伊斯兰文化影响所致。以上两类文字都可溯源于古代腓尼基文字的影响。

阿拉伯字母式的维吾尔文大约有一千多年的历史，它在维吾尔民族的文化发展中起过巨大作用，使用这种文字保存了丰富的文化遗产。11世纪前后，我国古代著名学者、喀什噶尔人马合木德·喀什噶里编著的《突厥语大词典》，和喀喇汗王朝著名诗人玉素甫·哈斯·哈吉甫的古典叙事长诗《福乐智慧》两部巨著就是用这一文字写成的。人们常常把用回鹘文写成的《金光明经》和以上两部著作共誉为维吾尔族古典文学中的“三大瑰宝”。《突厥语大词典》被称为维吾尔族古代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它是用阿拉伯字母拼写并用阿拉伯文解释的。除对每个突厥语词进行诠释外，还记录了天文、地理、历史、宗教、民俗、哲学、艺术等多学科的资料。《突厥语大词典》最早以手抄本流传，现存最早抄本是1266年抄成，今存土耳其国家图书馆，1917—1941年由土耳其铅印刊布，现在已有多种文字的译本。《福乐智慧》写于喀什噶尔，现在传世的有三种抄本，一种是用回鹘文写的，另外两种则是用阿拉伯字母抄写的。

《福乐智慧》的内容包括哲学、逻辑学、美学、社会学、法律、道德规范等各方面，是一部具有高度思想性、艺术性的优秀文学作品。现在也有多种文字的译本。这些著名文献为我国的文化史增添了光辉的篇章。另外，7 世纪以前的古突厥文献也是维吾尔族和其他各突厥语民族的共同财富。

بۇڭا ئوخشتىپ ئېيتتى شائىر بۇ سۆز،
چوڭايغاي ئوقسالڭ، ئىنتىكلىنىپ كوز؛

ياخشىلىق قىلىپ كىم ئۆزىدىن ئوكىنۇر،
يامان مىلڭ ئاتانسا، پۇشايمان قىلۇر.

يامانلىققا مۇمكىنچە قىل ياخشىلىق،
يامان قىلسا يامانلىق، پۇشايمان يانۇر.

نېچۇكمۇ مەدھىيلەي يامان كىشىنى،
نېچۇكمۇ تىلەيىن يامان ئىشىنى.

قوپاللىق، كۆستاخلىق، تەتۈرلۈك بولار،
ئى ئۆلۈغ، يامانلار ئىشىدۇر ئۇلار.

بالا، مېھنەت، پۇشايمان، زەخمەت، يىغا،
يامانلىق جاۋابى بولۇر، ئەي توڭا.

شۇڭا ياخشىنى مەن نېچۈك سويمەيىن؟
نېچۈن ياخشى ئىشنى مەدھى ئەتمەيىن؟

سېخىلىق، كىشىلىك، پايدا، ئەزگۈلۈك—
كېلۇرلەر ياخشىدىن بۇلار بەلگۈلۈك.

بۇ ياخشى كىشى بارچە ئەش ياخشىسى،
ئېرۇر ياخشى ئىش ھەممە ئىش ياخشىسى.

ھەمرا ياخشى بولسا نىمە كۆتسەڭ كۆت،
تاپايىن دىسەڭ يول، ھەمرا ياخشى تۇت.

راھەت، نېمەت، ئارزۇ، قۇۋانىچ ھەم ھوزۇر،
بۇلارغا جاۋاپ شۇ، خوشاللىق بولۇر.

维吾尔文 《福乐智慧》

现代维吾尔族文化史上,涌现出一批杰出的作家和诗人,他们创作了许多优秀的维吾尔文作品。其中最负盛名的是爱国主义诗人黎特夫拉·穆太里甫(1922—1945),他写有大量诗歌,如《给岁月的答复》、《当突破黑暗,留下足迹的时候》、《五月——战斗之月》,长诗《爱与恨》,剧本《齐曼与英雄》、《战斗的姑娘》、《暴风后的太阳》等,还有杂文。新中国建立后,大量政治、经济、文化、科学、教育等方面的维吾尔文书籍得以出版,数量和种类不断增长。现在常见的出版物有各级各类学校教材、各种科学技术书刊、社会科学读物和诗歌、小说、剧本等文艺作品。维吾尔文的使用受到国家和政府的重视。2004 年 1 月 29 日,我国第一款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手机——维吾尔文手机,在新疆推向市场。这次推出的维吾尔文手机填补了我国少数民族通信领域的一项空白。该手机在原有汉语、英语语言功能的基础上,增加了维吾尔语言功能。该手机可以使用维吾尔语言"语音短信"业务,还具备维吾尔文手机菜单和输入维吾尔文短信的功能,在全国尚属首例。这款手机的问世,为新疆约 900 万维吾尔族人口运用本民族语言提供了便利。

本节参考文献:

1. 中国大百科全书·民族卷.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
2. 赵相如、朱志宁编著.维吾尔语简志.北京:民族出版社,1985
3. 阿西木·图尔迪.维吾尔文.见:中国少数民族文字.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1992
4. 田晓岫.中华民族发展史.北京:华夏出版社,2001
5. 维吾尔族简史编写组编.维吾尔族简史.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1
6. 李德洙主编.中国少数民族文化史.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
7. 何星亮撰.中华文化通志·民族文化典.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

8. 米海力.维吾尔语喀什话研究.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7
9. 杨建新.中国西北少数民族史.北京:民族出版社,2003

第二节 哈萨克文

哈萨克族现有人口 1250458 人(2000)。主要分布在新疆天山北部地区,以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巴里坤哈萨克自治县、木垒哈萨克自治县以及甘肃的阿克塞哈萨克族自治县等地较为集中。青海也有一些。

哈萨克是历史悠久的民族。西汉时天山北部的乌孙,即是哈萨克族的先民。其实中国古代北方或西域很多部族如:塞种、匈奴、突厥、回鹘、康居、哈剌契丹、克烈、乃蛮、钦察、葛逻禄、阿尔根等,都或多或少融入今天哈萨克的族源。15 世纪以前,哈萨克各部经历了由统一联盟到分裂割据的多次反复。15 世纪中叶,在七河流域建立了独立的哈萨克汗国。18 世纪中叶,开始与清王朝交往。19 世纪中叶,中俄勘分界约,中国哈萨克为内属臣民。

"哈萨克"名称最早出现于 15 世纪初期,是从金帐汗国分裂出来的操突厥语的一些游牧部落的集合体。作为族称,学术界认为,先秦的"乌孙"、汉唐的"曷萨"、"可萨"即同名异译。哈萨克一词有"白天鹅"的意思。哈萨克人将白天鹅看成圣鸟,严禁捕杀。民间传说哈萨克的祖先是由白天鹅化身的姑娘与一人间勇士结合而生的,并有种种与之相关的禁忌和崇拜习俗。这一词还有"真正的塞克(塞种)"、"避难者"、"脱离者"、"自由人"的意思。

哈萨克族大部分从事畜牧业。过去,绝大多数牧民按季节转移牧场,逐水草而居,新中国建立后哈萨克群众有了自己固定的居所和牧场。哈萨克的青年男女都精于骑术,像著名的"姑娘追"、

“刁羊”等群众性文体活动，都是在马上进行的。哈萨克的饮食，大部分是肉食和奶食，他们制作的马奶酒是名贵饮料。哈萨克人过去信仰萨满教，11世纪前后，改信伊斯兰教。主要节日有纳吾肉孜节（相当于春节），俗称“宗族盛会日”。还有古尔邦节（宰牲节）、肉孜节（开斋节）等。

哈萨克语属阿尔泰语系突厥语族克普恰克语支。方言差别不大，只在语音和词汇上有微小差异，可分为两个方言。哈萨克语的词汇十分丰富，许多固有词与维吾尔、柯尔克孜、土瓦、西部裕固、撒拉诸语言同源，均出自古突厥语。现代哈萨克语保留了较多的古代语言成分，由于长期从事畜牧生产，反映畜牧业的词汇尤其丰富，区分相当细致，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

哈萨克族历史上使用过多种文字。6—8世纪，使用过突厥文，8世纪之后，使用过回鹘文，再后又使用过察合台文。10—12世纪，伊斯兰教在哈萨克地区得到广泛的传播。14世纪初，伊斯兰教已成为哈萨克人民信仰的惟一宗教。在宗教传播的同时，哈萨克人的先民开始使用阿拉伯字母来拼写自己的语言。哈萨克人真正采用阿拉伯字母的书面语是在19世纪下半叶。当时俄国哈萨克族著名诗人阿拜·库南巴耶夫的创作活动，俄国教育家恩·阿勒腾萨林的启蒙运动，以及最早的几种哈萨克文报刊，对此起了重要作用。由于阿拉伯字母和哈萨克语的语音系统不同，阿拉伯字母系统并不能准确地反映哈萨克语言的特点，在正音和正字上曾存在不规则的混乱现象。苏联哈萨克斯坦的哈萨克人于1917年和1924年先后两次对以阿拉伯字母为基础的哈萨克文进行过改进。1929年又创制了以拉丁字母为基础的哈萨克文。1941年，他们决定全面使用以俄文字母为基础的文字。

20世纪初，苏联哈萨克族对文字进行的改革，最终形成了以阿拉伯字母为基础的现代哈萨克文。我国的哈萨克族于1954年对现代哈萨克文又进行了修订。这种文字，在20世纪60年代以

来，被称为哈萨克老文字。

1959年，实行文字改革，我国又创制了以拉丁字母为基础的哈萨克新文字，并于1965年开始推行。哈萨克新老两种文字一度开始并用。经过几年的实践，发现这种方法并不可取，推行新文字的条件尚不成熟，而两种文字长期并用，又不利于哈萨克民族科学、教育、文化事业的发展。1982年9月13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五届人大常委会第17次会议通过决议：全面使用维吾尔、哈萨克老文字，停止使用新文字。于是迄今，哈萨克人民又开始全面使用哈萨克老文字，只将新文字作为音标保留。

中国哈萨克族现在使用的哈萨克文共有33个字母，9个表示元音，24个表示辅音。哈萨克文由右向左横写，每个字母按在词里不同的位置，有几种不同的写法。分为“单写”和“连写”，连写又分为“后连”、“前后连”、“前连”三种。哈萨克文的缩写词也有一定规则。

哈萨克族有着优良的文学传统，产生的文献中有大量丰富的文学作品。哈萨克文学可以分为民间文学和书面文学两大类，主要是民间文学，包括神话传说、民间故事、诗歌、谚语、格言、谜语和弹唱等。哈萨克民间文学的主要部分是叙事诗和故事。1982年起，很多民间文学已陆续整理出版，如多卷本的《哈萨克叙事长诗选》，据哈萨克学者统计，目前已掌握的民间叙事诗有250余部之多。其他重要的已出版的还有《阿勒帕米斯》、《英雄塔尔根》、《骑黄马的猎手》、《胡布兰德》、《哈米巴尔》、《甘布拜》、《科孜少年与巴彦美女》、《季别克姑娘》等。

哈萨克民族还有光彩夺目的书面文学。生于9世纪的穆罕默德·阿布·纳赛尔·法拉比(870—950)是哈萨克古典书面文学的先驱者和杰出代表，他学识渊博，通晓阿拉伯语、波斯语、希腊语、拉丁语，他在哲学、心理学、数学、天文学、音乐等领域均有研究，为后世留下了20余部巨著，其中有不少文学著作。穆罕默德·柯热孜

米是14世纪哈萨克族的著名诗人，他曾用察合台文写下了著名的《爱情史诗》一书。

قىرقىنشى ٴسوز

زينهار، سەندەردەن ٴبىر سۇرايىن دەپ جۇرگەن ٴىسىم بار.
وسى ٴبىزدىڭ قازاقتىڭ ولگەن كىسىسىندە جامانى جوق،
ٴتىرى كىسىسىنىڭ جامانداۋدان امانى جوق بولاتۇعىنى قالاي؟
قايراتى قايتقان شال مەن جاستىڭ ٴبارى ٴبىتىم قىلادى،
شالدار ٴوزدى ٴوزى قۇربىدان ايرىلىپ ازايىپ وتىرسا دا،
ٴبىرى مەنەن ٴبىرىنىڭ ٴبىتىم قىلمايتۇعىنى قالاي؟
ٴبىر ەلدىڭ ىشىندە جاماعايىندى كىسى ٴبىرگە تۋعانداي
كورىپ، ٴىشى ەلجىرەپ جاقسى كورىپ تۇرىپ، ەلگە كەلسە،
ٴارى-بەرىدەن سوڭ قايتا قاشقانداي قىلاتۇعىنى قالاي؟
جاتتىڭ ٴبىر ٴتاۋىر كىسىسىن كورسە، "جارىقتىق" دەپ
جالبىراپ قالىپ، ماقتاي قالىپ، ٴوز ەلىندە سودان ارتىق ادام
بولسا دا، تانىمايتۇعىنى قالاي؟
ٴبىر جولاۋشى ەلسىز جەرگە بارسا، بارمان ەلىنە ٴوز ەلىن
ماقتايمىن دەپ وتىرىكتى سىباپ-سىباپ، قايتىپ كەلگەن
سوڭ، سول بارعان-كورگەن ەلىن، جەرىن ماقتاپ وتىرىكتى
سىبايتۇعىنى قالاي؟
قاي قازاقتى كورسەم دە، قاي بالاسى جاسىراق بولسا،
ونىڭ باسىنان پارمەنە بولىپ ٴجۇرىپ، ەرجەتكەن سوڭ سۇق
تارتاتۇعىنى قالاي؟

哈萨克文　《阿拜箴言录》

阿拜·库纳拜伊(1845—1904)是哈萨克族近代文学的奠基人，被尊为“英明的诗人”、“诗歌的鼻祖”。阿拜是一位进步诗人。他幼年在经文学校学习，后进入正规大学，精通阿拉伯文、波斯文、俄文。大学毕业后，他努力将普希金、莱蒙托夫等俄国诗人的作品译为哈

文,介绍给本族群众。他的诗作对当时社会哈萨克民族的生活习俗和各阶层的心理状态进行了深刻的描写,成为哈萨克书面文学语言形成的典范。阿拜在创作诗歌的同时,还创造性地发展了哈萨克族的诗歌体裁及韵律。他的诗歌对后世哈萨克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的主要著作有《阿克里亚》、《阿拜诗集》等。他被称为"哈萨克民族文化的继承者和发扬者"。

近代作家艾赛特·纳依曼拜(1864—1922),一生中游遍了阿勒泰、塔尔巴哈台和伊犁地区。他采用以诗歌形式改编民间故事和民间传说的办法,写出过很多有影响的诗歌,如叙事长诗《木马》、《努赫曼与纳额母》、《法兰西皇帝》等。著名民主诗人唐加里克·卓力得拜(1903—1947),出生在伊犁新源县一个贫苦牧民家庭,是现代哈萨克族杰出的文学代表之一。1920 年前后,他把民间传说改编为长诗《萨那瓦尔》、《阿娜尔与赛吾列》、《萨丽哈与萨迪克》、《纳孜古丽》等。唐加里克于 1940 年被盛世才逮捕关押达七年之久,出狱不到一年便去世。他生前写有大量诗歌,1948 年出版了其第一部诗集。1985 年出版了两卷本的《唐加里克诗选》。新中国建立后,我国用哈萨克文出版了大量政治、经济、文化、科学、教育、文学等方面的书籍和多种报纸刊物。仅刊物即有以哈萨克、汉、维吾尔、柯尔克孜四种文字出版的季刊《语言与翻译》,以哈萨克、汉、维吾尔三种文字出版的季刊《伊犁河》,以哈萨克、汉两种文字出版的季刊《塔尔巴哈台》,以哈萨克文出版的季刊《绿草》、《遗产》和《阿勒泰春光》等。用哈萨克文发行的报纸有《新疆日报》、《伊犁日报》、《塔城报》、《阿勒泰报》等。

本节参考书目:

1. 贾合甫·米尔扎汗.哈萨克族.北京:民族出版社,1989
2. 田继周等.少数民族与中华文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
3. 耿世民、李增祥.哈萨克语简志.北京:民族出版社,1985

4. 中国大百科全书·民族卷. 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
5. 李增祥、宋正纯. 哈萨克文. 见:中国少数民族文字. 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1992
6. 王尧主编. 中华文化通志·民族文化典.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
7. 杨建新. 中国西北少数民族史. 北京:民族出版社,2003

第三节　柯尔克孜文

柯尔克孜族现有人口160823人(2000)。主要分布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还有一些散居在新疆各地。另外,黑龙江富裕县五家子屯也有一部分,是1755—1758年由阿勒泰、叶尼塞河上游迁去的。

柯尔克孜是民族自称,有"四十个部落"、"四十个姑娘"或"草原人"之意。在我国汉文史书中,曾先后被写作"鬲昆"、"坚昆"、"契骨"、"护骨"、"黠戛斯"、"纥里迄斯"、"吉里吉斯"等。在清代被称为"布鲁特"。

柯尔克孜先民原分布在叶尼塞河上游,经汉、唐,逐渐向西南迁至天山地区,并与当地的突厥、蒙古部落相融合,形成后来的民族。柯尔克孜先民在唐代曾建立过黠戛斯汗国,受唐中央王朝管辖,并与内地一直保持着友好的关系。新疆的柯尔克孜族主要居住在天山山麓和帕米尔高原,境内自然资源丰富,有森林、草场、耕地,高耸的慕士塔格山被誉为"冰山之父"。柯尔克孜族主要从事畜牧业,兼营农业和以畜产品加工为主的手工业,衣食起居都有游牧生活方式的特点。

柯尔克孜语属阿尔泰语系突厥语族东匈语支,又称吉尔吉斯

语。按语言的形态结构分，属于黏着语。新疆的柯尔克孜语分南北两个方言，两个方言区基本上是以克孜勒苏河为界，河以南为南部方言，河以北为北部方言。文学语言以北部方言为基础。绝大部分居民使用柯尔克孜语，居南疆者通晓维吾尔语，居北疆者通晓哈萨克语。居黑龙江富裕县的柯尔克孜族使用的语言保留了一些古代柯尔克孜语的特点，与新疆地区的柯尔克孜语有较大差别，而与俄罗斯联邦的哈卡斯语比较接近，他们还通用汉语、蒙古语。柯尔克孜族有以阿拉伯字母为基础的文字，有的地区也通用维吾尔文、哈萨克文、汉文或蒙古文。

柯尔克孜族很早就有自己的文字。史载唐代黠戛斯人“其文字语言，与回鹘正同。”(《新唐书·回鹘传·黠戛斯》)考古资料证明，7—10世纪，柯尔克孜族先人黠戛斯与突厥、回鹘人使用的文字，都是突厥文，同时还保留下了一些叶尼塞文献。据专家统计，目前发现的属于叶尼塞河流域古代柯尔克孜族的短小碑铭就有70多通，这种碑铭在吉尔吉斯斯坦的塔拉斯也有发现。当柯尔克孜人离开叶尼塞河流域之后，就慢慢失去了他们曾经拥有的重要文化成就——文字。

随着伊斯兰教的传入，柯尔克孜族也如中亚以及新疆地区其他民族一样，开始使用阿拉伯字母系统的拼音文字——察合台文。察合台文除包括全部阿拉伯文字母外，还吸收了4个波斯文字母。察合台文由于缺乏标记元音的符号，并不能充分表达柯尔克孜语的语音。在后来的使用过程中，柯尔克孜族对这种文字进行过多次改进和补充。我国的柯尔克孜族在20世纪30年代，使用的就是在察合台文基础上经过改进和补充的柯尔克孜文，但直到新中国建立初期，从未用这套文字出版过任何书籍。这套柯尔克孜文共有25个字母和1个附加符号，其中有5个元音字母，20个辅音字母。行文从右向左横写，字母分单写、连写，根据字母在词首、词中、词末的位置，写法略有不同。

新中国建立后，党和政府非常关心柯尔克孜族的文字问题。1954年11月成立了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语言文字研究委员会，专门研究文字问题。经过本民族领袖人物和专家学者的反复讨论研究，制订了以阿拉伯字母为基础的我国柯尔克孜文方案。

该方案文字共有30个字母。优点是：为适应柯尔克孜语的特点，采用了8个元音字母，这比以前用5个字母表示8个元音要完善得多。同时还采用了3个表示辅音的新字母，专门拼写借词。1956年，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语委针对1954年文字方案在使用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又对两个元音的字母形式作了修订。

1956年，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召开的首届民族语言文字科学讨论会上，有人提出使用斯拉夫字母创制文字的意见。这一意见得到采纳，1957年，经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批准，开始使用当时苏联境内以斯拉夫字母为基础的吉尔吉斯文。同时，还公布了《中国柯尔克孜文正字法》。这个正字法根据斯拉夫字母的特点，制定出33条规则和10种标点符号的用法。1958年2月，确定了汉语拼音方案，国家规定少数民族创制和改革文字原则上应该采用和汉语拼音方案一致的字母形式。这样，我国的柯尔克孜族放弃了前苏联的吉尔吉斯文，恢复使用1954年制定的以阿拉伯字母为基础的柯尔克孜文方案。使用这种文字，1958—1964年间，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党委出版了《克孜勒苏报》，新疆人民出版社和新疆教育出版社还出版了各种书籍和教材。

1959年11月，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召开的第二次民族语文科学讨论会上，通过了以拉丁字母为基础的维吾尔新文字方案和哈萨克新文字方案（草案），并于1965年1月公布推行。在此期间，南疆的柯尔克孜族转用维吾尔新文字；北疆的柯尔克孜族转用哈萨克新文字。这种做法，给柯尔克孜族地区的社会生活带来了很多困难和不便。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党的民族政策得到了全面贯彻。

1979年10月,再次正式恢复使用柯尔克孜文。1980年,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民族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公布了《柯尔克孜文正字法》。随着文字使用的进展和范围的扩大,这个正字法中的一些规则已经不能满足柯尔克孜文语言规范化的需要。1983年9月23日,经过深入调查研究,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民族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重又公布了《柯尔克孜文正字法》,经自治区人民政府批准公布实施。正字法对柯尔克孜文字母表中的字母顺序按字形又作了进一步调整,并对个别字母的使用及借词、人名、地名的写法做了新的规定。

رەداكسىياسىنىن جووپتۇۇسۇ ، ادىس رەداكتور جولدوش نورۇز ۇسونالى
ارقايىسى جاقتاردان شىق بەرىپ ، قىزماتىمدى زور كۉچ مەنەن قولدودۇ .
« تىل - جانا قوتورمو » جۇرنالىنىن باشقى رەداكتورۇنۇن ورۇنباسارى ،
ادىس رەداكتور جولدوش ماكەلەك ومۇرباي باسماعا جولدوودون مۇردا
كورۇپ چىعىپ ، زارىل تۉزۉتۉۉلۉردۉ بەردى .
مەن بۇل سوزدۇكتۉ تۉزۉۉدۉ « جۇڭگو ەنسىكلوپەدياسى - تىل
جازۇۇ بولۇگۉ » ، « جونوكوي تىل ئىلىمى سوزدۇگۉ » ، « تىل جانا تىل
ئىلىمى سوزدۇگۉ » ، « حانزۇچا - قازاقچا تىل سالىشتىرما سوزدۇگۉ
» ، « حانزۇچا - ورۇسچا تىل ئىلىمى سالىشتىرما سوزدۇگۉ »
سىياقتۇۇ ماتەرىيالداردان كەڭىرى پايدالاندىم . مەن جوعورۇدا جاردام
بەرگەن جولدوشتورعو جانا جوعورۇدا اتالعان ماتەرىيالدارعا ەمگەگىن
سىڭىرگەن ئىلىمپوزدورعو چىنىعى ىراقماتىمدى بىلدىرەمىن .
مەن بۇل سوزدۇكتۉ تۇنعۇچ ىرەت تۉزۉپ جاتقاندىعىم ۉچۉن
تۉردۉۉ جەتىشسىزدىكتەردەن وولاق بولو البايم . ئىلىمپوزدوردۇن سىن
پىكىرىن قابىل الۇۇعا ار ۇباقىت تايارمىن .

柯尔克孜文 《汉柯语言学词典》

由于当时柯尔克孜文刚刚恢复使用,对书面语中出现的问题还缺乏全面研究,后来,人们在使用过程中发现这个正字法仍然存在

一些问题。为了加强规范化的工作,我国柯尔克孜语文工作者进行了认真的分析研究,1988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民族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对《柯尔克孜文正字法》再次进行修改后,与《柯尔克孜文正字法词典》一起公布施行。《柯尔克孜文正字法》和《柯尔克孜文正字法词典》公布实施后,柯尔克孜文走上了健康发展的道路。

20世纪80年代,新成立了克孜勒苏柯尔克孜文出版社,开始出版柯尔克孜文书籍,包括文学书籍和大量教材等。同时还有一些报刊问世。1979年,柯尔克孜文版《克孜勒苏报》复刊,1984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语委主办的柯尔克孜文版《语言与翻译》(季刊)创刊。同年,中国作协新疆分会主办的柯尔克孜文的《新疆柯尔克孜文学》创刊。

柯尔克孜族人民创造了丰富多彩的民间文学,包括神话、传说、故事、史诗、叙事诗、寓言、民歌、谚语、谜语等。篇幅最多的是史诗和叙事诗,这是柯尔克孜民间文学的重要内容,其中重要的有《玛纳斯》、《玛玛克——绍波尔》、《库尔曼别克》、《艾尔托西托克》、《艾尔塔毕勒迪》、《艾尔塔尔兰》、《艾尔托里托依》、《考卓加什》、《阿勒帕米什》、《吐坦》等。《玛玛克——绍波尔》是一部历史诗,反映了清道光年间(1821—1850)柯尔克孜人民反抗英国殖民主义者及其走卒张格尔武装侵犯新疆的斗争,歌颂了额萨克、玛玛克、绍波尔等爱国主义英雄人物。这些诗歌都用柯尔克孜文进行了重新记录。

柯尔克孜族最宏伟的史诗是《玛纳斯》,它与我国藏族的《格萨尔王传》、蒙古族的《江格尔传》并称为我国的三大史诗。《玛纳斯》是世代口头传唱的民间文学,由柯尔克孜族的"玛纳斯奇"(歌手)演唱。演唱最为精彩和完整的歌手是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阿合奇县的居素甫·玛玛依。他生于1918年,1978年被选为中国文联委员,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联副主席。根据他的演唱,《玛纳斯》共分8部,21万多行,240多万字。这8部分别传诵的是玛纳斯和

他的后世子孙共8代人,玛纳斯是第1部第一个主人公,故全诗以他命名。全诗通过玛纳斯8代子孙的活动和遭遇,反映了10世纪后期到13世纪,古代柯尔克孜人民反抗侵略,争取自由的顽强精神,渴望幸福生活的理想和愿望。史诗不仅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也是一部研究柯尔克孜族历史、语言、文化、宗教、民俗等方面具有重要学术价值的巨著,有如一部"百科全书"。

关于《玛纳斯》的收集整理,久已引起人们的重视。1980年6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批准成立了《玛纳斯》工作领导小组,由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新疆分会承担具体工作,重新用柯尔克孜文记录整部《玛纳斯》。这项工作于1983年3月全部完成,柯尔克孜文的《玛纳斯》已由新疆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汉文译本也于1985年正式出版,并已被译成俄、英、德、法等多种文字。

本节参考书目:

1. 胡振华.柯尔克孜语简志.北京:民族出版社,1986
2. 田继周等.少数民族与中华文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
3. 中国大百科全书·民族卷.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
4. 赵相如.柯尔克孜文.见:中国少数民族文字.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1992
5. 王尧主编.中华文化通志·民族文化典.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

第三章　中国北方民族古文字

自古我国北方广袤的沙漠、草原和山林中，就生活着很多游牧、渔猎以及农耕的少数民族，他们勤劳、勇敢，富于聪明才智。随着时代的更迭，每一个古代民族的强大，都曾创造过自己辉煌的历史，有的还建立过自己的政权。后周至北宋以后，北方相继出现了一些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如辽、西夏、金等，这以后还出现过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建立起的全国性政权，如蒙古族建立的元朝、满族建立的清朝。

这些北方少数民族在建国之初，很多本来都没有自己民族的文字。他们的开国皇帝都十分清楚，靠刀马弓箭打来的天下，要想巩固，要想强大，要想夺取中央政权，就必须提高本民族的文化素养，而提高本民族文化素养的关键环节，就是要创造本民族的文字。文字可以说是一个民族文化精神的载体。缺少这个，一个民族无法从精神上强大起来。正是看到这一点，许多开国皇帝在立国之初都亲自坐镇或是主持，委派亲信大臣完成创制文字的工作。像辽国的耶律阿保机、西夏的元昊、金国的完颜阿骨打、蒙古的成吉思汗、元朝的忽必烈。有的人还亲自示范，指示具体字的造法，像清太祖努尔哈赤。

随着历史大潮的涨落，一些民族政权湮灭了，随之其文字也成了死文字，如契丹大小字、西夏文、女真大小字、八思巴字、满文等。有的文字经发展演变一直沿用到现在，如蒙古文、朝鲜文。这些文字毕竟反映了一个历史时期的风貌，记录着时代的变迁，具有重要

的研究价值。这些文字揭示了一个个历史之谜,显示着人类进步的脚印。对这些文字的研究,成为现代语言学家、历史学家的重要任务。

第一节　西夏文

18世纪中叶一个炎热的夏日,蝉鸣如歌,绿树掩映,一位读书人骑马去京北游历。当他来到居庸关前时,蓝天白云,心绪极佳,抬头一看,发现云台过街塔门的洞壁上刻有六种文字,便上前识读。经过仔细辨认,他知道这是元代的石刻,并认出了其中的几种文字,有一种却怎么也不认识。这一发现引起了众多读书人的注意,人们把这个发现称为六体文字石刻,暂时把那种不认识的文字称为"女真小字"。其实,那种文字是后来人们才知道的西夏文。洞壁上的6种文字实际上是汉文、藏文、梵文、回鹘文、八思巴字和西夏文。这组六体文字的石刻是《元如来心经石刻》,包括经文、咒语、功德记等。由于同时刻有六种文字,其中还有古文字,所以这组石刻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它成了中华民族多元文化的历史见证和宝贵遗产。

1804年,清朝学者张澍,在古代凉州首府武威的清应寺感应塔前发现了一通石碑。碑文一面是汉文,另一面乍看好像是汉字,但细看则无一字能识。该碑记录了西夏时期一次重要的佛教庆典活动。张澍根据碑上的汉文记载,认定另外一种文字是"西夏国字"。这一发现使世人见到了湮没多年的西夏文,同时拉开了获取新的西夏文献资料的序幕。由是张澍也成为我国西夏学的创始人。此后,清人初尚龄于道光七年(1827)在所著《吉金录所见》中指出:清代金石学家刘青园根据上述石碑的西夏文识别出了西夏

文钱币上的文字。

直到 1895 年，法国学者德维利亚才确认居庸关过街塔门洞壁上六体文字石刻中人们不认识的那种文字是“西夏文”。再后来，有人发现在西夏文的《妙法莲华经》上注释有汉字，这一重要文物落入法国人毛里斯之手。他依据佛经释文，在 1904 年发表了《西夏语言文字的解读》，识别并解读了一些西夏字，同时注意到西夏语宾语在前、谓语动词在后的语法结构，指出西夏语和藏语有相似的地方。西夏语文的研究由是肇始，我国张澍为西夏学的创始人，继后有法人、俄人等，中坚是我国学人，现代以王静如先生成果最著，今人李范文、史金波等也颇有成就。

西夏是中国中古时期以少数民族党项羌为主体建立起来的一个王朝。北宋景祐五年(1038)，党项羌族首领元昊创建该政权，都兴庆府，在今宁夏银川市，国号大夏，年号“天授礼法延祚”，因大夏地处宋朝以西，史称“西夏”。西夏以河西走廊为其主要基地，全盛时期版图包括今陕西、甘肃、宁夏、青海以及新疆和内蒙古部分地区，面积两万余里，境内居民主要有羌、汉、吐蕃、回鹘、鲜卑、契丹等族。西夏统治西北地区近两个世纪，前期与北宋、辽抗衡，后期与南宋、金鼎立。享国一百九十年，共传 10 代帝王。西夏宝义二年(1227)为蒙古所灭。元代以后，党项族逐渐融于其他民族，直到明、清时才彻底消失。

党项羌为羌族一支，是我国古代西羌的后裔。党项羌原生活在四川西北部、青海东南部的广袤草原上，那时他们从事狩猎和畜牧业，不事农耕，处于原始社会状态。在唐朝时，他们已发展成很多部落，其中有八个部落比较强大，以拓跋氏最为强盛。也有人认为拓跋氏先世本出自鲜卑拓跋部。党项羌由于受到吐蕃的挤迫，在得到唐朝的允许后，内迁至今甘肃庆阳一带，以后又有一部分被迁到陕西北部。再后逐渐迁徙分散。党项人一般以姓氏为部落，大者五千余骑，小者一千余骑，其俗尚武，有战阵则相屯聚。拓跋

氏曾建立以夏州(今陕西靖边)为中心的割据政权,唐代赐姓李,宋代赐姓赵。西夏延祚元年(1038),拓跋氏的李元昊自号嵬名氏,去掉唐、宋所赐的李、赵姓氏,正式称帝,建立大夏国。

元昊(1003—1048),具有雄才大略,一生文治武功,做了很多大事。他设官立爵,创制文字,建立各项典章制度。还建官署、定兵制、立军名、别服饰、下秃发令等等。史书说他"熟悉兵书、法律,晓佛学,通蕃汉文字"。《宋史·夏国传》称:"元昊自制蕃书,命野利仁荣演绎之,成十二卷,字形体方整类八分,而画颇重复。教国人记事用蕃书。"据《西夏书事》记载:"元昊既制蕃书,尊为国字,凡国中艺文诰牒尽易蕃书。于是立蕃字汉字二院。"元昊命手下大臣野利仁荣主持制定西夏文字,最后演绎成12卷,推行国内,与汉文并用。1036年,元昊正式颁布了西夏文,史书称为"蕃书"、"蕃文"。西夏文字创制后,元昊将其尊为国字,并改元为大庆元年,以示庆祝。元昊又设立蕃字、汉字二院,分别掌管与北宋及吐蕃、回鹘等来往的文书。二院的设立,以法律形式确立了西夏文字在夏国文化中的地位,同时扩大了西夏文的使用范围,将它的应用推广到周边地区。西夏延祚十年(1048),元昊44岁时,在一次宫廷内乱中被其子刺死,谥武烈皇帝。

野利仁荣(?—1042)是西夏的开国重臣,对于最终完成西夏文字的制定发挥了重要作用。他学识渊博,熟悉汉族文化典故,多参与元昊建国方略、典章制度的赞襄谋划。他提出"顺其性而教之功利,因其俗而严以刑罚"的立国主张。被封为"谟宁令"(天大王)。西夏大庆元年(1036),在元昊主持下创制了西夏文字后,他又受命主持蕃学事,将《孝经》、《尔雅》、《四言杂字》等译为西夏文。造字后,野利仁荣又挑选贵族弟子3700人学习文字,通读典籍。他还亲自教授学生,择优授以官职,因此形成"蕃人学者杰作出不穷"的局面。西夏天盛十四年(1162),佚名作者写有一首西夏文的《大颂诗》歌颂他,诗中提到"藏、汉、蕃族为同母,分地异处而言殊",因此各族有自

己的文字。他去世后，被追赠富平侯。后又因创制文字有功，仁宗时被追赠广惠王。西夏文字的形成，自有其社会的原因，如主体民族党项羌人需要有记录本民族语言的文字。也有其政治原因，如宋朝有汉文，辽朝也先后创制了契丹大字和契丹小字，就连势力弱于西夏的吐蕃和回鹘也有自己的民族文字，要与宋辽抗衡，雄踞西北，没有自己的文字也会产生低人一等的感觉。当然还有文化、宗教的原因，如文化发展的要求、佛经的翻译等等。

蒙古攻灭西夏后，将其原有属地分给了蒙古郡王，把留下的党项族迁至北京和河北一带。党项族东迁后，人数很少，且地处偏僻，虽然其后裔仍有人在使用这一文字，其影响力已很小了。元代居庸关的石刻和保定韩庄佛寺遗址出土的明中叶的石幢上都有西夏文，加之故宫博物院藏明初西夏文经卷，可知这一文字最迟在明朝中叶仍在使用。此后随着党项族融入其他民族，西夏文逐渐湮没，成为一种无人能识的死文字。

西夏亡国之后，元人只为宋、辽、金修了专史，却未给西夏修史。专家认为：一是元朝对西夏采取了鄙视的态度。二是西夏对蒙古的侵略进行了顽强的抵抗，逐城固守，蒙古大军六次进攻西夏，付出重大伤亡，甚至成吉思汗也病死于征服西夏的战争中，这引起蒙古贵族的强烈不满，采取了“灭其国并灭其史作”的残酷政策。三是西夏是一个重宗教轻历史的民族政权，灭亡时只有“实录”、“谱牒”之类，也因战乱荡然无存，元人想修史也难为无米之炊。

西夏语与藏语比较接近，属于汉藏语系藏缅语族，与彝、傈僳、纳西等族语言属同一语族。党项族在归附唐朝以前，一度为吐蕃所统治，曾借用藏文的字母拼写自己的语言。前面提到《宋史》中说“元昊自制蕃书”，《辽史》则记载为元昊的父亲李德明“制书十二卷，又制字若符篆”，认为是他发明的西夏文。沈括在《梦溪笔谈》中则说是由野利遇乞创造的，说遇乞“创造蕃书，独居一楼上，累年

方成,至是献之"。这三种说法虽有所不同,但都把西夏文字说成是某一个人的创造。西夏文字的创造受到了汉文化的深刻影响,借鉴了汉字的造字方式。党项人在谈及西夏文和汉文的关系时也说:"论末则殊,考本则同。"

据统计,西夏文共有5900余字。西夏文仿汉字创造,形体方整,结构复杂,是类似汉字的方块字,却又无一字同汉字相同。主要由点、横、竖、撇、捺、拐、提等基本笔画组成,却没有汉字常见的竖勾,可归纳出某些部首。西夏文字一般笔画为4至22画,没有3画以下的字。而汉字笔画最多为36画。相比之下,西夏文字笔画要少,但看起来,西夏文字要复杂得多。这是因为西夏文字笔画在10画到20画的占了绝大部分,没有类似汉字"一"、"二"、"三"那样的字,认记和书写都有一定难度。

西夏文有楷书、行书、草书、篆书四种写法。西夏文是表意文字,构字法类似汉字,但它又没有汉字那样悠久的历史,所以象形字、指事字极少,以会意字、形声字为主,这两种文字大约占西夏文的80%。与汉字相比较,西夏字笔画多,斜笔(即撇捺)多,会意字多。西夏文字的构成可分为单纯字和合体字。单纯字是不能再分割的字,造字能力强。合体字是由两个以上部首组成的字,又包括合成字和互换字,前者是指由部首合成组字,后者是指一个字中的两个部首互换组字。

西夏文所表达的语言,是古代党项羌人的语言。西夏境内居住着很多汉人和吐蕃人,所以语言中有大量汉语、藏语的借词。西夏韵书中,一个韵里甚至有半数以上的词借自汉语。西夏语音可以分为早期和晚期两类,晚期辅音有9类:重唇音、轻唇音、舌头音、舌上音、牙音、齿头音、正齿音、喉音、来日音。晚期共183韵,分属平、上两个调。平声97韵,上声86韵。元音有松紧之分,有鼻化元音,无辅音韵尾。

语法特点和其他藏缅语族语言相似,但也有它自己独特的语

法结构。在句子中，谓语动词往往位于末尾，宾语则放在动词的前面，形容词有时在名词之前，有时又置于名词之后。词汇可以分成单纯词和合成词两大类，其中双音节合成词所占比例较大，一字多义和词义引申的现象也比较频繁。西夏文行文格式是自上而下，由右向左。

西夏文创制后，被西夏王朝广泛使用。其分布的地域很广，宁夏、甘肃、内蒙古、陕西、北京、河北都有西夏文献发现，存留的文献数量也很大。仅在西北边陲的黑水城遗址，就先后发现西夏文文献 2000 卷册，敦煌石窟的西夏文题记遗留至今也在百处以上。西夏文使用涉及的范围也很大，种类繁多，有官府文书、审案记录、律令、碑铭、钱币、印章、买卖文契、字典、私人著述、佛经等。各个门类都有比较重要的文献流传于世。由于历史的原因，这些文献有的存于国内，有的已流失到海外。

现已发现的西夏文草书《瓜州审判记录》，是有确切年代记载的最早的文献，为西夏惠宗天赐礼盛元年（1069）的实物。最晚的是河北保定市郊寺庙遗址出土的石刻——西夏文陀罗尼经《相胜幢》，刻于明弘治十五年（1502）。可见西夏文前后延续使用在四百年以上。在西夏灭亡后的元明两代，还有人用西夏文刊刻佛经、刻制石碑，足见这一文字的魅力和使用价值。

西夏人所著的辞书、字典和音韵书主要有：《番汉合时掌中珠》，骨勒茂才著，西夏乾祐二十一年（1190）刊，黑水城遗址发现，木刻本，共 37 页。该书是西夏文—汉文双解通俗语汇本，是一本蕃汉人民互相学习对方语言的小辞书，为现在研究西夏文字和语言最重要的文献。《同音》，分新旧两种版本，旧本为正德六年（1132）修订，是一部以声母分类的辞书。《文海》，西夏文韵书，12 世纪中叶刊本，仿汉文《广韵》体制，按著者观点逐字解释西夏文字的构造和意义，是一部西夏文的形音义字典。韵表《五音切韵》，是乾祐四年（1173）写本。《圣立义海》，用西夏格言注释辞书，为乾祐

十四年(1183)刊。《同义一类》,乾祐二十年(1189)刊。《三才杂字》,乾定年间(1223—1226)刊。西夏文字的解读经过了艰难的历程,从开始的逐字对译、试解文义,到析求语音、贯通语法,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延续了半个多世纪。发现并利用这些古时的文字工具书,使西夏文的释读取得了重大进展。

西夏文 《文海》

重要的法律著作有《天盛改旧新定律令》、《新法》、《亥年新法》。有记载早期审判情况的《瓜州审判记录》,军事法典《贞观玉

镜统》,记录职官等级、封号的《官阶封号表》。有历史著作《太祖继迁文》、《贞观记》。有反映政治、经济、军事情况的《黑水城守将告近禀帖》、《天盛年卖地契》、《钱会凭据》等。还有一些文学作品。医学著作有《治疗恶疮要语》等。此外有很多翻译汉文的经典著作,如《论语》、《孟子》、《孙子兵法》、《贞观政要》等。军事法典《贞观玉镜统》是在黑水城发现的珍贵西夏文献,这部文献是崇宗乾顺贞观年间(1101—1113)用西夏文雕版印刷的。目前保存下来的有三个以上的版本,总共 73 面,残缺不全。该法典是在宋夏军事斗争对西夏不利的严峻情况下,由西夏国君乾顺下令组织官员修订、颁行的,意在依法治军,一方面对英勇杀敌、立有军功的官兵给予种种奖励,另一方面对虚报战功、不战而逃的败类予以严惩,以正压邪,整顿军纪,从而提高军队的素质和战斗力。

西夏人十分尊崇佛教,元昊亲自下令,让官民礼佛。西夏建国前期的四十多年中,曾先后 6 次向宋朝进马赎经,然后进行翻译。在迄今所见的西夏文文献中翻译的佛经占有很大比重,这些佛经有 3579 卷。既有西夏时期的,也有元、明时期的。形成了一部西夏文译写的《大藏经》,或称蕃文大藏经。西夏文《大藏经》是除藏文佛经外,翻译、结集最早的少数民族文字《大藏经》,它在我国中古时期的佛教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元大德十年(1306),西夏灭亡二十年后,元朝统治者还在杭州大万寿寺雕印了西夏文的《大藏经》3620 卷,印造 30 多套,分送原西夏统治的西北各地寺院"流通供养",以继续利用佛教加强对党项民族的统治。

说起西夏文献,应该提一下黑水城的发现。黑水城位于今内蒙古自治区额济纳旗,建于西夏初年,原为西北重镇,元代后逐渐荒废。1907 年至 1909 年,俄国探险家科兹洛夫率领的考察队,两次来到黑水城遗址,在这里发掘出大批文献和文物,相当于找到了一个中世纪的图书馆和博物馆,这一发现从根本上改变了西夏研究资料匮乏的状况。他们把这批文物打包数十箱,运到了俄国的

圣彼得堡。这以后，英国人斯坦因、瑞典人斯文赫定也接踵而至。他们也分别从黑水城搜罗了一批文献。1914 年，斯坦因率领的"第三次中亚探险队"在黑水城内外进行了 8 天的搜宝活动，获取了大量西夏文手稿、印本、塑像及雕刻品、绘画资料、丝织品等。斯坦因将其中的文书部分运到大英博物馆收藏，图画部分送到了印度德里的中亚古物馆。

西夏文　《西夏研究》

收藏在俄罗斯的黑水城文献有西夏文、汉文、藏文、蒙古文、回鹘文等多种民族文字类型，其中西夏文占全部文献的 90% 以上。西夏文文献有 8000 多个编号，包括世俗书籍 60 多种，佛教文献 400 余种，共有 2000 卷册之巨。此外还有大量绘画、雕塑品等珍贵文物。这是 20 世纪继殷墟甲骨、居延汉简、敦煌遗书三次重要文献收获以外又一次重大发现。俄国学者在此基础上做了大量研究，取得一系列成果。俄国学者公布了著名的西夏词语集《番汉合时掌中珠》，提

供了解读西夏文的关键性材料。

我国学者很早就注意到俄藏黑水城文献的价值,1993年以后,曾两次赴俄收集整理这批文献。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支持下,中俄最终达成协议,从1995年开始,双方共同编辑,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全部俄藏黑水城文献。

英藏黑水城文献,同样引起我国学者的关注。在英方人员的配合下,宁夏社会科学院研究人员将全部资料拍摄了20盒缩微胶卷。从2002年3月起,宁夏社会科学院和西北第二民族学院的学者经一年的艰苦劳动,将这批资料翻印成册,并且制成了光盘。英藏黑水城文献的内容也十分丰富。残页编成7000多号,除西夏文文献外,还有数量可观的波斯文、藏文、回鹘式蒙古文、巴利文、梵文、汉文文献。文献内容也十分广泛:有官府文书、兵书、契约、韵类辞书、诗歌艺文、医学药方、天文占卜、佛经等。这批文献弥补了俄藏文献的不足,成为研究西夏历史的重要资料。

经考古工作者精心整理和研究,2002年3月,莫高窟北区洞窟的一些发掘成果通过专家组鉴定,此次新发现了一批有重要学术价值和研究价值的珍贵文物。其中有西夏文《碎金》,夏文、汉文双语双解词典《番汉合时掌中珠》,这些是国内首次发现。出土的西夏文刻本《种咒王阴大孔雀明王经》、活字版《地藏菩萨本愿经》等文献均属海内外仅存的孤本。

毕昇发明活字印刷术后,这一技术很快从中原传向西部地区。西夏文很早就采用了活字印刷术,从泥活字演进为木活字。由于毕昇活字印刷的实物没有留存,让世人引以为憾,国外甚至有人质疑活字印刷术是否为中国人首先发明。经我国学者鉴别发现,西夏文遗留的文献中有十余篇活字印刷的实物,这既为中华民族在这一科技领域内所做的开创性贡献提供了有力的物证,也表现了我国汉族和少数民族在活字印刷的发明发展上,学习交流、衣钵相传的光荣传统。

甘肃武威市亥母洞寺遗址出土的西夏文佛经《维摩诘所说经》,1998年经国家有关部门组织专家鉴定,认定它是12世纪前期的活字印刷品。但对其是泥活字还是木活字印刷品,未下定论。随后武威市博物馆的孙寿岭又对佛经进行了深入研究,他按北宋毕昇的造字法烧制出数千个西夏文字,并用这些字重新印出了新本《维摩诘所说经》,从中找出了泥活字的特点,从而证明上述经文是我国现存最早的泥活字印刷品。

昔日备受冷落、少有人问津的西夏学,现受到中外学者的密切关注,正在成为"热学"。现全国有西夏学研究机构9家,中国社会科学院有西夏文化研究中心,宁夏大学的西夏学研究中心被教育部列为重点学科。在西夏学研究的专家名单中,外国学者占了将近一半。在已出版的120多种西夏学研究专著中,1980年以后出版的就有70多种,其中的42种又是1990年以后出版的。宁夏人民出版社编辑出版的《西夏学大辞典》,由于内容、词条不断补充,一再推迟出版。西夏学研究成果的不断涌现,正是当前我国学术繁荣的表现。

本节参考文献:

1. 史金波.西夏文化.长春:吉林教育出版社,1986
2. 史金波、白滨.西夏文及其文献.民族语文,1979
3. 国家图书馆学刊(西夏研究专号),2002增刊
4. 史金波、亚森·吾守尔.中国活字印刷术的发明和早期传播.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5. 中国大百科全书·民族卷.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
6. 钟侃、吴峰云、李范文.西夏简史.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1
7. 李蔚.简明西夏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
8. 史金波等主编.俄藏黑水城文献(1~11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2000

9. 国家图书馆:"中国西夏王国文字展",2002 年 7 月
10. 白滨. 西夏文. 见: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会编. 中国民族古文字. 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

第二节　契丹文

契丹是中国古代北方的民族。源出东胡,进而为鲜卑,契丹与奚同为鲜卑宇文部的一支。早在北魏时期,契丹先民就生活在我国今内蒙古东南部的西拉木伦河与老哈河流域,过着游牧生活。契丹在北朝时分为 8 部,朝贡于魏,以名马、文皮在和龙、密云一带与中原交换。隋唐时期,北方草原上,突厥称雄,契丹酋长就辗转臣服于唐朝和突厥之间。这期间,也因不堪唐朝的压迫,奋起抵抗,与唐发生数次战争。

唐末,契丹首领耶律阿保机(872—926)统一诸部,日渐强大。终于在 907 年即可汗位,辽太祖神册元年(916)正式称皇帝,年号神册,国号契丹。民间或称大蕃。耶律阿保机称帝后,册封妻子为皇后,废除世选制,确立皇权世袭制,立长子为太子。阿保机成为辽代的开国皇帝,即辽太祖。两年后,营建都城,在今内蒙古巴林左旗南波罗城。辽太宗大同元年(947)改国号为大辽,辽景宗乾亨四年(983)又改称大契丹,辽道宗咸雍二年(1066)复号大辽。即便在称辽的时候,在契丹语和女真语里仍称契丹,以族名为国名。据《辽史·地理志》记载,辽最盛之时,疆域"东至于海(今日本海),西至金山(今阿尔泰山),暨于流沙(西北沙漠),北至胪朐(今克鲁伦河),南至白沟(今河北省白沟),幅员万里。"辽保大五年(1125),辽天祚帝与金军作战时,兵败被俘,辽亡。历国二百一十年。

辽亡后,辽宗室耶律大石率部西迁,到达今新疆塔城一带,得

到突厥各部的支持，于西辽延庆九年(1132)建号称帝。他们继续沿用辽国号，史称西辽。阿拉伯史家称其为“哈剌契丹”。耶律大石建都后，东征喀什噶尔，进至和阗，向西征服撒马尔罕和花剌子模，使西辽成为中亚强大的国家。西辽后为乃蛮王篡位，1217 年亡于蒙古。

如今契丹早已消亡，人们只能从《杨家将》等文艺作品中，依稀看到他们在历史舞台上的身影。契丹人给人们的印象好像只会游牧和狩猎，或者发起战争，侵扰中原，其实这是很大的误会。从考古工作者和历史学家的发现和研究来看，契丹曾创造过灿烂的文化。契丹对于中国文化的发展起过巨大作用，后来几乎成了北方中国人的别称，以至语言学家在考证何以外国称中国为 China 或旧时称“支那”时，有的认为源于“秦”，有的认为源于“茶”或“瓷器”，也有人认为是源于早期“契丹”的族名。据称俄语“中国”一词即源于“契丹”。以后的契丹人多同化于汉、满、蒙古人中。多数研究者认为，达斡尔族较多地保存了契丹的传统，是契丹大贺氏的后裔。

契丹人建国前本无文字，刻木为信，需要书面表达时使用汉字。立国后，由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的发展和民族意识的觉醒，在辽太祖耶律阿保机的倡导和支持下，辽国两名文武全才大臣耶律突吕不和耶律鲁不古以及一些汉族知识分子在辽神册五年(920)创制了契丹大字。

耶律突吕不(？—942)，辽初学者，字铎衮，契丹族。自幼聪敏好学，深得辽太祖阿保机的器重。他受命创制契丹文字，是契丹大字的主要创制者。以功授文班林牙(契丹官名，掌文翰)领国子博士，知制诰。后又奉诏撰“决狱法”。他一生随阿保机、皇太子耶律倍南、耶律德光等南北征战，屡建战功，参加辽初多起战事，以功加特进检校太尉(见《辽史·耶律突吕不传》)。

耶律鲁不古，也是辽初学者，字信宁，契丹族。耶律阿保机的

从侄，契丹大字的主要创造者。以功授林牙，监修国史。多次参加辽初的各项战事，多有战功。后任北院大王。终年 55 岁（见《辽史·耶律鲁不古传》）。

契丹大字　《萧孝忠墓志》

契丹大字参照汉字制成，是一种十分典型的表意方块字。它以汉字隶书减少笔画而成形，字形有些像简化的汉字。也有点、横、竖、撇、捺的笔画，写法像汉字，横平竖直，拐直弯儿。即所谓的“汉人教之以隶书之半增损之，作文字数千，以代刻木之约”（《新五

代史·四夷附录》)。大字还直接借用了一些笔画简单的汉字,如"仁"、"来"、"田"等,但这些只是音符字,并不再使用汉字原来的字音和字义。只有少数还使用汉字原来的音和义,如"皇帝"、"太后"、"王"等。绝大多数契丹大字是自行创造的新字,字形与汉字不同。

契丹大字的创造者深感汉字有笔画复杂、字数多、难写难记的弊病,他们在造字过程中,就尽量减少契丹大字的笔画和字数。他们造了3000余字来表达契丹语,绝大多数字都在10画以下。根据现有资料,发现的1000多契丹大字中,多达15画的字只有一个,还只出现过一次。10画以上的仅百余字。这都显示了契丹大字比汉字进步的地方。契丹大字的行款格式是自上而下,由右而左。

契丹大字由于是模仿汉字制造的,对于记录契丹语言还是产生了极大的矛盾。汉语特点是单词多为单音节,每个字都是单音节并各有字义。契丹语属阿尔泰语系,与汉语有极大差别,单词多为双音节和多音节,语法中有黏着词尾的特点。这样,每个都是单音节的契丹大字,就不能用一个字把双音节或多音节的单词记录完毕。遇有这样情况,就必须用多个字记录一个单词的语音。这就要求契丹大字必须放弃汉字表义文字的特征而走向表音文字。单词之间没有分隔符号,也不容易判断行文中的一个字究竟本身是一个词,还是与上边或下边的字、抑或与上边下边的字共同组成一个词,还是它仅仅是表示语法关系的一个词尾。契丹文字的改造很现实的摆在了人们面前。不久,人们又创制出了更加完善的契丹小字。

阿保机的二弟耶律迭刺是个聪明过人,又十分不安于现状的人。他曾数次参与叛乱。911年,参与"诸弟之乱"。913年再次叛乱,参与谋杀阿保机未果,图谋另立,兵败被擒。918年又密谋南奔,事发,由其妻代死。史载回鹘使臣来访,无人能通其语言文字,太后便向阿保机推荐迭刺作陪。迭刺寸步不离回鹘使臣,早晚跟随,不到一月,便学会其语言,能识读其文字。迭刺随后根据回鹘

文字，"因制契丹小字，数少而该贯"。契丹小字对契丹大字作了重大改进，对契丹文化的传播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契丹小字　《萧仲恭墓志》

契丹小字为拼音文字，拼音方法受了回鹘字的启发和汉字反切注音的影响。小字有 450 多个表音符号，称原字。将几个原字拼在一起记录契丹语，文字虽少却能系统全面地表达契丹语，"数少而该贯"，使用起来比大字更为方便。两种契丹文字是为了区分创制的先后顺序，先创制的称大字，后创制的称小字，并不是因为

字写的大小。契丹小字是更加完善、更加进步的一种拼音文字,这种文字非常适合记录契丹语。

契丹小字即契丹语的单词,分别由1至7个不等的原字拼成,每个单词的原字都按一定顺序堆在一起,单词之间有间隔,极容易辨认。有些原字可以单独构成一个契丹小字,这样的小字称为单体字。有些是几个原字拼起来构成一个小字,这样的小字称为合体字。原字的笔画都比较少,没有10画以上的,多在6画左右。契丹小字的行文款式自上而下,由右向左换行。敬词抬头或空格。字体也有篆、楷、行、草之分,最常见的是楷书。

两种契丹文字和汉字一直通行于辽国境内。金灭辽后,仍在西辽和金朝前期的境内通行,而且契丹字在女真制字的过程中起过很大作用。金章宗于明昌二年(1191)才明令废除契丹字,而契丹字还在西辽使用。蒙古灭西辽后,契丹文字才渐绝于世。明代,契丹人渐融于其他民族,世无操契丹语者,更无识契丹字者,于是契丹文字成了不为人识的死文字。从创制到废止,契丹文字前后使用了200—300年。契丹文图书全部湮灭。只有宋代王易的《燕北录》和元末明初陶宗仪的《书史会要》里收录了几个经过描画变形的契丹字。

契丹字创制后,主要用于书写官方文书、碑碣、牌符、书状、印信等,同时还用契丹文字翻译了大量儒家经典、文学、史学和医学的著作。如萧韩家奴曾译《通历》、《贞观政要》、《五代史》;耶律倍译《阴符经》;耶律庶成译方脉书等。耶律庶箴用契丹大字记录建国初诸部乡里之名,寺公大师著有《醉义歌》等。今天所能见到的契丹字多为墓志铭文、碑文、铜镜、玉盘、鱼符、印章、钱币的边款铭文等。辽代书禁极严,凡个人著述传入别国即犯死罪,因此辽代文献流传下来的很少。

传世的契丹大字资料有《大辽大横帐兰陵郡夫人建静安寺碑》碑阴铭文(多已斑驳不清)、《故太师铭石记》、《萧孝忠墓志》、《耶律



契丹小字　《契丹国书·道宗宣懿皇后哀册》

延宁墓志》、《北大王墓志》、《辽太祖陵纪功碑》等，还有一些钱币、铜镜边上的铭文。传世的契丹小字资料有《兴宗皇帝哀册》、《仁懿皇后哀册》、《道宗皇帝哀册》、《萧令公墓志》、《许王墓志》、《故耶律氏铭石》等。传世的契丹字资料除玉盏等个别资料流往国外，几乎绝大部分保存在我国辽宁、内蒙古、河北和陕西的有关单位中，其中辽宁省博物馆收藏最为丰富。

契丹文字在中华文明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它首开我国东北少

数民族创制文字的先河，对女真文字、蒙古文字和满洲文字的创制都有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对女真文字的影响尤大。目前契丹小字的研究已取得突破性进展，国内外学者已释出语词400余条，构拟出原字音值100多个，并分析了20多条语法成分。我国学者清格尔泰、刘凤翥于1985年出版的《契丹小字研究》，是研究契丹文字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成果。而对于契丹大字，由于种种困难，尚未能进行深入的研究，在域内外都还未取得突破性的进展。过去人们都认为它是表意文字，现在已逐步认识到它是表意文字与音节拼音文字的混合体。两种契丹字的解读，虽然或多或少都取得一些成绩，但距离契丹字的彻底解读还相当遥远。契丹文字被称为是比甲骨文还难破译的"世界天书"。

本节参考文献：

1. 刘凤翥、于宝林．契丹字．见：中国民族古文字图录．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
2. 本书编委会．中华文明史（第6卷辽宋夏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4
3. 李桂芝．辽金简史．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6
4. 张碧波、董国尧主编．中国古代北方民族文化史．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1
5．（元）脱脱等．辽史．1343
6. 清格尔泰编著．契丹小字释读问题．东京：东京外国语大学出版，2002
7. 刘凤翥．略论契丹语的语系归属与特点．抽印本．台湾大陆杂志，1992
8. 清格尔泰等．契丹小字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

第三节 女真字

女真亦称女直，作为族称出现在五代时期。女真人是一个有悠久历史的古老民族，其先祖是商周时期生活在北方的肃慎人，后汉时称“挹娄”，南北朝时称“勿吉”，隋唐时称“靺鞨”，靺鞨有七大强部，其中粟末靺鞨在唐武则天时期建立了渤海国，隔断了黑水靺鞨与唐的联系，其余五部皆附于渤海。渤海亡国后，居民南迁。黑水靺鞨这才能从黑龙江中下游迁至渤海故地。至五代时，女真之名见于史载。黑水靺鞨便是女真的直接族源。女真分布于松花江、黑龙江下游，东至于海。主要从事渔猎，也有少量农业。

926年，辽太祖耶律阿保机灭渤海，部分女真人南迁，编入辽籍，称为“熟女真”。留居故地，未入辽籍的称为“生女真”。经过一段时期的发展，生女真中的完颜部逐渐强大。北宋末，完颜部首领阿骨打(1068—1123)利用“猛安谋克”的组织形式统一女真各部，起兵反辽，并于1115年建立金朝。1125年，金灭辽。1127年，又灭北宋，成为与南宋对峙的强大王朝。疆域极盛之时，东临海(今日本海、鄂霍次克海)，至库页岛，北到外兴安岭，西北越金山(大兴安岭)，以“界壕”与蒙古相邻，西以河套、陕西横山、甘肃东部与西夏接界，南以秦岭淮河为界与南宋对峙。1234年亡于蒙古。共历9帝，传国一百二十年。

女真人最初没有文字，各部使者往来都使用“信牌”，类似汉地古代的“合符”，以木制成，也叫“木契”。与部外联系时，派出的使者必须记忆很好，这样十分不便。太祖阿骨打破辽之后，俘获了很多契丹和汉人，这样才开始了解契丹字和汉字，并开始命令子弟学习，当时主要学的是契丹字，从此，女真贵族里有了不少通契丹字

的人。金建国后,国内文书、记录,与国外的文函往来,几乎全部使用契丹文字。

没有自己的文字,自然与国体不称。完颜阿骨打建立金朝政权不久,便命令完颜希尹和叶鲁创制文字。完颜希尹是金朝的大将,为人有谋略,智勇双全,能文能武,从阿骨打征战,屡立战功。袭辽帝时为前驱,以八骑冲锋,一日三败辽主,骁勇异常,勇不可当。南宋建炎元年(1127)灭北宋时,任元帅右监军,与诸将掳宋徽、钦二帝。1140年获罪与子同被赐死。希尹和叶鲁沿袭契丹字母的规则,仿照汉字楷书,按本国语言,创制了女真字,于金天辅三年(1119)颁行,史称女真大字。《金史·完颜希尹传》载:"希尹乃依仿汉人楷字,因契丹字制度,合本国语,制女真字。"

二十年后,金熙宗完颜亶鉴于契丹文字有大小字的制度,又在原女真文字的基础上,创制了一套女真文字,于天眷元年(1138)颁行,史称女真小字。女真小字颁行七年后,金皇统五年(1145),《金史》上又有"初用御制小字"的记载,大约小字经过一番修改后,才实际应用。女真大小字与契丹文字和汉字成为金朝前期通用的官方文字。直到章宗明昌二年(1191),才"诏罢契丹字",只准使用女真字和汉字。

为了推行女真文字,太宗命叶鲁在京师设学,专门教授女真字。并选贵族子弟入学,由国子监统一制定教材,发给学校。女真字颁行后,不仅用于官方文书往来,还翻译了大量汉文的经史著作。如翻译了《诗》、《易》、《书》、《论语》、《孟子》、《史记》、《新唐书》等。《金史·选举志一》载,金世宗大定四年(1164),曾下令颁行女真大小字所译经书,令每谋克(注:金建立的氏族单位)选两人学习。不久又建女真字学校,择猛安(注:金建立的部落单位)谋克户子弟3000人入学,并从中取优秀者百人赴京师进一步深造。同时创女直策论进士科,开科取士,鼓励女真人学习文化。为了褒奖完颜希尹、叶鲁创制女真文字的功劳,金章宗对他们加以封赠,按仓

颉立庙之例，在上京为他们立祠，岁时祭祀。

女真大、小字之间有什么区别，《金史》上并没有说明。现在发现的女真文字只有一种，所以无从确定其为大字还是小字，故学界只称其为女真文字。女真文字为方块字，由汉字的基本笔画组成，多数是采用将契丹字、汉字加笔、减笔、变形或参考原音、原义的方法制成。笔画最多十画。每个字大都为单音节，也有部分表意字为双音节。而女真词汇一般为多音节，所以一个词往往由两三个女真字组成。行文则是竖行直写，自右向左。书写时有以间隔为断句，或加“V”号表示段落。据现有资料统计，女真文字共有 900 余字。

金亡以后，留居东北的女真人，在元、明二朝统治下，仍有部分人使用女真字。明朝对东北女真各部的敕谕一向用女真字，直到明英宗正统十年(1445)，玄城卫指挥使撒升哈等奏：“臣等四十卫，无识女真文字者，乞自后敕文之类第用达达字(蒙古字)。”女真文字在女真族中也不再使用，逐渐成为死文字。这一文字在金亡之后，在东北局部地区曾使用近二百年之久。

用女真字写成的文献都已失传。传世的只有明永乐五年(1407)四夷馆编辑的《女真译语》，这是一部对照字典性质的书。该书分“杂字”和“来文”两部分，杂字专辑词汇，包括女真字的汉义及汉字注音。来文则是移录了当时东北女真进贡的表文。此书可作为研究女真文字的钥匙。明后期会同馆又编辑一种《女真译语》，专为口译之用，只有汉字注音，没有女真文字。明代所编《女真译语》有数种抄本，多已流失海外。现在常用的《女真译语》是夏德藏本，因藏于柏林图书馆，也叫柏林本。还有罗福成整理本《女真译语正续编》(1933)等。

金石资料有《海龙摩崖》、《大金得胜陀颂碑》、《昭勇大将军墓碑》、《女真进士题名碑》、《永宁寺碑》等，还有一些符牌、铜镜、印章边款铭文等。《大金得胜陀颂碑》原在吉林扶余县石碑崴子，现藏吉林省博物馆。碑石一面刻女真文，一面刻汉文，女真文译自汉

文,记载了收国元年金太祖在达鲁古城郊大破辽军的事迹,可与《金史·太祖本纪》相互印证。20世纪50年代以后,还发现了一些墨迹资料,如内蒙古发现的一些题壁、题字等。在整理西安碑林石台《孝经》中,发现了11张女真字的手抄残页,被称为《女真字文书》,这是迄今发现的惟一抄本,对研究女真文字有重要作用。

女真文 《女真文辞典》

清太宗天聪九年(1635)改女真族名为“满洲族”以后,研究女真成为禁区。直到清中叶,女真文字才为学者注意。清朝学者刘师陆清道光九年(1829)著有《女真字碑考》,四年后又著《续考》,并随文刊布了《女真进士题名碑》拓本。这之后,清光绪十一年(1885),曹廷杰

写了《得胜陀碑说》和《特林碑说》等文。清末，杨同桂写了《女真小字碑》一文。这些文章是我国研究女真文字的先声。

真正对女真文字进行深入研究，是20世纪20年代以后。一批中国学者收集资料，释读碑文，取得较大成绩。1964年，金光平、金启孮的《女真语言文字研究》在《内蒙古大学学报》发表，后经修订，1980年正式出版。这是中国第一部研究女真文字的专著。此后金启孮又积十年之功编得《女真文辞典》，1984年由文物出版社出版。这是用科学方法编著的第一部女真字词典，既是工具书，又是一部重要的学术专著。此外，一些外国学者也取得很好的研究成绩。经过一百多年中外学者的不断努力，女真字已能得到大体解读。当然，其中也还存在不少问题。

属汉字文化圈的西夏文、契丹文和女真文都是创造和仿造的汉字型文字，这三种文字表述的语言分属两个不同语系。西夏文表述的党项羌语属汉藏语系的藏缅语族，契丹文及女真文所表述的语言分属阿尔泰语系的蒙古语族和满－通古斯语族。西夏文和女真文经晚近考释，都已基本能通解。女真语乃通古斯语族惟一有文献可征的古语言，对从事通古斯语族的历史比较研究很有价值。

本节参考文献：

1. 于宝林．女真字．见：中国民族古文字图录．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
2. 中国大百科全书·民族卷．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
3. 本书编委会．中华文明史（第6卷辽宋夏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4
4. 李桂芝．辽金简史．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6
5. 颜华．女真文．见：中华民族古文字．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
6. 金启孮编著．女真文辞典．北京：文物出版社，1984
7. 金光平．启對．女真语言文字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1980

第四节　吏读、朝鲜文(谚文)

我国朝鲜族的先民,都是从朝鲜半岛迁徙过来的朝鲜人。他们定居下来以后,逐渐发展成当代中国的一个民族。据2000年统计,我国现有的朝鲜族人口为1923842人。

公元5世纪以前,朝鲜族人民一直使用汉字。汉字是何时传入朝鲜半岛的,史书上并无确切记载,也无考古资料的实在证明。传说周武王灭商以后,封商的忠臣箕子于朝鲜,但不以他为臣。现朝鲜平壤还有箕子陵遗迹。战国、秦汉时期,中原百姓也与朝鲜人有着密切的接触。大约2—3世纪,汉末和三国时期,汉字开始大量传入朝鲜。两晋以后,用汉字记载的经籍文献大规模传入朝鲜半岛。据朝鲜汉文史书《三国史记》载:549年,中国梁朝派使者与新罗赴华留学僧人觉德一道,携带佛经赴新罗国。565年,中国陈朝派使者刘思,携佛经1700余卷赠送新罗。早在372年,高句丽的小兽林王仿效东晋王朝,创办儒学教育机构——太学,教授四书五经和《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等儒家经典。朝鲜半岛的人民很早就使用汉字书写经典文献、记写历史、创作文学作品、记录语言等。

但朝鲜语和汉语是两种不同体系的语言。一说朝鲜语属阿尔泰语系,一说朝鲜语是不属于任何特定语系的"独立语言"。朝鲜语有六个方言,方言之间差别不大。有元音和谐律,元音分阳性和阴性,是一种粘着语,用递加附加成分表示语法范畴。朝鲜语的词具有语法形式多样化的特点,有特别发达的词形变化,如变位、变格等。而汉语是词根孤立语,词的变化很少。借助汉字可以表达不变化的根词干,却不容易表达用词缀系统表示的词的语法形式。

所以，经历了一段双语同文的过程后，朝鲜半岛开始创制自己的合体——音素文字体系。这就是吏读。

吏读大约出现在6世纪，是一种借用汉字的音和义标记朝鲜语的特殊文字形式。吏读又称为吏札、吏吐、吏道。吏读来自"吏"（小官吏）和"读"（阅读、解释之意）两词，可知它最早是使用于朝鲜的下级官吏。他们广泛使用这种文字来给汉字文句注音并用来表达朝鲜语的词缀和虚词。

关于吏读的产生有两个传说。一个传说是大约在690年，高句丽学者素治高僧选了几十个表示汉语单音节词素的汉字，用它们编制成某种类似音节字母表的东西，这一字母表便被称为"吏读"。再一个传说是吏读为新罗神文王（681—692）时期的鸿儒薛聪所创。实际上，在薛聪之前就已有不少早期的吏读碑文。根据出土石碑所记事实看，用汉字书写朝鲜语，应当是开始于高句丽长寿王（413—491）时期。薛聪的贡献是把历代吏读文献归纳整理，使这种文字形式更加系统化和定型化。高丽李朝时期（1392—1910），吏读主要用于公私文书。

吏读的特点主要是：实词大致使用汉语词，这些汉语词在句子里一般都按朝鲜语的语序排列。汉字实词则按当时朝鲜语的读音认读。然后再添加一些用汉字标记的表示语法意义的附加成分。这些附加成分朝鲜语称为"吐"。

吏读曾和汉文长期并用。朝鲜文创制后，三种书面文字同时使用，一直延续到19世纪末。现存的吏读文献有碑文、《大明律直解》以及一些文书契约。这些都是研究古代朝鲜语的珍贵材料。

现在，我国朝鲜族和国外的朝鲜人共同使用的文字是朝鲜文，也叫谚文。这种文字创制于15世纪中叶，是音素文字。当时的名称叫"训民正音"。至今学界还有人沿用这一名称，把它叫做"正音文字"。过去朝鲜的士大夫阶层崇尚汉文，他们把汉字奉为正统，认为学问越高，汉字水平就越高。与此相对，他们把"训民正音"看

做"谚文",意思是在群众中流传的俗文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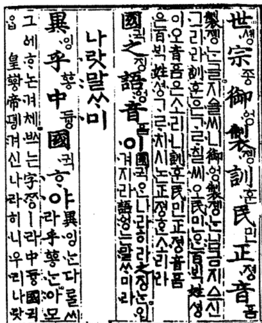
在"训民正音"创制之前,朝鲜民族曾长期以汉文为书面语,它完全和口语脱节,并不适合在群众中使用。后来又逐渐创造了一种借用汉字的音义来标记朝鲜语的文字形式——吏读。但吏读依然不能摆脱难学的汉字,标记方法复杂又不准确。尽管10世纪以后,吏读发展成为官方使用的文字,但它依然不能解决用汉字记写语言系属完全不同的朝鲜语所带来的种种不便。为了顺利发展朝鲜民族的文化,同时也由于民族意识的增强,创制朝鲜民族的语言文字成为一种迫切的要求。

朝鲜李朝世宗二十五年十二月(1444.1)开始,在世宗亲自主持下,经"集贤殿"许多精通汉语音韵和其他多种民族文字的学者的共同研究努力,在明朝翰林学士黄瓒的帮助下,总结了使用汉文和吏读的经验,利用当时已取得的音韵学知识,通过对梵文、回鹘文、八思巴字、女真文、日文等周边国家民族表音文字的分析研究,由郑麟趾等创制出了可以准确记写朝鲜语言的表音文字——"训民正音",刊印于《训民正音》一书中。当时把这种文字称为"谚文",即"通俗文字"。还在宫中设置"谚文厅",专门教授新字。后来也称谚文为国文、韩字、Hangul等。

谚文也是与汉文相对而言。在正音文献中,就有大量的诸如《杜诗谚解》这一类书籍,所谓"谚解",就是把汉文译成正音文所专用的名称。如果把满文、蒙古文、日文等译成正音文,就称"翻译"、"译语",如《三学译语》、《新翻捷解蒙语》。

谚文于世宗二十八年(1446)颁布推行。在《训民正音》的序文中指出:"国之语音,异乎中国,与文字不相流通,故愚民有所欲言而终不得伸其情者多矣。新制二十八字,欲使人人易习,便于日用。"在"例解"中,还强调了它的通俗易学:"故智者不终朝而会,愚者可读句而学。"可见这是一种非常适合朝鲜人民的文字。

《训民正音》有两种不同的版本,一个版本是1446年颁布正音


世솅宗종御엉製졩訓훈民민正졍音흠

製졩는 글 지슬씨니 御엉製졩는 님금 지스신 그리라 訓훈은 ᄀᆞᄅᆞ칠씨오 民민은 百ᄇᆡᆨ姓셩이오 音흠은 소리니 訓훈民민正졍音흠은 百ᄇᆡᆨ姓셩 ᄀᆞᄅᆞ치시논 正졍ᄒᆞᆫ 소리라

國귁之징語엉音흠이

國귁은 나라히라 之징는 입겨지라 語엉는 말ᄊᆞ미라

나랏 말ᄊᆞ미

異잉乎홍中듕國귁ᄒᆞ야

異잉는 다ᄅᆞᆯ씨라 乎홍는 아모 그에 ᄒᆞ논 겨체 ᄡᅳ는 字ᄍᆞㅣ라 中듕國귁은 皇황帝뎽 겨신 나라히니 우리 나랏

朝鲜文　《训民正音》

文字时所刊行，一般称“解例本”。另一版本是收录在今朝鲜庆尚北道半基喜方寺《月印释谱》卷首的《世宗御制训民正音》，一般称“谚解本”或“注解本”。

1504年，朝鲜李朝第十代王燕山君曾下令禁止教习谚文，并焚烧谚文书籍。“解例本”经历此“谚文禁乱”后遂至失传。过了四百多年，1940年7月才在朝鲜庆尚北道安东发现了李汉杰一家祖传的密藏“解例本”。“解例本”由《例义》、《解例》两个部分组成，全书除正音字母和举例单词外全用汉文叙述。《例义》部分由世宗自纂，主要叙述创制正音文字的宗旨以及有关新文字的规定和说明。《解例》的内容包括制字解、初声解、中声解、终声解、合字解、用字例以及郑麟趾的序文，该部分由郑麟趾、崔恒、朴澎年、申叔丹、成三问、李垲、李善老等集贤殿的学者以及敦宁府主簿姜希颜等人集

体纂写。"解例本"是正音文字研究中最重要的文献。

俗称"谚解本"的《世宗御制训民正音》,实际就是《训民正音·例义》的正音文译文。此外,还有两种单行本,其一为朴胜彬家传本,其二为日本宫内省图书寮所藏抄写本。"谚解本"的内容与"解例本"的《例义》有所不同,末尾添加了几条有关汉字音的记写规则。一般认为"谚解本"成书于1448年以后,是研究当时朝鲜语及汉字音韵的宝贵资料,在"解例本"失传的400多年间,"谚解本"曾是研究《训民正音》的主要依据。

谚文出现后,并未立即取代汉文和吏读的地位。从谚文的创制到19世纪末,一直是汉文、吏读、谚文三种文字形式同时并用。春秋馆仍用汉文纂辑实录;诉讼、告示等官方文书仍使用吏读;谚文则主要用于翻译和纂辑佛教和儒家经典、语言文学、农医书等。尽管新文字的出现为民族文化的发展和民族文化遗产的保存提供了有利的条件,但由于崇奉儒家正统思想的士大夫和统治者燕山君等的反对,新文字仍受歧视。正音文字的发展充满坎坷。其发展过程大致可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正音文字的问世到燕山君的"谚文禁乱"(1444—1504);第二阶段,从崔世珍撰《训蒙字会》前后到"壬辰倭乱"(1527前后—1592);第三阶段,从"壬辰倭乱"到19世纪末正音文字成为官方文字为止。此后正音文字改称"国文"或"朝鲜文",并逐渐演变为现代朝鲜文。也有人称第一阶段为"训民正音时代",第二、三阶段为"谚文时代"或"受迫害的训民正音时代"。还有人称第一、二阶段为"确立文字的时代",第三阶段为"以韵学为背景的时代"等等。19世纪末,李朝封建制度急剧崩溃,农民起义,争取自由、平等、民权的爱国文化启蒙运动迅速发展,迫使统治阶级进行一些改革。李朝末期的1895年,通过了"使用国汉文混合体"的法令,正式废除了汉文和吏读,使朝鲜文成为统一的书面语。正音文字终于踏上了过渡到现代朝鲜文的新阶段。但当时的朝鲜文夹用汉字,和现在的日文相似。朝鲜民主主

义人民共和国于1948年取消了夹用汉字。我国朝鲜族从1952年4月开始，也不再夹用汉文，使用纯朝鲜文。韩国直到20世纪90年代，还是汉字和朝鲜文夹杂使用，只是最近十年来，人们才逐渐习惯基本上都使用朝鲜文字。汉字文化在韩国有深厚的历史基础，一般老人都懂一些汉字，与中国人交往，虽然不会讲汉语，但都能写上几个汉字表达自己的意思。20世纪60年代，韩国就有人主张废除汉字，完全使用朝鲜文，但这样又给他们的生活造成很多不便，因为很多朝鲜语都是汉字词，一个发音和写法会对应很多种意思，如无汉字作注释，可能发生混淆，使人难以理解正确的意思。

正音文字系音位文字，同时具有音节文字的性质。《训民正音》的音韵理论源于汉语音韵学，在实际使用中，结合了朝鲜语的特点。汉语音韵学把汉语的音节分为声和韵，《训民正音》则根据朝鲜语音节的特点，使用三分法，将一个音节分为初声、中声和终声，而"终声复用初声"，即终声和初声用相同字母表示。这就以初声、终声为一方设计了辅音字母，以中声为另一方设计了元音字母。

朝鲜文创制之初有28个字母，其中有17个辅音字母，11个元音字母。1527年，朝鲜语文学家崔世珍对《训民正音》作了修改，他在《训蒙字会》凡例中做了少许修订，删去一个辅音，并作补充组成新的字母表。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废除了《训蒙字会》中用来表示字母名称的汉字。现代朝鲜文共有40个字母，其中辅音字母19个，元音字母21个。

朝鲜文字母不分大写、小写，楷体、草体、手写体和印刷体差别也不大。笔顺先左后右，从上到下。现代朝鲜文已有一套规范化的准则，操各个方言的人民在读写书面语时，都要符合这套准则。朝鲜文的行款和词的分写也有变化。在创制当初，受汉文影响，采用从右到左竖行连写。现在韩国横竖皆可。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和我国朝鲜族则采用从左到右的横排。朝鲜文是拼音文字，

안녕하십니까? 문을 닫으려고 그러십니까①?

아닙니다. 아직 퇴근시간이 되지 않았습니다. 좀 늦게 오셨더라면②헛걸음을 하실번했습니다.

책을 바칠 기한이 되였기때문에 왔습니다.

다 보시지 못했으면 더 연기할수 있습니다.

다 보았습니다.

이렇게 제도를 잘 지켜주시니 참 고맙습니다.

제도를 지키는것은 응당한 일인데 고마울게③있습니까?

책과 도서대출증을 주십시오. …수속이 끝났습니다. 또 무슨 책을 보시겠습니까?

시간이 다되였는데 어떻게 또 수고를 끼치겠습니까?

념려마십시오④. 저 목록카드를 보시고 책이름과 번호를 적어오십시오.

적어왔습니다. 이 책을 빌려주십시오.

아, 오늘 바친 책과 같은 내용인데 더 자세히 썼습니

朝鲜文 《朝鲜语自学课本》

连写会影响意思的理解和阅读速度，现在朝鲜文都规定按单词和意群分写。

朝鲜文创制后，一直沿用至今。但抗日战争时期，日本帝国主义实行奴化教育，在日伪统治下的我国东北朝鲜族在学校里只许讲日语、学日文。只是抗战胜利，特别是新中国建立后，我国朝鲜族才真正获得使用和发展本民族语言文字的权利。朝鲜语文在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是主要的通用语文，《延边朝鲜族自治州自治条例》规定："自治州自治机关在执行职务的时候，通用朝、汉两种语言文字，以朝鲜语言文字为主。"自治州以外的东三省，朝鲜语言文字是朝鲜族人民内部的主要交际工具。

朝鲜文有丰富的文献。《训民正音》是朝鲜文方案，1444 年制定，1446 年颁行。《龙飞御天歌》是历史上最早的朝鲜文文献，1447 年 10 月正式刊行。该书是作为新文字的使用示范而撰写的，全书 10 卷，采用长篇诗歌的形式叙述了李朝的建国事迹。诗歌共 125 章，每章诗后都附有汉文译诗和详细注解。全书由权踶、郑麟趾、安止等人完成，该书在正音文字研究中具有重要文献价值。《释谱详节》是释迦牟尼传记，1447 年完成，是朝鲜文最早的散文作品。《月印千江之曲》是李朝世宗阅览《释谱详节》后亲自用朝鲜文创作的歌颂释迦牟尼的歌辞，1447 年至 1449 年刊行，1462 年以后，有大量的“谚解”书刊行，其中有《佛经谚解》、《四书五经谚解》、《古诗谚解》等。汉字、汉语读本有 16 世纪著名朝鲜语文学家崔世珍编著的《训蒙字会》、《老乞大谚解》、《朴通事谚解》等。

本节参考文献：

1. 中国大百科全书·语言文字卷. 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8
2. 宣德五. 朝鲜文. 见：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国家民委文化司. 中国少数民族文字. 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1992
3. 张碧波、董国尧主编. 中国古代北方民族文化史. 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1
4. 罗卫东. 汉字在韩国、日本的传播历史及教育概况. 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01(3)
5. 黄有福：《训民正音》，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会编：《中国民族古文字》，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2

第五节　蒙古文(回鹘式蒙古文、近代蒙古文、托忒蒙古文)

蒙古族主要聚居在内蒙古自治区、东三省、新疆、甘肃、青海等地,宁夏、河北、云南、四川、北京等省市也有分布,人口为5813947人(2000)。蒙古族始源于大约7世纪唐朝时望建河(今额尔古纳河)流域的一个部落。蒙古一词最早的汉文写法是"蒙兀",蒙兀是室韦的一个部落。以"蒙兀室韦"之名初见于《旧唐书》。13世纪初,蒙兀乞颜部孛儿只斤氏族首领铁木真统一蒙古诸部,建立了蒙古国,从此蒙古成为民族名称。铁木真被拥戴为全蒙古的君主,号成吉思汗。

蒙古人及其祖先劳动生息在我国北方的大草原,他们使用逐渐形成的蒙古语进行交际。蒙古族的主体部分来自东胡系统的室韦人,室韦就是鞑靼人。蒙古兴起之前,北方草原许多部落都以"鞑靼"相称。一些汉文献中将蒙古语称为"鞑靼语"。13世纪以前,无文献记载的蒙古语称古代蒙古语。13世纪至16世纪末17世纪初的蒙古语称中世纪蒙古语。这以后为近代蒙古语。蒙古语属阿尔泰语系蒙古语族,分内蒙古、卫拉特、巴尔虎-布里亚特3种方言。

在蒙古族的历史进程中,不同地区、不同时期曾使用过回鹘文、回鹘式蒙古文、八思巴字、索永布文、瓦金德拉文、托忒文、基里尔(或斯拉夫)蒙古文。此外,蒙古族还曾使用汉文、阿拉伯文、满文、藏文以及"阿里嘎里"音标记录或标记过蒙古语。也有专家认为蒙古人早年还使用过突厥文和契丹文,但还需要进一步的考古材料来证明。这其中使用时间最长、范围最广、影响最大的是13世纪初创制的回鹘式蒙古文。经本民族语言学家的多次改革,现

在回鹘式蒙古文已经成为规范化的文字,为我国蒙古族所通用,一般称之为"蒙古文"、"老蒙文"或"胡都木文"。此外,元世祖忽必烈曾命西藏僧人八思巴另创蒙古新字——八思巴字。17世纪中叶,又创制出一种叫做"托忒"的蒙古文,在新疆等地的蒙古族中使用。

蒙古族起先并无文字,同其他兄弟民族一样,也经历过刻木结绳,在兽皮、兽骨上画画记事的阶段。1204年,成吉思汗在扫平西部蒙古乃蛮势力时,俘获其国师掌印官塔塔统阿。《元史》卷124《塔塔统阿传》中有如下记载:塔塔统阿,畏兀人也。性颖悟,善言论,精通回鹘文。"乃蛮大扬可汗尊之为傅,掌其金印及钱谷。太祖西征,乃蛮国亡。塔塔统阿怀印逃去,俄就擒。帝诘之曰:'大扬人民疆土悉归于我矣,汝负印何之?'对曰:'臣职也,将以死守,欲求故主授之耳。妄敢有他!'帝曰:'忠孝人也!'问是印何用,对曰:'出纳钱谷,委任人才,一切事皆用之,以为信验耳。'帝善之,命居左右。是后凡有制旨,始用印章,仍命掌之。帝曰:'汝深知本国文字乎?'塔塔统阿悉以所蕴对,称旨,遂命教太子诸王以畏兀字书国言。"这里的国言即指蒙古语,从此用回鹘字母书写的古代蒙古文便成了蒙古汗国的正式国文。这种文字先在贵族中使用,进而在全国推广,这就是最早的回鹘式蒙古文。1206年,蒙古汗国建立后,正式使用回鹘式蒙古文记录"札撒"(法令)、"青册"(户籍),缮写公文等。

关于回鹘式蒙古文创制的时间问题,目前在学术界有不同观点。一是"1204年说",主要依据就是《元史》卷124《塔塔统阿传》及13世纪西方旅行家《行记》中的有关记载。二是"千年说",有些学者认为,11世纪后半期,成吉思汗的曾祖父合不勒汗曾建立过政权。按一般规律,凡建立新政权的民族都要重新创制文字或改进原有文字。合不勒汗有可能借用畏兀儿字母记录了蒙古语。另一种可能是人口众多的克烈部早已使用畏兀儿字母书写蒙古语,成吉思汗建国后很容易将克烈现成的文字用于全蒙古。这样,蒙

古文字使用就有千年的历史。三是“千年以上说”，此说认为乃蛮部本身是蒙古部落，其使用的文字当然是“蒙古文”。后两种说法都是分析或推测，至今并无可靠的根据。

蒙古语和回鹘语同属阿尔泰语系，关系十分密切。在类型上都是黏着语，有大量共同成分，语音系统也相似。因此，回鹘文字母，蒙古族使用起来也很方便，回鹘式蒙古文很容易得到认同和推广。1269年，元世祖忽必烈颁行“蒙古新字”（现通称“八思巴字”），使原来使用的回鹘式蒙古文受到一定影响和限制。元代后期，回鹘式蒙古文又逐渐流通起来，直到明末清初。蒙古文研究专家道布先生认为，“一般以17世纪初林丹汗时期，蒙古族学者集体翻译的《大藏经》甘珠部作为近代蒙古文形成的标志”。

1945年，蒙古人民共和国改用以斯拉夫字母为基础的拼音文字，或称基里尔字母或俄文字母，以此来拼写蒙古文。俗称“新蒙文”。20世纪90年代，改称蒙古国后，又废除新蒙古文，恢复了回鹘式蒙古文。我国从1955年至1957年也曾试行过斯拉夫蒙古文，当时称“新蒙古文”。后来改回。人们称回鹘式蒙古文为“老蒙古文”，即针对斯拉夫蒙古文而言。新疆蒙古族自己使用托忒文，而把其他地方使用的蒙古文都称为胡都木文。

回鹘式蒙古文是一种拼音文字。字母分元音辅音两大类，共19个字母，5个元音，14个辅音。这些字母结合在一起，表示了当时蒙古语的25个音位。书写时，元音字母和辅音字母结合很紧，笔画连在一起。最小的书写单位是词。早期拼写法并不严密，有一个词分做两段书写的情况，因此常有重文及别体出现。书写格式是由上而下竖写，从左往右移行。为适应书写需要，回鹘式蒙古文字母在词首、词中、词末等不同位置上，笔画略有变化。标点符号有三种：单点（相当于逗号），双点（相当于句号），四点（用于段落末尾）。

回鹘式蒙古文的发展分为两个阶段。从13世纪初到17世纪初是第一阶段。这时字母的笔画结构、拼写规则和书写体式都与回鹘

蒙古文　《蒙古语文教程》

文相似,保持着古朴风貌。17世纪以后进入第二阶段。卫拉特部在回鹘式蒙古文的基础上创造了适合本地区方言的托忒蒙古文。回鹘式蒙古文在不同地区向着不同方向发展,字母笔画结构有所改进,拼写规则渐趋严密,一个词分成两段书写的现象消失了,终于形成了区别于古代蒙古文的近代蒙古文。

成吉思汗时代,回鹘式蒙古文一直是蒙古人最主要的文字。即使在不再享有“国字”地位的元代,回鹘式蒙古文不仅没有停用,依然得到改进和发展。第一部蒙古文语法书便在元代写成。传说13世纪中叶,西藏萨迦派高僧功嘉监藏(1182—1251)就曾研究蒙

古语。对回鹘式蒙古文进行较大改进,制定拼写规则,并写出基础语法书的,是生活在13世纪末至14世纪上半叶的元代蒙古族学者搠思吉斡节儿。他撰写了第一部蒙古语语法书《蒙文启蒙》,直译为《心箍》。原书已失传,但它的基本内容在18世纪的丹津达格巴的语法名著《心箍注疏·虚空宝》中保留了下来。《心箍》由3部分组成,涉及蒙古语的语音、语法及词法。这部著作对蒙古语的发展和回鹘式蒙古文的规范化起到了重大作用,成为蒙古传统语法研究的开山之作。

搠思吉斡节儿是元代的蒙古语文学家,生卒年已不可考。据称是蒙古化的畏兀儿人。他学识渊博,曾拜元朝国师八思巴为师,精通蒙古语、畏兀儿语、吐蕃语等。元仁宗时(1311—1320)被封为国师。英宗时"常令军士五人守卫"他的住处,可见其地位显赫。所著的《蒙文启蒙》补充蒙古文字母,修订正字法,对回鹘式蒙古文的拼写规则做了比较完整的阐述,为回鹘式蒙古文的规范奠定了基础,常为后世蒙古语言学者所引鉴。从清雍正年间(1723—1735)成书的《蒙文启蒙诠释》转述的内容来看,他对当时的官方文字八思巴字持否定态度,主张用回鹘式蒙古文译写佛经。他把回鹘式蒙古文的字母区分为元音、辅音两大类,又将元音字母分为阳性、阴性、中性3组,详举了123个开音节和11个韵尾,对各种常用语法附加成分的写法也分别加以规定。他本人也是著名佛经翻译师,译过不少佛经,也写过诗歌。他曾率领译者将众多藏文经、咒译成蒙古文。他用蒙古文翻译了印度学者寂天所著《入菩提行论》,并撰《入菩提行论疏》。此外还译有《五守护经》、《十二因缘经》等佛经多部。

从蒙古族采用回鹘字母拼写本民族语言开始,到明末清初,这种文字的使用已有七百多年历史。1269年,忽必烈下令创制蒙古新字——八思巴字以后,回鹘式蒙古文不再是元朝的官方文字。但它并没有被完全遗弃,有元一代,留下不少用这种文字写下的金

石、手抄和木刻文献。在民间更是一直流行回鹘式蒙古文。在蒙古族文化发展的长河中，它使蒙古族优秀的文化遗产得以保存，成为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用回鹘式蒙古文写成的文献，以原件形式保存下来的不过数十种，包括写本、刻本、碑铭、印文、符牌等。

现存用回鹘式蒙古文书写的最早的碑铭是《也松格碑》(1225)，又称《成吉思汗石》。该碑为成吉思汗弟哈撒儿次子也松格立。原在外贝加尔地区黑尔黑尔城遗址附近溪谷中，19世纪移至尼布楚时已毁为两段，1832年转送彼得堡。碑文五行，大意是成吉思汗征服回回百姓，于不哈速赤忽召集全蒙古那颜聚会时，“也松格射335步中的”。此碑对研究蒙古历史、语言、文字有重要价值。碑刻还有《释迦院碑记》、《竹温台碑》、《云南王藏经碑》、《兴元阁碑记》等，其中《云南王藏经碑》和《也松格碑》是纯粹用蒙古文刻写的，其余都为汉蒙两种文字合刻或对照的。这些汉蒙对照的碑铭大都属于元代晚期。

今天流传下来的元代回鹘式蒙古文文献主要有：《阿八哈赐教皇使节书券》，该券为伊儿汗国阿八哈汗(1265—1282)赐给罗马教皇使节的证书，现藏于梵蒂冈教廷档案馆。此证书共16行，写于1267或1279年兔儿年。1921年初次发现。同年在教廷档案馆发现的还有1290年虎年写成的《阿鲁浑汗致教皇书》和1302年虎年写的《合赞致教皇书》。《阿鲁浑致法国国王书》共34行，写于1289年牛年，现藏法国国家档案馆。1824年初次公布。前两件是现存回鹘式蒙古文最早的写本。

吐鲁番出土的《亚历山大传奇》蒙古文抄本残卷也属于元代，残存7页，现藏于德国东方研究所图书馆。该书描写的是马其顿王亚历山大寻求长生圣水的故事。原作成书于公元1世纪，有拉丁文、阿拉伯文、波斯文、突厥文等多种译本，而此书传入中国仅见蒙古文译本。这本书对研究元代中西文化的交流提供了极有意思的线索。

回鹘式蒙古文翻译作品也很多,元代时曾用此文撰写、翻译过大量著作、典籍、佛经等。现存的有蒙汉合璧的木刻版残本《孝经》,译文是1307年由中书右丞孛罗铁木儿所作,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还有《入菩提行论疏》,《入菩提行经》是7世纪印度的梵文经典,1299年元朝文豪搠思吉斡节儿将其译成蒙古文并加以注释。元皇庆元年(1312)在北京白塔寺以木刻版刊行,共印了1000份,原件曾在吐鲁番出土,残存12页,现藏于德国柏林,1953年,前西德初次将其公布。明代有四夷馆抄录的《华夷译语·鞑靼馆杂字》和《高昌馆课》中的一些敕谕和奏章。《华夷译语·鞑靼馆杂字》和《高昌馆课》中的蒙古文敕谕和奏章等,都是从汉文译为蒙古文的,里面的蒙古文档案都是蒙汉合璧。此外还有一些请参阅道布先生的《回鹘式蒙古文文献汇编》,民族出版社1983年出版。

回鹘式蒙古文流传下来的典籍十分丰富。其中重要的有《元朝秘史》,亦即《蒙古秘史》,是蒙古族存留至今的第一部史学著作,原著已佚。书中记载了成吉思汗祖先谱系,蒙古各氏族部落源流,成吉思汗生平事迹,以及窝阔台一朝的史实,是研究12—13世纪上半叶蒙古族社会历史的重要文献,被誉为蒙古族历史文化的百科全书,受到古今中外蒙古史学者的特别重视。它最早是口耳相传的口碑文献,太宗十二年(1240),用回鹘式蒙古文记录成书,收藏在国史院内,秘不示人。朱元璋灭元后获此书。蒙古文原书后佚失,现只有明初四夷馆蒙古文汉字译音写本。翰林院侍讲火原洁、编修马沙亦黑奉敕编,每个词旁译注汉文词义,附有内容择要。全书分为282段。此书有两个版本,一种是正文10卷,续文2卷;另一种是15卷本。近代以来,此书相继流传俄、日等国,影响及于域外,对该书的研究逐渐成为一门国际性的学问。它与《蒙古黄金史》、《蒙古源流》并列为蒙古文三大历史著作。

17世纪后,以康熙帝钦命刊刻《如来大藏经》为重要契机,蒙古文的书写形式和拼写规则发生了很大变化。由于刻写经书对语

言文字的严格要求和概念的准确反映，使回鹘式蒙古文变得更加规范化，终于形成了近代蒙古文。清代是近代蒙古文文献的极盛期，官方到民间刻印了大量书籍，这些图书构成了现存蒙古文古籍的主体。

由于清廷将藏传佛教作为统治蒙古诸部的重要工具，所以其蒙古文的官刻本中占大多数的是藏传佛教经典。较为重要的有早在康熙二十二年(1683)，皇帝钦命刊刻的蒙古文《如来大藏经》。这部大藏经是从藏文译成蒙古文的，历时十七年，到康熙三十九年(1700)方告刊成。从当时投入之多，所设机构规格之高，组织之严密，分工之明确，都可以看出清廷对这部文献的重视。佛教重要典籍《甘珠尔》、《丹珠尔》早在13世纪末14世纪初便已译成蒙古文，后又经几次重译、修订。康熙五十九年(1720)在北京又雕版刊印了《御制甘珠尔》108卷。乾隆十四年(1749)又刊印了《御制丹珠尔》共225卷。这两部佛典不仅具有宗教意义，对蒙古语文的发展也颇具价值。它们卷帙浩繁，内容丰富，涵盖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诸多分支，对蒙古族的语言、历史、文化都有重要研究价值。此外，官刻的文献还有一些辞书如《御制满蒙文鉴》、《西域同文志》等。还有一些史书如《蒙古源流》、《格斯尔的故事》等。

新中国刚成立时，蒙古文的《甘珠尔》和《丹珠尔》全国只剩下6套，成为稀世珍宝。内蒙古和北京的有关专家学者百余人，从1992年开始，对这两部蒙古文的《大藏经》进行整理校注，从1996年开始，由辽宁民族出版社陆续重新出版。此举在国内外蒙古学界产生重大反响。

我国现行的蒙古文是由回鹘式蒙古文发展而来。现行蒙古文字母有29个，其中表示元音的5个，表示辅音的24个。其具有以下特点：(1)一些字母在书写上有所分化，表示了不同读音。(2)一些字母的形状有所改进，更便于书写。(3)书写借词时，增添了一些字母。(4)一个词是一个单位，上下连书。(5)某些词及其附加成分的

规范写法改进为接近口语的形式,而且增加了新式标点符号。现行蒙古文是一种超方言的拼音文字,无论何种方言的人都便于掌握。超方言是它的一个特点,也是它富于生命力的重要原因。

1648年明末清初,西部蒙古藏传佛教首领、语言文字学家咱雅班第达·南喀嘉措(1599—1662)(法名那木海札木苏)在回鹘式蒙古文基础上创造了适合卫拉特方言特点的托忒蒙古文,这种文字又称陶德蒙古文。卫拉特也称作"厄鲁特",是清代西部蒙古各部的总称,元时称"斡亦剌",明称"瓦剌"。他们初居今叶尼塞河上游,元末,南迁至匝盆河流域和准噶尔盆地,主要在今新疆一带活动。明时,在朝廷的扶持下,所部曾屡与东部蒙古交战。清时分为杜尔伯特、准噶尔、土尔扈特、和硕特等四部。17世纪70年代,准噶尔崛起,兼并各部,并威胁清统治。清康熙年间曾屡次对之用兵。直至乾隆二十二年(1757),才全部统一于清。

17世纪初,西藏黄教传入卫拉特。卫拉特四部首领议定各献一子出家当喇嘛。联盟首领拜巴噶斯无子,便以咱雅班第达(1599-1662)为义子献出当喇嘛。咱雅班第达16岁受戒,17岁赴西藏修习佛法。因资质聪颖,学习勤奋,十年时间,成为博通经教、出类拔萃的僧人,被大昭寺授予"格西"学位,深受班禅和达赖的赏识。清崇德三年(1638)应邀返回卫拉特,代表五世达赖布教。他曾参与制定著名的《蒙古卫拉特法典》。他信奉佛教,规劝众人尊重宗喀巴教,并在各部首领中积极斡旋,消除纷争,足迹甚至到达伏尔加河的土尔扈特部。他号召卫拉特人崇信佛法,与萨满教作斗争。他亲自为封建贵族诵经、受戒、主持殡葬仪式等。调解了和硕特部的内战后,他在前往西藏的途中得病,于青海圆寂。咱雅班第达还从事了创制文字和翻译大量佛经的工作。

他创制的托忒蒙古文,使书面语言和卫拉特方言密切结合起来,能够较好的表现卫拉特人的语言。他先前翻译了藏族文献《玛尼全集》。创制托忒蒙古文后,又与弟子把藏文佛经《大涅槃经》、

《无量寿智经》、《金刚经》、《金光明经》等译成托忒蒙古文。他翻译的藏文著作达170余种，多为宗教典籍，也有关于藏族人民伦理、历史、文学、医学的文献。他著的《缀字法》是托忒蒙古文的第一部正字法。

托忒蒙古文与现行蒙古文一样也是拼音文字，在新疆卫拉特部一直沿用至今。托忒蒙古文是在原蒙古文的基础上略加改动而成。以加圈点和改变字形的办法使一个字母只表示一个音，另外设附加符号使长短元音分明。行文从上到下，从左向右移行。托忒蒙古文有32个字母，7个表示元音，25个表示辅音。一些字母的形状和读音与现行蒙古文不同。托忒蒙古文各种附加成分跟词干连写的现象多于现行蒙古文，标点符号则与现行蒙古文相同。

"托忒"在蒙古文里是清楚的意思，意为"清楚的"蒙古文。它在一些地方确实比老蒙古文清楚了。如使用一个字母表示一个元音；把辅音字母的形状和读法固定下来；用特殊方法表示长元音等。尽管如此，它还是属于方言文字，而且有些笔画比现行蒙古文还复杂，所以多年来托忒蒙古文只在卫拉特方言区使用。为了使国内蒙古族使用的文字能够统一，1982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决定在新疆地区蒙古族中推广现行蒙古文，逐步停止使用托忒蒙古文。

托忒蒙古文图书存量较多。《四卫拉特史》是卫拉特部最早的一部历史文献。全书16章，作者是额木齐嘎班沙力希，乾隆二年(1737)的抄本是此书最早的一个本子。《和鄂尔勒克史》是托忒蒙古文的早期图书，成书时代不详，作者为和鄂尔勒克。此书记录了卫拉特诸部的分布、汗位交替、对清对俄政策、土尔扈特部迁徙俄国、和硕特部占领西藏、青海等重要历史事件，史料价值很高。已发现两个抄本，一个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丢失，一个于1982年在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发现。此外还有一些文学作品和语文专著。清代蒙古族学者富俊编著的《蒙古托忒汇集》4卷是一部重要的语文著

作,有嘉庆二年(1797)的北京刻本。另外还有一些佛经和碑刻。

新中国建立后,国家对蒙古文(以下包括托忒文)的使用和发展十分重视。培训大量师资,出版各种教材,在蒙古族聚居区的中小学里普遍使用蒙古语文授课。大学里使用蒙古文教学,设立蒙古语言文学系。自治地方的主要城镇党政机关行文,都是蒙汉两种文字并行。全国有十余家出版社出版了大量蒙古文的图书文献,最近每年有数百种,印数将近200万册之多。一些蒙古文的古代典籍也得到了整理出版。蒙古文报刊的发行量每年都不断增加。专门研究机构、大专院校都承担了研究、讲授蒙古语言文字的工作。

1975年,成立了内蒙古、新疆、青海、甘肃、辽宁、吉林、黑龙江和北京八省市自治区蒙古语文工作协作小组,担负起全国蒙古语文研究、学习、使用的指导责任。1979年10月,八省市区蒙古语文工作协作小组办公室编印了《全国蒙文古旧图书资料联合目录》,反映了全国各地60个公共和专业图书馆收藏蒙古文古旧图书资料的一般情况。所收书目均为新中国成立前国内出版或抄写的图书资料,分哲学、政治、法律等15类,收录书目1500余种,7000余册,由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

蒙古文正字法进一步规范。内蒙古自治区还设有蒙古语名词术语委员会,使蒙古语名词术语在规范化、制度化的道路上前进。2001年底,内蒙古自治区还召开学习使用蒙古语文先进集体和个人的表彰大会,会议号召各族干部群众进一步落实党的民族政策,做好学习使用民族语文的各项工作。2002年7月9日,中国第一台蒙古文彩色电视机在青岛海尔下线,彩电屏幕显示的都是蒙古文,这是为了满足边远地区蒙古族牧民特殊需求而推出的。

2001年9月11日,"蒙古文化"网站及蒙古文互联网应用技术通过专家鉴定。这项技术首次实现了蒙古文在互联网上的浏览、传输、编辑、显示和打印等,填补了在互联网上无法使用蒙古文的空白。同时,中国少数民族第一个多功能办公软件"蒙文 WPSoffice—

多功能办公组合"开发成功,该软件是包括汉、蒙古、满、锡伯等多民族语言文字在内并兼容国际通用语言的大型基础软件,这一软件为蒙古文的电脑使用提供了有力的技术支持。2002 年 7 月,中国首家蒙汉双语网站——呼和浩特市政府(蒙汉)双语网站(www.hhinfo.cn)正式开通。该网站在全国首家采用蒙古族语言文字发布信息,解决了蒙古文字不能在互联网上浏览的关键性技术难题。蒙古语文正快步跨入现代信息社会。

本节参考文献:

1. 中国大百科全书·民族卷.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
2. 道布.回鹘式蒙古文.见:中国民族古文字图录.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
3. 高文德.中国民族史人物辞典.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
4. 张碧波、董国尧主编.中国古代北方民族文化史.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1
5. 田晓岫.中华民族发展史.北京:华夏出版社,2001
6. 斯钦朝克图.蒙古文.见:中国少数民族文字.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1992
7. 黄润华、史金波.少数民族古籍刻本.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
8. 孟广耀.蒙古民族通史(第 1 卷).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2
9. 道布.回鹘式蒙古文.见:中国民族古文字.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

第六节　八思巴字

13世纪初，铁木真的蒙古铁骑像旋风一样，从漠北高原横扫欧亚大陆。1206年，铁木真在斡难河即蒙古大汗位，号成吉思汗，建立了空前强大的蒙古帝国。建国后，成吉思汗着手制定了一系列政治、军事、法律制度。在文化上，采用回鹘字母书写蒙古语，形成了最初蒙古文字的萌芽。蒙古国使用这种回鹘式蒙古文记录法令、登记户籍、缮写公文。

1260年，成吉思汗第四子拖雷之子忽必烈（1215—1294）继承了汗位。忽必烈鉴于蒙古"武功迭兴，文治多缺"的状况，极力提倡文治，推行汉法。他深感"今文治浸兴而字书有阙，于一代制度实为未备。故特命国师八思巴创为蒙古新字，译写一切文字，期于顺言达事。"（《元史·八思巴》）这就是八思巴蒙古字。

八思巴是藏族著名学者、藏传佛教萨迦派五祖中第五代祖师罗追坚赞（1235—1280）的尊号。他是元朝第一代帝师，吐蕃萨迦人，出生于款式贵族之家。相传他3岁能诵读莲华经咒，8岁能背诵《本生经》，9岁即能为人讲经，且又出生于名门望族，故时人称其为八思巴，意为"圣者"，犹汉之"神童"。史书上说他"生七岁，诵经数十万言，能约通其大义，国人号之圣童，故名曰八思巴。少长，学富五明（五明为佛教用语，'明'系梵文意译'学问'，五明即佛教徒的五门学问），故又称曰班弥怛。"（《元史》卷201《释老传》）

宋淳祐四年（1244），八思巴随伯父萨班赴凉州（今甘肃武威）谒见窝阔台子阔端。途经拉萨时，萨班于大昭寺内为其授沙弥戒出家。三年后，终于见到阔端。12岁的八思巴聪明智慧，举止大方，深受阔端喜爱。1251年夏，八思巴应召赴六盘山谒见忽必烈，

时年已36岁的忽必烈也十分喜欢这个16岁的少年。八思巴以他的才智被忽必烈尊为"上师"。萨班病逝后,八思巴继为萨迦派新法王。忽必烈及王妃、子女皆从其受密教灌顶。忽必烈还赠给八思巴"优礼僧人诏书",确保后藏萨迦派寺院僧人不受侵害。

忽必烈从登基前的1253年,即召八思巴喇嘛于左右。当时佛道二教为取得蒙古统治者的支持,常激烈论战。1258年,佛道两家各选17名代表在忽必烈座前辩论,以决优劣。八思巴作为佛家第二名"抗论"名手参辩,引经据典,条分缕析,一举驳倒对方,使道家辞屈折服。遂以樊志应为首的17名道人诣龙光寺削发为僧。八思巴以学识才干进一步取得忽必烈的信任。忽必烈授予八思巴以"三界法王"的称号,赐珍贵之礼,表彰他弘扬佛法之功。

1260年,忽必烈即汗位,尊八思巴为国师,赐玉印,任中原法王,统天下释教。至元元年(1264),设总制院,执掌全国释教和吐蕃僧俗政务,以八思巴领总制院事。次年,八思巴受命赴萨迦,筹建卫藏行政机构。返京后,又奉命创制蒙古新字。

为确保蒙古贵族对境内人民的有效统治,要有一种能够记写各民族语言的新文字,于是忽必烈命令八思巴创制新文字。1269年,文字制成,由忽必烈下令颁行,初称"蒙古新字",不久改名"蒙古字",后又严令但称"国字"、"国书"。因新字是八思巴用梵藏文字母创制,故近代学术界通称其为"八思巴蒙古字"或"八思巴字",也叫"方体字"。因造字有功,第二年,八思巴升号为"帝师",加封"大宝法王",更赐玉印。

蒙古内部曾发生四年内战,忽必烈获胜后,将大本营从和林迁往燕京,称为大都。至元八年(1271)定国号为元,正式建立了元朝。新文字的使用对新政权的巩固起到了不小作用。在一些史籍上,人们曾把多民族的蒙古帝国称之为"五色之国"。元朝建立之际,疆域已有很大扩展,许多民族已被统一。与此相适应,创制一种全国共用的文字自然就显得非常必要。忽必烈于元朝建立的前一年颁布

使用新文字的诏书，规定这种文字不仅要适用于当时的蒙古语，而且还要适用于汉语，以及元帝国所辖领土内诸民族的语言。以为这样就可以为元帝国的文化统一奠定基础。《元史》中记录了忽必烈推行新字的著名诏书。诏曰："朕惟字以书言，言以纪事，此古今之通制。我国家肇基朔方，俗尚简古，未遑制作，凡施用文字，因用汉楷及畏吾字，以达本朝之言。考诸辽、金，以及遐方诸国，例各有字，今文治寖兴，而字书有阙，与一代制度，实为未备。故特命国师八思巴创为蒙古新字，译写一切文字，期以顺言达事而已。自今以往，凡有玺书颁降者，并用蒙古新字，仍各以其国字副之。"

1276年，由元太子真金率军护送八思巴返回其故乡萨迦。一路上千辛万苦，八思巴总算回到了阔别多年的家乡。到达西藏后，在曲弥（今日喀则曲美）举行了有7万僧众参加的盛大法会，真金以忽必烈名义作法会的施主。法会盛况空前，八思巴受到家乡人民的尊敬和爱戴。八思巴有《彰所知论》等多种著述问世，生前对内地与藏区的文化交流发挥了巨大作用。

八思巴字是一种拼音文字，主要由藏文字母组成，也有一些梵文字母，还包括几个新造字母。字母形体多呈方形。字母原有40多个，后按实际使用的需要，陆续有所增补，按现存资料统计，共有57个字母。书写时以音节为单位，自上而下竖行，自左向右转行。书体分为正体（楷书）、篆体、双钩体等三种。正体最常用，篆体一般用于官印和碑额，双钩体最少用，只是偶见于碑刻的边框两侧。八思巴字以音素为表音单位，字母分元音和辅音，原则上一个字母代表一个音素，元音a不设专用字母。

按忽必烈的规定，八思巴字是用来"译写一切文字"的，所以它不仅为蒙古民族使用，也为元朝期间的其他民族所使用。现存资料也表明，它曾经用来书写蒙古、汉、藏、梵、突厥、察合台、维吾尔等多种语言。译写各种语言时，有两种原则，一是按口语语音拼写，如译写蒙古语和汉语；一是按所译写语言的书面形式转写，如

译写藏语和梵语。在蒙古语文献中出现的个别藏语词有两种形式，一种与藏语的书面形式相同，一种与藏语的书面形式不尽相同。后者大约就是依据蒙古人读音的缘故。

元代吐鲁番地区的畏兀儿人也使用过八思巴字，已为出土文献所证实。据专家考证，目前发现的八思巴字的畏兀儿语资料主要分两部分，一是八思巴字的印章资料，一是八思巴字的文献资料。前芬兰总统曼涅尔海姆曾在吐鲁番考察，获得过回鹘文和八思巴字文献残片，他推测一件文献上的印章可能是八思巴字突厥语。直到1974年，大量回鹘文官私文书上的八思巴字突厥语印章铭文才被破译解读，知道这是用八思巴字拼写的突厥语。过去德国柏林博物馆收藏的吐鲁番出土蒙古语文献中，有两件八思巴字的文献残片，并被注明其表示的不是蒙古语。最近，经德国回鹘文专家解读后才确认，这是八思巴字回鹘语文献，为古代回鹘人的遗物。

八思巴字制成之后，朝廷采取了一系列行政措施，扩大其适用范围。如颁布文字使用的诏令、法令，设置蒙古翰林院、蒙古字学等。尽管颁布了强令学习和普及新文字的各种法令和措施，但收效甚微。朝廷再三下令禁止回鹘式蒙古文的使用，强调使用八思巴字，都效果不佳。事实上八思巴字在民间和伊儿汗国、金帐汗国等处都未真正使用。由于八思巴字以音节为书写单位，不像回鹘式蒙古文，这种书写单位并不适合蒙古语的特点。所以这种文字主要使用范围只是在朝廷上，用于书写圣旨等官方文书，并未得到普遍推广。即使在忽必烈时期的朝廷上，这种文字的使用依然碰到重重阻力，个别部门甚至中书省，仍要求在公文中使用旧文字。至元二十年(1283)，皇太子阿难答给陕西永寿的旨令，也用的是原汉蒙两种文字书立。

至正二十八年(1368)元朝灭亡后，蒙古贵族退回北方大草原。作为元帝国的国字，八思巴字并没有立即被遗弃。蒙古贵族仍然继续使用它刻制印玺，直到明万历八年(1580)，还有贵族使用八思

巴字刻制碑文。但它始终没有被广大蒙古人民所接受,很快成了一种死文字。然而在西藏,八思巴字一直被保留至今,八思巴字在那里被称为“霍尔·伊格”,即“蒙古字”,主要被使用在印章和书籍封面的题签上,如达赖喇嘛和蒙古王爷的印章。在西藏、安多地区和内蒙古一些寺庙的门上仍有八思巴字镌刻的经文。

八思巴字作为元朝的官方文字,使用了一百一十多年,译写过多种语言。现存资料中,译写维吾尔语、藏语、梵语的资料很少,译写蒙古语、汉语的资料较多。1991 年,照那斯图先生出版了《八思巴字蒙古语文献 40 种》,汇集了各种原件,主要有:圣旨、懿旨、令旨、法旨、石壁经文、碑刻、官印、符牌、图书、禁约榜、钱币等。这部书不仅集八思巴字资料之大成,而且有考证和注解,是一部极有价值的研究论著。

ཧོར་ཡིག་གསར་པའི་སོག་སྐད་ཀྱི་རྒྱལ་པོའི་

རྫས་རིགས། གསེར་ཡིག དབྱིབས་སྒོར་མོ། སོར་ཅིག་ཙ་རིམ་ཙི་པ་ཏ། ཞུགས་མ་འདོགས་ཕྱིང་ཅན། ཚངས་ཐིག་རིང་ཚད་སི་མི་༡༡.༥། རྒྱབ་མདུན་གྱི་ཡི་གེ་སྦྱར་འབུར་བ།

དེའི་ནང་དོན་ཆེ་རིང་གནམ་གྱི་སྟོབས་ལ་བརྟེན་ནས་དབང་ཐོབ་པའི་རྒྱལ་པོའི་ལུང་། མི་སུ་ཞིག་ཡིན་རུང་བཀའ་ལ་མ་ཉན་ན་ཙ་རར་བྱེད་དུ་བཙུག་རྒྱུ་ཡིན་ཞེས་འཁོད་འདུག

ཕྱང་བུ་འདི་ནི་ད་བར་མཐོང་རྒྱུ་བྱུང་བའི་ཧོར་ཡིག་གསར་པའི་སོག་སྐད་ཀྱི་རྒྱལ་པོའི་ལུང་གི་གསེར་ཡིག་གི་ཕྱང་བུ་གཅིག་པུ་རེད།

བཀྲས་ལྷུན་དགོན་དུ་ཉར་ཚགས་བྱས་ཡོད།

八思巴字 《八思巴文蒙古语金圣牌》

八思巴字的碑刻近 60 种,其中拼写蒙古语的近 30 种,半数已公布于世;拼写汉语的 30 种左右,多数也已公布于世。印章现存 100 余方,包括皇帝玺,帝师、国师、藩王印,元朝中央和地方各级行政、军事机关及其主管官员之印。符牌,俗称“牌子”,多呈圆形,铜质、铁质,或镀以金银,一般发给各级军官或使者作为出入关卡、禁地的通行证,现存十余种。元朝通行的宝钞,钞面为汉文,面值

两旁各有八思巴字一行,拼写汉语。一般钞面为“大元通宝”或“至元通宝”,左行为“至元宝钞”,右行为“诸路通行”。

八思巴字的图书,现已发现的有4种。(1)《萨迦格言》蒙古语译本残叶。20世纪初在吐鲁番地区发现,共4叶,现1叶藏于芬兰,3叶藏于德国。(2)《百家姓蒙古文》。俗称八思巴字百家姓。(3)《蒙古字韵》。为八思巴字译写汉文的范本,元刻本一直流传到清代。现仅存一个旧抄本,藏于大英博物院。(4)《译语》。汇编元时各种译语材料而成,书中有一编《八思巴字字汇》,是重要的文献资料。

本节参考文献:

1. 中国大百科全书·民族卷.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
2. 照那斯图、杨耐思.八思巴字.见:中国民族古文字图录.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
3. 牛汝极、照那斯图.元代畏兀儿人使用八思巴字述论.西北民族研究,2002(3)
4. 曹永年等.蒙古民族通史,第2卷.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2
5.(美)尼·鲍培著、郝苏民译.“八思巴字蒙古语碑铭”译补.呼和浩特:内蒙古文化出版社,1986

第七节 满 文

满族具有悠久的历史渊源。其直系先人为明代女真(亦称女直),世居长白山及黑龙江、松花江流域。12世纪初,以完颜部为核心的女真人,在阿骨打领导下,建立了金国政权。金代,大量女真人进入中原地区,逐渐融入汉族。仍留住在今黑龙江省依兰一带的女真人,和分布于松花江两岸、黑龙江中下游以及乌苏里江流域、东达海岸的女真各部逐渐演化。16世纪末至17世纪初,以建州、海西两部女真人为主体,将分散在东北的女真人统一为一个整体,原自称“颟珠”,金太宗天聪九年(1635),皇太极废“诸申”旧号,定族名为“满洲”。辛亥革命后称为满族。据2000年统计,满族现有人口10682262人。

满族原是女真后裔。金代女真曾创制女真文字,并有大、小字之分,这种文字使用了一个多世纪。金灭亡后,女真文字仍在我国东北地区使用至明英宗正统年间(1436—1449)。那时,东北各个卫、所的女真官吏向明朝进贡奏表时,还在使用女真文。据记载,明朝设在松花江岸的玄城卫指挥使撒升哈在给朝廷的奏文中说:“臣等四十卫,无识女真文字者,乞自后敕文之类第用达达字。”(《明英宗实录》正统九年二月甲午)。达达字就是蒙古文。这以后满族曾经使用蒙古文。从1119年完颜希尹创制女真大字到1234年金亡,是女真文使用的全盛期,从1234年到1449年,为女真文沿用期。从1449年到1599年创制满文,是女真人使用蒙古文的时期。

明万历二十七年(1599),努尔哈赤命令额尔德尼和噶盖两人在蒙古文字母的基础上创制满文。这就是“无圈点满文”或“老满

文”。满文由于满族使用而得名，又由于清王朝的缘故，也叫“清文”，满族立国后，又将其文字命名为“国书”。

据《清太祖武皇帝实录》记载：当时满洲没有文字，文书往来使用蒙古字。必须先学会蒙古字，将文书译为蒙古语，然后才能明白。已亥年(1599)二月，太祖想以蒙古字为基础编成国文，便与大臣额尔德尼和噶盖商量。他们二人说：“我们都是学会蒙古字，才知道蒙古语。要把我国的语言编成文字，我们实在不行。”“太祖曰：‘汉人念汉字，学与不学者皆知；蒙古之人念蒙古字，学与不学者亦知；我国之言写蒙古之字，则不习蒙古语不能知矣。何汝等以本国言语编字为难，以习他国之言为易耶？’噶盖、额尔德尼对曰：‘以我国之言编成文字最善，但因翻编成句，吾等不能，故难耳。’太祖曰：‘写阿字下合一妈字，此非阿妈乎(阿妈，父也)？厄字下合一脉字，此非厄脉乎(厄脉，母也)？吾意决矣，尔等试写可也。’于是自将蒙古字编成国语颁行。创制满洲文字，自太祖始。”(见《清入关前史料选辑》第一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这真是开国皇帝，雄才大略，气度非凡。

以上文字比较详尽地记录了努尔哈赤创业之初，深感借用蒙古文字往来文书的困难，决心创制满文的肇始过程。满文的创制是满族文化史上的大事，它促进了满族社会的进步，扩大了与相邻民族的交往，并且为后来满族人的全面统一，建立后金政权以至入主中原都起到了重要作用。

额尔德尼、噶盖二人受命于努尔哈赤，创制了满文，成为满族历史上第一代语言文字学家，也是第一代满文文献的编撰者。

额尔德尼(1580—1623)，清初学者，纳喇氏，满洲正黄旗人。《八旗通志》说他：“生而聪敏，明习蒙古文，兼通汉文。太祖高皇帝创业之初，即以文学侍从。随大兵所至汉人及蒙古地，俱能以其本地语言文字传宣诏旨，招降纳附，著有劳绩。授副将世职。”被赐号“巴克什”(满语“学者”之意)。在后金、清初时受此称号者甚少。

巴克什额尔德尼凭借通晓多种语言的优势，在努尔哈赤身边效力，参与了一系列重要国事活动及满文史籍的编写工作。后金天命元年(1616)，后金建国时，额尔德尼的地位十分显赫，努尔哈赤称汗当天，由其宣读诏书。曾参与草创后金的各项制度。1618年，从征明抚顺，因功授男爵。天命八年(1623)，额尔德尼被告私藏东珠等财物，努尔哈赤大怒，下令将其夫妇杀死。皇太极称誉额尔德尼为"一代杰出之人"。世祖福临时追谥文成。

额尔德尼受命与噶盖创制国书，以蒙古文字协女真语音制成满文，创满族有文字之始。这一文字对满族社会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为与后来的"新满文"相区别，这一文字被称为"老满文"或"无圈点满文"。

噶盖(？—1600)，后金开国功臣，伊尔根觉罗氏，隶满洲镶黄旗。被努尔哈赤封为十扎尔固齐之一。多次率军参加统一女真诸部的战争，骁勇善战，屡立战功。其地位仅次于清初五大臣之一的费英东。可以"受命制国书"，可见其人能文能武。可惜，在创制满文的当年9月，因失察哈达贝勒蒙格布录通谋篡位，连坐，被诛。

由于是初创，"老满文"与蒙古文字实际上相差不多，在使用中发现存在一些问题和不足，它的字母并不能确切记录满语的语音，像"它、搭"，"特、德"，"扎、哲"，"呀、耶"等字都不分。文字的弊病显而易见，这些问题都会影响到满族文化的发展。清太宗皇太极在完成了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一系列改革后，又着手文字改革。后金天聪元年(1632)，他命巴克什达海改进老满文。

达海(1594—1632)，觉尔察氏，满洲正蓝旗人。据《八旗通志》记载：说他"生而聪颖，9岁即通满汉文。初事太祖高皇帝，置在内廷机密重地，专司文翰。凡与明朝及蒙古、朝鲜词命，悉出其手。其宣谕诏旨，应兼汉音者，亦委命传宣，无不称旨。"达海一生主要在太祖、太宗身边作文职。他曾多次跟随皇太极攻打明朝。天聪五年(1631)，赐号"巴克什"。

达海编制了十二字头，规范了满文的字母形式。其主要方法是在字母旁加上圈点，用来区别相同字形的不同读音，于是改进后的文字被称为“有圈点的满文”。达海还创造了译写汉字的新满文字母，称之为“外字”，共 10 个。“切音法”也是达海所创。无圈点满文创制在先，称老满文；有圈点满文创制在后，故又称为新满文。从满文的创制到改进完善，经历了三十多年，最终使满文成为一种比较可靠、完善、成熟的文字。达海对汉文造诣亦深，将《大明会典》、《素书》、《三略》、《六韬》、《孟子》、《三国志》、《通鉴》、《大乘经》等译为满文。因积劳成疾，达海 38 岁病逝。他对满汉文化交流作出重大贡献，被誉为满族“圣人”。死后追赠大学士，谥“文成”。

皇太极时期，就曾想草创满文篆字。清乾隆十三年(1748)，乾隆命内阁仿照汉文篆书创造满文篆体字，内阁奉旨将乾隆的《盛京赋》修成满文 32 体篆字的《御制盛京赋》。满文篆字主要用于玉玺、印信、碑额和钱币。

满文是参照了蒙古文字改造而成的，与蒙古文同属拼音文字。满文字母有 6 个元音，19 个辅音，10 个借音。每个字母代表一个音位。满文中的 2 个元音与另外 10 个辅音组成新的音节，俗称为满文 12 字头。满文字母在词首、词中、词末时，一般有三种不同的书写形态。满文以词为单位书写。书写时，先自上而下连续书写字母主干，再按先左后右、先上后下的顺序依次添加点或圈。行文格式是自上而下，由左向右换行。字母无大小写区别。

老满文仅使用三十余年，保存下来的文献不多。最为著名的是《满文老档》。此外，还有天聪初年的《满洲实录》、《国史院档》、《清太祖朝战绩功录》、《大金喇嘛法师宝记》和满文木牌等。《满文老档》是中国最早的官修满文编年体史书，详细记载了从清太祖丁未年(1607)到崇德元年(1636)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史实，并收录了后金与朝鲜、蒙古、明朝及明叛将毛文龙等的往来文札。此书为研究清入关前满族的兴起发展、社会性质，以及东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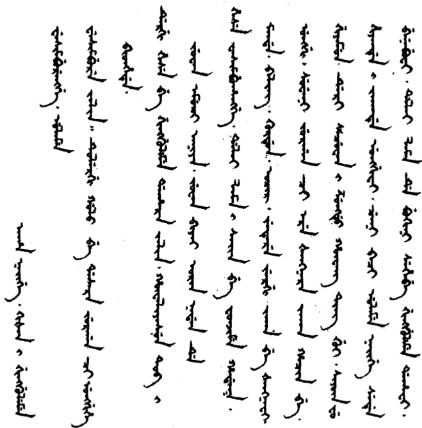
边疆各族历史、分布和语言文字的珍贵文献。《满文老档》现存 40 册，今保存在台湾省故宫博物院。

新满文的使用几乎与近三百年的清代相始终。满文文献中，包括大量书写、印刷的书籍、档案资料；多种文字的满文译本；满文标注的地图、绘画；满文与别种文字合璧镌刻的碑刻、钱币、器具等。有清一代史料，保存在满文中的极多。如最早之实录。即在康乾盛世，朝廷档案，只有满文而无汉译者，亦为数不少。满文书籍大部译自汉文，译自其他文种为汉籍所无的也有不少。还有从汉籍译为满文，而汉文原本已散失，只有满文译本流传的。

辛亥革命，清室覆亡之后，国人都认为满文书籍已无用，随意毁弃。而外国人则乘机大量收购，当年满籍流传海外者，为数极多。此事引起当时有识之士的忧虑，认为如不采取行动，数十年之后，国人研究满学将求助于外国人。国立北平图书馆(今国家图书馆)开始尽力收购，馆内的袁守和、于道泉、李德啓等先生为此付出极大。1933 年 6 月，编印出版了《国立北平图书馆、故宫博物院图书馆:满文书籍联合目录》。据不完全统计，今存满文书籍，包括满文原著和满译书籍共有 820 余部。除此之外，还有大量的满文档案存世。

满文原著、译著的内容很广。如《满文老档》的乾隆年新满文抄本、《尼山萨满》、《满洲祭祀图说》、《出使交趾纪事》、《御制五体清文鉴》、《清文全书》、《满文大藏经》、《金瓶梅》、《水浒传》等有数千部之多。《御制五体清文鉴》，是中国清代官修的满、藏、蒙古、维吾尔、汉 5 种语言对照的大型分类辞书。编撰者和成书确切年代不详，有人估计完成于清乾隆五十五年(1790)前后。该《文鉴》词按意义分类，正编 32 卷，分 36 部、292 类、556 则，收词 17052 条。该书对沟通上述民族的文化起了桥梁作用，对探讨突厥语、蒙古语、满—通古斯语之间的关系也有参考价值。此书目前已知共有四部，两部藏中国故宫博物院，一部藏伦敦大英博物院，抗战期间，

日本人在沈阳故宫还发现一部。1957年，民族出版社曾将故宫藏本分上中下三册影印出版，1998年又重印。这种大型类书还有满、蒙古、汉、回、托忒等文字的《西域同文志》等。



满文　《清宫珍藏历世达赖喇嘛档案》

《满文大藏经》在清时又称《国语大藏经》，是清代继《四库全书》之后又一巨大的文化工程。乾隆年间（1736—1795），皇家主持，印制了宫廷版汉文《大藏经》，史称《龙藏》，乾隆三年（1738）12月刊成。之后，乾隆皇帝因《大藏经》只有汉、藏、蒙古文本，独缺满文本，便在开修《四库全书》的同年，下令设内府清字经馆，以汉文

《大藏经》和藏文《甘珠尔》为底本，翻译刊刻《满文大藏经》。于乾隆五十五年(1790)刊竣。收录佛教经典699种，2535卷。有刻板48211块，96422页。它代表着清雕版印刷及装潢的最高水平，是“康乾盛世”的产物。自此，中国佛教无论显密汉藏，形成四种文字的《大藏经》流传天下。《满文大藏经》有108函，当时共印12部，目前存世的只有两部。其中一部分别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76函)和台湾故宫博物院(32函)；另一部藏于西藏布达拉宫(107函)。《满文大藏经》原刻梨木经版现藏故宫博物院。经国家文物局批准，2003年1月，由故宫博物院所属的紫禁城出版社利用旧藏经版，又补全、重印了20套《满文大藏经》。现在，满文雕版书籍及相关满文资料存世都很少，能说满语、识满文的学者也寥寥可数。《满文大藏经》有1780万个满族文字，它的重印出版，为保存研究濒于失传的满族语言文字，提供了丰富的第一手资料。

用汉文编写学习满文的书籍有《清文启蒙》、《初学必读》等启蒙读物和《清汉对音字式》，还有《清文汇书》、《清文补汇》等字典。

档案内容更为丰富，仅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就收藏150余万件。此外，北京、辽宁、吉林、黑龙江、内蒙古、西藏、台湾等地图书馆或档案部门都有收藏。台湾故宫博物院收藏有大量的满文文献。一些满文文献还流散于日本、俄罗斯、英国、美国、法国、意大利等国家。

由于时代变迁，满语已成为接近消亡的语言，满文也基本不再使用。如今绝大多数的满族人都使用汉语、汉文，只有黑龙江省某些边远农村的少数满族老年人还能识读满文。现在，在满族人聚居地的小学里已开始有满文课程的教学。

本节参考文献：

1. 中国大百科全书·民族卷.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
2. 富丽.满文.见：中国民族古文字图录.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

社，1990
3. 高文德主编. 中国民族史人物辞典.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
4. 张碧波、董国尧主编. 中国古代北方民族文化史. 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1
5. 于道泉、李德启. 满文书籍联合目录序言. 国立北平图书馆、故宫博物院图书馆合印，1933
6. 张公瑾主编. 民族古文献概览. 北京：民族出版社，1997

第八节　锡伯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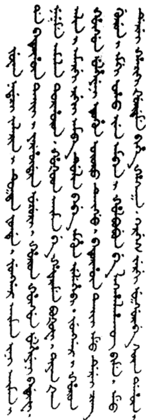
明代东北的野人女真中，有一些留居在深山密林中的部落，他们都认为自己是鲜卑遗民。清代时，海拉尔迤南室韦山一带，作为地名，曾被注称为锡伯。住在这一带的人便因此得名，被称为锡伯族。这一名称也是锡伯人的自称。也有说锡伯族源于匈奴、室韦、女真的。

清代以前，锡伯人生息在以伯都讷（今吉林扶余县）为中心，东自吉林，西至呼伦贝尔，北起嫩江，南抵辽河的广阔地区。他们世代以渔猎为生。16 世纪后期至 17 世纪初，锡伯族被满洲统治者征服，所部被编入蒙古八旗和满洲八旗。随着清王朝的建立，锡伯族从长期的聚居地分散到许多地方，不仅移居东北，而且远戍云南、新疆。

康熙三十七年（1698），锡伯族奉命举族南迁盛京（沈阳）和京师（北京）。乾隆二十九年（1764），清廷从盛京所属的 17 个城镇抽调了锡伯族官兵 1016 人，携同家眷共 3275 人，赴新疆伊犁一带屯垦戍边，组建成锡伯营。他们农历 4 月 18 日从家乡出发，一路艰

辛,历时近一年半的长途跋涉来到伊犁河畔,建立起自己新的家园。他们在察布查尔的山崖上开凿大渠,引来伊犁河水灌溉农田,建成了察布查尔渠。锡伯族对开发、保卫祖国西北边疆作出了重大贡献,从此正式有了一个民族分居祖国东北、新疆的历史。

锡伯族人口现在有 188824 人(2000)。居住在东北地区的锡伯族通用汉语文。只有居住在新疆的锡伯族大约 34500 余人使用锡伯语,锡伯语属阿尔泰语系满—通古斯语族满语支。锡伯语是 18 世纪中叶,部分锡伯族从东北迁到新疆之后,在满语基础上发展形成的一种独立语言,无方言差别。域外将其称为满语的一种方言。他们拥有自己的文字——锡伯文。



锡伯文

锡伯文是 1947 年,由锡伯族语文工作者在满文基础上略加改动而形成的。之所以能够这样做,也有历史的原因。西迁新疆察布查尔地区的锡伯族组建锡伯营后,按照八旗体制分筑八个城堡定居下来,这就是现在察布查尔的八个牛录居民区。这里实行严格的军事管理,人员不得随意外出,因此与外界各族群众接触很少,客观上对保留原来的语言文字形成了有利条件。另外,各牛录居民区里,都保有大家从内地带来的满文书籍,为了怀念故土文化,锡伯族家庭中都有一些满文辞书和课本,如《五体清文鉴》、《清文启蒙》,及一些汉文史书《三国志》,小说《三国演义》、《聊斋志异》的满文译本等。这些都有利于新疆锡伯

族继续使用满语和满文。

现在新疆的锡伯族由于长期和当地其他民族生活在一起，相互之间有密切的交往。他们通常会多种语言，有时一个人即会三四种语言，如汉语、维吾尔语、哈萨克语、蒙古语等，有的人还会俄语，所以他们常被称为当地的语言学家。

冒领 冒籍 冒进 冒尖 冒汗 冒火 冒风 冒犯 冒度 冒充 冒 茂正三德 茂盛 茂密 茂才异等

帽架 帽耳 帽顶托盘 帽 冒险 冒天下之不韪 冒头 冒失 冒入 冒名顶替 冒名代替 冒名 冒昧

锡伯文　《汉锡简明对照词典》

锡伯族历来有注重教育的优良传统。西迁新疆的锡伯族，早在清光绪八年(1882)，即在伊犁察布查尔地区居住的八个牛录里

开办了义学，后来发展成正规的小学，开始有了本民族的书面文献。1913年，本民族进步的知识分子，成立了以兴办教育为目的的"兴学会"、"尚学会"，1917年，在六牛录开办了一所高等学堂，相当于高级小学。为了加强本民族的语言文字工作，1947年，在伊宁市成立了"锡伯、索伦文化总协会"，简称"锡索协会"。1948年，在该会倡导下，伊宁市成立了第一所锡伯中学。"锡索协会"根据锡伯族的实际情况，对使用的一些满文字母的形体做了改进，由此满文在锡伯族中的使用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即开始称作锡伯文的时期。

新疆的锡伯族经过二百多年的生息，使用的语言和文字都有了一定的发展。锡伯语是目前仍在流通的语言，而满语则已接近消亡。锡伯语是从满语派生来的，加之锡伯人长期使用满文，这些都是锡伯文能在满文基础上改动而成的重要条件。锡伯文与满文一样，是回鹘字母体系的拼音文字，其字母表与满文字母表基本相同。锡伯文对满文的改动，主要是个别字母的形体，并删减了一些音节。锡伯文是以词为单位书写的拼音文字，行款自上而下，由左至右。其基本笔画和满文一样，分字头、字牙、字圈、字点、字尾，以及不一样的撇和连接字母的竖线。使用通用的标点符号，以此标明句逗、语气和专名。有印刷体和手写体两种字形。

锡伯文有40个字母，其中有6个元音字母，24个辅音字母和10个专门用来拼写借词的字母。每个字母都有规定的读音，但读音相同不一定是同一个字母。锡伯文的字形结构、字母数目、字母在词中的不同形式、拼写规则、书写方法等都和满文相同，在字形、拼写法、词汇、语法等方面也有一些不尽相同的地方。

20世纪60年代初期，受极"左"思潮影响，锡伯文被停止使用，小学生入学后直接学习汉语汉文，结果造成许多学生留级或弃学回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于1978年批准恢复使用锡伯文，紧接着当地政府做了一系列工

作,使锡伯文的教育、出版、使用等方面都有了极大的发展。锡伯文通行于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此外在霍城县、巩留县、塔城县、尼勒克县以及乌鲁木齐市和伊宁市也有人使用。

锡伯族保留下来的文献有《辉番卡伦来信》,这是一篇书信体的散文作品,写于19世纪50年代清咸丰初年。作者是一位叫何耶尔·维克金的锡伯青年,他出生在察布查尔五牛录的一个普通农民家庭。18岁应征入伍,成为披甲,道光末年升为侍卫。咸丰初年去辉番卡伦换防时,写下了这篇优美的散文作品。辉番卡伦是当时伊犁河北岸极西部的一座哨所,是索伦营管辖的19处卡伦之一,由锡伯营协助防守。作品中,作者详细描写了卡伦的日常生活情况,记录了从察布查尔到辉番卡伦沿途的自然风光、地理气象、风土人情。这些使作品具有了历史文献的价值,一百年来,锡伯人民用锡伯文转抄流传至今。它是锡伯族早期文学作品的代表,展现了用民族文字创作作品的风貌。

《萨满神歌》是前些年在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发现的,分上下两卷,是三牛录的尔喜萨满于清光绪十年(1884)抄录的。书中反映了清代锡伯族萨满祭祀的基本情况,是研究萨满教仪式、观念、神歌和锡伯族萨满教信仰的极好资料。《顿吉纳的诗》,诗人顿吉纳是东北齐齐哈尔的锡伯族人,早年从军驻防新疆伊犁。清道光元年(1826)从驻地渡过伊犁河来到察布查尔与后来迁过来的锡伯族同胞一起过清明节。当时诗人已77岁,他见到从东北老家来此的亲人,心情无比激动,即席赋诗,成为流传至今的《顿吉纳的诗》。

1946年在伊宁创办了油印的锡伯文《自由之声报》。新中国建立后,该报改名为《新生活报》,"文革"中被迫停刊。1974年复刊,复刊后改名为《察布查尔报》,发行至今。近年来,仅新疆古籍整理人员就先后整理出版了锡伯族文献几十种,除了以上提到的以外,还有《三国之歌》、《喀什噶尔舞春》、《锡伯族情歌》以及《清代锡伯族档案史料选编》等,为研究锡伯族的历史文化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本节参考文献：

1. 中国大百科全书·民族卷.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
2. 张碧波、董国尧主编.中国古代北方民族文化史.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1
3. 李树兰.锡伯文.见:中国少数民族文字.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1991
4. 张公瑾主编.民族古文献概览.北京:民族出版社,1997
5. 田继周等.少数民族与中华文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

第四章　中国南方民族文字

我国南方尤其是西南地区历来是多种少数民族分布聚居的地区，历代统治者都对这里实行一些比较特殊的政策。如元朝在一些民族聚居和杂居的地区，除直接统治外，还采取广泛任用当地民族首领世袭担任土官的办法，即土司制度。明朝最初沿袭元朝的羁縻制度，原官封赐归顺者，设立土官，以后逐渐形成明朝的土司制度，设立宣慰司、宣抚司等政府机关。在交通便利的地区还派有一定任职期限的流官，与土官同时掌权，实行土流合治的办法。清初，对南方各族仍沿用明朝的土司制度，但从雍正四年(1726)开始，实行了改土归流政策，即变土司世袭制为一般的府、州、县制度。这些政策，都在一定程度上适应了当时少数民族地区的特点，为当地少数民族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提供了较为有利的条件。

我国南方的少数民族都有悠久的历史，创造了灿烂的文化。一些民族还有自己创造的传统文字，如藏文、彝文已有上千年的历史，藏文使用的面比较广，有大量出版物，一直是全民族通用的文字。彝文在不同地区由于方言差异，假借字也有所不同，没能形成全民族的通用文字。这些民族文字还有不同的特点，有的属于图画——象形文字，如东巴文、尔苏沙巴文等，其实我国西南的山区内不少民族都有书写象形文字的悠久历史；有的文字属于在汉字影响下创造的方块字，也叫仿汉字，即使用汉字的造字方法造出新字来书写本民族的语言，如壮族方块字、苗族方块字、瑶族方块字、

方块白文、水书等，此外侗族、布依族、哈尼族、仡佬族等都造过仿汉字。不过有的造的字多，有的造的字少。

有的文字逐渐成为比较成熟的文字，如藏文等。有的文字存在一些缺点和不足，如文字不能准确反映语音，有的字数少，不能全面书写语言，有的仿汉字缺乏统一规范，用字因人而异，没法推广。无论如何，这些文字在少数民族文化发展的艰难历程中，都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应为后人了解和研究。

第一节　东巴文、哥巴文、玛丽玛萨文与纳西文

纳西族主要聚居于云南的丽江纳西族自治县及邻近的维西、中甸、宁蒗等各县，四川的盐源、盐边、木里等县和西藏的芒康县也有分布，人口有 308839 人(2000)。云南丽江等地的纳西族多自称“纳西”，云南宁蒗、四川盐源等地的多自称“纳”或“纳汝”、“纳日”。中国史籍记载为“摩沙”、“磨些”、“末些”、“么些”等。新中国建立后，根据本民族的意愿，定名为纳西族。

纳西族来自古代髦人的一个部落，族源上属于秦时由西北河湟地带向南迁徙的古羌人的一支。汉代文献中的“牦牛夷”和“摩沙夷”都是纳西族的先民。从三国到唐初的数百年间，雅砻江以东的纳西族先民逐渐向西南迁徙，盐源以西金沙江流域一带的磨些族亦逐渐聚居于丽江地区并繁荣起来。唐代一部分磨些族渡过金沙江，向南进入洱海东部，在今宾川一带建立了“越析诏”，亦称“磨些诏”，为当时洱海地区六诏之一。后“蒙舍诏”统一各诏，建立了南诏政权。今丽江、永宁一带则成为南诏、吐蕃角逐之地，先后为吐蕃、南诏所统治。

纳西语属汉藏语系藏缅语族彝语支，群众多能使用汉语文。

纳西族在自身发展中，创造了灿烂文化，先后有过表意的象形文字——东巴文和表音的音节文字——哥巴文，这两种文字都未能在群众中推广使用，只是记载了古代的许多诗歌、传说、故事和宗教经典。纳西族除有以上两种文字外，还有一种鲜为人知的少数人使用的玛丽玛萨文。新中国建立后，设计了一种以拉丁字母形式为基础的纳西拼音文字方案。

纳西语分东西两个方言，东巴文和哥巴文都用于纳西族的西部方言区。一般认为东巴文产生于7世纪左右。东巴文文字总数有1300多个。纳西族称东巴文为"森究鲁究"，意思是"木石之标记"。见木画木，见石画石，取象于事物之形。从这种文字图像符号的形式出发，人们称其为象形文字。隋末唐初，纳西族原有的巫教受到吐蕃苯教的影响，形成了东巴教，纳西象形文字开始为东巴教徒所使用。"东巴"是纳西语的音译，也作"多巴"，指从事纳西族传统宗教活动并能诵读经文的经师。东巴文主要是纳西族经师们书写经书时用的，有大量东巴经流传于世。直到新中国建立前，在偏僻山区的民间还有用它记账和写信的。一种古老的象形文字到20世纪50年代还在民间流传，这在世界上也很罕见。东巴文可以说是世界上惟一保存大批完整材料的原始象形文字，是研究文字起源和发展的珍贵史料。

在被称为东巴教圣地的中甸县三坝区白地乡白水塘旁，留有一块明代嘉靖年间(1522—1565)的摩崖，上面有丽江纳西族土知府木高的汉文题诗，头两句是"五百年前一行僧，曾居佛地守弘能"，诗末注明此地是"释理达多禅定处"。"一行僧"指著名大东巴阿明，"佛地"即白地，"释理达多"是东巴教祖师丁巴什罗。专家认定，阿明是一个北宋时期传播东巴文化有贡献的白地纳西人，东巴经中有以他命名的经书，现在白地尚存东巴教灵洞崇拜的阿明岩洞。白地是东巴文化开始形成的中心。13世纪初年宋理宗时，丽江出了一个重要人物麦宗，他是云南通安州(今丽江坝区)的摩娑大酋长，7岁时即认

识象形文字,长大后又旁通藏文、汉文,也有说他后来创制了本地的标音文字,当指哥巴文(见《元一统志》及明修《木氏宦谱》)。丽江白沙岩脚村有“番字岩”古迹,“难译其语”,历代史志都认为是他的墨迹。麦宗是纳西族中有正式文献记载的通晓多种文字的第一个历史人物。此时东巴文化的中心已从白地移至玉龙雪山下的丽江了。



东巴文 《纳西族与东巴文化》

东巴文是象形文字(也有认为是图画文字),它比原始记事的图画文字进步,但又比能系统记录语言的表意文字原始。东巴文

由象形符号、表音符号和附加符号构成,以象形符号为主。在象形符号中包括象形、会意、合体、转意、指事等字符。表音符号包括假借字和形声字。附加符号是各种点、线等不能单独成字的符号。也有专家认为,东巴文是一种发展中的文字,它早期是一种图画文字,由这种图画文字发展演变成象形文字。象形文字是东巴文发展的新阶段,是在哥巴文的影响下产生的。书写咒语的需要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这个发展。象形文字的特点是:书写行款固定,从左向右横写,一个字只表一个音节,一个音节就是一个词,也有几个音节组成一个词的情况。语音相同或相近的词可以通假,基本上已由表意发展到表音。以单体象形字和指事字为主,也有形声字和会意字。

东巴文主要用于手写东巴经,方法比较原始。绝大部分经文并非每句都逐字写出,而是只写一部分,类似主题词。在书写经书时,有相当数量的字常常脱离它所代表的词而表示一个词组或整句话的内容。写一两个字,就代表整句或几句话的大意。因此,它在研究人类如何使用原始象形文字记录语言方面很有价值。受东巴文影响而派生的文字变体和经书,还有玛丽玛沙文、阮可经、鲁鲁经等,均流行在纳西西部方言区的某些支系中。

东巴文字的这些特点,使不同地区不同的人书写、诵读同一本经书时有很大差别,同一个人的读法写法也不一样。只有自幼学习东巴经文的经师才能诵读经文。一般熟悉纳西语、认识单个东巴字的人,还是读不了东巴经书。这也是这种文字固有的缺陷。

现在传世的东巴文经书,完全是手写本,大部分没有标明写作的年代。美国国会图书馆所藏清康熙七年(1668)的经书,是现已发现标明准确年代最早的一个写本。东巴文典籍主要是卷帙浩繁的经书,国内外现存东巴经约 20000 多册。国内以国家图书馆和丽江纳西族自治县图书馆最多,国外以美国国会图书馆最多。东巴经可分为 10 个大类,有祭山神龙王经、除秽经、祭风经、消灾经、开丧经、

超荐经、求寿经、零杂经等，共600多种，内容涉及纳西族的社会、历史、宗教、哲学、文学、艺术、天文、气象、农业、手工业、畜牧、医药、科技、语言、民俗等诸多方面，是研究古代纳西族的资料宝库。



ȵi˧le˥gv˧。昼也，从日省。又读 ȵi˧me˧ȵi˧le˥gv˧。



ȵi˧ly˥gv˧ 又 ʈu˧dʐʅ˧dʐʅ˩。午也，日當中，光直射也。



ȵi˧me˧kʻa˧la˧lɯ˩。下午也，从日光下降。



hu˩、ha˥ 又 mɯ˧kʻv˥。夜也，从月侧形无光。又作 。



hu˩kʻo˧。夜半也，月当中，暗光微弱。又作 ，从月暗 (kʻo˧、角)声。



tsʻe˧do˩。初也，初一至十计日词头，十一以下用数名。字从 (tsʻe˧、盐)、 (do˩见)二音。

东巴文　《纳西象形文字谱》

国内外研究东巴文取得了丰富的成果。国内学者方国瑜1936年完成了《纳西象形文字谱》初稿，在和志武协助参订下，1981年精印出版了这部专著。1995年，又进行了精装再版。李霖灿1939年开始研究东巴文，著有《么些象形文字字典》、《么些标音文

字字典》、《么些经典译注九种》三部专著。2001 年，云南民族出版社出版了李霖灿先生编著的《纳西族象形标音文字字典》。傅懋勣 1940 年开始研究纳西语文，著有《维西么些语研究》、《丽江么些象形文"古事记"研究》、《纳西族图画文字"白蝙蝠取经记"研究》等。云南人民出版社 1985 年出版了一部 40 万字的《东巴文化论集》。

早在 1885 年，法国人拉卡珀里尔就首次发表了有关东巴经文字的资料。1913 年，法国人巴克发表了第一部研究东巴文化的专著《么些研究》。1948 年，被誉为"西方研究纳西文化之父"的美国人洛克，呕心沥血二十多年，完成了《中国西南的古纳西王国》，随后又编撰了《纳西语英语百科辞典》等大量著作。此后，英、俄、意、日、挪威等国的学者也相继发表了大量有关东巴文化的论著并编有多种辞典。近年来，"纳西东巴研究热"不断升温，东巴经籍越来越为国际学术界关注，因此也引发了丽江观光考察旅游的热潮。

1999 年，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纳西东巴古籍译注全集》。这是国家"九五"重点出版工程项目，由丽江东巴文化研究所的东巴先生和研究人员历经二十年的艰辛，条分缕析、积铢累寸，译注、编纂而成。全集凡 100 卷，共收入东巴经籍千册。全集分五大类：祈福类、禳鬼类、丧葬类、占卜类以及包含东巴舞谱、杂言、字典、药书的其他类。每册都有详细的中英文内容提要，正文则包括古籍东巴象形文字原文、国际音标标注的纳西语音、汉文直译对注和汉文意译四个层次。这部千册百卷的经籍，对于我们了解纳西先民的创业史、哲学观、艺术思想，了解纳西文明的发展轨迹，了解我国西南西北民族的迁徙史，都有重要的价值。

哥巴文的"哥巴"一词，是纳西语"弟子"、"徒弟"的音译，说明这种文字是由后世弟子们所创制的，有哥巴文以东巴文为师的意思。哥巴文中有大量象形文的缩写字，并借用了不少汉字，说明哥巴文的产生晚于东巴文。我国学者李霖灿 1945 年在《哥巴文字典》序言中谈到他调查哥巴文创始人经过时，认定哥巴文是大东巴

何文裕创制的，并推断创制时间距当时不超过一百年。对此也有不同意见，美国学者洛克认为，哥巴文是纳西族从西藏草地带到丽江的，时间早于东巴文，东巴文是纳西族迁到云南以后才创制出来的。也有人认为，东巴文的图画文字最早，其次是哥巴文，东巴文一字一音的象形文字出现最晚，它是在哥巴文的影响下产生的。



哥巴文经书　《请萨英威登神》

哥巴文属音节文字，笔画简单，一字一音。但标音不标调，难以区别词义。又有不少一音数字和异义同字现象存在，重文别体很多，很难确解其义。哥巴文主要用于书写经书，字形结构的来源大部分也还不清楚。哥巴文的流行范围和书写经书的数量远不及东巴文。哥巴文主要在丽江一带使用。

纳西族使用的文字里，还有一种叫玛丽玛萨文，这种文字只在云南省维西傈僳族自治县第五区自称玛丽玛萨的 1000 多纳西族群众中使用。他们的祖先是从原四川木里县拉塔(今四川盐源县的左所)迁来的。他们的先辈向当地的东巴经师学会了象形文字之后，就根据自己的情况，在这些象形文字中挑选了 100 多个符号，经改造组成了现在的玛丽玛萨文，用这些文字来记录自己的方言。玛丽玛萨文的特点是一个符号只表示一个音节，在这点上很像哥巴文。东巴文和哥巴文主要在宗教上使用，玛丽玛萨文则可以在一部分纳西族群众的日常生活中使用。这三种文字的共同缺

陷都是字形原始、使用面狭窄，最终都没能发展成全民族共同使用的书面交际工具。

玛丽玛萨文								
东巴象形文								
读　音	tsʻe^{33}	dze^{33}	tsʻɯ^{33}	tɕi^{55}	kʻo^{33}	(稍异)	ɣɯ^{33}	he^{21}
汉字音	盐	麦	铧	剪子	角	旗	牛	神

玛丽玛萨文与东巴象形字比较

1956 年 6 月，中国科学院少数民族语言调查工作队第三队和云南省少数民族语文工作指导委员会共同进行了纳西语普查工作。经过近一年的调查，搜集整理了 42 个点的纳西语材料和一些人文材料，了解了纳西族语言文字使用的情况，并于 1957 年 3 月写出了《关于纳西族语言文字问题的汇报》。当时根据各地语音、词汇异同情况和某些语法现象，以及人文社会情况，将纳西语划分为东部、西部两个方言。以西部方言为基础方言，丽江大研镇的土语为标准音，设计了一种以拉丁字母形式为基础的纳西拼音文字方案，并在 1957 年 3 月云南省召开的第一次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科学讨论会上通过。纳西拼音文字方案，是本着在字母形式和语音表达上与汉语拼音方案，以及彝语支各语言的新文字方案尽量取得一致的原则下拟定的。这个方案当时曾在一部分小学教师和干部中试验推行，1958 年即中止。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纳西语文工作又逐步恢复发展。1981 年初，对《纳西文字方案》(草案)略作修订之后，开始在丽江县试验推行。并于 1982 年 7—8 月，在丽江县新善乡和天红乡塔城等地区进行试点。《纳西文字方案》(草案)采用拉丁字母，凡是纳西语和汉语相同或相近的音，尽可能与汉语拼音方案一致，汉语

Gogoqbbei Sheelgge Liqshee Tiaqjail gol Gaidaho yeel Daigge Jailsef Juq Gatvl, Quaiqguef Reiqmiq Gvsee yeel Seicai'lif Ggeqtv Zherqnaiq

Jai Zefmiq Guaide kacaf cheekaq
sel gge yalji geezheeq

Zugul zuyai zusujil, guefja zvxif, zuyai juiwei zvxif Jai Zefmiq, Guaide Malmiq Gazesheel suibbeimei gol "saijai" meilmei gge huil loq ceeq bbil gguq, 2 yui 21 nee sheel bbel 25 tv chee ni hal loq Guaide gge guzof liu'liuq ceeq, rheeqsheel loq nee dai gge jailsef juq gatvl nef gasi jilsvf ggeq tv zherq sel chee ni tv teiq welwe bbei dialcaq yaijel bbei.

纳西文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里没有的音,用双字母或字母重叠形式来表示。把字母设计限制在26个拉丁字母的范围内,声调用字母表示。纳西文有30个声母,19个韵母,4个声调以及隔音符号,都有相应的拼写方法和规则。修订后的方案,经过两年多试验推行,取得较好效果。1984年对这个方案又作了进一步修订。当地政府为纳西文字的普及做了大量工作,这一文字也日益受到纳西群众的欢迎和认可。

1997年,国家民委下达了一项重要的民族文化建设项目,编纂《中国少数民族古籍总目提要》。这部《提要》规模宏大,将全面

反映我国古今少数民族古籍的情况,填补文化史上的空白,为中华民族整理出宝贵的文化遗产。作为这套丛书的第一卷,《中国少数民族古籍总目提要·纳西族卷》已于2003年11月正式出版。作为《总目提要》的首卷,这是我国第一部东巴古籍目录学领域的专著。

本节参考文献:

1. 和志武.东巴文和哥巴文.见:中国民族古文字图录.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
2. 中国大百科全书·民族卷.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
3. 姜竹仪.纳西文.见:中国少数民族文字.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1992
4. 杨甲荣.东巴文.见:中国民族古文字.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
5. 李霖灿编著.纳西族象形标音文字字典.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01

第二节　傈僳文(新、老傈僳文,汪忍波文字)

傈僳族名称最早见于唐代樊绰的《蛮书》,称之为“栗粟”,被认为是当时“乌蛮”的一个组成部分。明清两代,汉文献记载为“栗粟”、“力些”,是以其族自称记音得名。其中“栗”是族名,“粟”意为“人”或“族”。族称千余年沿用至今。傈僳族和彝族、纳西族在族源上关系密切。12世纪以后,傈僳族受丽江土司木氏(纳西族)和北胜州土司高氏(白族)的统治,多数充当奴隶。16世纪时,丽江土司与吐蕃统治集团发生战争,吐蕃人的数次进攻都被丽江土知府木氏率领“力些”兵打退。这些“力些”兵作战非常勇敢。与此同

时,也有大批傈僳族在首领木必等人的率领下,渡过澜沧江,翻越碧罗雪山,迁入怒江地区。

现在的傈僳族主要聚居在云南怒江傈僳族自治州及丽江、迪庆、大理、保山等州县,四川的西昌、盐边、盐源等县也有分布,人口有634912人(2000)。傈僳语属汉藏语系藏缅语族彝语支。过去傈僳族地区经济文化发展水平很低,人民普遍刻木、结绳、点豆记事。近现代傈僳族先后分别使用过3种文字,一是西方传教士创制的拼音文字,或称老傈僳文,一是维西县傈僳族农民汪忍波创制的音节文字,再就是1957年创制的以拉丁字母为基础的新文字,也称新傈僳文。

老傈僳文是一种以印刷体大写的拉丁字母为基础,由其正反、颠倒形式组成的拼音文字。这种文字在新中国建立前称为"傈僳文",或称"圣经文字"、"上帝书",现在一般称为"老傈僳文"。

老傈僳文是20世纪初由西方传教士创制的拼音文字。文字的创制过程有几种说法,比较可靠的说法是:1912—1914年间,缅甸克伦族基督教传教士巴托以印刷体大写的拉丁字母为基础创制了傈僳文,后来英国传教士傅雷塞(J.O.Fraser)进一步完善了这种文字。这种文字有30个辅音字母,10个元音字母,6个声调符号和4个标点符号。老傈僳文的词,以音节为单位分写。据1976年在曼谷出版的老傈僳文《教理问答》一书中的音节结构表分析,老傈僳文共有596个音节,其中两个字母组合的有312个,3至4个字母组合的有260个,另外还有更多字母组合的音节24个。

新中国建立前,老傈僳文只通行于基督教徒之间,不信教的群众无人能识,所以人们常称其为"圣经文字"。新中国建立后,怒江傈僳族自治州曾用老傈僳文培训过会计、印制一些宣传小册子等。现在广大的傈僳族地区,实行了新老傈僳文的并存并用。人民群众在宗教生活中仍然使用老傈僳文,出版有老傈僳文的报纸及各种书籍,学校也对老傈僳文继续进行教授。怒江州的怒族、独龙族

MU GW GW DU

1 (9)

```
D 2/4——1 =                                        (NYI ꓛꓵ)

   3 — 1 — | 1 2  3 — | 5 — 5 6 | 3 2 1 — | 3 —  1 — |
1. A    Xꓵ.   MI   YE    B    L.    M-.      A    Xꓵ.
2. MI·  MI.,  V    B     KU   ꓤ     NY-.     Mꓵ   KO
3. MI   Nꓯ.   KW   Z:    Xꓵ:  Z     JE:-.    SI.  WE
4. SI,  Pꓱ    KW   TY.   M    NY    ꓤ-.      WU-S
5. WU-S       L    ꓞO    Tꓯ   Nꓵ.   LO=      ꓞO   BO
6. WU-S       RO   Tꓯ    NI.  Nꓵ    ƧI-.     CYU  SI

   1 2  3 — | 5 — 5 6 | 3 2 1 — | 1̇ — 1̇ — | 2̇ — 1̇ — | 7 —
1. MI   Sꓷ    GU   LE.   M-.     RO  B     B    WU-S
2. Dꓵ   Dꓵ    LY   Gꓶ    TY=     NYI MO    DU   Tꓯ   LO.
3. LO.. WE.   BE   SI.   ZI.,-.  FAI NY    YI   JY   KW
4. YI.  Tꓯ    C.   Gꓶ    L=      FAI NY    HW:  ꓤ    BY:
5. ꓞO   X.    YI   M:    LO.=    Z:  DU    GW:  DU.  BE
6. ꓒ    YI    Gꓶ   L     NYI-.   ꓕI  ꓞI    Lꓱ   YI   Tꓯ

   6 — | 5 — — | 5 — 5 6 | 3 2  3 — | 5 — 5 6 | 3 2 1 — ‖
1. ꓥ    LO=    YI   N:    MI   Nꓯ    CE.  SU   ꓥO..=
2. MO.  NY-.   RO   WU-S       Tꓯ    Xꓱ.  Gꓶ   TY=
3. M    ꓥW.-.  A:   Jꓵ:   WU-S       LE   CE:  T.=
4. ꓤ    NY-.   YI   W     Tꓯ   WU-S       LO   TY=
5. TY   GU-.   A    Jꓵ    YI   LE    Gꓶ   L    ꓥO=
6. X.   MO=    YI   Tꓯ    Xꓱ.  Gꓶ    NI.  Xꓵ.  LO=
```

老傈僳文歌谱

基督徒也还使用老傈僳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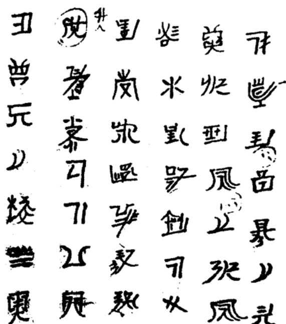
汪忍波(1900—1965),也写作哇忍波,傈僳族,是傈僳族音节文字的创造者。1900 年出生于维西县叶枝乡新洛行政村米俄巴村,1965 年病逝于家中。他生前长期在家务农,也从事一些傈僳族的原始宗教活动,是傈僳族祭天仪式的第九代主持人,在当地群众中有很高威望,新中国建立后曾担任县政协委员。

汪忍波出生在一个贫苦的傈僳族农民家庭。童年时,父母不

和,经常闹矛盾。母亲身体不好,为了给她治病祭鬼,花光了家里仅有的财物。汪忍波小时候身体也不好,11 岁那年,天天跟着巫师去学念经。12 岁那年,父亲去世,为办丧事典去了家中在村中央惟一的一块地。当时说好以后用 3 两银子去赎地,可到时候对方却不认账。由于是刻木记事,木块上虽刻有三转三道的标志,但人家不承认,说那是表示每年要交的 3 块银元的利息。这件事给了汪忍波极大震动,使他深感无文字之苦。他说:"当时要是用文字把它记下来。地价就是地价,赎金就是赎金,利息就是利息。该合多少,明明白白写在纸上。白纸黑字写清楚了,不论什么时候,到什么地方,一眼就看得分明,谁也赖不了账。可惜当时我们没有文字,也不可能用文字把这件事记下来。而今吃了哑巴亏,又怎么能说得清楚呢。"

1925 年,汪忍波在 25 岁的时候,有了一种强烈的要创造文字的冲动。在一次种地休息的时候,他先是用缝衣针在石块上刻画,画了 20 多个符号。此后便不停地写写画画,总共写了 12 本。想到傈僳人都是出力气干活的人,没有时间读那么多书,认那么多的字,他就把这些字归纳整理成一本书,编成一个识字课本去传授给人们。这就是汪忍波用来推广他创制的音节文字的最初的识字课本。他创字的要则是将音同之字以同一形体表示出来,每个字代表一个音节。其中一小部分是利用汉字的音读和训读制成,也有一些象形字。他把 1000 多个音节文字按一定顺序编排成长短不一而又大致押韵的 291 个句子,类似歌谣、口诀。教学时,先让大家熟读以至背诵出来,然后再一字一句地对照着学习字形。

汪忍波的文字于 1935 年左右成熟。他家周围的康普、叶枝两乡百姓开始学习掌握这种文字,并且实际使用,有的人用这种文字记录身边发生的事情。土司发现这种文字在流行,便下令不许推广使用。傈僳百姓认为,这是土司怕大家有了文化不好统治,现在是民国,各种文字都应该可以使用,便继续学习。后来省里来了个



傈僳文　汪忍波文字

委员，把汪忍波叫去反复盘问，最终认可了他创制的文字，土司才准许人们继续学习。汪忍波生前用这种文字记录下大量珍贵资料，可惜“文革”中多已散失，目前能收集到的还有数万字。汪忍波的文字通行于维西县的几个区，有诗歌、神话传说的手抄本存世。他写有《自传》、《识字课本》，还记录了民间传说《造太阳月亮》、《射九个太阳》、《播树种》等共 20 种，1995 年，汪忍波的遗著被收集整理为《傈僳族音节文字文献资料汇编》，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图书馆有收藏。

为解决傈僳族的文字问题，怒江傈僳族自治州人民政府于 1956 年 1 月召开各界人士代表会议，确定了“保存旧文字继续使用于宗教生活，另创造新文字应用于社会主义经济和文化建设”的方针，并在 1956 年 1 月的傈僳文字研究扩大会议上通过“新傈僳

文方案",由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批准试验推行。

EILSHIR HAIRNIX ZIL GGAR SIL
DA XAQDE TITGOT LATCO DAIL
HOT NEI MIT YI SAIRWAT DIQ LA
NA DDUITDOQ WA ZI

Ja zhetmit guadol gua
yi mit qatjaq tait bbai ket ma.

Zholgoq zholyal zo suljiq, gotjal zushit, zholyal juilwei zushit Jazhetmit nia, Guadol Moqmit Gaolzel shiq hotmal su "saket jua" mal zzirddu gua ggix gailnial si, 2000 kor 2 han 21 nix guajol 25 nix tait Guadol gua yimit qat ni, eilshir hairnix gua Da xaqde bbei atkel jjix ma jiqsut selniq mit vutla ma dail ddeitdoq ddu tei nitbel dail heqear sil qatni lolni nga. Eil tei li bbai, zholgot shitvuq yi jjix zi ngo

傈僳文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新傈僳文方案以拉丁字母为基础,还吸收了一部分斯拉夫字母,用单字母表示所有语音,规定了拼写规则。为试验推行新傈僳文,编写了一套试验课本和《傈僳语小辞典》,培训了师资。1957年底,对新傈僳文方案作了修改,将原方案中用斯拉夫字母表示的语音全部改为用拉丁字母表示,并采用了用双字母表示一个语音的方法。

1958年,修改后的新傈僳文方案呈报云南省委,省委批示:

"对已确定的文字方案，如无原则性不同意见，即可在本民族试验推行。"并指出，试验期间要广泛征求意见，加以必要修改，使文字更臻于完善，然后按一定手续，正式公布推行。1962年，在怒江州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经讨论确定了"新老傈僳文并存并用主要推行和发展新傈僳文字"的方针。经一段试行，1964年1月，怒江州人大再次召集有关部门讨论了新傈僳文方案。这个方案在州党委召开的扩大会议上一致通过，并决定"今后在怒江州内的广大农村、机关、学校、企业单位正式使用和推行新傈僳文"，"今后政府部门发出的傈僳文和汉文的各种文件同样有效"。

新傈僳文有33个辅音，16个元音。傈僳语有6个声调，用5个辅音字母表示。声调字母既表示音节的调值，又是划分音节的标志。新傈僳文以词为书写单位，规定有各种正字法和拼写规则。使用通用的各种标点符号。

傈僳族群众大多数信仰基督教。党的宗教政策落实后，老傈僳文的使用范围有所扩大。如维西县、丽江地区和四川凉山的傈僳族，都在学习使用老文字。怒江州政府机关虽规定各种文件汉文和新傈僳文同样有效，实际政府行文时很少使用新傈僳文，只是在政府机关、商店的图章、牌匾上使用两种文字。德宏《团结报》1959年到1979年，曾经用新老两种傈僳文出版过，后来只用老傈僳文出版。《怒江报》从1984年出新老两种傈僳文版。1988年，怒江州教育局曾创办不定期的新傈僳文版《学科学》。云南民族出版社出版有新傈僳文的各种书籍。

本节参考文献：

1. 木玉璋翻译.汪忍波自传.见：维西文史资料，第一辑，1989
2. 木玉璋.老、新傈僳文.见：中国少数民族文字.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1992

3. 铁木尔·达瓦买提主编. 中国少数民族文化大辞典(西南地区卷). 北京:民族出版社,199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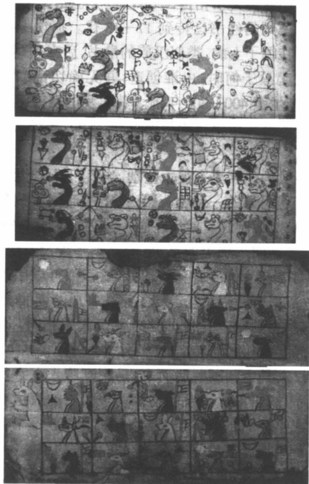
第三节 尔苏沙巴文

在四川西南部生活着尔苏人。他们是古代羌戎的后裔之一,尔苏是他们的自称,意为“白石”。传说古老的东方有一个白海,海浪滔天,浩瀚无边。海中有一块巨大的白石巍然屹立,光芒四射。从石缝中会走出各种各样的神。尔苏人对白石极其崇拜,认为它是生育自己民族的母体。往古尔苏人曾用白石相击取火,或用石片杀羊而食,所以每家都在神龛上供奉白石,这正是古羌戎白石崇拜的遗风。

尔苏人现主要分布在川西南的大渡河南北两岸,凉山彝族自治州、雅安市以及甘孜藏族自治州的一些县。尔苏人历史上人口很多,后来与汉、彝杂处,一些人逐渐融于其他民族。现有人口约2万人。尔苏人有悠久的历史,他们是西番的一支,曾被称为“凉山山主”,是凉山的重要开拓者。尔苏人原来从事游牧业,习惯于食肉衣毛。他们还善于骑射,至今仍有隆重的射箭节。尔苏人的农业也十分发达,高山养蚕更是他们了不起的发明。养蚕织丝是他们重要的收入来源,蚕蛹则是待客的佳肴。在川滇之交有不少叫“毕基”的尔苏村落,该词即是蚕蛹之意。尔苏人也善于建筑,能用乱石垒成雄伟壮观的邛笼和碉房。

尔苏人的语言属于汉藏语系藏缅语族羌语支,分东部、中部、西部三个方言。传说尔苏人很早就有了文字,是他们的造物主——觉木阿布创造的。也有传说在诸葛亮治蜀时就已有了尔苏沙巴文,但都无证据。尔苏沙巴文是一种象形文字的初级形态,或

叫图画文字。曾经用来记写了很多经文。据说后来由于逃避战乱，以九匹骡子驮运经书，结果途中大量毁坏散失，只剩下很少一部分。这些文字也只是在1980年才为我国学者所发现。当时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刘尧汉等人在甘洛县的腊摩村发现了三本尔苏沙巴文经书。



尔苏沙巴文　《中国民族古文字图录》

尔苏人相信万物有灵，崇拜自然宗教。他们中间专门从事宗教活动的人叫沙巴。过去沙巴经常被人们请去占卜吉凶祸福，驱鬼祛灾，主持丧葬活动等。那种图画文字只在沙巴中间使用，所以叫尔苏沙巴文。尔苏人自己称这种文字为“扎拉玛”。这一文字记载了很多沙巴的经文，也仅用于宗教活动，并没有在日常生活中传播。沙巴这一职业是父子相传，尔苏沙巴文也是父子传授，使用范围很小。目前见到的经书已传到17—18代。据说最早的尔苏沙巴文经书是写在绸子上的，类似汉族的帛书，后来才写在纸上。尔苏沙巴文究竟起源于何时，由谁创造，并无确切记载。据专家推测，这种文字产生于400—500年前。其实我国西南不少民族都有书写象形文字的悠久历史，《华阳国志》所述的“夷经”，就是用图画写成。

分布在各县的尔苏语有很大差别，沙巴们彼此也无往来，但尔苏沙巴文却有着明显的一致性。第一，字的形体大致相同。这种文字笔画简单，类似图画。使用在同一经文的不同部分，和使用在不同经文的、表达同一意思的字，尽管笔画多少没有统一规定，但相差不大。第二，读法大致相同。所有的字都可以用尔苏语读出来，一个字一般只有一种读法。同一字在各地的读法、语音上有些不同，但都有严格的对应关系。第三，释义大致相同。各地的沙巴对形体相同的字和相同的经文的解释大体一致。

尔苏沙巴文是由图画脱胎而来，是刚刚跨入文字行列比较原始的图画文字，属于象形文字的初级阶段。它的表达功能还很不完备。在专家整理的尔苏沙巴文经书中，有200多个单体字。这些字有以下一些特点：(1)文字形体与它代表的事物明显相像，可以从中推知它的含义。它描述的对象，无论是动植物、自然物、生产生活用品，凡有具体形象的，均按其形绘于纸上，形成象形字。这些字仅代表所记物体的名称，并以物体名称来确定该字的读音。这样的字大约占80%。此外还有一些衍生字和会意字。有的会

意字由两三个象形字组成。表达比较复杂的意思。它们虽比象形字有些进步,但仍属其范畴,不能按字读音,只有少数巫师多方解释,才能略知其意。(2)用不同颜色象征不同意义。如用白色表示五行中的"金",绿色表示"木",蓝色表示"水",红色表示"火",黄色表示"土"。有时也用白色表示明亮,黑色表示暗淡无光或不吉利。(3)无固定笔顺和书写格式。(4)不能准确反映尔苏人的语言。一个字往往读两三个音节,与语言里的词不是一对一的关系。文字表示具体实物多,抽象概念少,大部分是名词。一组文字组成复杂图形时,其意义要靠沙巴们阐释和发挥,一般人不懂。

尔苏人的经书分两类。一类是"扎纳玛"(繁体);一类是"米朵玛"(简体)。1980年,刘尧汉等人在腊摩村认识了一位70多岁的老沙巴杨光银,他拿出了自己最珍贵的一本经书《搓夸拉摩》,"搓夸"为历书,"拉摩"为母虎,这部书的意思是"母虎历书"。尔苏人以12兽记时间,又崇虎,故有其名。母虎历书呈横开本,折页,长26厘米,宽14厘米。除封面、封底外,用12兽记12个月,每月一篇,两面书写,共24页。封底里页绘有四幅方位图。历书主要有以下内容:记地球和方位;记时。尔苏人以12属相记年,分为虎年、兔年、龙年、蛇年、马年、猴年、羊年、鸡年、狗年、猪年、鼠年和牛年。记月记日也用12兽。这本历书不仅在文字学上具有重要学术价值,在天文历法史上也具有重要意义。

现今研究人员见到的沙巴文献仅几种。《虐曼史答》,主要用于解释天象,预测人间祸福。《各齐史答》,主要用于算命。《史帕卓兹》,用于卜卦。《昌巴尔刷答》,主要用于说明病灾的原因。这些文献都保存在个人手中。尔苏沙巴文经书带有不少迷信色彩和荒诞不经的内容,这也正是古代人们思想文化发展的正常现象,科学正是在不断排除这些荒谬内容的过程中前进的。这些文献涉及历史、语言、宗教、医药、历法、民族关系等诸多方面,具有重要研究价值。

本节参考文献：

1. 刘尧汉等人.一部罕见的象形文历书.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1981
2. 孙宏开.尔苏沙巴文.见：中国民族古文字图录.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

第四节 水 书

水族的总人口有406902人(2000)，主要分布在贵州、广西、云南等地，其中90%以上的水族人口在贵州，主要聚居在黔南的三都水族自治县，邻近的荔波、独山、都匀等市县也有分布。水族自称"虽"，汉语译为"水"，汉译的称呼最早见于明代，清代多称其为"水家苗"、"水家"等，1956年正式定名为"水族"。水族源于古代"百越"族系，是秦汉时期由"西瓯"、"骆越"的部落发展而来，唐宋时与壮侗语族诸民族统称为"僚"，明清时称"水"。

水族地区是鱼米花果之乡，盛产水稻、小麦、棉花，水果品种多样，"九阡糯米酒"是水族人民的传统佳酿。水族地区有多种矿产资源，自然环境优美，动植物种类丰富，是比较完整的自然生态区，被称为"天然的动植物园"。水族在民歌中常以"像凤凰羽毛一样美丽"来形容自己的家乡。水族古代的天文学和历法知识有较高的发展水平。水历与夏历基本一致，以月亮变化的周期来定月份，一年分12个月。水历以夏历的9月为岁首，谓之"端月"，以干支纪时、日、年。

水语属汉藏语系壮侗语族侗水语支，不分方言，可分为阳安话、潘洞话及三洞话三种土语，虽略有差别，在本民族内部通话没有问题。由于长期以来与其他民族交往，许多水族人能使用汉语或其他

民族的语言进行交流。水族地区人们日常生活中使用汉文。

水族先民曾创制过自己的文字，所记录的是水语，水语称这种文字为泐虽；汉文称为水书。其形状类似甲骨文，流行在贵州三都县一带的水族地区。由于这套文字符号数量不多，又主要用于占卜等宗教活动，难以记录水语中的每一个词，所以通常称其为水书而不称为水文。由于水书中一些字是汉字反写而成，当地汉人又称其为“反书”。现存水书有 1300 多个单字，且主要用于巫术活动。

水书创造的年代没有确切的记载。据水族的民间传说，泐虽是拱陆铎在燕子洞口、蝙蝠洞坎向仙人学来的。拱陆铎汉译为陆铎公、六乙公、六甲公等。传说他向仙人学来水书多册，后书本失落，只剩下一册，便把其他记住的字用口头传授出来，有的字横着写，有的字倒着写，结果变成水书现在的样子。陆铎公既是水书的创造者，也成为水族尊奉的鬼神。陆铎公大约是父系社会形成之后的部落首领，后演变成全民族的保护神。从这一传说中也可推知水书是在水族人民尚以山洞为居室时创造的，它同时与外来文化有着传承的关系。因为泐虽难学难记，后来人们把熟悉泐虽的人都尊称为“陆铎公”。现在的水书已濒于失传，只有个别耄耋老人尚能解读。

有的学者根据水书部分字形和甲骨文类似，行文体例也和甲骨文相近，先写占卜时日、下注征兆等，便推测其创造的年代可能与甲骨文、金文同时。这种推测目前尚无可靠证据，但水书很可能具有悠久的历史。可能在秦汉之际，受中原文化的影响，水书有了一定的发展。后来由于战争、迁徙等各种原因，它的发展受到了限制，还不能完全成为交流思想的工具，只为民间占卜、择日所用。也有专家认为，水字中虽有部分古老的字体，如甲骨文，但并不能说明它真的就古老，就整体来看，1300 多个水字，有好几种字体，正好反映了它产生的年代是比较晚的。近年来，有关部门多方收

集发掘,发现较早的抄本大都是清光绪以前的,距今 120 年左右,目前已无法知道是否还有更早的水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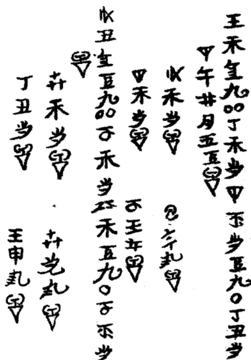
水家人由于居住集中,语言内部有很大的一致性,不分方言,彼此都可以通话。但水书则是远远落后于语言的,还处于文字的初创阶段,水书只能代表水语词汇中极小的一部分。尽管如此,水书毕竟是水族人民固有的文化形式,是研究水族社会历史和哲学思想的重要资料。水书还得到了相邻的布依族、侗族、苗族、瑶族、汉族等各民族的公认。

还有一个现象是,与水族相邻的布依族、侗族、苗族,还有广西的壮族,都借用汉字,再加上一些新造字来记录本民族的语言,这些文字基本上保存了汉字的原形和结构,虽有部分自创的土俗字,也是模仿汉字字形造出来的。水字却不一样,虽也借用了少量汉字,但反过来,倒过去,改变了字的形体,多数则像画图一样,很难跟方块壮字、布依字、侗字归入同一种类,难怪有人认为这是一种很古老的文字。

水书的文字可以分成改制汉字和自创符号两类,笔画简单,形体古朴。从字形看,水书属方块字类型。它的特点是:不采用楷书体,而取近似篆书体或圆形体,有的类似甲骨文或金文,如干支中的一些字。水字都是私人传抄的,个人写法不同,造成字的变异很大,所以有古体字、今体字和秘写字的区分。古体字多见于年代久远的藏抄本,是用竹木烧成的炭条书写的,故笔画似刀刻。今体字是用毛笔书写的近代抄本。秘写字是巫术活动中使用的秘密记号。

水书结构同样参照"六书"理论,大体可分为象形、会意、指事和假借四种。象形字占的比重较大,一般抓住事物的典型特征,运用简单的构图来表示,如"虎"字在简化的头形上突出双耳,"豹"字则在虎字基础上延长颈部和突出双目表示,鱼、斧、日、月、马、牛等字都是这样构成。会意字是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象形符号组成的

复合符号。如“祖”字，上面一个“天”，下面一个“口”，合体而成。



水书　《水族文字研究》

借用汉字有两种形式，一种是按照水语的读音借汉字读音相同或相近的字来托事。这部分字在古代水书中没有，只是近代才出现。这是由于语言发展，原有文字不够用才增加的。被借的汉字，只用来记水语语音，与原来汉义无关。再一种方式是“反书”，很有特点，即把现成的汉字颠倒过来书写，这种罕见的现象可以丰富人们关于汉字系统文字的知识。水书自上而下竖行书写，自右而左换行。

20世纪40年代，社会学家岑家梧先生曾到水族地区深入调查，对水族文化进行研究。据他统计，普通水书文献约有560余种，用于丧葬者尤多，婚嫁、营造等次之。水书均系民间个人传授，

新中国建立前,农村也有办私塾的,没有统一教材,均由水书先生执教。



水书 《农事》

现存的水书文献资料不多。水书古籍就其内容性质而言可分为吉、凶两类,吉祥类有代旺、鸠高、鸠笨等40多个条目;凶祝类有棱顶、鸠火、花消、都居等近600个条目。按用途也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普通水书,意为白色的书,为日常生活中占卜测吉凶使用。这类书比较多,一般水书先生和部分群众家中都有收藏。另一类是

黑书，是用于放鬼、收鬼、拒鬼的巫术书，这类书较少，只有部分水书先生家有收藏，且密不示人。若按形式来划分，可以分为阅览本、朗读本、遁掌本、时象本、方位本、星宿本、黑巫术本等。朗读本是启蒙之书，是学习水书的基础读本，用民歌体裁写成，用词严谨，比喻夸张，便于诵读。阅览本是水书的主体部分，是朗读本的注释，也是择定各种日期的主要依据。遁掌本，主要用来编修水利史志、计算星宿历法及预测气象。

这些古籍记载了水族历法、农事、征伐、宗教、民俗、伦理、美学等方面的内容，与水族人民的社会生活关系密切，是研究水族社会、历史、文化、语言的一扇重要窗口，同时也是历史学、宗教学、民族学、民俗学、语言文字学等多学科研究的宝贵资料。多年来，水书由于其神秘的文字构造和特殊的用途，在民间艰难地传承着，水书先生不愿将水书公开示人，水书主要靠手抄、口授流传，文献流失比较严重。随着时代变迁，学习水书、能够释读的人越来越少，水书先生过世后，家人便将水书作为祭品焚烧或陪葬。水书正面临失传的危险。有鉴于此，2002 年 3 月，国家档案局、中央档案馆将水书列入首批"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收藏保管。为此，贵州荔波县政府成立了抢救水书的专门组织，荔波县档案馆已从民间收集到 2000 多本水书，供专家研究，并将建立专门的收藏馆，以保护这份珍贵的文化遗产。

本节参考资料：

1. 石尚昭、吴支贤. 水书. 见：中国民族古文字图录.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
2. 黄润华、史金波. 少数民族古籍版本. 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
3. 张公瑾主编. 民族古文献概览. 北京：民族出版社，1997
4. 中国大百科全书·民族卷. 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

5. 王尧主编. 中华文化通志·民族文化典.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
6. 石尚昭、吴支贤. 水族文字研究. 见: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二). 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3

第五节　白文(方块白文、拼音白文)

白族现有人口 1858063 人(2000),大多居住在云南大理白族自治州,云南的其他地方,贵州、四川、湖南等地也有分布。历史上白族自称“白子”、“白尼”,汉意为“白人”。此外,其他民族对不同地区的白族有“民家”、“那马”、“勒墨等”称呼。1956 年,中央人民政府根据本民族人民的意愿,正式定名为白族。

白族是个古老民族,源于古代氐羌的一支。新石器时代,其先民已在大理地区繁衍生息。白族先民史称“滇僰”、“昆明”、“叟”、“爨氏”、“白蛮”等,早在汉代以前就分布在洱海一带,汉武帝时曾在这里设置了叶榆县,225 年诸葛亮南征时,在大理置云南郡。唐朝时,这里曾建立了以彝白先民为主体的南诏奴隶制政权,公元 902 年崩溃。公元 937 年,以白族段氏为主体,建立了“大理国”封建领主制政权,与宋以臣属关系相处。元至正十三年(1253),“大理国”灭亡,元朝在大理地区设置了大理路和鹤庆路,分封当地的大小领主为土官,各自统治其属地。明朝在白族地区实行“改土归流”政策,废除世袭土官,以“流官”治理。清承明制,但在边远地区委任了一批土官和土司。

白族居住的大理地区,位于云贵高原西北部,澜沧江、怒江奔腾而下,水力资源十分丰富。加之横断山脉地质复杂,高山峡谷交错分布,地质结构迥异,气象万千。巍峨的点苍山终年积雪,融雪

注入洱海,形成山水相映的奇妙景观,成为举世闻名的旅游胜地,素有“东方瑞士”和“鱼米之乡”的美誉。

白语属汉藏语系藏缅语族。语支系属有两说:一是认为白语属彝语支,一是认为应单独构成白语支。由于长期与汉族交往,白语受汉语影响很大,白语里含有大量汉语借词,为汉、藏缅语混合语言类型。有南部、中部和北部3种方言,即大理方言、剑川方言和碧江方言。绝大部分白族人使用本民族语言,多数白族通晓汉语,并以此作为与其他民族交际的工具,汉文是白族的通用文字。

白族使用汉文的历史十分悠久,早在南诏时期(738—902),白族使用汉语文就已达到很高的水平。在长期使用汉文的过程中,白族民间逐渐开始使用汉字来记录本民族语言。到南诏中后期,又通过增减汉字笔画、用汉字或汉字的偏旁组合成字的办法,创造了一种类似汉字的方块字,用来记录白语。这种文字历史上称为“白文”或“僰文”,是一种典型的汉字型文字。为了和新中国建立后创制试行的拼音白文相区别,现在一般称过去的白文为“方块白文”、“老白文”或“汉字白文”。

在许多历史文献中,都有关于白文的记载。现在能见到的最早的文献是元代和明代的,一个是昆明筇竹寺元代翰林杨载在《大元洪镜雄辩法师大寂塔铭》中提到“以僰人之言为书,于是其书盛传,解者益众。”这是提及白族有文字的最早文献。再就是明代杨慎在其《滇载记》(又名《滇记》)的序言中所说:“……得《僰古通记》及《玄峰年运志》于旧家,其词皆僰文,义兼众教,稍加删润,成《滇载记》。”《僰古通记》(亦称《白古通》)和《玄峰年运志》都是早期的白文文献,这两部书大约成于元代,和大部分白文文献一样,这些书到明代中叶还在流传,但到晚清便都失传了。绝大多数的白文文献都是在明军入滇时被毁的。明中叶以来,引用《僰古通记》的著作有十余种之多,最为著名的是杨慎的《滇载记》和阮元声的《南诏野史》。康熙四十五年(1706)大理圣源寺住持寂裕刻印的《白国

因由》，也是根据《僰古通记》中的宗教传说部分译为汉文的。

散天歡千经去　逬謳花细習不
成堂阿古千在　翫浮红月漕重
地是部阿古威　在身柳白溪三
獄荣逄部万儀　偽得絲風木教
分華劫遇代模　佉尧用清阿经
救新催時傳草　骨天顔不解書
哽鲜浪宜万風　石法回貪長接
侔漂秃心代化　有度道摘尋雅

方块白文　《山花碑》片断

方块白文到底是什么时候形成的，其历史发展情况如何？学术界目前尚未有统一意见。有据以上文献认为其形成于元明时期，有认为其不早于北宋开宝四年(971)，也有认为其滥觞于南诏中后期。

方块白文属于汉字型文字。像日本、朝鲜、越南等邻国，我们国内的壮族、白族、布依族、瑶族、侗族、哈尼族、水族等，受汉文化的影响，历史上曾长期使用汉字，后来根据本民族的需要，他们使用汉字记录本民族语言的时候，对汉字进行了改造，形成了本民族的方块文字。这一过程是逐渐发生的，有的民族开始使用汉字记录本民族语言的时候是用其音，叫做“借汉字”。此后受汉字造字法的启发，利用汉字或汉字的偏旁部首组合起来造成新字，这种新造字叫“仿汉字”。还有一种是通过增减汉字笔画造成新字，叫“变汉字”。由于这些文字体系是在汉字的基础上产生和发展起来的，所以它们被统称为汉字型民族文字。方块白文就是一种有代表性的汉字型文字。

方块白文一般由以下四种方式构成:(1)利用汉字的音表达白语的意思。如汉字“波”,白语意为“他的”、“它的”,汉字“娘”,白语意为“咱们”等。(2)利用汉语的词义,用白语的音来读。如汉语的“词”、“蝴蝶”等,白语也同样用其表示“词语”、“蝴蝶”的意思,但用白语的音读这两个词。(3)利用汉字偏旁部首自造新字,以形声字最多,也有一些会意字。(4)直接借用汉字的形音义。

白文形成以后,一直在民间使用,没有发展成民族通用文字。但从南诏到明代的四百年间,白文还是有一定发展:在流通使用过程中,书写符号不断得到统一,使用范围不断扩大。白文留下了一些文献。早期的方块白文文献,以南诏的有字瓦为代表。这类文献年代较早,多数产生于南诏中晚期,也有一部分属于大理国时期,出现较多自创字,主要是通过增损汉字笔画而成,文字符号结构奇特,很难从其字形结构上推知其意,加之年代久远,材料零散,释读难度很大。

初步发现的方块白文古籍,以南诏大理国时期的手写白文佛经为代表。1956年,在大理仪凤县发现古本佛经3000多卷册,内有南诏大理国时期的写本佛经共20卷。其中有的经卷夹写方块白文,有的经文右侧写注白文,卷尾还有白文注疏。最有代表性的是《仁王护国般若波罗蜜多经·嘱果品第八》,此经卷轴装,正文有汉字1800多个,旁注方块白文1700多个,白文疏记4300字。白文字体较小,是在汉文正文中间见空夹写的。由于古代白语和现在白语已经有了很大差别,上述经典中白文自创字又较多,文字又是行书草书相杂,所以不易辨识。这些年识读虽有了一些进展,还需进一步研究。这部白文写经,文字书写流畅,墨色浓黑,前后书法统一,可见当时作者已熟练掌握白文,白文有自己固定的书写体系,已经是一种成熟的文字。

还有方块白文的铸件和石刻,重要的有宋开宝四年(971)大理国段氏《与三十七部会盟石城碑》,碑文共219字,夹有白文。再有

12世纪，南宋年间留下来的《段政兴资发愿文》。段政兴资为大理第17代国王，1147—1172年在位。他曾在观音铜像背面铸有发愿文，共42字，前面为汉字，后20字为一首白文五言诗。据张公瑾先生翻译，诗为“铸得观音像，求佛佑千春。吾子孙社稷，万世永相承。”此铸件抗日战争期间被劫往美国，现存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美术馆。手写白文佛经、《段政兴资发愿文》等文献，在方块白文古籍文献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再就是一些明清时期的各种碑刻铭文。如明代杨黼的《词记山花·咏苍洱境》(即《山花碑》)，刻于1481年，全文528字，是现今保存最完好的一块白文碑。十联诗歌，一韵到底，艺术成就很高，最负盛名。再有杨安道《故善士杨宗墓志》、《故善士赵公墓志》，清代的《史城芜山道人健庵尹敬夫妇预为家冢记》后附《白曲一诗》等。这一时期的白文古籍相对较多，材料较为丰富，方块白文文字体系有了一定的发展。方块白文的历史文献在明代多被焚毁，留下来的只是极少数。

今天的白族地区，方块白文在民间仍有流传，主要是大理地区的大本曲唱本，有120多本，剑川地区的本子曲曲本，以及大理、洱源、剑川、云龙等地区都有流传的白族民歌唱本和白文祭文等。此外还有民间书写的对联、书信等，不过这类材料较为少见。

新中国建立后，人民政府十分重视为各少数民族创制和改进文字。1958年，中国科学院少数民族语言调查第三工作队白语调查组的徐琳、赵衍荪等语文专家，经过深入调查分析，拟定了26个拉丁字母形式的《白族文字方案》(草案)。但由于种种原因，这个方案未能推行。1982年，大理州政府组成了以语言学家为核心的白文研究小组，在修订原方案的基础上，制定了新方案，简称“新白文”，现今正在剑川县试行推广。1990年，一些语言学家在一起，对1982年的《白族文字方案》进行了认真研究，对个别声调字母作了补充性的修订。1993年6月，云南省民语委召开专门讨论会，

Jientmif Jifhuof Xinl Nox Lifsit Tiaopjinb,
Jiaxqianp Dant Mel Jinbsef,
Yifzif Dai Kex Quinpguaif Ssenpmiep
Hox Cufjienb Senxcaintlif Fafzaint

Jianx Zefmiep Zex Guantdonl Kaotcaf Gonxzuf
Zandgai Nox Zonbyaob Jianthuab

Zonxgonb zonxyanx zontsuxjib、guaifjiax zutxif、zonxyanx juinxweit zutxif Jianx Zefmiep cufxif lap Guantdonl Maobmiep Gaoxzouxsib lientdaob ganbbub "sanxjiant"jiaobyuf huibyib laphhex, 2 yuaif 21 ~ 25 haob gvp Guantdonl kaotcaf gonxzuf, weipssaot jiaxqianp xienx sipqix dant mel jinbsef gol tuixjienb gaox xienx jibsuf caintyif nox tipmuf lel gonx neid zul diaobyainx. Mot qianpdiaob, yonx ga Zonxguaif nox

白文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进一步完善了《白族文字方案》,并最终通过《白族文字方案》(草案)修订稿。

修订后的白族文字方案,有 27 个声母;37 个韵母,其中单韵母 8 个,复韵母 12 个,为南部方言设计了 3 个儿化韵母,表示中部方言的鼻化韵母 14 个;声调字母 7 个。修订后的白族文字能够科学、准确地书写大理州境内白语两大方言区百万白族成员的口语,

从而调动了白族知识分子和人民群众学习白文的积极性，白文的社会功用也得到了显著发挥。

本节参考文献：

1. 徐琳、赵衍荪. 方块白文. 见：中国民族古文字图录.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
2. 黄润华、史金波. 少数民族古籍版本. 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
3. 张公瑾主编. 民族古文献概览. 北京：民族出版社，1997
4. 中国大百科全书·民族卷. 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
5. 王尧主编. 中华文化通志·民族文化典.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
6. 赵衍荪. 白文. 见：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会编. 中国民族古文字. 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

第六节　傣文(西双版纳傣文、德宏傣文、金平傣文、傣绷文、新傣文)

傣族是一个跨境的民族。我国的傣族人口有 1158989 人(2000)，主要居住在云南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和耿马、孟连、新平、元江、金平、景谷、双江等 30 余个县市。傣族先民很早就生息在滇桂黔地区。公元前 1 世纪，汉文史籍就有关于傣族先民的记载，他们是"滇越"、"掸"的后代。唐宋时期的"金齿"、"银齿"、"绣面"、"茫蛮"，元明清以至民国初期的"白衣"、"僰夷"、"摆彝"、"摆夷"等，都与傣族有密切的渊源关系。

1180 年，傣族先民在今西双版纳地区建立了强大的"景陇金

殿国”。11 至 15 世纪，德宏地区的傣族曾以瑞丽为中心，建立了称雄于世的王国，被尊为“勐卯弄”，意为“大瑞丽”。元朝时建立云南行省，开始在傣族地区实行土司制度。清代沿袭元明旧制，但在比较先进的地区实行“改土归流”政策，委派流官进行直接统治。在边疆地区，傣族的土司统治一直延续到新中国建立初期。傣族自称为“傣”，意为酷爱自由、和平的人。

傣语属汉藏语系壮侗语族壮傣语支，主要有德宏、西双版纳、金平 3 种方言。傣族有自己的文字——傣文。傣文分老傣文（又称古傣文）和新傣文，新老傣文都是拼音文字。老傣文是随着佛教的传入而产生的。老傣文按地区又可以分为 4 种，它们是：西双版纳傣文，又名傣仂文，字母呈圆形；德宏傣文，又名傣哪文，字母呈长方形；金平傣文，又称傣端文，字母形状方圆兼备；在瑞丽、澜沧、耿马等县部分地区使用的叫傣绷文，字母呈圆形。这 4 种傣文都是从婆罗米字母或巴利文字母演化而来，与老挝文、泰文、缅甸文、柬埔寨文同属一个体系。新中国建立后，根据本民族的意愿，对傣仂文和傣哪文分别进行了改进，形成了新傣文。

西双版纳傣文，又名傣仂文。古时傣族称西双版纳这块地方为“仂”。生活在这里的傣族自称“傣仂”，意思是“仂地的傣族”。傣仂文是自称“傣仂”的傣族和孟连、双江、耿马、镇康、景谷、澜沧等县的傣族以及信仰小乘佛教的布朗族所使用的文字。在国外，使用这种文字的还有缅甸南掸邦的“傣痕”、泰国北部的“傣允”和老挝的居民。这些地方的人都把这种文字称为“经书文字”，可见这种文字的创制与小乘佛教的传入有密切的关系。在西双版纳地区，这种文字起初仅用于宗教活动，后来逐渐传入民间广为使用。但在其他地方，至今依然只作为寺院中使用的经典文字，与日常使用的文字不同（孟连、双江、耿马、镇康、景谷、澜沧、沧源等县的傣族群众日常使用德宏傣文）。

傣仂文的创制年代目前尚无定论，一般认为开始于 13 世纪。

[illegible]

西双版纳傣文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据说有本名为《多拉维梯》的傣文文献记载，过去佛经在傣族地区的流布全靠口耳相传。傣历 639 年，即公元 1277 年，有位名叫督英达的佛爷创造了傣仂文，他用铁笔把傣仂文的经书刻写在贝多罗树的树叶上，成为著名的贝叶经。一般认为这本傣文文献所记载的时间可以与汉文史籍上记载的与西双版纳关系极为密切的八

百媳妇国使用白夷字的时间相印证(《经世大典招捕总录》),因而傣仂文有可能创制于13世纪。八百媳妇国也就是当时泰国北部以清莱、清迈、景线一带为中心的景线王国,也称清迈或兰那泰王国,它在历史上与西双版纳境域相接,民族相同,语言相通。1190年,傣族首领叭真在景洪一带建都时,它们都曾作为属国,政治上结为同盟,文化交融,相互间又有姻亲关系。当时八百媳妇国国主已在奏章上使用白夷字,即傣文,那么在与西双版纳官方往来的文书中使用傣文应是正常现象。因此,傣文创始年代应在这个时间以前若干年。

另一种意见认为这种文字的创制还要早些。它是随小乘佛教的传入而创制的,并且一开始就应用于天文历法的传授和计算。小乘佛教传入西双版纳地区是在公元6—7世纪,而公元638年又是傣历纪元的起始年,天文历法的计算如果没有文字是难以想象的。再者,傣仂文比中南半岛各国使用的印度字母系统的各种文字字母形体(如泰文、老挝文)更为古老,至今在老挝和泰国北部仍被视为经典文字,专门用于佛教经典中。6—8世纪又是傣族社会一个大的发展时期,所以一些专家认为傣仂文的创始年代应在这一时期。

傣仂文字母的书写形式何以能别具一格呢?据傣族传说这种文字起源于过去流行的一种记事符号,一个煮饭人用吹火筒在炉灰上印出一些痕迹,吹火筒为圆竹筒,破损后成为半圆形,于是形成了很多圆形与半圆形的符号组合,这种符号组合最后成为一些傣文字母,它占全部字母的半数以上。这种文字创制的故事真是富于生活气息。

傣仂文来源于古老的印度文字,与中南半岛的缅甸文、柬埔寨文、泰文、僧伽罗文有渊源关系,其文字形式都是从纪元前印度所使用的婆罗米字母演化而来。由于佛教传播路线的不同,婆罗米字母分为南北两路东传,传到中南半岛后又分作两个系统,一个系

统是古代吉蔑文，另一个系统是古代孟文。经典傣文属于孟文系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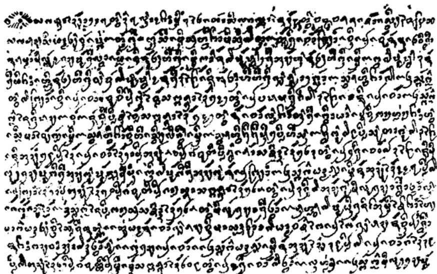
有人认为中南半岛这几种文字脱胎于非梵文系统的巴利文，因为小乘佛教至今流传一套公元前 483 年始编的巴利语三藏经。巴利文拼写的巴利语是释迦牟尼传道所用的印度北方摩揭陀地方的语言，后来成为写作小乘佛教经典的共同语言。傣仂文作为一种拼音文字，字母的排列顺序和巴利文一致。

老傣文和老挝文、泰文、缅甸文、柬埔寨文同属一个体系，书写字序从左到右，行序从上到下。文字结构基本属于拼音文字中的音位文字，即用字母来表示音位的读音。傣仂文最初是 41 个字母，后根据傣语特点增加到 56 个字母，其中 7 个元音字母，1 个元音兼辅音字母，48 个辅音字母。48 个辅音字母又分为高音组和低音组。高音组字母拼写阴类调，低音组字母拼写阳类调，再加上两个声调符号，正好拼写 6 个不同的声调。这套字母基本上能拼写出以景洪话为代表的西双版纳方言，但也存在不足，即同一个音位可以用不同的几个字母拼写，同一个字母也可以拼写几个不同的音位，比如 S 音位的拼写多至 5 个字母。

人们主要通过寺院学习傣仂文，西双版纳地区的傣族男子到七八岁时就被送到佛寺当小和尚，在那里通过念经学习傣仂文。这些孩子在寺院生活，少则 3 个月，多则数十年。人们认为只有入寺当过和尚，才能成为有教养的人，否则会被社会歧视。佛寺内的僧阶有 10 级，一般晋升到 4 级以上的人才能通晓傣仂文。僧侣成年后，多数还俗为民，还俗以后被称作“康朗”，被社会上看作是有学问的人而受到尊重。少数留寺院深造，成为终身僧侣。

傣仂文过去没有铅印出版的书籍，只有刻写的贝叶经和手抄本，但流传下来的文献十分丰富。傣族先民使用傣仂文记录了大量本民族的政治历史、文学传说、宗教经典、天文历法、农田水利、数学科技、医药科学等知识，同时翻译了很多汉文书籍、印度经文

和文学等作品。明代，傣仂文就为中央王朝与当地文牍往来所通用。傣族的文献多不注明其著者和写作年代，现只能根据文献内容所反映的时代特点和文字上表现的语言情况来推测和考定其写作年代。现在所见标明年代的最早傣仂文罕本是傣历 976 年(1614)的《论傣族诗歌》。



西双版纳傣文　《车里宣慰使司地方志》

傣仂文重要文献有《泐史》，原名《囊丝本勐》，意为"地方志"，即《西双版纳历代编年史》。从南宋淳熙七年，即傣历 542 年(1180)，傣族首领叭真入主西双版纳建立景陇金殿国写起，至 1950 年西双版纳解放止。新中国建立前有译本，从南宋淳熙元年(1180)至清同治三年(1864)，名为《泐史》。新中国建立后重译，名为《车里宣慰使司地方志》。此书有详简不同的多种写本，也有多种不同译本。《芒莱法典》问世距今已有六百多年，是傣族历史上最早的一部法学著作。芒莱(1239—1317)曾在景线(今属泰国)立国为王，先后建都于今泰国清莱和清迈，即我国历史上所称八百媳

妇国。全书内容分断案的基本原则、刑法条文、案例分析三部分，在西双版纳一带长期保持法律效力。此书有多种手抄本。《景洪的水利分配》，该书记载了傣历826年(1464)时景洪的水利灌溉情况。重要的文学作品有《傣族创世诗》、《召树屯》等。医学方面有《传统傣医学手稿》，记载了传统傣医关于医药、方剂、制剂方面的理论和治疗方法。

老傣文文献中数量最大的是佛教经典，包括小乘佛教经典和原始宗教资料两部分。小乘佛教经典据称有84000卷，现仅存一小部分。这些经典保存了小乘佛教早期传入的面貌，而且有一部分是傣族僧人的著述，其中包含许多当地历史、地理、语言、文学的材料，有极高的史料价值。原始宗教资料包括祭文、祷词、占卜书等。

傣仂文古籍中的佛教经典都是用铁笔刻写在贝多罗树的叶子上，因此被称为贝叶经。贝多罗树原产印度，我国云南、广东地区也有栽培。这种树属棕榈科，像棕树，形体比棕树更高大。这种树的叶子用水沤后，晾干、压平可以代纸，保存千百年上面刻写的字迹都不变。古代印度僧人多用这种树叶写佛经。西藏的寺院里，保存着近千种原始贝叶经的手抄本，甘肃、陕西、浙江的一些寺院，也有这种传世的贝叶经。傣族的贝叶经书记载了一个民族的历史文化，这种贝叶成了傣族文化的重要载体，所以有人称傣族文化为贝叶文化。贝叶经使傣族文化一代一代传承下来，发扬光大。现存最早的贝叶经是中国历史博物馆所藏、刻写于傣历1162年(1800)的《玛哈瓦戛经》。

傣文佛教经典最为重要的是傣文《大藏经》。傣族佛教属于南传上座部系统，这个教派的基本经典都由巴利语经典移译过来，所以就叫“巴利三藏”，或叫“南传大藏经”。三藏是指佛教经典的经、律、论三大部分，北传三藏和南传三藏所包含的经典是有所不同的。我国北传大藏经有汉文、藏文、蒙古文、满文、西夏文等种类，

而南传大藏经仅傣文一种，因此傣文大藏经在我国佛教经典研究中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傣文大藏经有三种不同地方文字的写本和刻本，即西双版纳的傣仂文本、德宏的傣哪文本和傣绷文本。

过去外国传教士曾在曼谷使用傣仂文铅印过基督教的福音书，如《马可福音》、《马太福音》等，还有加五线谱石印的傣仂文赞美诗。但由于基督教在傣族群众中传播不广，这些印刷品在中国流传甚少。

傣仂文的使用一直到1956年。作为一种拼音文字，傣仂文拼写的是文字创制之时西双版纳傣语的语音，至今这种语音已发生一些变化，遇到这种情况，则不按现代口语拼写而保留原来的固定写法，再加上有些书写规则并不规范的问题，所以给群众学习带来很大困难。

根据傣族人民的意愿，1954年在原有文字的基础上对傣仂文进行了改进，改进方案于1955年经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批准试行。改进后的傣文称新傣文，1956年开始正式推行。新傣文在一些方面发生了变化：字母由原来的56个减少到42个。辅音分高、低音两组。韵母和声调符号一律平列，便于书写和印刷。新傣文保留了老傣文三个主要特点：(1)保留原有的字母形式。(2)声母辅音字母分高、低音组表示调类。(3)保留原来表音上的某些省略方法。

傣仂文虽然进行了改进，但新傣文要取代老傣文并不是一件简单容易的事。佛寺中的大量经书和民间流传的文献都是使用老傣文，掌握本民族传统文化的老一代知识分子多数只认识老傣文。认识老傣文的人数越来越少，传统文化的继承出现重大问题。1986年5月25日，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第6届人代会第5次会议又通过了恢复使用老傣文(即傣仂文)的决议。然而，新傣文从推行开始，进行普及教育等，已使用了三十年，结果有将近两代人不懂老傣文。新傣文克服了老傣文存在的一些缺点，它的出现满足

了当时傣族人民尽快掌握本民族文字的愿望。从 1996 年开始,《西双版纳报》又重新改用新傣文出版,一般出版物、文件及小学课本等仍使用新傣文。现在新老傣文正处于并用阶段,老傣文尚未大力推广,新傣文的推行又有所削弱。

德宏的傣文因主要使用于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故通称"德宏傣文",也叫"怒江上游傣文"、傣哪文。州外临沧地区的耿马县、双江县、镇康县;思茅地区的景谷县、孟连县、镇沅县;保山市的保山县、昌宁县、腾冲县的傣族,也有部分群众在使用。德宏傣文又叫傣哪文,傣哪文创制和使用的时间较傣仂文要晚一些,大约在 14 世纪左右。

明初钱古训、李思聪著有《百夷传》,记述云南德宏地区傣族事迹颇详,其中记有滇西傣族"小事刻竹木,大事作缅书,皆旁行为记"的情况。由于傣文字母与缅文字母同属一个体系,看起来十分相似,因此,汉籍记载中常将傣文称作缅文。《百夷传》所记之"缅文"实际上就是傣哪文。傣语与缅语属于不同语族,语言差别很大,虽然傣语中有一部分缅语借词,但傣族历史上未曾有过哪一个时期、哪一个阶层曾用缅语、缅文作为交际工具。至于"旁行为记"的习惯,在现今的傣文抄本中仍然习用不变,如段落要点、小节标题等都斜书于正文之侧,与《百夷传》所记的相同。只是当时民间还盛行"刻竹木"的记事方法,使用傣文还不广泛。李思聪偕钱古训去滇西的时间是明洪武二十九年(1396),那时傣哪文已在官方使用。傣哪文的创始年代,当然应该比这个时间要早一些。

傣哪文同与我国接壤的缅甸掸邦北部的掸族以及我国云南瑞丽、澜沧、耿马等县部分地区的傣族所使用的"傣绷文"原是同一种文字(在口语上属同一方言,可以互相通话),当时,傣哪文和傣绷文的字体基本是一致的,字母都是圆体。后来因居住在怒江上游、使用傣哪文的傣族,多与汉族比邻或杂居,受汉族文化影响,使用毛笔书写,逐渐形成今日略带方形的文字。而居住在怒江下游,使

用傣绷文的傣族,多用硬笔书写,所以仍保留了圆形字体。傣哪文字母源于缅文字母,缅文字母源于古孟文字母,古孟文字母又源于印度婆罗米字母。婆罗米字母是印度文字体系的最早形式,在中亚地区曾用于梵文文献。

傣哪文有 19 个辅音字母,9 个元音字母,组成 45 个韵母。声调没有符号表示。现代德宏方言的韵母有 84 个,但原有文字只有 45 个韵母,所以混音混义的字很多,造成傣哪文在拼写以芒市话为代表的德宏方言时,字母和音位不对应的情况较为明显。一是没有符号表示声调,读什么调要根据词的意义来确定。二是有些音用同一个符号表示,怎么读也要根据词的意义来确定。三是有的音位分别有两个字母可以表示。

傣哪文的改进提出的比较早。1952 年 12 月,即成立了保山专区傣族文字改进委员会。1953 年 8 月通过了《德宏傣文改进方案》,10 月报呈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审批。1954 年 6 月,中央民委批准试行。1955 年、1963 年、1988 年又作了一些补充修改,成为现行的《德宏傣文改进方案》。

改进后的新傣文仍保留了 19 个辅音字母,但更换了其中 3 个。韵母方面,将不同的长短元音或读音近似的单元音都用不同的符号区别开。设计了 5 个声调符号区别不同声调。使用了 84 个表示元音及复合韵母的字母或字母组合形式,取消了原来的合体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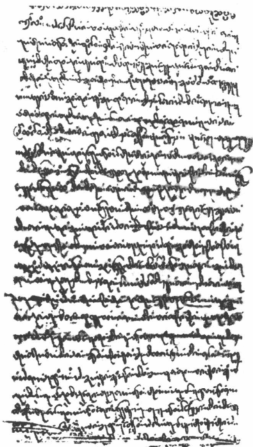
新傣文开始使用后,首先在学校推行,继而在教材、报纸、电台、剧本、法律文书方面使用,云南民族出版社和德宏州民族出版社等出版了大量傣文书籍。新傣文在傣族群众的社会文化生活中发挥了巨大作用。傣族群众信仰佛教,佛寺里的经书和群众的宗教活动、传抄经书等都还使用原来的傣哪文,群众的文艺活动、书信往来、生活记事等则用新傣文。

德宏傣哪文使用的地区最广,西双版纳傣仂文次之。这两种

德宏傣文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文字保存的文献资料比较丰富。傣绷文和傣端文使用的范围较窄,保存的文献资料较少。傣哪文文献有如下几种:《华夷译语》,是明、清两代官修的双语对译词书。明代永乐年间(1403—1424)翰林院设四夷馆,纂有10种译语,其中《百译译语》属于德宏地区的傣文,有天文、地理等16个门类,共收674个词。每个词右边为傣文,中为汉字,左为傣文的汉字音译。每页4字,共169页。清乾隆年间设会同四译馆,编有《华夷译语》42种77册,其中属于傣文系统的计有《车里译语》、《猛缅译语》、《焚夷译语》、《猛麻译语》、《耿马译语》、《镇康译语》、《勐卯译语》、《南甸译语》、《湾甸译语》、

《猛连译语》、《干崖译语》、《芒市译语》、《潞江译语》共 13 种。《车里译语》是西双版纳一带曾用过一阵的官方文字，其他 12 种基本属于德宏傣文体系，但又掺杂有个别傣绷文和西双版纳经典文字。这套译语也是每页 4 个字，每字上为傣文，中为汉文，下为傣文的汉字音译。各册分别设 14 ~ 17 门类，字数少者仅 112 字（如僰夷译语），多者 800 多字（如镇康译语）。



德宏傣文　《维先达罗》

这套傣文系统的译语文字有重要的文字史价值。13种译语文字互相间有同有异,对了解德宏傣文的演变过程提供了极为重要的资料。这套译语原件现存故宫博物院,北京图书馆有晒蓝复制本。

民间文学文献有很多,大都以唱词式的叙事诗流传下来,其中仅长诗、故事就有500多部。如多种以阿銮命名的故事集,《牧羊阿銮》、《四脚蛇阿銮》、《三眼阿銮》等,都有傣哪文的手抄本。傣哪文还有大量佛教经典,前文已经涉及。再如《维先达罗》,是佛教文学《本生经》中最后一经的扩写本,傣族佛教的重要经典。傣哪文手写本合装一厚册,横宽30厘米,高56厘米,共约240页。内容记述佛祖释迦牟尼修成正果的故事。当地佛寺每年佛诞日定期咏诵,对人民风俗习惯、宗教礼仪等都有很大影响。

傣绷文在文字体系上与傣哪文比较接近,是德宏傣文的前身,两种文字后来由于书写的关系有了分化。傣绷文的字母来自缅文字母,源于梵文,属印度婆罗米字母体系。据记载,缅文形成于11世纪上半叶,缅人建立蒲甘王朝开始形成统一国家的时期。因此据专家分析,傣绷文的创始时期应当晚于11世纪,因为大约在12至13世纪期间,缅文才从缅甸南部传到缅甸掸邦北部和我国云南与缅甸接壤的傣族地区。傣绷文与缅甸掸邦的掸文基本相同。掸邦是缅甸最大的一个自治邦,掸族是缅甸的第三大民族,有悠久的历史和较高的文化。在1287—1531年的近二百五十年间,曾是缅甸历史上的掸族统治时期,它的影响随之波及到我国边境的傣族地区,可见傣绷文的起源也比较古老。

我国目前使用这种文字的约有两三万人。德宏傣族称这种文字为"下方傣文",意指怒江下游傣族使用的文字。汉族称这种文字为"水傣文"。西双版纳傣族称这种文字为"民间文字",意为不用于经书的文字,与"经典文字"相对。傣绷文的声母原有19个,但现在勐定口语中实际音位只有17个。韵母经常用的有45个,

傣绷文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音　标	a	i	e	u	o	ɔ	ə, ɯ, əu
傣绷文	[illegible]						
音　标	aɯ						
傣绷文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音　标	ai, a:i		ui, oi		ɔi		əi
傣绷文	[illegible]	[illegible]					
音　标	au, a:u	iu, eu, ɛu					

傣绷文常用韵母

不包括经书上的和借用缅语的，但现代口语实际上却有 81 个韵母，还缺少 36 个，所以大多数韵母都是一形多音。一些在口语中有区别的词，在文字上却一样。这些缺点在傣文中基本相同。傣绷文从左向右横写，字与字之间不留空当，辅音字母作韵尾时，在辅音字母上面加隔音符号“ʻ”，词不分写。标点符号只有两个，逗号用单竖线，句号用双竖线。

傣绷文不但用于佛寺，也用于民间，是勐定“水傣”的通用文字。傣族人家男孩六七岁时都要进寺当和尚，他们进寺后就要学习傣绷文，一般半年八个月就可学会。女孩不进佛寺，所以男子大多懂傣绷文，而妇女不懂。

由于使用傣绷文和傣哪文的人同操一种傣语方言——德宏方言，耿马县政府曾决定傣族小学校和扫盲夜校统一使用经过改进的新德宏傣文，但因寺院和民间都使用傣绷文，而且两种话语在语音上还有一些差别，所以新傣文的推广有很多困难。

国内傣绷文的著作出版很少，除了 1968 年 6 月，曾由云南民族出版社出版过毛主席的《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三篇外，没出过其他书刊。但历史上流传下来的抄本则有数百

部之多，如《克历勐》、《娥并与桑洛》、《郎京布》、《郎娥弄》、《阿崃巷坎》、《窝信》等，德宏等地还存有少量傣绷文贝叶经。

我国云南与越南接壤的金平县地区的傣族使用的一种傣文叫金平傣文，金平傣文也叫傣端文。金平傣文是我国自称"傣端"的一部分傣族群众使用的文字。"端"是"白"的意思，"傣端"意即"白傣"(因其服饰而得名)，故金平傣文又称"白傣文"。自称白傣的傣族大部分分布在越南境内，约有 80 余万人。我国傣族中自称白傣的有 1 万多人，主要居住在云南省红河州的金平县猛拉区。这个地区的白傣文是从越南莱州传入的，越南莱州有黑傣文、白傣文两种，两者相似。由于资料少，白傣文的创始年代还不清楚。根据民间传说，白傣文有七百多年的历史，但何时传入金平，并无记载。

高音组			低音组		
	?			?	
k	x	ŋ	k	x	ŋ
tɕ	s	j	tɕ	s	j
t	th	n	t	th	n
p	ph	m	p	ph	m
f	v	l	f	v	l
h	d	b	h	d	b
kh	tɕh	ȵ	kh	tɕh	ȵ

傣端文辅音字母

金平傣族的文字和傣族其他三种方言文字一样都来源于古老

的印度字母。金平傣文的字母和符号在形体上与其他三种傣文不同,字母和符号以带棱角的笔划为主,直线和半圆为辅。傣端文有44个辅音字母,另有几个同音异体字母,根据所拼音调高低分为两组。高音组为清音,低音组为浊音。元音字母和韵母符号有92个,9个单元音都由独体符号构成,其余二合元音都由合体符号组成,金平傣语没有三合元音。金平傣文有6个声调,3个声调符号,声调的表示方法与傣仂文相同。

金平的傣族群众过去使用傣端文记载历史、编写民间文学,并在日常生活中使用。民间流传有一些手抄本,这些文献在十年动乱中焚烧殆尽,让人叹息。现在认识傣端文的人已经很少。

除上述四种老傣文外,还有一种鲜为人知的傣文。据国家民委民族问题五种丛书《思茅、玉溪、红河傣族社会历史调查》载:1934年,德国牧师贝里泰夫妇在新平县四区仙河村传教时,曾与当地傣族知识分子刀丕训合作翻译过有关宗教的书籍,他们创造过一种拼音文字,叫"花腰文"。

1985年,刘以在《关于新平傣文的调查与核实》一文中写到:我们对"花腰文"或称"新平傣文"的情况进行了反复的调查核实,现在可以这样说:"花腰文"或"新平傣文"是20世纪30—40年代,在新平第四区传教的基督教"内地会"德国牧师贝里泰及夫人贝里德,与当地傣族知识分子刀丕训一起,采用汉语注音字母拼写当地傣语的一种文字。这种文字,因产生于新平的漠沙,故被称为新平傣文。新平漠沙、嘎沙地区的傣族因其服饰特点被称为"花腰傣",因此这种傣文也被称为"花腰文"或"花腰傣文"。新平傣文相对于其他四种老傣文来说影响不大,仅在新平漠沙等部分地区的基督教徒中传授,因而知道的人很少。

本节参考文献:

1. 罗美珍.西双版纳傣文.见:中国少数民族文字.北京:中国藏学

出版社,1992
2. 周耀文.傣绷文.见:中国少数民族文字.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1992
3. 张公瑾主编.民族古文献概览.北京:民族出版社,1997
4. 岩峰主编.傣族文化大观.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1999
5. 中国大百科全书·民族卷.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
6. 华林.傣族历史档案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2000
7. 张公瑾.傣文.见: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会编.中国民族古文字.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

第七节 彝 文

彝族人口有7762272人(2000),云南、四川、贵州和广西等地都有分布,其中云南省人口分布最多。彝族支系繁多,历史上有"诺苏"、"聂苏泼"、"纳苏泼"、"罗婺"、"阿西泼"、"罗罗"、"撒尼"等自称。新中国成立后,正式定名为彝族。

彝族先民与远古时期的氐羌族群有渊源关系,其形成是古羌人南下过程中与西南土著部落长期融合的结果。各地彝族都有出自仲牟由的同一传说,其谱系可上溯至战国前期,仲氏所生六子发展为"六祖"部落。约在四五千年以前,羌人南下支系与当地土著融合为"僰"(濮),在此基础上,昆明人与僰的融合是形成彝族的新发展。魏晋以后,又形成对僚人的融合。两晋南北朝,中原混乱,建宁郡大姓爨氏乘机兴起,独霸宁州,至唐天宝年间(742—755),雄踞南中达四百余年。隋唐以来,彝族先民有了"乌蛮"与"白蛮"的分化。"爨"原为南中大姓,后又作地名。爨地分东爨与西爨两大区域,"西爨"居住着"白蛮",系以叟、濮为主体,并与其他民族融合而成,为爨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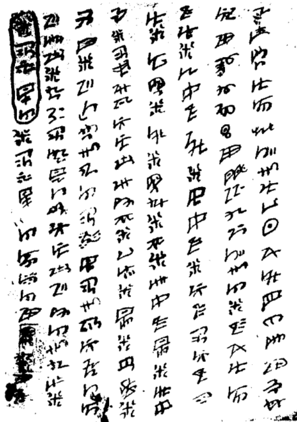
家族统治;“东爨”居住着“乌蛮”,系由昆明部落发展而成,为仲牟由家族统治。“爨”后又指族称,史料中的“爨蛮”即彝族的先民。

8—10世纪,彝族和白族先民以洱海和滇池地区为中心建立了南诏国,这一时期是对彝族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均产生很大影响的重要时期。彝族社会长期保持着奴隶制度,清康熙、雍正年间(1662—1735),清王朝在彝族地区推行“改土归流”政策,给土司、奴隶主势力以沉重打击,部分地区迅速向封建制过渡,如在东川、乌蒙等地,乾隆年间(1736—1795),已是“汉土民夷,比屋而居……与内地气象无二”。而川、滇及大小凉山少部分地区,仍保留着比较完整的奴隶制。

家支制度是彝族基本的社会结构,是一种以父系血缘为纽带的组织形式,内部不允许通婚。森严的奴隶等级制渗透到家支中,家支分黑彝家支和白彝家支,即诺伙家支和曲诺家支。黑彝家支属统治阶层,有较稳定的统辖地域,白彝家支从属于黑彝家支。

彝语属汉藏语系藏缅语族彝语支,有北部方言、东部方言、东南部方言、南部方言、西部方言、中部方言等6种方言。彝族原有一种文字,史称“爨文”,又叫“韪书”、“罗文”、“倮倮文”、“夷文”、“蝌蚪文”、“毕摩文”等,通称“老彝文”。彝语称文字为“司”或“布玛”,故称彝文为“聂苏司”、“纳苏司”、“尼司”或“诺苏布玛”等。彝文约有10000多字,是处于表意向表音发展中的一种音节文字,通行于北部、东部、东南部、南部方言地区。据专家统计,流传至今还在使用的彝字,云南有14200余个,贵州有7000余个,四川有8000余个,广西有600余个。

一般历史悠久的文字,都从年代上分为古文字和非古文字,由此可以看出文字发展的历史。而彝族文字很难从时间上界定出古今文字,因为彝文虽是一种历史悠久的文字,但它从古至今字形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依然保持着原生态,所以彝文分不出古今形态。我国古代各民族创制的文字不下30余种,其中大部分文字的



老彝文 《六祖诗史》

来源脉络比较清楚，如来源于阿拉米字母体系、印度婆罗米字母体系、阿拉伯字母、汉字系统等。在中国民族古文字中，创制不受其他民族文字影响土生土长的文字，只有汉字、彝文和纳西东巴文。

彝文创自何时，至今尚无定论。有人认为彝文已有数千年的历史，也有人认为其创始于唐代而集大成于明代，目前学术界影响较大的观点，认为其创始于汉代或更早一些。至于彝文为何人所创，历史上有很多传说，民间传说中有吉禄老人、本夺本耿、毕阿诗拉

吉、阿山、孔子等；见于彝文经典的有恒本阿鲁、伊阿伍、伯博耿等；见于汉文史志的有阿町、阿畸等。彝文经典《帝王世纪·人类历史》载：人类始祖并无文字，不过口授而已，流传到二十九代武老撮之时，上帝差下一祭司宓阿叠，他开始创造文字，建立典章。贵州彝文文献《西南彝志》说：恒本阿鲁“创始供奉祖先，发现了天地的根源，并创造了象形文字。”《西南彝志》还说：伊阿伍创造文字。汉文文献上也有些零星记载，如旧《云南通志》称：“初，有阿町者，马龙人，撰爨字如蝌蚪，号曰韪书，夷人奉为书祖。”《清一统志》卷 484 载：“唐，阿畸，纳垢夷之后，隐岩谷，撰爨字如蝌蚪，三年始成，字母一千八百四十，号韪书，爨人至今习之，以为书法。”由以上情况可以知道，彝文大约不是一人一时的创造，而是有多人在不同历史时期和不同地点对彝文进行过整理或改进。

发现较早的金石彝文有贵州的《拦龙桥碑记》(1259)、《成化钟铭文》(1485)、云南的《镌字崖》(1533)等，都是宋、明时期的刻石。后又发现贵州的《妥阿哲纪功碑》，推测可能是蜀汉时期的作品。从字体看，那时的彝文已发展到一定的水平。

彝文尽管从形体上看与汉字很接近，但它实际上不是从汉字演变出来的，而是一种自创文字。但从其构造来看，有些是仿汉字造字法的。彝文一个字形代表一个意义，有象形、会意、指事等造字方法，也有同音假借现象。象形字如“眼”、“脸”、“头”、“蛋”、“饭”等；会意字如“水”、“浮”、“鸭”等；指事字如“上”、“下”、“左”、“右”、“地平线”等。彝文每个字都归属于一定的部首，部首大多是该字较为突出的笔画。彝字一般由主干和若干附加符号组成，其中包括少量意符。彝文的独体字多，合体字少。文字结构大体分上下结构、上中下结构、左右结构、左中右结构、全包围结构等几种。一般笔画顺序是先横后竖、先上后下、先左后右、先外后内和先中间后两边。

彝文书籍一般没有标点符号，因其多是五言一句，断句并不困

难。后来的书中出现了一些简单的标点符号,如替字号或叠字号,句号。在段落的开始和结尾常画有花鸟等图形标示。在每篇文章、故事结束的地方,则画有一棵树、一种动物头像或符号之类表示完结。

滇、川、黔、桂彝文古书中的彝字形体大部分相同或相近。后来因彝族居住分散,山川阻隔,随着方言发展,出现读音用字的不统一,加之辗转传抄,字形也有了差别,繁简不一,形体互异,重文别体很多。主要表现在书写符号不同,基本字有差异,各基本字的大量异体字差别更大。同一段话,用不同地区的彝文来写有很大不同,识读都有困难。四川凉山一带彝文一般由右向左横行书写,云南、贵州一带则由左向右竖行书写。天长日久,自成体系。彝文现存较早的文献有很多是碑铭石刻。如贵州大方县的《火济碑》,为东晋时期所刻。《拦龙桥碑记》(岩刻),位于贵州黄果树瀑布上游的六枝特区拦龙河岸的岩石上。碑面高 70 厘米,宽 45 厘米,刻有彝文 589 字。镌于南宋开庆己未年(1259),是现今存世最早的彝文文献。《成化钟铭文》,贵州大方县罗甸水西的成化铜钟铸于明成化二十一年(1485)。钟体全高 135 厘米,口径 110 厘米,厚 1 厘米,重约 300 公斤。钟顶部有 36 厘米高的挂耳,形状奇特。钟面四周各有一幅八卦图,八卦图四周的云、雷纹夹有两对日、月图案。钟面铸有彝、汉铭文 8 幅,每幅高 19 厘米,长 54 厘米。此钟是明代贵州宣慰使安贵荣之妻建宗祠、安祖灵时以锡、铜、银合金浇铸的祭祀物。

《水西大渡河建桥碑》为明万历二十年(1592)立,位于贵州大方县和黔西县分界的大渡河桥北头。高 178 厘米,宽 73 厘米。刻有彝汉两种文字,彝文有 1972 字。碑文是彝族罗甸水西君长、贵州宣慰使安国亨撰写的,内容大部分为叙述彝族默部历史,建桥的缘起,以及宣扬安邦母子捐资修桥的德政。此碑是现存字数最多的彝文刻石,也是研究彝族社会历史、风俗习惯的珍贵资料。此外

重要的还有《新修千岁衢碑记》(岩刻),位于贵州大方县马场区白布乡,为彝汉文合璧,镌于明嘉靖二十五年(1546)。《镌字岩彝文石刻》(岩刻),位于云南禄劝县法宜村边高达数丈的峭壁上,镌于明嘉靖十二年(1533)。

彝文古籍卷帙浩繁,种类多样,涉及哲学、历史、文学、语言文字、医药卫生、天文地理、农业生产等。比较重要的有《西南彝志》,彝文原名为《哎哺啥额》。该书流传于贵州省毕节一带,原著的编纂者是古尼甸水西热卧土目家的一位慕史(经师)。此书大概于康熙三年(1664)吴三桂平定水西之后,至雍正七年(1729)改土归流之前这六十余年间所写。全书共26卷,有彝文37万余字,400多个标题,采取五言诗体裁,以赋为主。"哎"、"哺"在彝语里是"影"和"形"的意思,亦即阴、阳;"啥"、"额"在彝语里是指清气与浊气。"哎哺啥额"即是对阴阳气的称呼。该书正是以"阴阳、清浊"的观点来解释宇宙万物的产生和人类起源的问题。由于这部书涉及面广、包罗内容丰富,被誉为是"百科全书式的巨著"。全书分为《创世志》、《谱牒志》、《地理志》、《天文志》、《人文志》、《经济志》六个部分。原抄本是贵州大方县陈朝光家祖传收藏本,现存北京民族文化宫图书馆。

彝文较为著名的文献还有《彝族源流》,原名《能素恒说》或《六祖源流》,是一部彝族历史文献巨著,内容广泛,历史久远。另外还有《宇宙人文论》、《劝善经》、《阿诗玛》等。另外有很多彝文经书,多为手抄本,以有关宗教祭祀的较多,主要是祭经占卜之类。

对于彝族文献的收集整理工作很早就已开始。明王朝组织编写、现存北京图书馆的《华夷译语》,是为时较早的一民族语文工具书。其中彝文部分把分布于现今川、滇、黔三省五个地区的彝文字、词,按"天文门"、"地理门"等学科分为19个门类,并采取汉译和注音的方式编成。这是一部研究各省彝族文字和其他民族语文的难得的工具书。

经丁文江先生编辑,1936年出版了《爨文丛刻》,共收《千岁衢碑纪》、《说文〈宇宙源流〉》、《帝王世纪〈人类历史〉》、《献酒经》、《解冤经上卷》、《解冤经下卷》、《天路指明》、《权神经》、《夷人做道场用经》、《玄通大书》、《武定罗婺夷占吉凶书》等11种经典,是研究彝族历史、哲学、宗教、语言、文学的一部彝文巨著,全书连注音、释读、意译共约10万字。19世纪末20世纪初,一些外国传教士到彝区传教,也收集整理了一些彝文文献,其中法国天主教神甫保禄·维亚尔(Palli－Vial)曾翻译过数篇彝文文献,他通过收集、整理编写出一部彝文与法文对照的《法罗词典》,1905年初版,1909年再版。

新中国建立后,彝族文献的收集整理工作受到广泛重视。大量彝族文献被重新整理出版,很多彝文被译为汉文。各种工具书相继问世,如贵州毕节地区彝文翻译组编的《彝文字典》、四川凉山语委编的《彝文单字汇集》、云南民族出版社出版的《彝汉字典》、贵州民族出版社出版的《简明彝汉词典》、四川民族出版社出版的《彝汉词汇》、《汉彝词典》、《彝汉字典》等。对彝文文献的研究近年也出版了很多著作。1994年12月,四川民族出版社出版了由贵州毕节地区彝文翻译组搜集整理的《彝文典籍目录(贵州卷)》。

纸出现在彝族社会后,彝文古籍的制作有人工抄写、雕版印刷、铅印、石印等多种方法。抄本一般是用毛笔或竹签笔写在纸上或布帛、羊皮上,也有少量用小刀刻在竹简或牛羊骨上。雕版印刷始见于明代,铅字印刷开始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石印技术出现在20世纪30年代。浩如烟海的彝文古籍中,绝大多数是抄本,印刷本的数量很少。

明朝以来,彝文使用广泛。特别是"改土归流"后,彝族奴隶主、土司将自己的子弟送到京城或省府学习彝汉文。明朝在"四夷馆"设立专门人员,将彝文文献译成汉文,将汉文文献译成彝文。清《新纂云南通志》载:"官府文书,必为爨字于后,乃知尊守,是乾嘉之际,其字犹行于夷中也。"当时,彝族地区用彝文教学,并定期在府上会

考,优胜者为"毕摩"(即有知识的彝人)。毕摩可到各地主持婚丧嫁娶,节庆祭祀,或安排到官府做事,掌管彝文经典,著书立说,招徒授业。新中国建立前,彝族人民常用彝文写书信、开药方、立文契、做对联、记账目、续家谱以及记录写作文学作品。解放战争时期,我党领导下的游击武装还用彝文写传单、递情报。新中国建立后,彝文仍在广大彝区使用,据调查有相当一部分人能够掌握彝文。受极"左"思潮干扰,十年动乱期间,彝文被当作"四旧"破除,但老彝文仍在彝族地区传播使用。四川凉山使用规范彝文后,老彝文主要使用于云南、贵州的彝族地区。

彝文《"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由于彝文大量使用同音假借字,各地存在语音差别,代音文字因地而异,加之一些文字书写缺少统一标准,造成彝文难解难认。

为使彝文能更好地为彝族人民服务，1975年，四川凉山彝族地区以喜德语音为标准音，以圣乍话为基础方言，制定了四川《彝文规范试行方案》，共确定819个规范彝字。《彝文规范试行方案》在字形、读音、书写、标点符号、新词术语等方面都规定了明确、固定、统一的使用标准，并设计了"彝语拼音符号"，便于注音学习。1980年经国务院批准开始在四川彝区试行。实践证明，《彝文规范试行方案》是一种科学实用的音节文字方案。实践取得很好效果，凉山州语委将发至基层的中央、省、州、县文件都译成彝文，便于群众学习；《凉山日报》、《凉山文艺》等彝文报刊发行扩大；农村扫盲进度快、效果好；教学中，凉山州内40%的中小学，师范学校都开设了彝文课；编写了大量彝文工具书；彝文规范应用研究也取得重要成果。凉山规范彝文可以说是我国少数民族文字改革成功的典范。

凉山的成功，对云南彝族产生了巨大影响。1986年，云南省少数民族语文指导工作委员会向省人民政府上报了《云南彝文规范方案》，并于1987年开始试行，规范彝文出台后，相应读物也接连问世。但由于云南彝族存在较大方言差异，彝文规范工作难度较大，但其实践仍在彝族文化史上留下辉煌一页。

本节参考文献：

1. 武自立、陈英. 彝文. 见：中国民族古文字图录.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
2. 黄润华、史金波. 少数民族古籍版本. 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
3. 张公瑾主编. 民族古文献概览. 北京：民族出版社，1997
4. 中国大百科全书·民族卷. 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
5. 王尧主编. 中华文化通志·民族文化典.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
6. 马学良等. 彝族文化史.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

7. 贵州省毕节地区民委等. 彝文金石图录. 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89
8. 丁椿寿. 彝文论. 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93
9. 黄建明. 彝文文字学. 北京：民族出版社，2003

第八节　藏　文

藏族现有人口 5416021 人（2000），主要分布在平均海拔 4000 米左右的世界屋脊——壮阔的青藏高原上，他们大都聚居在西藏自治区，以及青海的大部分地区和甘肃、四川、云南等省的部分地区，这些地区都设有藏族的自治州或自治县。此外，在毗邻我国西藏的印度、尼泊尔、不丹、锡金、克什米尔、缅甸等一些国家和地区也有藏族聚居。

藏族为汉语称谓，藏族自称"蕃"（音 bo）。关于"bo"音来历，说法不一，有说是"地名"，有说是"农业"，有说是"逃逸"（印度宫廷争位败者北逃）。较为流行的说法是，这是"苯教"的名称，即以古代藏族信奉的一种宗教称说族名，此说已基本为学界所接受。唐代汉文文献中，多用"蕃"或"吐蕃"指称藏族。藏语对居住在不同地区的藏族人有不同的称谓：西藏阿里地区的人自称为"兑巴"；后藏地区（即日喀则地区）的人自称为"藏巴"；前藏地区（即拉萨地区）的人自称为"卫巴"；西藏东部和四川西部的人自称为"康巴"；藏北及川西北、甘南、青海的人自称为"安多娃"；统称"蕃巴"。"巴"、"娃"藏语意为"人"。

藏族发源于西藏雅鲁藏布江中游地区，他们长期在那里生息繁衍，也曾向东北方向发展。据汉文文献记载，两汉时期的西羌人便是藏人先民的一支。7 世纪，"悉补野"部首领第 32 代赞普（赞

普,藏语意为"雄壮的男子",是吐蕃君长的称号)松赞干布(617? —650),雄才大略,平定内乱,兼并诸部,完成了统一西藏高原的大业,正式建立吐蕃王朝。他定都逻娑(今拉萨市),采取了一系列重大的经济、政治、军事、文化措施,诸如创制文字、历法,制定法律、度量衡,分设文武各级官职等,使西藏社会取得极大发展,由是逐渐形成了统一的藏民族。

藏族居住地区有着丰富的自然资源。藏族以牧业为主,农业主要种植青稞。以青稞和小麦为主食,糌粑是藏族的特色食品,喜喝酥油茶和奶茶,不吃奇蹄类兽肉。藏族最隆重的传统节日是藏历新年。藏族在婚丧嫁娶、觐见佛像、迎送亲友时都要献上哈达,表示美好的祝愿。丧葬方式以天葬为主。

7世纪以前,在藏区占统治地位的宗教是当地土生土长、信奉多神的原始宗教——苯教。再后来佛教传入藏区,与苯教经过长期斗争融合,逐渐形成藏传佛教。藏族信奉藏传佛教,藏传佛教中占主导地位的是格鲁(意为善规)派,其创始人为青海湟中藏族僧人宗喀巴(1357—1419)。他当时发起宗教改革,于明永乐七年(1409),在拉萨举行大祈愿法会,创立格鲁派。因此派僧人平时戴黄色僧帽,故俗称"黄教"。此教派有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两大转世系统。

藏语属汉藏语系藏缅语族藏语支,分为卫藏、康、安多三个方言。藏文创制于7世纪前期,有悠久历史,是我国现正使用的多种民族文字中仅晚于汉文出现的文字,距今已有一千三百多年的历史。

据藏文史籍记载,松赞干布建立吐蕃王朝之后,在与其他民族交往、整理朝政以及征战过程中,深感无文字之苦。于是派遣他的心腹近臣图弥阿努之子图弥三菩札等人携带重金前往西域诸国和天竺(即古印度)等地学习文字、佛法和声明之学。图弥三菩札含辛茹苦、跋山涉水,走遍西域,最后来到天竺南方。他性格坚毅,虚

心好学，精研佛学和梵文，向精通各种文字的婆罗门大师里津学习了多种文字，又向大班智达（精通五明学者）拉日僧格学习声明学。学成返回西藏后，图弥三菩札遵照法王旨意，依据梵文体系中的某种字体，结合藏语情况，创制了藏文。他根据梵文兰查字母创制了藏文正楷，又根据乌尔都字母创制了草书。他用藏文写下了 8 种文法书，翻译了《宝云经》等 20 余部梵文经典。

不过，随着藏学研究的深入，这种说法已受到国内外学者的质疑。据近人的研究考证认为，藏文的出现使用可能早于 7 世纪，先在民间流传，到松赞干布时进行了统一和规范，并从法律上确定了它的地位。一种文字的出现是比较复杂的，它要有一定的理性认识和符合实际的内部规律，不可能是很多人同时创造。由一两个或是几个学者创制出文字初型，在民间使用过程中不断完善，应该是可以的。对藏文原型的研究也是诸说纷纭，因为古印度文字种类繁多，又历经嬗变，相互影响渗透，给藏文原型的考证带来很大困难。仅从字形比较，它与 5—7 世纪在印度流行的悉昙梵字和一度通行于克什米尔的梵字都比较相似。苯教的历史书则认为，藏文最初是由大食国（今伊朗）的一种叫做"崩伊"的文字首先转为象雄古文字，再转为"曼扎文"，最后逐渐转化为藏文的有头字（楷体）。

藏文在创制和使用过程中，曾几度修订，如原来只有 29 个字母，后来才发展成为 30 个字母。在历史上有记载的藏文重大修订有 3 次。第一次在 7 世纪中叶至 9 世纪初，是指图弥三菩札这次。这是苯教的说法，苯教认为西藏古有文字，图弥只是对古藏文进行了厘定。第二次是 814 年，开始于吐蕃王赤德松赞（804—815），完成于吐蕃王赤热巴巾（815—841），由赤热巴巾亲自领导，在噶瓦·白泽、觉若·鲁意坚参、尚·益西德三大译师主持下进行。第三次是 11 世纪初至 13 世纪，由阿里地区古格王意希畏时的仁青桑布等一些译师陆续进行的。

藏文的三次修订中以第二次影响最大，译师们主要是统一佛

经译语和简化正字法，以适应语音变化、文字规范和使佛经通俗易懂的要求。这次藏文厘定的内容，《贤者喜宴》一书有较为详细的记述："……废弃其中难懂不便读的古词，代之以便读易懂的新词。"当时还编写了《语合二卷》和《大、小翻译名义集》等语法修辞和字典一类的工具书。这次藏文厘定工作得到了吐蕃赞普的支持，以法令形式强制推行，取得较大成效。现行藏文基本上与这次规范后的藏文相同，这次文字厘定也成为鉴别古今藏文的重要标志。

藏文修订主要包括字母体系的修订和正字法的修订两方面内容。在文字修订同时，还规范了词汇，以一些新词代替旧词。此外，还设计了藏梵字母转写系统。藏文的这几次修订，对藏族文字的统一和推广、文化的发展、宗教的传播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藏文是一种参照梵文字母体系和文字制度创制的辅音字母式的拼音文字。共有 30 个辅音字母，其中 23 个字母基本上同于梵文字母，还有 3 个字母是将梵文字母略为变化而成，另有 4 个字母为藏文独创。另外，从梵文的 16 个元音字母中挑出 4 个与藏语相符的，制定出 4 个元音符号。辅音字母依其在音节中的位置和作用分为"基字"、"上加字"、"下加字"、"前加字"、"后加字"和"再后加字"。前 4 种表示辅音声母，后两种表示辅音韵尾。元音符号不能单独出现，必须加在辅音字母的上面或下面。元音 a 不用符号表示。由于语音的演变，许多字母在现代藏语中已改变发音或不发音。藏文拼写以音节为单位。在其初创时，每个音节在理论上都由基字和后加字两部分构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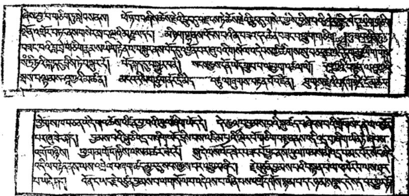
以现行藏文正楷字母与梵字原型悉昙梵字或克什米尔梵字的形体比较来看，梵字以斜线、圆角为主，而藏文则以直线、锐角为主，更具稳定感。梵字几经变化后，现在通行的拼写印地语的天城体字母，在形体上与藏文更为近似。藏文字母表的顺序也同梵文一样，大体按发音部位编组排列，4 个字一组，共七组半。

藏文自左向右横写，有的音节是用字母上下叠写的方式表示。音节与音节之间用一小点隔开，作为分节的符号。书题、篇章开头有一个起始符号。散文句尾用一个竖道表示，诗、颂句尾用两个竖道表示；全篇文章或诗颂大段落的末尾划4个竖道作为结束号。字体分有头字（楷体）和无头字（草体）两种。有头字顶上多一短横，主要用于印刷。无头字上面没有短横，主要用于书写。手写体又可细分为"粗通"、"粗仁"、"朱杂"等多种形式。最流行的一种草书叫"秋"，连笔较多，同印刷体差别很大。

藏文读音在不同方言区有一定差别，但正字法各地是统一的。这套正字法大体上反映了藏文初创时期藏语的语音情况，虽与现代口语有很大差别，但都有对应规律。现代藏文可以说是一种按历史规范拼写的超方言拼音文字。一千多年来，藏语发生很大变化，方言差别扩大，甚至达到互相不能通话的程度。藏文作为一种超方言文字，是指同一个字在各地可以读音不同，但写法完全一致。藏文保留着自己古老的语词和语法成分以及表达方式，可以说藏文是一种不同于现代口语的书面语言或文言。藏文这种超方言的性质，有利于藏民族的团结统一。

藏文的文献典籍非常丰富。早期文献多属金石铭刻、木简、手卷一类，内容以会盟祭祀、纪功述德、历史文书和佛教经典居多。如著名的"长庆会盟碑"即是唐长庆三年（823）吐蕃赞普可黎可足纪念唐蕃会盟所建。此外，还有敦煌石窟的大批藏文手卷以及敦煌、新疆出土的藏文竹木简牍和昌都、洛扎等地的摩崖石刻等十分珍贵的资料。

传统上，藏文的出现和使用与宗教活动有密切的关系，过去藏文的教学和传播主要由寺庙承担。藏文从创制开始，除政府、军队、民间等少量使用外，主要用于译经，即将梵文或汉文经典译为藏文。因此，藏文的文献和著述大多与宗教有关，著名的作家和翻译家也大多是宗教职业者。



藏文 《大藏经·无比喀且班智达传》

藏文佛典浩如烟海，14世纪编成的《藏文大藏经》包括的书达4500多种，分为《甘珠尔》和《丹珠尔》两部分。《甘珠尔》，藏语意为“经部”，包括藏文译成的原始佛经1108种（据德格版统计），由贡噶多吉编订。《丹珠尔》，藏语意为“论部”，包括对经律的阐释和注疏、密教仪轨和五明杂著等，有书3461种（据德格版统计），由布敦·仁钦珠编订。《藏文大藏经》是元朝武宗海山（1308—1311）时，为皇帝所信赖的大德尊巴降央，委托前藏的欧巴洛赛益西等人，把所有在藏的《甘珠尔》和《丹珠尔》编纂成集，并派欧巴洛赛益西常住日喀则附近的那塘寺，主持此事。欧巴洛赛益西和索南沃赛、江惹强秋绷等三人，以萨迦寺藏书为基础，把《甘珠尔》和《丹珠尔》抄本搜寻齐全，完成了汇编工程。至此，西藏有了第一个《甘珠尔》、《丹珠尔》全集的手抄本。由于印刷条件所限，未能印制出版。元末明初，藏传佛教大师布敦·仁钦珠（1290—1364年）复又搜集《甘珠尔》、《丹珠尔》抄本，加以整理，并增添了许多新目，存放在夏鲁寺金殿佛堂内。《藏文大藏经》除了佛教的经、律、论之外，还包括天文、历算、逻辑、文法、工艺、医药、美术、诗歌等著述，可以说是藏族文化的百科全书。

明永乐十二年(1414),明成祖朱棣下令在南京印制《甘珠尔》、《丹珠尔》。结果制成铜版印模,印刷了数套红油墨楼梯折叠式的《甘珠尔》、《丹珠尔》,合称《藏文大藏经》,封题为金字汉藏对照。作为皇帝封赏,萨迦巴、嘎玛巴和宗喀巴每人一套。宗喀巴的这一套至今尚完好地保存在色拉寺大乘洲昂巴扎仓的甘珠尔佛堂内。南京铜版《藏文大藏经》是《藏文大藏经》的第一个版本,影响至巨至深,有力地推动了西藏印刷事业的发展,使前藏、后藏、阿里、康区、甘肃、青海、蒙古等地的木刻印刷和铁字铸造技术得以成长起来,并相继建立了印书院。《藏文大藏经》逐渐出现了多种版本:如万历版、里塘版(丽江—里塘版)、卓尼版、那塘版、德格版、北京版、库仑版、拉萨版、拉嘉版等。

藏人自古重视典籍的编目工作,吐蕃时期以来,先后有许多书目问世,主要有《丹噶目录》、《旁塘目录》、《钦浦目录》、《布敦目录》等。《丹噶目录》、《旁塘目录》、《钦浦目录》世称吐蕃时期三大目录,可惜后二者早已失传,仅有丹噶目录保存在藏文《丹珠尔》经杂部内。据日本芳村修基先生研究,此目录集成于 842 年,当时收入的译经书目即已有六七百种,共分为 37 个门类。

除佛教文献外,藏族的历史和文学作品也十分丰富。著名史书有《巴协》、《布敦佛教史》、《红史》、《青史》、《西藏王统记》、《贤者喜宴》、《西藏王臣史》、《五部遗教》等,还有敦煌的古藏文史料。《巴协》书中正文部分记述了赤德祖赞(704—755 年在位)和赤松德赞(742—797)父子两代的事迹。其中不少情节为作者亲身经历或增补者耳闻目睹,所记翔实可信,成为后世藏史学者写史的重要依据。敦煌石窟发现的吐蕃文献很多,多为手写卷子,其中受到学术界重视的有《吐蕃历史文书》,此书由 3 个主要卷子组成,文书中最重要的是《赞普传记》,为全书主体,收有赞普传记 10 篇,是研究吐蕃历史的重要文献。文书中的《吐蕃世系牒》为吐蕃王朝的编年史,是了解吐蕃历史最重要的文书之一。

传记文学类有《玛尔巴传》、《米拉日巴传》、《唐东杰布传》、《宗喀巴传》、《颇罗鼐传》等，其他文学名著有《青年达美的故事》、《尸语故事集》、《米拉日巴道歌》、《仓央嘉措情歌集》、《萨迦格言》等。民间说唱体史诗《格萨尔王传》是藏族人民在长期历史过程中集体创作的伟大英雄史诗，史诗以说唱为主要流传形式，先后出现了不少藏文和蒙古文的手抄本和木刻本。藏文本主要流传在广大藏区，此外土族、纳西族、裕固族等地区和国外的尼泊尔、不丹、拉达克等一些地区也有流传。蒙古文本在国内外也有多种流传。《格萨尔王传》篇幅巨大，部数尚无法肯定，有说几十部，有说百余部，为 11 世纪以来陆续创作而成，长达 1000 多万字，是世界上最长的英雄史诗。这部史诗受到国内外学者的广泛重视，国外有俄、德、英、法、日、印等文字的节译本。新中国建立后，我国对该史诗进行了搜集、整理、翻译、出版和研究工作。《格萨尔王传》已形成一种专门的学问。

过去，藏族群众中识字的人很少，教育中心在寺庙。辛亥革命以后，在西藏、西康和青海等地也曾办过学校，教学和传播藏文，但为数极少。只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新建了大批学校，藏文的教学和传播才与宗教脱离，由各级各类学校承担起来。藏语文是西藏各级各类学校的主课。目前，西藏已完成义务教育阶段 500 多种中小学教材的藏文编译。全国很多民族院校都开设了藏文系。

西藏和平解放五十年以来，人民政府对藏族文化的继承和保存做了大量的工作。国家出版了大批藏文出版物，现已有一大批积封多年、鲜为人知的珍稀藏文古籍、历史档案等得以重见天日。现在整理编目的藏文古籍已有 200 多种，每年有 10 多种出版。作为国家重点科研项目的《中国民间故事集成·西藏卷》、《中国民间谚语集成·西藏卷》、《中国民歌集成·西藏卷》、《中国戏曲集成·西藏卷》等志书早已完成。著名英雄史诗《格萨尔》被列为国家社会

༄༅། །སོ་རྒྱལ་གྱི་ཆ་རྐྱེན་དང་བསྟུན་ཏེ་ཏང་འཛུགས་
སྐྱོང་བྱེད་ཤུགས་ཆེ་རུ་བཏང་ནས་ཐོག་མཐའ་བར་
གསུམ་དུ་རྒྱལ་ཡོངས་མི་དམངས་ཀྱི་སྣེ་ཁྲིད་
དེ་ཐོན་སྐྱེད་ནུས་ཤུགས་གོང་དུ་སྤེལ་བར་
སྐུལ་འདེད་གཏོང་དགོས།

ཅང་ཙེ་མིན་གྱིས་ཀོང་ཏུང་དུ་ལས་ཀར་རྟོག་ཞིབ་གནང་སྐབས་ཀྱི་གསུང་བཤད།

ཀྲུང་གུང་ཀྲུང་དབྱང་གི་སྤྱི་ཁྱབ་རྫུའུ་ཅི་དང་རྒྱལ་ཁབ་ཀྱི་ཀྲུའུ་ཞི། ཀྲུང་དབྱང་དམག་ལྷུའི་ཀྲུའུ་ཞི་ཅང་ཙེ་མིན་གྱིས་ཀོང་ཏུང་ཞིང་ཆེན་གྱི་མའོ་མིང་ཁྲོང་ས་ཀའོ་ཀྲོའུ་གྲོང་ཁྱེར་གྱི་འགོ་ཁྲིད་ལས་བྱེད་པའི་“མཚོན་དོད་ཕྱེལ་གསུམ”གྱི་སློབ་གསོའི་གྲོས་ཚོགས་སུ་དངོས་ཞུགས་གནང་རྗེས་ཟླ2ཚེས21ཉིན་ནས་ཚེས25ཉིན་བར་ཀོང་ཏུང་དུ་ལས་ཀར་རྟོག་ཞིབ་གནང་ཞིང་། དུས་སྐབས་གསར་པར་ཏང་འཛུགས་སྐྱོང་བྱེད་ཤུགས་ཆེ་རུ་གཏོང་བ་དང་ལག་རྩལ་མཐོ་གསར་གྱི་ཐོན་ལས་འཕེལ་རྒྱས་གཏོང་བར་སྐུལ་འདེད་གཏོང་རྒྱུའི་དོན་འདི་གཉིས་ལ་དམིགས་ནས་བརྟག་དཔྱད་ཞིབ་འཇུག་གནང་ཡོད། ཁོང་གིས་ནན་བཤད་གནང་དོན་དུ། ཀྲུང་གོའི་དོན་དག་ལེགས་པར་བསྒྲུབ་རྒྱུའི་འགག་རྩ་ནི་རང་རེའི་ཏང་ལ་ཐུག་པ་དང་། ཏང་གི་བསམ་བློ་དང་། སྤྱོད་ཚུལ། རྩ་འཛུགས། སྒྲིག་ཁྲིམས་བཅས

藏文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科学重点研究项目，据不完全统计，到2001年，已出版史诗的藏文版62部，发行300万册，近日又推出了精选本。历经百年沧桑、几乎失传的《显密文库》，被誉为“藏族传统文化的百科全书”，经十六年发掘整理，终于出版，并获第五届国家图书奖。

外文出版社先后出版了大型的藏学图书目录——《中国藏学书目(1949—1991)》、《中国藏学书目续编(1992—1995)》和《中国藏学书目三编(1996—2000)》。书目的出版为藏学研究人员及关注

西藏问题的读者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和丰富的资料。中国藏学书目三编为16开本,汉、藏、英三种文字合排,有精装和平装两种版本。书内配彩色插图。为了便于检索,书后附有汉文、藏文、英文的书名、编著者索引共6种。三卷内容包括自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至2000年五十余年间,中国内地200多家出版社出版的藏学书目3169种。每种书皆列出书名、编著者、出版者、出版年、页码、开本、书号以及内容介绍。藏学已成为世界性显学。中国内地近几年平均每年出版藏学书籍达200余种,足见用功之深。

民族图书馆,在整理馆藏藏文古籍的基础上,将馆藏藏文典籍中的文集类子目编制成册,收录了180余家的文集,由四川民族出版社,从1984年开始,陆续出版《藏文典籍目录(文集类子目)》共3册。

藏文的电脑系统也已开始使用。为了推动藏语文的规范化、标准化和信息化处理,在国家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下,西藏自1994年开始进行"信息技术藏文编码字符集"国际标准的研制工作。以西藏大学网络中心主任尼玛扎西教授为首的课题组承担了研制任务。他们将藏文编码国家标准的制定与ISO国际标准的制定结合起来,历时四年,1997年,《信息交换用藏文编码字符集国际标准》在丹麦哥本哈根举行的多文种编码国际标准审定会议上获得通过。这是中国少数民族文字中第一个完成信息交换用编码的文种。

2001年9月12日,中国西藏信息中心藏文版正式开通,世界各地的网民只要键入 www.tibetinfor.com 就可看到藏文网页的信息。12月,具有藏、汉、英多功能的软件面市,西藏大学研制了藏文windows平台,它在中文windows的基础上,可同时处理藏、汉、英文信息,使藏文处理达到一个新水平,古老藏文进入了电脑时代。西北民族学院于洪志教授领导的藏文信息技术研究课题组,研制了世界上第一个藏文视窗平台和字处理软件,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藏文网

站，其成果获 2001 年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越来越多的藏族人民掌握了藏文，藏文被广泛应用，得到发展，成为藏族人民民族团结、经济建设和文化发展的重要工具。

本节参考文献：

1. 胡坦.藏文.常凤玄.藏族.见：中国大百科全书·民族卷.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
2. 瞿霭堂.藏文.见：中国少数民族文字.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1991
3. 张公瑾主编.民族古文献概览.北京：民族出版社，1997
4. 黄润华，史金波.少数民族古籍版本.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
5. 喜饶尼玛.藏族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展.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2001
6. 罗秉芬.藏文.见：中国民族古文字.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
7. 魏忠.2001 年少数民族文化发展概述.见：中国民族年鉴 2002，2003

第五章　新中国建立后新创的民族文字

中国共产党在民族问题上的总政策是民族平等团结政策，主张各民族都有使用和发展自己语言文字的自由，并以宪法形式规定下来。1954年9月20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3条明确规定："各民族都有使用和发展自己的语言文字的自由。"

本着这一思想，20世纪50年代，党和政府在民族语文工作上做了两件大事：一是开展少数民族语言大调查，一是帮助一些少数民族创制和改革文字。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使用和发展，直接影响到我国各民族的团结和边疆的巩固，关系到少数民族地区的现代化发展。以前，我国有许多少数民族没有自己的文字，或文字不完善，为了使他们能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尽快发展，帮助他们创制、改革文字成了新中国建立后面临的一项重要任务。几十年来，国家对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政策一直是"自愿自择，积极帮助"。

1954年，政务院批准了《关于帮助尚无文字的民族创立文字问题的报告》。1955年12月，在北京召开了首次"全国民族语言科学讨论会"，会上制定了创制和改革民族文字的全面规划。帮助少数民族创制和改革文字是一件有利于国家民族长远发展的千秋大业，同时也是一项细致的科学工作。有关部门采取了积极慎重的方针，很多语言学专家和大批的语言工作者为此付出了辛勤劳动。

1956年，中国科学院组织了700多人的7个语言调查工作队，分赴各民族地区普查语言。他们翻山越岭，深入村寨，记录了几十种语言上千份口语材料。工作人员艰苦调查、细致论证，取得了很好的成绩。

创制新文字的工作首先在少数民族人口最多的壮族中进行。到1958年8月，国家先后帮助壮、布依、苗、彝、侗、哈尼、傈僳、佤、黎、纳西共10个民族创制了14种文字（其中苗文4种、哈尼文2种），同时还为傣、拉祜、景颇等民族改革和改进了原有文字。1980年以来，又相继为土族、白族、瑶族、达斡尔族、独龙族、土家族、羌族创制了拉丁字母新文字。其中根据一些少数民族居住地域和方言的不同，还创制了一种以上的文字。有的文字还可供操同种语言的其他民族使用。

这本是有利于国家民族的好事，但由于20世纪60—70年代极"左"思潮尤其是"文化大革命"的干扰，20世纪50年代创制的各种文字一度中断推行和试验推行，给民族文字事业造成了极大损失。再加上其他方面的原因，如民族心理习惯、方言差别、文字本身存在的问题等，到目前为止，这些文字使用的范围都还有限。彝族后来改用了本民族固有的文字。黎族因方言分歧放弃了黎文。西双版纳傣文又恢复使用老文字。国家还曾帮助维吾尔族和哈萨克族于1965年进行文字改革，用拉丁字母形式的新文字替代阿拉伯字母形式的老文字，1982年，维吾尔、哈萨克按照本民族的意愿，又改用原有文字。

民族文字的发展受一个民族多方面情况的影响，它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出现一些困难和反复毫不奇怪。无论如何，文字对于一个民族的发展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少数民族群众有了自己的文字，就可以接受文化教育，通过知识改变落后面貌，与外界进行交流，提高经济文化水平，融入祖国现代化建设的队伍中。新中国建立后，党和政府帮助少数民族创制文字，从而有力地推动了这一进

程。

另外，还值得一提的是，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一些西方传教士深入到我国西南的边远地区传教。他们先学会汉语，再学习当地民族的语言，然后购买土地，建立教堂，传播教义。有的还建医院，办学校，发救济，从物质利益上吸引少数民族人民信教。在他们学会了民族语言，而且有了一批教徒以后，为了更好地传播教义，他们就开始琢磨为当地的民族语言创造文字，并且说干就干，很快用这种文字翻译出圣经、赞美诗等宗教书籍，并铅印出版，发给教徒学习。

那时在我国云南、贵州，由传教士主持，创制了多种文字。例如：

1887 年，外国传教士在缅甸创制过一种载瓦文。从 1934 年起，法国传教士威廉(Wiliam)等人，就在我国德宏州潞西县东山区传播过这种文字，至今还有少数人在使用它。

1890 年，美国牧师欧拉·汉森博士(Doctor Ola Hanson)到云南景颇族地区传教，给景颇族创制了拉丁字母景颇文。缅甸的景颇族也使用这种文字。

1904 年，英国传教士柏格理·波拉(Samuel Pollard)到贵州省威宁县(今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石门坎苗族地区传教。他学会石门坎苗语以后，与苗族教徒杨稚各、汉族教徒李斯提反等，在 1905 年创制了波拉字母苗文，也叫柏格理苗文。

1913 年，英国教士王慧仁为云南武定、禄劝的傈僳族创制了波拉字母傈僳文。

1930 年，英国传教士永文森(M.Vincent Young)父子以安康、岩帅一带的佤语为基础，为云南的佤族创制了拉丁字母佤文。

1912—1914 年，缅甸克伦族基督教传教士巴托以印刷体大写的拉丁字母为基础创制了傈僳文。后来，英国传教士傅雷塞(J.O. Fraser)进一步完善了这种文字。

1920年以后,澳大利亚传教士胡致中(Maurice H Hutton)与苗族教徒潘世英等,在贵州凯里市旁海创制了注音字母苗文。

传教士创造文字,主要是为了传教。有的由于教徒不多,文字并没有推广,如旁海的苗文。有的则突破宗教范围,进入群众的日常生活中,如景颇文和波拉字母苗文,新中国建立后,经过改进,景颇文已成为正式文字,波拉苗文也还有一些人在使用。

参考文献:

1. 道布、谭克让.导言.见:中国少数民族文字.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1992
2. 戴庆厦等.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1999
3. 陈其光.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字.见:中国文化杂说·民族文化卷.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1997
4. 郝时远主编.中国少数民族分布图集.北京:中国地图出版社,2002

第一节 土 文

土族人口有241198人(2000),77%以上的土族聚居于青海的互助土族自治县、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以及同仁县、乐都县等地,还有部分居住于甘肃天祝藏族自治县、永登县境内。土族自称"蒙古尔"、"察汗蒙古尔"等,藏族称土族为"霍尔",蒙古族称土族为"察汗蒙古尔",周围的汉、回族称土族为"土民"、"土人"。新中国建立后,经民族识别并依据本民族的共同意愿统称为土族。

土族族源目前学术界尚无定论，有几种推断性的说法：一是鲜卑支系吐谷浑人后裔；一是沙陀突厥后裔；一是蒙古族后裔。此外还有其他一些说法，如源于阴山白鞑靼、源于元代蒙古驻军与霍尔人融合等。从明朝到1931年，土族聚居区都实行土司制度。土族主要从事畜牧业和农业，尤其善于养羊，农作物主要有小麦、青稞、土豆等。土族原信奉多神教，也有一些人信道教，元明以后普遍信仰藏传佛教。

土语属阿尔泰语系蒙古语族，分互助、民和、同仁三大方言区。基本词汇和蒙古语相同或接近，语言借用汉藏词汇较多。无文字，过去借用汉文和藏文。1979年制订了以汉语拼音字母为基础的《土文方案》，现正在试用和推行。

土文是我国土族使用的拉丁字母形式的拼音文字。1979年创制后，《土文方案》经互助土族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通过，呈报青海省人民政府审批。1981年，青海省人民政府发出104号文件，决定把土族文字方案“作为试验方案，先在互助土族自治县慎重推行”。按照这一指示，互助土族自治县人民政府有计划地开展了大量工作，包括培训骨干、扫盲；用土文记录口头文学，进行文艺创作；编辑发行土文教材、一般读物、工具书；译制电影，开办广播等。

土族文字经六年多的试验推行，1986年7月，在互助土族自治县召开了土族语文工作座谈会，会议写出了《互助土族自治县土族语文工作座谈会纪要》上报省政府。青海省人民政府办公厅于1986年10月17日发出“青政办(1986)234号”文件。文件指出：“自1981年《土文方案》作为试验方案在互助县土族聚居地区试行至今……已取得了一定的效果，受到土族群众的欢迎。目前土文方案的试行工作已基本完成，可在土族群众中逐步推广。……组织协调工作由省民委牵头，各有关单位积极配合，共同做好土文的推行工作。”这项工作目前正在进行中。

《土文方案》采用了全部26个拉丁字母，与汉语拼音方案一

yamba ban dire surghaasannu ujesa, niudur malang kujaa menhen haliu kun. mongghul pujignaa mudena. Mongghul pujiglanaa aargu shge gunsandangnaa, lamanqan saihan diinaa, kun tiruudunu jargal aadalnaa juuriji shdorlajin kun qoon gui; Darong yaahange kun ang udaa aghadiu szarbatennu pujignii ni mongghulqilegu lisgenu nzhurlawa; shgengii tundaasge mongghul pujigla ulon kun dunda waijin dau xulig, hughui hughuilangnu pujigdu baulghaji tiruulewa. Dundog mange julaaji, tagxi nagxi qimee gisnen mange yaulghajin kunda niguudursa niguudur ulondiwa. Mongghul pujig ulon kunnu jirgere nanaarlaji, qijiglen alima baugunu guledalda gui.

Dodu ni, mongghul pujignu isgenee surghaaji surildugu juurewa. Ne 《Mongghul Qidar Merlong》 nu mu nudu muxigu ne saihan waidalnu ujeji shge rgusaa waina giji njaglalghawa. Buda mongghul kun mongghul pujignaa surigu dire juure mange urolghagunsa tagxindaa, mongghul pujignaa waraanu qidar pujig surijin tundaanguladu darong tasraaji loolugu sawaanu juure uro shdam.

Nenge merlongnu Likeyu（李克郁）tundaa nige menhen shzin jong jiran naiman fonsa nagxindaa, HMNDX lisgelasannu uyedu shdur ulon fondu ni huraaji daglasanna. Huinoxi szarbatennu deedu surghaaldu ireenu jalghaaji ne lisgenaa warija. Hu-

土文　《土汉词典》前言

致。这种一致性，对于利用汉语拼音方案的一切现成成果，对于土族和汉族互相学习语言文字创造了极为便利的条件。这种便利条件的客观基础就是土语和汉语的语音绝大多数相同或相近。

土文正字法的基本原则是语音原则，即口语怎么说就怎么写。在词干接附加成分或与某些助词结合出现的一些连音变化时则按

形态学原理处理,以保护它们各自的语音原貌。个别情况下,为照顾其他地区,也有按历史上的语音形式书写的。土文对元音辅音的拼写做了详细规定。土文书写单位是词,有单音节和多音节词,音节的划分也有相应的规定。附加成分的连写也有具体要求。

在当地政府的努力下,对土族文字的推广做了大量工作。如举办土文师资培训班,开展农村扫盲,在小学教授土文,译制多部土语影片,举办土语广播节目,编辑教科书、通俗读物和创办刊物等。土文诞生时间虽然不长,但充分表现出了强大的生命力,它受到土族人民的热烈欢迎,使用范围不断扩大。

本节参考文献:

1. 中国大百科全书·语言文字卷.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8
2. 照那斯图.土文.见:中国少数民族文字.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1992

第二节　侗　文

侗族人口有 2960293 人(2000),主要分布在贵州、湖南、广西的毗连地区。古代汉文献中有不少关于"洞人"、"峒人"、"洞蛮"的记载,后来"洞"、"峒"就演变成侗族的专称。侗族来源于秦汉时期的"骆越",是百越中的一支。据汉文史籍载,侗族秦时称为"黔中蛮",汉代称为"武陵蛮"或"五溪蛮"。魏晋以后,这些部落被泛称为"僚"、"僚浒"或"乌浒"等,侗族即"僚"的一部分。宋时有"仡伶"、"仡佬"等称。明代有"峒人"、"峒蛮"之称,这是侗族开始形成为单一稳定的民族共同体的时候。清代侗族被称为"洞苗"、"洞民"、"洞家"等,有时也被泛称为"苗"。

侗语属汉藏语系壮侗语族侗水语支,分南北两个方言,其下又各分3个土语区,南、北方言间基本可以通话。侗语的标准音以贵州榕江话为代表,因声调多、词汇丰富,素有“富于音乐性的语言”之誉。侗语吸收了很多汉语成分,人民也多通汉语。侗族原无本民族文字,侗文是新中国建立后创制的拉丁字母形式的文字。

新中国建立前,侗族一直没有与自己语言相适应的文字,只有一些受过教育的人能够使用汉文。早在宋代,侗族地区就创办过学舍,培养通晓汉文的知识分子。但汉文毕竟与自己的民族语言有差别,随着懂汉文的人不断增多,在民间出现了直接使用汉文记录侗语的做法,这一做法叫做“汉字记侗音”。这种办法逐渐为民间所接受,使用这种办法产生了很多侗族的古代文献,包括“歌册”、“历书”、“农本”、“药书”、“家谱”等,这些文献统称为“侗书”。这些侗书反复传抄,很多本子已有相当长久的历史。由于这样做并不能准确地表达侗族语言,文字用法又难以统一规范,所以最终没有发展成正式的民族文字。

“汉字记侗音”毕竟是一种创造,它反映了侗族人民渴望使用文字的迫切需要,同时对侗族文化和社会的发展也起到了桥梁的作用。清代嘉庆年间(1796—1820)的吴文彩就是这方面一个有代表性的知识分子。他是贵州黎平腊洞人,有较高程度的汉文化,人称“侗家秀才”。他为开创侗戏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被尊为“侗戏祖师”。侗族文学史上第一个侗戏剧目《梅良玉》,就是吴文彩用汉字记侗音的方法创作记录下来的。侗戏从诞生至今的一百多年中,大部分剧目都是用汉字记侗音的办法编写的,积累了相当多的优秀剧本。

“汉字记侗音”在侗族民间权充文字使用,在汉文古籍上也有以此直接引用侗语的。最早见于《宋史·西南溪洞诸蛮》和陆游的《老学庵笔记》,再有明邝露《赤雅》、地方志如《庆远府志》和《龙胜厅志》等。这些典籍上的记录虽是一鳞片爪,却为侗族历史的研究

留下了珍贵资料。目前发现的年代较早的侗文文献大都是明末清初的文献，主要有明万历三年(1575)《绥宁县志》载的《尝民册示》、明末的《东书少鬼》、清乾隆五年(1740)的抄本《古款本》等。此外还有些侗歌、农书等，如《侗族通书》、《侗族款歌》等。

新中国建立后，汉字记侗音运用得更为广泛，地方报刊用它来进行宣传，甚至还正式出版了汉字记侗音的书籍。1958年"大跃进"时，人们在这方面更是有一些作为。1958年8月，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贵州省文联编写的《侗族大歌》，全书50余首大歌的歌词都用汉字记侗音完成。同样的还有贵州人民出版社1960年5月出版的《侗族民歌》等。

在借用汉字记录侗歌时，一般有以下三种形式：(1)借用汉字的音来表示侗语的意思。例如用汉字"高锦"表示侗语"山头"之意；用汉字"消"表示侗语"你们"之意。(2)借用汉字的义，在该字旁边加一些符号，表示要按侗语的音来读。如在"风"字下面加x或·，则读"勒母"，为"风"；在"挑"字下面加x或·，读"塔普"，为"挑担"之意。(3)利用类似汉字反切的方法来记录侗语。一般是用两个汉字记录一个音节，头一个字取声，后一个字取韵。如用汉字"尼亚"记录侗语"你"。也有前字取声和韵腹，后字取韵尾的。也有用三个汉字来记录侗语一个音节的，前字取声，中字取韵腹，后字取韵尾。如用"其阿姆"来记录"走"等。

这种办法虽然在记录、保存和传播侗族口头文学方面起过一些作用，但它既不能准确表达侗语，又不便使用。没有统一规范，一个人一个记法，常常是同一人所记也不一致，有同一汉字记不同侗音，也有同一侗音使用不同汉字，往往是自己记自己认，别人很难认清，只能做个人备忘工具，不可能成为侗族的通用文字。

1956年，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中央民族学院、中南民族学院和贵州民族学院四个单位组成侗语工作组，负责侗语普查和侗文的方案设计等工作。工作组在湘桂黔三省区14个侗族聚居的

县份进行了广泛深入的调查，把侗语划分为南、北两个方言，每个方言下又各分3个土语，并设计了侗文方案。

1957年9月和1958年8月，贵州省民族语文指导委员会邀请湘桂黔三省区侗族代表在贵阳先后召开了《侗族语言文字科学讨论会》预备会议和正式会议。会议讨论并通过了《侗文方案》（草案）。侗文方案以南部方言为基础方言，以贵州省榕江县车江乡章鲁寨侗话的语音为标准音。侗文方案完全采用拉丁字母，与汉语普通话相同或相近的音都用汉语拼音方案里相当的字母表示。字母表的排列与汉语拼音方案相同。侗文共有声母32个，韵母64个，声调9个。

Leec gaeml nyaengc lail nyenc gaeml eiv,
Jeml jingl yogc yuih weenh luh map;
Xul liunc mungl wap daengc nyal yak,
Huc guangx guiv xul bail mungl wap;
Bux daengv siih leec eeus nyih siit,
Lagx xoc leec gaeml weex sil fap;
Nyonc nyux gaeml lail lis leec nyenh,
Singc dangx yuv nyenh weenh nyinc nal.

侗文真好侗家爱，
喜得金鸡万里来；
杜鹃花开江红遍，
湘黔桂境石花开；
父辈创字教子孙，
后代学习建四化；
侗家历史有字写，
党的恩情传万代。

侗文　诗歌

1958年10月，《侗文方案》（草案）经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批准

试验推行。当时曾在侗文标准音点——榕江县车江乡开办侗文师资培训班和晚间侗文学习班，取得较好效果。当时还编写出版了侗文课本以及《侗汉词典》和《汉侗词典》等工具书。侗文的试验教学受到当地侗族群众和干部的热烈欢迎和支持，大家学习的积极性十分高涨。然而，20 世纪 60 年代初，由于极"左"思潮干扰，侗文被迫停止试验推行。直到 80 年代初，这一工作才逐渐恢复起来。

近年来，对侗族文化遗产的整理发掘受到各方的重视。为了整理和保存少数民族古籍，继承各民族宝贵的文化遗产，研究人员做了大量工作。1988 年 10 月，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侗族史诗——起源之歌》。这是一部使用"汉字记侗音"保存下来的侗族史诗，经杨权、郑国桥先生根据原本整理译注，由原来的"汉字记侗音"，标出侗文，再用汉文直译和意译组合出版，使史诗成为四对照的、有汉文注释和提示的科学版本。

侗族史诗《起源之歌》的内容十分丰富，它是侗族民间流传最广、历史最久、篇幅最大、内容最宏富的史诗，包括《开天辟地》、《侗族祖公》和《款》三大部分。这部史诗对侗族先民远古时代生产、思想的发展，侗族和周边民族的关系史研究都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新中国建立后侗文的创制、使用，对侗书的进一步发掘整理会产生有力的推动作用，侗族文化的发展将揭开崭新的一页。

本节参考文献：

1. 中国大百科全书·语言文字卷. 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8
2. 张均如. 侗文. 见：中国少数民族文字. 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1992
3. 杨权、郑国乔整理、译注. 侗族史诗. 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8
4. 王锋. 从汉字到汉字系文字. 北京：民族出版社，2003

第三节　哈尼文

我国的哈尼族有1439673人(2000),主要分布在云南的元江和澜沧江之间,现大部分聚居于云南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思茅地区、玉溪市、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等地。哈尼族在汉文史籍中有"和夷"、"和蛮"、"和泥"等多种历史名称,哈尼族内部也有"卡多"、"雅尼"、"碧约"等6个主要自称。新中国建立后,根据本民族的意愿,统称为哈尼族。

哈尼族源于古代南迁的氐羌人的一支。7世纪时,已居住于今哀牢山、无量山一带,南诏时,傣族先民"白夷"北据今景东、景谷一带,促使哈尼族先民逐渐向东南集中,其分布区与今天哈尼族聚居区大体相同。哈尼族人民长期生活在这里,他们开辟梯田、种植茶林,为开发祖国边疆进行了辛勤劳动。哈尼族人民在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中也同样作出了巨大贡献,进行过1853年、1917年的农民起义和1925年、1935年的抗法斗争。哈尼族的传统节日主要有十月节(新年)和六月节,此外与汉族一样,也过春节、中秋节等。

哈尼族的语言属于汉藏语系藏缅语族彝语支,与彝语、傈僳语、拉祜语、纳西语比较接近。哈尼语分为哈雅、碧卡、豪白三种方言,哈雅方言下又分哈尼次方言和雅尼次方言。哈尼族过去没有文字,文化十分落后,有些地方曾刻木结绳记事。过去在云南思茅墨江的部分哈尼族地区,曾流传一种汉字型哈尼文,叫"老哈尼文",记录的是豪白方言,主要方法是假借汉字,曾留下一些手抄本的经书、民歌。新中国建立后,哈尼人的情况引起了党和国家的重视,在1957年为哈尼族创制了以拉丁字母为基础的拼音文字。

过去,哈尼语鲜为人知,直到20世纪40年代末,也只有一两

位语言学家对哈尼语进行过一些调查。新中国成立后,50 年代初,结合民族识别工作,开始了比较广泛的哈尼语调查研究。1956 年,围绕着解决民族文字问题的中心任务,中国科学院少数民族语言调查第三工作队和云南省民族事务委员会语言研究室哈尼语组普查了哈尼语,并于 1957 年在云南省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科学讨论会上提出了《关于划分哈尼语方言和创制哈尼文的意见》的报告。报告将哈尼语分为三个方言,指出由于地区阻隔,三个方言差别很大,不同方言之间的人不能相互通话。如哈雅方言和碧卡方言差别最大,这两个方言的同源词不到一半,即使是同源词,读音也不同,读音全同的只占少数,两个方言的语音差别也很大。根据这种情况,决定为哈尼族创建两种文字,即一种哈雅方言的文字,一种碧卡方言的文字。豪白方言比较接近哈雅方言,操这种方言的人可以学习哈雅方言文字;从人民联系看,豪白人跟碧约人关系密切,也可学习碧卡方言文字。豪白方言的人民可以自行选择学习何种文字。

哈雅方言文字选择哈尼次方言为基础方言。因为它在本方言中人口最多,而且有较大的聚居区,作哈雅方言文字的基础方言最为合适。但哈尼次方言内部有不同土语,所以还要在这个基础方言内部选择一个地点的语音作文字的标准音。哈尼族有这样的特点:人口众多,分布广,多居住在高山或半山上,没有自己的城市,也没有形成民族共同语,方言十分活跃。研究人员经分析发现,要从中找出一个地点的语音作为标准音,这是不可能的。只能从实际出发,把语言的普遍性作为选择标准音的主要根据,同时兼顾其他方面的情况。经过比较研究,在 1957 年,以绿春县大寨哈尼话的语音为标准音设计了哈雅方言文字方案(草案),以墨江县菜园碧约话的语音为标准音设计了碧卡方言文字方案(草案),并得到了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的批准。但后者因故没有试验推行。

我们现在所说的哈尼文,实际上是指《哈雅方言文字方案》(草

案)推行的文字。哈尼文采用26个拉丁字母,有26个基本声母,9个单元音韵母。此外还有借词复合韵母。紧音字母、声调字母等。1958年方案,从当年起至1983年试验推行。十年动乱期间,哈尼文实施的工作受到巨大干扰,一度中断。现行方案是在1958年方案的基础上对声母字母作了部分调整,于1984年开始使用的。

Huvqlavq Puvli Lo'qo Da E Miqnieiq
Aol Meeq Haltaq Liq Ssaqlaol Yaol
Seqto Alnei Zeiq Ssol Zal Aoldav

——Jal Ceiqmiq Guadaol milcaq gaolzoq
kaocaq e taq eil laq e doqsi yoma

Zaolgaof zaolyal zaosuljiif,Goqjal zuxiq,zaolyal jyulhhyu zuxiq Jal Ceiqmiq,Guadaol Maofmiq Gaolzel Siif yosaol dama saoqgee gee e"sal ja"(xoqxiq gee,zeifziif gee,zeifqif gee) jaofyeq doqzil duv naolhao,2000 huvq 2 la 21 nao nei 25 nao hevnei Guadaol milhaoq salhu,huvqlavq puvli lo'qo da e miaoqnieiq aol meeq ssolnei lavqqivq qivqmiaoq bi davli e doqheiq xil niq heiq lo'qo miaoqhu galquv ceil. Aqyoq gee'loq hultav

哈尼文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哈尼文于1958年开始在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试行。此间,云南省民族语文指导工作委员会和云南省民族出版社编写出版了哈尼文课本和读物。中央民族学院和云南省民族学院先后开办了哈尼文专业班,培养哈尼语文工作干部。有关部门编译出版了全

日制小学的哈尼语文、数学课本,还编有扫盲课本、《汉哈尼语词典》、《哈尼语谚语》、《生产生活知识》等各种出版物。经验表明,在不通汉语的哈尼村寨教学哈尼文效果良好。学生不仅很快学会哈尼文,还为进一步学习汉语提供了条件。作为一个工具,哈尼文在编译广播、译制影片、收集整理民间文学、演出文艺节目等方面都发挥了良好的作用。利用哈尼文整理出版的史诗《哈尼阿培聪坡坡》受到人们的关注。这一文字方案本身当然也还要在使用过程中逐步完善。20世纪90年代初,专家又对《哈尼文方案》进行了修改,使这一文字进一步臻于完善。

对于创制哈尼文的艰苦过程,中央民族大学的教授戴庆厦先生在2002年写出了长篇回忆文章——《悠悠岁月,哈尼情深》。文中记载了如下情况:1956年6月,戴先生大学一毕业,即参加了中国科学院少数民族语言调查队第三工作队,奔赴云南进行哈尼文的创制、试行工作以及参加了哈尼语方言调查的全过程,一去就是四年。当时他们和云南省民委的同志共同组成哈尼语组,在创制哈尼文过程中做了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如在准备工作中,进行了哈尼语方言、土语的普查。在哈尼文方案的设计过程中,要进行基础方言和标准音的选定、字母形式的确定、对文字方案的试行等。还谈到所取得的成绩和受到的"左"倾思潮的干扰,如他们抓紧时间赶编了一本《哈汉对照小词汇》,对扫盲起了一定作用,不但没有分文稿酬,还成了知识分子走白专道路的罪证。但他们的工作是有利于哈尼人民的,所以还是受到了各级领导和群众的大力支持。他们也在工作中与哈尼人民建立了难忘的鱼水深情。

本节参考文献:

1. 李永燧.哈尼文.见:中国少数民族文字.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1992

2. 戴庆厦.悠悠岁月,哈尼情深.见:中国哈尼学,第二辑.北京:民族出版社,2002

第四节　布依文

布依族人口有2971460人(2000),其中94%以上分布在贵州,主要居住在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安顺市和贵阳市。贵州其他各地及云南、广西、四川个别地区也有分布。布依族源于古代的"濮越"人。汉以后,"濮"、"越"等名称逐渐被"俚"、"僚"所取代。唐代则称"谢蛮"、"都匀蛮"、"白水蛮"。宋元以后称"七蕃"、"八蕃","蕃"是当时对封建领地的称呼,"蕃主"即封建领主。元代布依族称"仲家"。明清时期称"仲家"、"仲苗"、"青仲"、"仲蛮"、"布和"等。清末民初布依族也被称为"夷家"、"夷族"等。一般认为布依族是古代"百越"中的一支,与壮族同源。古代越人的风俗习惯,一些还保留在布依族中。有人认为西汉时的"夜郎"国与今日的布依族有渊源关系。布依族大多居住在依山傍水之处,故有"水乡布依"的美称。

布依语属汉藏语系壮侗语族壮傣语支,与壮语、傣语、侗语、水语、黎语等有着历史的渊源关系。布依语内部没有方言之分,它在发展过程中形成3个土语区,各土语区之间基本可以通话。布依族过去没有文字,主要使用汉文。1956年创制了以拉丁字母为基础的文字方案,这套文字目前正在试行阶段。

布依族过去以汉文作为书面交际工具。在使用汉文过程中,曾有人利用汉字并借鉴汉字的结构特点造字,来记录本民族的语言。这些办法大致有以下几种:(1)借音。借用汉字读音表示布依语的词。如用汉字"打"表示布依语的"河",用汉字"更"表示布依

语的“吃”，用“蛮”表示“村子”等。(2)训读。借汉字的义改读布依语词的音。如“儿”、“三”、“要”等，用布依语发音，使用的都是汉字的本义。(3)形声。借汉字的形旁和声旁，用形旁表示布依语词的义类，用声旁标记布依语词的音。(4)会意。把两个汉字合在一起表示一个新义，读音按布依语。这些办法虽然在记录和表示布依族语言方面起过一些作用，但由于没有形成规范，字形用法因人而异，所以没能在布依族中通行。

对于布依语的情况，早在1950年，中央人民政府组织的中央访问团赴西南少数民族地区访问时，就对布依语做过局部调查。1952至1953年间，中科院语言研究所曾派工作组对布依语进行重点调查。1956年，中科院少数民族语言调查第一工作队在上述基础上，又对布依语进行了全面系统的调查。认为布依语内部基本一致，只需创制一种文字。同时又把布依语和壮语进行了比较研究，认为二者十分接近，语音对应整齐，语法结构基本一致，两族人民居住地区又相连。1956年11月，在贵阳召开的布依族语言文字问题科学讨论会上作出决议：“为了便于布依族和壮族人民之间经济、文化、科学事业之间的交往和联系，会议决定布依文和壮文采取文字联盟的方针。”并通过了以拉丁字母为基础的《布依文方案》(草案)。

布壮文字联盟的方针是：布依文和壮文字母形式一致。布依语和壮语同源的词，采取和壮文一致的书写形式，但读音不强求一致。布依语里特有的词和现代汉语借词，用布依文读音参考点惠水县羊场(现属龙里县)话的读音拼写。

《布依文方案》(草案)于1957年2月经国家民委批准试验推行。贵州省各级政府十分重视，开班办学，编辑出版各种课本、词典等。但在“左”倾思潮干扰下，1959年中止了该文字的试验推行工作。1981年，贵州省民委和省民族研究所联合召开会议，讨论修改《布依文方案》(草案)，拟订了《布依文方案修改草案》，并于

dosramx[-zam^{31}]　小水潭

dosxingz[-ɕiŋ^{11}]　地壳蜂<方>做窝在地里的马蜂

douj

doujcey[tɔu^{53}tshɛ^{33}]　斗车

douq

Douq[tɔu^{24}]　窦姓

douqbanqjiangq[-paːn^{24}tɕiːŋ^{24}]　豆瓣酱

douqjiangy[-tɕiːŋ^{33}]　豆浆

douqzeny[-tsɯn^{33}]　斗争

douqziq[-tsɿ^{24}]　1. 斗志　2. 斗智

douy

douyfungyrejhoq[tɔu^{33}fuŋ^{33}zɛ^{53}xɔ^{24}]　兜风惹祸

douyqianyzij[-tɕhiːn^{33}tsɿ^{53}]　兜圈子

dox

dox^{1}[tɔ^{31}]　驮<[illegible]>：～ haux bail gaail 驮米去卖

dox^{2}[tɔ^{31}]　围嘴儿、围兜<方>

dox^{3}　桩子 义 sanc ～：yungh soongl sanc ～ geeb gol waljacngonz 用两根桩子夹住向日葵树

dox^{4}　脓根：aul ～ os sael, bais lungc ndil. 把脓根清除干净，疮才会好。

dox^{5}　[daih ～]

doxnaaiz[-naːi^{11}]　围嘴儿

doy

doycijyifjij[tɔ^{33}tshɿ^{53}ji^{31}tɕi^{53}]　多此一举

doymianqsouj[-miːn^{24}sɔu^{53}]　多面手

doyyif[-ji^{31}]　多余

doz

doz^{1}[to^{11}]　缠：Ndaangl mizsaaih, laaih faangz ～; mol mizsaaih, laaih gais nees. 身体不好赖鬼缠，巫术不灵赖鸡小。（意：埋怨客观条件）

doz^{2}　惹；引起：D ～ ndanlsaml rauz ruangh, D ～ ndanldungx rauz ruangh. 引起我们心里挂念。

doz^{3}　见[bil ～]、[bux ～]、[log ～]、[raanz ～]

duab

duab　见[maauh ～]

duadt

duabt[tuːp^{35}]　踏：jic ～ masgaaml

布依文　《布依汉词典》

1982年春在全省布依族聚居区试验推行。经一段时间实践，1985年3月，贵州省民委再次召开会议，针对《修改草案》存在的一些不足之处，再次进行修改，拟订出《布依文方案》(修订案)。目前推行的就是这个修订案。

《布依文方案》(修订案)是以布依语第一(黔南)土语为基础，

以规范的望谟县复兴镇布依话为标准音，采用全部拉丁字母设计的。修订案有26个字母，依国际惯例排列。字母读音，元音读本音，辅音一律在字母后加元音a。布依文有32个声母，87个韵母，8个声调，还有现代汉语借词的4个声调。布依语的每一个音节都由声母、韵母、声调三个部分组成。

自1982年恢复试验推行布依文以来，群众反映很好，认为布依文好学、好记，便于掌握。农村青年人的学习积极性很高。

本节参考文献：

喻翠容.布依文.见：中国少数民族文字，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1992

第五节　佤　文

佤族人口有396610人(2000)，主要居住在云南西南部的西盟和沧源两个佤族自治县，另外在孟连、澜沧、双江、耿马、镇康、永德等县也有分布。佤族自称各地有些区别，一般居住在西盟、孟连的称为“阿佤”，居住在沧源、澜沧、耿马、双江的称“巴饶克”，居住在镇康、永德的称“佤”。其他民族的人称镇康、永德的佤族为“本人”(意为土著居民)或“拉”，称其他地区的佤族为“卡佤”。“卡”为傣语“奴隶”之意，有贬辱的意思。新中国建立后统一族称，正式命名为佤族。

佤族先民在周秦时期是“百濮”的一支。佤族内部在历史上没有统一的族称。唐代称“濮子蛮”，宋代称“濮蛮”，明代称“古刺”和“哈刺”，清代称“嘎刺”、“哈瓦”、“卡佤”。新中国建立初期曾用过“佧佤”的族称。佤族居住的阿佤山区物资丰富，土地肥沃，气候温

和，主要种植玉米、水稻、小米和豆类。佤族居民多用竹筒煮饭，喜欢“米肉共食”的烂饭，有鸡肉烂饭、牛肉烂饭、猪肉烂饭等，吃饭时由主妇均分，一次分完。另外还喜嚼槟榔、饮酒。本民族传统节日有春节、新米节、火把节等。

佤语属南亚语系高棉语族佤崩龙语支，分巴饶克、佤、阿佤 3 种方言。佤语与德昂语、布朗语相近，反映了他们在族源上的密切关系。佤族本来没有文字，过去主要以刻木结绳记事，或用实物传递消息。

20 世纪 30 年代，英国传教士永文森（M. Vincent Young）到我国西南少数民族地区传播基督教时，曾以澜沧、沧源两县之间的安康、岩帅一带的佤语为基础，设计了一套拉丁字母形式的拼音文字，当地群众称之为“撒喇文”（撒喇为佤语“牧师”之意）。永文森等人使用这种文字翻译出版了《圣经》、《经文问答》、《赞美诗》等书，这些书发行量很小。由于他们没有对佤语进行全面调查，只是以少数人的发音为依据，因此不能准确拼写佤语，文字显得十分粗糙。撒喇文虽然已经使用了有几十年的历史，但一直没有定型。除了阿佤山部分信教的群众用来传教和写信外，没有被广泛使用，影响很小。

1956 年，根据党的民族政策和佤族人民的需要，中国科学院少数民族语言调查组第三工作队和云南省少数民族语文指导工作委员会，对佤语进行了普查，摸清了佤语方言土语的分布情况，并作了科学的分析，编写了《卡瓦语言情况和文字问题》的报告。在广泛听取佤族各阶层代表的意见后，确定了以政治、经济、文化较为发达，语言代表性较大，人口较多的巴饶克方言为基础方言，以在广大佤族群众中享有威信的沧源县岩帅佤话为标准音。在此基础上，于 1957 年初，拟订了《卡瓦文字方案》（草案），创制了以拉丁字母为基础形式的拼音文字。后经国家民委批准使用至今。

这个草案最初借用了 3 个国际音标、两个俄文字母表示语音。

Mgiex tiaox jīan nbēen njū kraox dom
si ndaing nbāox nīad dix jīan
sex dāng dom joung vīex gon būi hun
quan gox yūh gāing rīang haog huan

Loux grāi jīang jex ming yām see
qax dix gāing nqo gah guang dōung

Jōung gōung jōung yāng jōung sū jī、gox jīa jū six、jōung yāng jūing voui jū six jīang jex ming, kaix hoig qux six noh hui yi si ndiex mgāe "loui mu grāi" kai ling dāo bāng zi guang dōung mao ming see, kix 2 ngāix 21 houig ngāix 25, noh kaox qax gāing nqo gah guang dōung, noh mgāig gah sang jīa qiang eix grax jīan sex dāng dix yūh gah mox mai gah sang gīeh gāo sing jī sū qang yiex haog huan yūh

佤文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1958年,根据广大群众的意见和国务院"关于少数民族文字方案中设计字母的几项原则"指示精神,对草案进行了修改,去掉了几个国际音标和俄文字母,完全采用26个拉丁字母,并尽可能采用相同的字母形式表达佤语和汉语相同或相近的语音,以利于各民族之间的相互交流。

佤文的26个字母,除了O、Y、X三个字母所表示的语音与汉语拼音方案不一致外,其余23个字母与汉语拼音方案基本一致。佤语的声、韵母比汉语多,有些声、韵母采用双字母或三字母表示。另外在音节的第一个元音字母上,用"—"表示松元音。佤文按音

节分写，不连写。

现在出版有《佤文读本》、《佤汉词典》、《汉佤词典》和其他各种政治读物、文史类读物、工具书、教学课本、科普读物等。

本节参考文献：

1. 周植志. 佤文. 见：中国少数民族文字. 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1992
2. 中国大百科全书·民族卷. 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

第六节　壮文（方块壮字、拼音壮文）

壮族是我国人口最多的一个少数民族，据2000年统计，有16178811人，主要分布在广西壮族自治区，云南、广东、贵州、湖南的一些州县也有分布。壮族的聚居区基本连成一片。壮族的自称，各地不同，主要有"布爽"、"布依"、"布土"、"布梓"、"布斑"、"布越"、"布那"、"布壮"、"布曼"等20余种。"布"即是"人"之意。在新中国建立初时壮族通称僮族。1965年，经国务院批准，将"僮"改为"壮"。

壮族是我国岭南的土著民族。几万年以前，其先民就生活在我国南方，是先秦时期百越的一支。它与周秦时期的西瓯、骆越，汉唐时的僚、俚、乌浒，宋以后的僮人、俍人、土人等有密切的渊源关系。壮族地区大山绵延，丘陵广布，江河纵横。左江、右江、邕江、红水河、柳江、郁江等大河在壮乡大地川流不息，奔腾于山谷之间的红水河流量是黄河的3倍，蕴藏着巨大的水能资源。那里气候温和、光照适度、雨量充沛、四季常青。壮乡盛产各种水果，是我国著名的甘蔗产区，动植物和各种矿产资源也十分丰富。

壮语属汉藏语系壮侗语族壮傣语支,分南北两大方言,各方言区内又有数个土语。两大方言的语法结构、基本词汇大体相同,区别只在语音上。在广大的壮族农村地区,人们用壮语进行交际,由于长期和汉族及其他民族交往,有半数以上的壮族人兼通汉语。

历史上,壮族人民多是通过汉字来学习文化知识和用于日常生活。但由于文字和语言脱节,使用起来十分不便。唐宋时期,壮族人民曾利用汉字和汉字的偏旁部首,按照汉字六书的造字方法,造了一种"土俗字",或叫"土字",现在一般叫"方块壮字",也叫"古壮字",这种字有些是把几个汉字的部首组合起来,成为一个壮字,读壮语的音,表示壮语的意思;有些是直接取汉字的音,表示壮语的意思。如"荀"是我,"否"是不,"啰"是知道等。群众多用这种方块壮字记录诗歌、民谣或标写人名、地名,道士、巫师也用这种文字书写一些符咒和经文。唐宋时期是古壮字系统形成的时期,南宋名臣范成大在静江府(府台在今桂林市)任广南西路经略安抚使,到他手上的文件讼牒想必非同寻常,而他对古壮字竟能"习见之",可见当时这一文字使用频率之高,所用关系之重大。

由于壮语存在各种方言土语,各地壮语的语音差别较大,这些方块壮字在各地的读音也不一样。再由于方块壮字的创制出自多人之手,无人强行统一,往往会出现相互不认识对方所写文字的情况。用方块壮字书写的经书不少,但能看懂的人很少。甚至掌握经书的"布摩"也只能读懂出自同一师爷的师兄、师弟的经书,看不懂其他"布摩"的经书。这种方块壮字被称为"不成熟的文字",既不被官府承认,又备受封建文人的歧视,没能得到很好的整理和提高。方块壮字字数少,要和汉字混合使用,加之笔画繁冗,异文又多,所以这种文字只是在个人记录、备忘时使用,并没有成为壮族正式通行的文字。

尽管如此,自古至今,方块壮字一直在壮族民间流行,应用于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成为壮族人民传情达意、陈理记事的工具。

据有关文献分析，方块壮字的形成已有千年以上的历史了。唐朝永淳元年(682)，澄州壮族首领韦敬办撰写的《六合坚固大宅颂碑》，其族弟韦敬一于大周通天二年(697)刻的《智诚洞碑》，都是用方块壮字刻写的，其中夹杂了一些变体字和土俗字，这是至今保存下来的最古老的壮族方块字。此情况说明，最迟在7世纪晚期，方块壮字在壮族地区已有流传。唐宋时期，壮文得到进一步发展。宋代，壮族民间已普遍使用壮文。宋人庄绰在他的《鸡肋篇》中举例谈到方块壮字，范成大也在《桂海虞衡志》中记载了方块壮字的情况。明清两代所编《华夷译语》中收入了几篇汉语和壮语的对译，其上就附有壮文的自创字。

说起古壮字发挥的作用有很多，过去曾使用它记录古代流传的神话传说、歌谣寓言、碑刻药方、家谱契约等。在我党领导的各个革命历史时期，例如战争年代，壮族人民还用这种文字编写宣传材料，传递情报。新中国建立后，还使用这种文字编写山歌、壮剧等，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可惜“文革”中，很多这种壮字记录的文献，都被当成“四旧”焚毁了。

方块壮字在使用中并不能完全满足记录壮语的需要，所以常和汉字混合使用。再由于使用人汉文程度高低不同，所用的壮文出现频率也不一样。用方块壮字记写的诗歌、民间传说等，文中内容一半以上直接使用汉字。所用汉字有的是繁体，有的是民间流行的简体字。壮字构造则较复杂，一般由两个汉字组成，大部分是使用汉字形声字的造字法，用一个汉字的音来表达壮语的音，用另一个汉字或汉字的偏旁部首来表达壮语词的意义。有的壮字由两个读音相同或相近的汉字组成，两个汉字都表声，是双声造字法。有的由两个都表形符的汉字组成，是会意字。还有的采取反切的方法，用一个汉字或偏旁做壮语读音的声母，用另一个汉字或偏旁做壮语读音的韵母。还有借用汉字的形和音，赋予壮语的义。也有象形字等等。

叶、哺、佈、门、佈、卜）
bouX[pou⁴]（ ）个（人）：啃料三～伝 Ngamq daeuj sam boux vunz·刚来了三个人。

脬（胇、膘）
bouz [pou²] 前面加"膘"义为膪肉：膈膘～。nohbwdbouz. 膪肉；膪囊［猪腹部肥而松弛不实的肉，俗称泡囊肉］。

播〈方〉box[po⁴]放；搁置：提糯～缸。Dawz gaeu box gang. 把米放到缸里去。

颰〈方〉box[po⁴] 后面加"颷"义为，拉风箱：拡～颷。daz boxbed.拉风箱。

鏺 boz[po²]箔；金箔。

𩃬（䨇、𩅑、𤄷）
〈方〉boz[pho²]（ ）堆：～㹈 .boz gix.一堆屎。

夫〈方〉bu[phu¹]沸腾溢出。

措〈方〉bu[pu¹]扶。

搏buek[pu:k⁷] ❶拼（命）：～佮 。 buek mingh.拼命。❷搏；拼搏。

駇 buek[pu:k⁷]（ ）群：～伝 刁 .buek vunz ndeu. 一群人。

瞸（𪾢）
buemx [pu:m⁴]后面加"𪾢"，义为黎明拂晓；傍晚天刚黑：～𪾢只合宜。Buemxsuemj cij

古壮字 《古壮字字典》

壮族人民用方块壮字记录了不少文献，形成了一些有特点的壮族古籍，主要有碑碣、乡规民约及讼牒、信函、谱牒、民歌、长诗、剧本、说唱本、经书、医药书等。这里面较多的是记录和创作的民歌及剧本，如《董永》、《舜儿》、《周军》、《梁山伯与祝英台》、《何文秀》、《梅良玉》、《传扬诗》等。还有长达1万行的《嘹歌》。家喻户晓的《刘三姐》，民间保有多种版本，其歌词世代流传，和古壮字歌本的保存有很大关系。

远古创世神话有《摩则杜》，共36篇，全是五言律诗，反映了壮族先民对客观世界的原始认识，内容包括"分天地"、"分阴阳"、"分生殖器"、"只让人讲话"、"两兄弟厮杀"、"洪水漫天地"等；探索大自然奥秘的有《陆驮公公》、《妈勒带子访太阳》等；解释天象的有《开天辟地歌》、《太阳和月亮的传说》等；解释万物起源的有《盘古歌》、《人类来源的传说》等。

《布洛陀》是壮族著名创世史诗，它有20多种不同写本，其主要内容是一致的。使用神话艺术的手法，反映了壮族远古祖先对天地起源、人类来源、物种起源的质朴、幼稚、充满幻想的认识，歌颂了人类为了生存与大自然奋力斗争的英勇精神，曲折反映了人类早期社会的生产、生活情形，可以说是一部壮族早期的氏族社会史。当然这其中也渗入一些宗教因素，有浓厚的迷信色彩。《布洛陀》有着重要的认识价值和研究价值。

方块壮字还被用来传抄宗教经典，主要使用者是"布摩"，即巫师。壮族老人去世后，都要请布摩念唱超度经文，这类经文大都用方块壮字传抄。

由于汉文化的传播，有不少少数民族都曾尝试着利用改造的汉字形式来记录自己的语言，这些文字的形体类似方块壮字，而比其更为简约，且没有形成体系，仅偶然用于民间。如布依族、侗族、苗族、瑶族、哈尼族等都曾借用汉字的字形构造过类似方块壮字的民族文字。

广西民族出版社1989年9月出版了《古壮字字典》，这是历史上第一部壮字字典，共收入了民间普遍使用的古壮字4918个，另有音同义同写法不同的异体字10700个。实际未收入的壮字还会有一些，这些字过去在民间已足以表达任何意义，因而出现了众多洋洋万言的古壮字文献。

新中国建立后，党和政府非常关心壮族人民的文化事业，根据党的民族政策及壮族人民的愿望和要求，创制了一种以拉丁字母

为基础的壮文。

1952年,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派人到广西壮族地区进行了壮语的初步调查。1954年又派工作队到广西,和前广西省桂西壮族自治区壮文工作队共同进行了壮语方言的普遍调查。从1954年9月起,到1955年2月止,在各级党政组织的领导和协助下,一共调查了47个县51个点和一些副点的语言及人文材料(1956年8月和1957年4月到8月又两次调查了云南文山地区十几个点的壮语方言)。经过整理和比较研究,1955年5月在广西南宁召开了壮文工作座谈会,讨论壮语方言的划分问题,最后决定以壮语北部方言为基础方言,以武鸣城厢和双桥一带的语音为标准音创立壮文。1955年12月《广西日报》公布了《壮文方案(草案)》。经过1956年至1957年的实验教学和修订,1957年11月29日,国务院全体会议第63次会议讨论通过了这个壮文方案,同时批准正式推行。

壮文方案字母设计的原则是:以拉丁字母为基础,尽量靠拢汉语拼音方案,正确合理地表达壮语的音位系统。壮语和汉语相同和相近的音,尽可能用汉语拼音方案里相当的字母来表示;汉语里没有的音,酌量添制新字母或用双字母表示。这样,壮文最终形成32个字母和5个声调符号。这个方案的优点是,既能清楚地区分壮语所有的音类,又不带区别符号,字形简短,容易拼读。

壮文方案被批准后,曾在壮族居住的广大地区大力推行。各级政府和学校培养了大批壮文工作骨干和教师,陆续成立了各种研究、编译、出版、推行等机构,出版了各种课本、工具书、参考资料和壮文报纸。仅1957至1958年间,参加壮文学习的农村青壮年即达200万人。1966年,"文革"袭来,这项工作被迫停止,各种机构解散。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壮文推行使用的工作又开始恢复。1980年以后,考虑到将来科技文化的发展及壮族人民与国内外其他民族的交往,对原来的壮文方案进行了一些修改。

aenboemh　　3　　aen'gveuj

aenboemh〔方〕小坛子
aenbou（见 cabau）沙煲
aenbyazyiz（见 fagnyauj）挖花生用的铁制小齿耙
aencaqfaenj（见caeufaenj）榨米粉的工具
aencaqyouz（见 youzcaq）土榨油机
aencaet（见 lwgsaek）塞子
aencamj 罩子〔指罩鸡、鸭用的〕
aencek（见rungz）（鸡、鸭）笼
aencibuh 缝纫机
aencingz 恩情
aencoeng〔方〕gyaeujsaeng;doenggyauj 罾网
aencouq〔方〕couqbya 挑鱼花用的篓子
aencux（见 gaetnuk）襻；布纽扣〔带圈的〕
aencung〔方〕坛子
aendak 托盘
aendaez（见 cok）（油、酒）勺
aendaengjgu（见 doj）藤圈；簸圈
aendangq（见 daengqgyauz）扒谷子用的无齿木耙
aendojhob〔方〕长喇叭〔一种管乐器〕
aenduengqnengh（见 aennungxnengh）鞦韆
aengaq 架子
aengab 夹棍〔刑具之一〕
aengaen（见 swng）①量米筒〔比 mbaek 大，能装一斤左右〕②（　）升
aengaep（见 dietmeuz）铁猫〔捕鼠或野兽的工具〕
aengaepnyaen（见 dietmeuz）铁猫〔捕野兽的工具〕
aengaet（见 lwggaet）扣子
aengaujfaiq〔方〕ngad 土扎棉机
aengei（见 lahleiz）饭箕〔盛米、饭用的〕
aengien 圈子
aengiengh（见 rieng）鱼篓
aengungfaiq 弹棉弓
aen'gvaekfeiz（见 lwggvaek）火镰
aen'gveuj（见 cuenh）旋儿

壮文　《壮汉词汇》

新修改的《壮文方案》废除了26个拉丁字母以外的字母和声调符号，这一方案于1982年2月得到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的批准，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于同年3月20日公布并推行使用。现在的《壮文方案》字母表的排列与汉语拼音方案相同。壮文有22个声母，6个元音同一些韵尾构成108个韵母。壮语有6个舒声调和2个

促声调，分别用不同的方法表示。壮文音节的拼写次序是：声母—韵母—声调。壮文以词为书写单位，大小写、缩写、转行及标点符号使用等规则与一般拉丁字母形式的拼音文字基本相同。

壮文的创制使用，为壮族文化的发展光大、研究历史语言现象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例如壮族学者黄懿陆用壮文全译《白狼歌》的研究工作。《白狼歌》是东汉明帝永平年间(58—75)，白狼王为了歌颂中央政权统治者写的一首诗歌，记录在《后汉书·西南夷列传》中。当时一个叫田恭的官员，把这首歌带到洛阳，皇帝听了非常高兴，让史官用汉字译音录下歌词(原文是少数民族语言)。《白狼歌》是最早用少数民族语言与汉语对译的一首较长的古歌。

明朝以来就有学者对其专门研究，始终未能破译全文。《白狼歌》共有44句，每句4个字，共176字。很多著名学者对它进行了研究、翻译，但是都只能翻译其中一部分。译出90多个单个字，而无词汇，还有80个字不易确定。久而久之，对《白狼歌》的研究成了一个专门学问。

近六七年来，壮族学者黄懿陆在研究中发现，《白狼歌》是百越民族的语言，保留着不少越人口语的原生词，与今天壮语的基本词汇一模一样，说明壮语里保留着不少汉语的上、中古音。《白狼歌》全文44句，全部保留着壮语原生词。经过比较分析，黄先生用壮文翻译了《白狼歌》，并把研究成果收入自己的专著《壮族文化论》中，该专著已由云南教育出版社出版。黄先生在书中指出，《白狼歌》系百越之锁，前辈学者概用氐羌之匙去开，则难以开启。读了黄先生用壮文全文翻译的《白狼歌》，可知黄先生的研究和论证，言之有据，言之有理，至少是研究《白狼歌》的一家之言，破解了2000年前的"天书"。

本节参考文献：

1. 梁敏. 壮文. 见：中国少数民族文字. 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1992

2. 中国大百科全书·民族卷.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
3. 韦庆稳、覃国生.壮语简志。北京:民族出版社,1980
4. 黄润华、史金波.少数民族古籍版本——民族文字古籍.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
5. 张元生等.古壮字文献选注.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
6. 张元生.方块壮字.见:中国民族古文字.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
7. 黄懿陆.壮族文化论.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2002
8. 王锋.从汉字到汉字系文字.北京:民族出版社,2003

第七节　苗文(黔东苗文、湘西苗文、川黔滇苗文、滇东北老苗文、滇东北苗文)

苗族人口据2000年统计有8940116人,是我国西南地区人数较多的少数民族,主要分布在贵州、云南、湖南、重庆、四川、广西、湖北、海南等省区市。其中,苗族总人口中近一半居住在贵州,在黔东南和湘鄂川黔的交界地带有较大的聚居区。各方言区的苗族分别自称为"仡熊"、"牟"、"蒙"、"阿髦"等,这些自称具有同源性。"苗"是对苗族自称的汉语音译,意为"人"。

苗族具有悠久的历史,其先民最早生活在黄河中下游一带,后来一些部落向南迁徙,在长江、淮河流域组成了三苗部落联盟。商周时期,他们被华夏民族称为"南蛮"、"荆蛮"。春秋战国时期,他们再次向南迁徙。汉代时移居湘黔,被称为"黔中蛮"、"武陵蛮"、"五溪蛮"、"长沙蛮"等,并逐渐形成单一稳定的族体。唐宋时期,各地苗族均被称为"苗"。元代在湘黔的苗族居住地区设置了各种统治机构。苗族入居云南,主要是清代由贵州迁去的。历史上,苗

族人民曾多次掀起反抗压迫的斗争。

苗语属汉藏语系苗瑶语族苗语支,分黔东、湘西和川黔滇3大方言,川黔滇方言内部又分7个次方言。大多数次方言内部还有土语的差别。各方言及次方言之间差别较大,基本不能互相通话。越南、老挝、泰国等国北部的苗人所使用的语言属于川黔滇方言的川黔滇次方言。苗族虽然有自己的语言,但过去一直没有代表苗语的文字。苗族人民订立契约、记账、通信都使用汉文。新中国成立以后,政府组织语言学家为苗族3大方言各创制了一套拉丁字母形式的拼音文字,同时把滇东北次方言中的老苗文也改革为拉丁字母形式的新苗文。

新中国建立后,党和政府十分关心苗族的文字问题,曾先后派出工作队对各地苗语进行调查研究。1956年10月在贵阳召开了"苗族语言文字问题科学讨论会",会上讨论并修订了由中国科学院少数民族语言调查第二工作队设计的苗语各方言的文字方案草案。这其中就有《黔东苗文方案草案》(原名为《苗语中部方言文字方案草案》),这一方案分前言、适用地区、基础方言和标准音、字母等共11个部分。1957年经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批准试验推行。1959年对《黔东苗文方案草案》进行了修订。1960年停止试验推行。1981年重又恢复试验推行工作。

黔东苗文以黔东方言为基础方言,以黔东方言北部土语区的贵州凯里市养蒿村的语音为标准音。修订后的黔东苗文用26个拉丁字母表达30个声母、17个韵母和8个声调。30个声母中,有20个用单字母表示,10个用双字母表示。17个韵母中有5个是单字母韵母,8个是双字母韵母,2个是三字母韵母,2个是四字母韵母。分别用8个辅音字母写在韵母后面表示8个声调。1981年,黔东苗文恢复试验推行以来,苗文的使用与修订后的新方案又有些出入,譬如新增加了2个声母,增加了9个韵母等。

黔东苗文恢复试验推行后,党和政府不仅进行了大量的扫盲

DREUK JAIX DREUK NYONGS
NGHEL ROS CIF KOT DANGD
DUAD JAOX QINX GOX RENX MINX
CEUB NGHANGT SENB CHANGD
LIX HLOB HLANGD

Jangb Zex Mix nyaob Guangd Dongb
dous shaib dlex nof haik let lol

Zhongb gongf zhongb yangb zongd shub jif, gox juab zhud xix, zhongb yangb jenb wek zhud xix Jangb Zex Minx, nyaob touk ndros Guangd Dongb Maof Minx Gaob Zheub dex gangf buf kab dangl Sangb Jangd huef, lob 2 hlit hnob 21 zos hnob 25, dout nyaob Guangd Dongb dous shaib dlex nof, zaox dreud lob jaix nyongs chab nghel ros cif zhangt Dangd tab ceub nghangt ged bangx del chab hlob hlangd aob

苗文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和教学工作，而且出版了很多课本、读物和报刊，为这一文字的普及、满足苗族人民的需要做了很多极好的工作。如贵州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台江县有"天下苗族第一县"的美誉，保存着苗族十分完整的活态文化体系。那里的民间口传文学作品《苗族古歌》是集苗族历史、法律、伦理、民俗、天文、服饰、建筑、冶炼等为一体的百科全书。《苗族古歌》分为四部分：《开天辟地》、《枫木歌》、《洪水滔天》和《跋山涉水》。整部史诗多少年来一直以口传心记为传承手段，代代相传。全诗长达 15000 余行，塑造了 100 多位有名有姓

的人物，充满浪漫主义和理想主义的色彩。古歌大多在民俗活动中演唱，演唱者多为老年人、巫师、歌手，通常以比赛形式进行，可以连续演唱几天几夜。在20世纪50年代，才出版了古歌的苗文文本，有节选本，也有全本。黔东苗文为保护这一重要文化遗产发挥了重要作用。

湘西苗族过去没有代表自己语言的文字。1956年，由中国科学院组织的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第二调查队，对湘西苗语进行了深入调查研究，根据其特点，创制了《苗文方案草案》(湘西方言)，这就是人们所说的湘西苗文。这个方案1957年经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批准试验推行。1958年在湘西的花垣县、凤凰县作了推行的试点，州内也建立了培训师资的苗文学校(吉首大学前身)。1961年中止了这项工作。1983年，湖南省民委报经省人民政府同意之后，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人民政府于当年下发了5号文件，湘西苗文试验推行工作得以恢复。

湘西苗文是拉丁字母形式的拼音文字，以苗语湘西方言为基础方言，以花垣县吉卫的语音为标准音。共有26个拉丁字母，分别表示48个声母和35个韵母，有的声母和韵母是由双字母、三字母和四字母表示。用6个辅音字母做声调字母，表示湘西苗文的6个声调。湘西苗文自左至右横写，词儿一律不连写。固有词每个音节都由声母、韵母、声调组成。有少量没有声母的音节，前面都有一个喉塞音，在文中不标出，按零声母处理。

湘西苗文经过试验推行，证明文字的设计是科学的。在农村用湘西苗文扫除一个青壮年文盲，只需三四个月的时间。时间短，收效快，深受苗族群众的欢迎。政府这些年也编印出版了大量的湘西苗文读物，取得文字普及的良好效果。

川黔滇苗文也是于1956年10月在贵阳召开的“苗族语言文字问题科学讨论会”上定下的方案(草案)。会上为川黔滇方言中的川黔滇次方言确定了拉丁字母形式的拼音文字。这一方案(草

案)于1957年经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批准试验推行。

川黔滇苗文是以贵州毕节县先进乡大南山地区的苗语语音为标准音创制的。这一苗文有26个拉丁字母,表示56个声母和23个韵母,同时用辅音字母表示8个声调。川黔滇苗文也在一些地区开展了积极的普及工作,受到广大苗族群众的喜爱和欢迎。

1904年,英国传教士柏格理·波拉(Samuel Pollard)到贵州省威宁县(今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石门坎苗族地区传教。1905年春,他从云南昭通带来了汉族的基督教信徒和牧师李斯提反、钟焕然、王玉洁、傅正中、刘中五等人,在石门坎地区建立基督教堂、开设学校。他们在苗族知识分子杨雅各、张武、张约翰、王道源等人的帮助下,给这一地区的苗族群众创制了一种拼音文字。因为石门坎的苗语属苗语川黔滇方言的滇东北次方言,所以有人把这种苗文叫做滇东北老苗文或是石门坎苗文,也有人把它叫做柏格理苗文。

1840年,英国传教士埃文斯曾为加拿大纽因特人中的基督徒创制了一种文字,其中11个字母与滇东北老苗文中的字母完全相同,因此有人认为柏格理从埃文斯为纽因特人创制的文字中采用了部分字母。

滇东北老苗文适用于贵州的威宁、赫章、水城、紫云等县和云南的彝良、大关、永善、寻甸等县及楚雄彝族自治州和昆明市近郊区等地。据20世纪80年代统计,操这种苗语的苗族约有25万人,熟悉这种苗文的群众约有5万人。这种文字主要由信基督教的一部分苗族群众使用。

滇东北老苗文属自创字母与其他字母混合的拼音文字,每个音节由一个大字母和一个小字母组成。大字母为声母,构成文字的主体,小字母(除“,”以外)为韵母,写在大字母的上方、右上角、右侧、右下角,以小字母位置的高低表示声调的高低。小字母的大小只相当于大字母的四分之一。在创制文字的初期,把大字母叫

“大人字母”,小字母叫“娃娃字母”。中间有一个阶段,大小字母分别被叫做“老人字母”和“年轻人字母”(见《花苗新课本》),最后才确定分别称为大字母和小字母。

大字母	国际音标	例字	意义	大字母	国际音标	例字	意义
Y	ʔ	Y°	肿	S	s	Ş	边
L	l, lɦ	L̄	兔	3	z, zɦ	3"	好
┘	p, b, bɦ	┘̊	逃	Δ	tɬ, dl, dlɦ	Δ̄	腰
T	t, d	T̄	难	L	ɬ	Ľ.	挣
†	ts, dz, dzɦ	†̊	砌	6	ɯ, ɯɦ	6-	惠
Γ	f	Γ̊	宽	|	ɣ, ɣɦ	|ᵓ	岭
˥	h, x	˥ₙ	说	J	ʂ	J̊	热
[	tɕ, dʑ, dʑɦ	[̊	虎	R	ʐ, ʐɦ	Rɔ	认
]	k, g, gɦ	]̆	我	(┘	mp, mb, mbɦ	(┘-	拍
Ɪ	ʈ, ɖ, ɖɦ	ƗG	忙	(†	ŋts, ŋdz, ŋdzɦ	(†̈	遮
J	q, ɢ, ɢɦ	J'	鸡	([	ɳtɕ, ɳdʑ, ɳdʑɦ	([̊	盐
C	n, nɦ	C̊	在	(]	ŋk, ŋg, ŋgɦ	(]ʒ	懒
Ɔ	m, mɦ	Ɔ̆	糖	(˥	nt, nd, ndɦ	(˥̊	书
U	w	Ŭ	叹词	(Ɪ	ɳʈ, ɳɖ, ɳɖɦ	(Ɪ°	胸
V	v, vɦ	V̊	盖	(J	ɴq, ɴɢ, ɴɢɦ	(J'	肉
Λ	ʑ, ʑɦ	Λ̄	要	(Δ	ntɬ, ndl, ndlɦ	(Δ̊	浅

滇东北老苗文大字母

滇东北老苗文的大字母从结构来看,笔画比较简单,主要由直线条和弧形构成。一些字母是自创的。在创制文字的初期编写的《苗语基础课本》中,表示声母的大字母只有 29 个,后来根据使用中语言实际的发声情况,在编写《花苗新课本》及翻译《圣经》时,又增加了 3 个声母,大字母一共有 32 个。小字母有 37 个,其中单元音韵母 9 个,双元音韵母 15 个,三元音韵母 6 个,带鼻音韵尾的 6 个,表送气或清化的 1 个。另外还用不同方式表示 8 个声调。这些字母,有的是拉丁字母原形,有的是拉丁字母变体,有的是一些符号,可以

说是各种符号的混合体。由于设计者英文名字为柏格理·波拉(Samuel Pollard),故这种字母也被称为波拉字母(Pollard Script),使用这种波拉字母创制的文字,还有1913年英国传教士创制的云南武定傈僳文和云南禄劝的彝文。

滇东北老苗文问世后,第二年即以这种文字出版了两本宗教方面的书,一本是《花苗一书》(10页),一本是《花苗二书》(16页)。署名都是"柏格理、李斯提反、张约翰",由昭通福音堂出版发行,成都华英书局印刷。用滇东北老苗文还翻译过《圣经》和《赞美诗》,编写过普及课本等。《花苗新课本》问世后,云南、四川的苗族都先后派人到石门坎来购书,在群众要求下,石门坎曾两次派人到云南昭通油印课本,前后印数达到15000多册。1936年前后,云南彝良的苗族著名歌手杨芝用老苗文记录下13首讲述苗族历史的古歌,如《创造天地万物之歌》等。1952年,中科院语言研究所的苗语小组到石门坎地区收集了大量苗语资料,其中有苗族迁徙古歌、故事传说、苗族诗歌等,都是用这种老苗文记录、创作和整理的。云南安宁县还搜集到用老苗文记录整理的《苗族芦笙组曲集》(初稿),受到国内外专家的好评。

新中国建立后,党和政府派工作队对苗语进行了调查,根据调查结果和苗族人民的意愿,在向汉语拼音方案靠拢的基础上,对滇东北老苗文进行了改革,创制了一套拉丁字母形式的拼音文字,这套改革后的文字称滇东北苗文。滇东北苗文用26个拉丁字母,表示55个声母和20个韵母,同时对8个声调作出表示。

滇东北苗文创制于1956年,其方案(草案)1957年经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批准试验推行。当地曾先后派出优秀的教师、干部到贵州民族学院学习。1958年,贵州毕节地区还开办了民族语文学校,编写教材培训师资。苗族人民普遍反映不错,但不久这项工作即告停止。苗族各方言文字方案(草案)试行不久就都停下来,主要是当时遇到连续三年的自然灾害,其后又有农村"四清"、"文化

大革命"等政治运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苗族地区的经济文化事业发展很快,人们迫切要求学习,各级政府办学校、编教材,几种苗文的推广普及工作又广泛深入的开展起来。

值得一提的是,20世纪初,基督教传入苗族地区,对文字的创制和使用也起了某种推动作用。一些外国传教士在苗族各地传教,分别为不同的苗语方言设计了几种拼音文字,人们用这些文字翻译经书,也记录了一些传统的口传文学。近代出现的几种苗文,只有湘西苗文与宗教没有关系。历史上苗族曾使用的几种苗文大致情况如下。

篆体苗文:湖南南部苗族曾使用的一种文字,明代以前就流行。道光年间(1821—1850),清廷在湘南苗族地区编甲时规定,"其从前捏造篆字,即行销毁,永禁学习。"(《道光宝庆府志·大政纪六》)

克拉克苗文:英国传教士克拉克(Samuel R Clarke)1896年在贵阳为黔东苗语设计的拉丁字母苗文,不标声调,但设计者发现黔东苗语有8个声调。这一文字设计出来之后,设计者曾用这套文字记录了17个苗族的民间故事及神话,如《洪水滔天》、《兄妹结婚》等,还翻译了《马太福音》等经书,这些文献都已散失。

湘西方块苗文:湘西方块苗文一共有3套。其中1套是20世纪50年代由湘西花垣县麻栗场老寨村的石成鉴等人创制的,叫"老寨苗文"。1套是在《古丈坪厅志》中记录的"古丈苗文"。再有1套是花垣县龙潭镇板塘村的苗族秀才石板塘(1863—1927)创制的"板塘苗文"。古丈苗文最晚是在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以前创制的。板塘苗文则是在光绪二十九年(1903)之后创制的。石板塘是苗族歌师,自幼聪慧好学,16岁中秀才,一生编写了大量苗歌。40岁时,为服父丧,误了考举人的时间,于是静下心来,埋头创制苗文,编写苗歌。他把现实生活、本族名人、史书列传、古典小说、传说故事等都编成苗歌演唱。如唤醒苗族民族精神的《平等歌》、

《苗族名人歌》、《祖先歌》、《劝歌》、《太阳山》等；还有为让苗族人民了解丰富的社会历史知识，取材于中国史书、小说的《十三经歌》、《二十四史歌》、《三国演义歌》、《封神演义歌》、《西游记歌》、《水浒传歌》等。他的创作可以说是开创了现代苗语书面文学的先河。在创制苗文方面，除了假借汉字以外，他还自造了五六百个新字。他还编写了一部苗文字典《苗文字正谱》，收录了 1000 多个苗字。在龙潭一带，板塘苗文有着较好的群众基础，人们至今用它创作、记录苗歌。

湘西的方块苗文是借汉字的结构创制而成的，由于苗语和汉语语音结构基本相同，方块苗文很容易采用汉字一个音节一个字的造字办法，在字的结构上仿汉字使用形声、会意、假借、双声符和象形等手段，其中形声字占所有文字的四分之三，字的构件主要来自汉字，仿制的方块苗文大约有 1000 多个。

党居仁苗文：英国传教士党居仁（Adam J. R.）1908 年为贵州安顺地区的苗语滇东北次方言设计了一套拉丁字母的拼音文字，当时有 4000 多教徒学习过这种文字。1915 年，党居仁不幸意外遭雷击身亡，代替他工作的艾萨卡（Isaac Page）于 1917 年决定废除党居仁苗文，并从石门坎请教师来当地教授柏格理苗文，从此党居仁苗文不再流行。

此外还有一种澳大利亚传教士创制的注音字母苗文：19 世纪末我国出现了一个统一国语和推行汉语拼音的运动。1912 年 7 月，民国教育部通过了《采用注音字母案》，正式决定使用注音字母为汉字注音。1913 年读音统一会制定了注音字母 39 个。1918 年北洋政府教育部公布了这些字母。1920 年增为 40 个。注音字母的符号体系直接源于汉字，有着汉字部首的特征。它的功能本来是给汉字注音的，但一些传教士用它来记写少数民族语言，出版书籍，进而衍生出一些民族文字，如贵州旁海苗文、云南新平傣文等。这些文字多创制于 20 世纪 20 年代。

澳大利亚牧师胡致中(Maurice H. Hutton)1917年到贵州凯里市旁海镇进行传教活动。他大约在1920年以后,与苗族信徒顾元亮、刘文光等用汉语注音字母为当地的苗语设计了一种苗文,用以取代克拉克原来设计的拉丁字母苗文。并用这种苗文先后出版了《马太福音》、《马可福音》、《使徒行传》、《赞美诗》等。这就是注音字母苗文,也叫贵州旁海苗文。这种苗文出现的时间较短,前后使用了大约三十年,由于存在很多缺陷,能够掌握的人一直很少,留下的文献也比较少。

注音字母苗文有27个声母,每个声母用一个或两个注音字母书写。有25个韵母,每个韵母使用一个或两三个注音字母书写。根据苗语特点,新增了3个字母,删掉了原有的3个字母。早期的出版物未标声调,后来声调用圆点表示,多数字用一个点,少数用两个点,分别加在音节的一个角或两个角。书写款式与汉文相同,由上往下竖写,从右到左提行。标点符号不完备,只有顿号和句号。人名在左边加单线,地名加双线。分段不提行,只在首句前加一大圆圈。由于教士们不精通语音分析,这类文字常有一字多音、一音多字现象。有的音没有表示出来,有的字母是多余的,加上少数民族对基督教兴趣不大,信徒很少,所以教士们推行了几十年,使用这类文字的人依然寥寥无几。类似这样的文字还有贵州彝文、新平傣文等。

本节参考文献:

1. 王春德、向日征、王德光等.黔东苗文.湘西苗文.川黔滇苗文.滇东北苗文.滇东北老苗文.见:中国少数民族文字.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1992
2. 黄润华、史金波.少数民族古籍版本.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
3. 张公瑾主编.民族古文献概览.北京:民族出版社,1997

4. 赵丽明、刘自齐. 湘西方块苗文. 民族语文. 1990(1)
5. 王辅世主编. 苗语简志. 北京:民族出版社,1985
6. 铁木尔·达瓦买提主编. 中国少数民族文化大辞典. 北京:民族出版社,1998
7. 陈其光. 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字. 见:中国文化杂说·五. 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1997
8. 王锋. 从汉字到汉字系文字. 北京:民族出版社,2003

第八节　黎　文

我国的黎族人口据2000年统计有1247814人,分布在海南省,主要聚居于海南省的南部地区。黎族源于古代百越的一支,与壮、布依、傣、侗、水等民族有着密切的渊源关系。黎语在语音、语法和词汇上与这几个民族的语言有着明显的相似之处。秦汉以前"骆越"的一支就从大陆陆续迁到海南岛,他们以土著自居,称汉族为客。黎族的先民在西汉时曾被称为"骆越",东汉时被称为"里"、"蛮",隋唐时又作"俚"、"僚"。"黎"作为族称,始于唐末,到宋代才固定下来,一直沿袭至今。

黎族以农业为主,也有手工业、饲养业和商业。黎族居住地区处于热带,风景秀丽,水稻可一年三熟,是我国热带经济作物的主要产地。沿海渔业、盐业、林业和旅游事业都很发达。黎族多食水饭,妇女爱嚼槟榔,住房多为金字形茅屋,泥糊竹笪为墙。曾有婚后"不落夫家"的习俗。人死后鸣枪报丧,用独木棺葬于本村公共墓地。

黎语属汉藏语系壮侗语族黎语支。黎语有俘、杞、本地、美孚、加茂5种不同的方言。在5种方言中,俘方言使用人数最多,

同杞方言也较为接近，本地方言和美孚方言比较接近，加茂方言与其他几个方言差别较大。各方言相同的词一般占 80%左右，加茂方言与其他方言相同的词不足 50%。由于长期与汉族接触，很多黎族群众都兼通汉语。

GHA HLAI BHAEIS ZAUX CAQIAS VEENGZAUUS

Gha Hlai qihauux winsnaeis caqias veengzauus, gaeus qihauux puuendza dhaens hansneix, gha ngan dhung aeublaeu hauux. zaux caqias Hluumsghweuu dzueis. zaux qias Hluumsghweuu taeis, aeu rien gha meshes ruus boi.

Tum hansneix (1956 his) Gungcansdhangs uengx Maus Dusdia pais aeu buuen tois gha vuek caqias. Tuuenneix hei, gha Hlai gums zaux caqias veengzauus bhe! Laeis gha tuuenkaux ojiep, hauux gha gums rien meshes ngan lopp taeis meshes. zaux caqias ngan kueng dzueis, bhaeis da lums dhung aeu uu blaeu hauux he!

译文：

咱们黎族过去没有自己的文字，自古至今，咱们就像瞎子那样，有书不会看，有字不会写，人家说咱们什么都不会。

但是现在(1956 年)，共产党和毛主席派人来帮助咱们创造文字，从此以后，咱们黎族就有自己的文字了！只要咱们努力学习，那么咱们说什么就可以写什么，有书也会看，再不像瞎子了。

黎文

历史上，黎族长期使用汉文。有没有自己的文字，史书、古籍并没有明文记载。只是清代屈大均在《广东新语》中有过这么一句话："黎妇女皆执漆扁担，上写黎歌数行，字如虫书，不可识。"这漆

扁担上的虫书，到底字迹如何，无人见到实物，“上写黎歌数行”更是无法查究。因此，后来人涉及黎族文化时，都说黎族没有文字。

1956年夏，中国科学院少数民族语言调查第一工作队海南分队和海南黎族苗族自治州黎族苗族语文研究指导委员会，共同对黎语进行了全面调查。根据语音、词汇和语法特点，确定了以侾方言为基础方言（因为这一方言使用人口最多，只有3个调值，语言易学），以乐东县抱由镇保定村话（属侾方言罗活土语）的语音为标准音。设计了一种拉丁字母形式的《黎文方案》（草案），该方案于1957年2月在海南黎族苗族自治州首府通什镇召开的“黎族语言文字问题的科学讨论会”上通过。6月，《黎文方案》由广东省人民委员会报送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备案。

新创制的黎文，共有26个字母。这些字母分别表示31个声母，84个韵母。声调在音节末尾加字母表示。行款从左向右横写。1984年9月，根据使用的情况，对原方案又作了一些修改，修改后的黎文更符合黎语的实际。

后来，黎族因方言分歧放弃了黎文。

本节参考文献：

1. 欧阳觉亚、郑贻青编著．黎语简志．北京：民族出版社，1980
2. 中国大百科全书·民族卷．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

第九节　景颇文、载瓦文

景颇族人口有132143人（2000），主要聚居在云南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其他在怒江傈僳族自治州各县和临沧地区也有少量分布。景颇族大多以村寨为单位居住，以前通称为“山头”，新中国

建立后,根据本民族意愿统称为景颇族。景颇族有"景颇"(大山)、"载瓦"(小山)、"喇期"(茶山)、"浪莪"(浪速)等支系。他们原住在康藏高原南部,经过历史上几次大迁徙,才定居在今天分布的地方。元明时期,景颇先民被称为"寻传蛮",亦称"峨昌"。明末清初,大批景颇人迁入永昌府和腾冲府,即今德宏地区,形成了现在的分布格局。

景颇族使用两种语文的语言:一种是景颇语,属汉藏语系藏缅语族景颇语支。一种是载瓦语、勒期语、浪峨语、波拉语,属藏缅语族缅语支。不同支系使用不同的语言,相互之间不能通话。

景颇文创制于19世纪末,是以拉丁字母为基础的文字,主要通行于云南省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缅甸的景颇人也使用这种文字。据有关资料记载,这里发挥作用较大的是一批美国传教士。早在1834年,创制景颇文的探索已经开始。布朗森先生(Brownson)作为第一位探索者,曾试图用罗马字母创制景颇文字,由于种种原因,没有成功。1873年,弗朗辛·玛逊先生(Francin Mason)改用缅文字母创制景颇文,也没有成功。这之后,1876年美国牧师卡逊先生(Cushing)、1879年罗伯特先生(Robert)、1881年克伦奈特先生(Cronknite)以及从1883年到1885年的弗莱谷森先生(Fregu Son),先后设法用缅文字母进行景颇文的创制,由于各种原因,都没有成功。

卡逊创制的景颇文,在缅甸八莫一带做过试验,并有少数景颇族人士学习过,但还是不行。正是有了他们多次失败的经验,1890年,美国牧师欧拉·汉森博士(Doctor Ola Hanson)在认真总结前人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改以拉丁字母为基础,终于创制成功了景颇文。经过分析,汉森认为,以缅文字母为基础设计的景颇文拼写《圣经》有困难,于是便改用拉丁字母来拼写,这就是我们现在使用的景颇文的雏形。这以后,字母表又经过数次改动,直到20世纪40至50年代才趋于稳定。修改后的文字,最初主要用于宗教目

的，用来翻译出版《圣经》、《赞美诗》和景颇语歌曲，编写教会课本，后来也用于出版有关景颇族历史文化的书籍。1895年，由缅甸的英联邦政府当局批准，正式公布了景颇文字方案，景颇文首先在缅甸境内进行广泛的推广使用。1906年，汉森的《克钦词典》出版。其序言中说：该词典的出版是十六年多不间断工作的结果，在此之前，尚无人做过这一工作，所以，它对景颇文的发展具有开拓性的意义。

景颇文传入中国是在20世纪初。最早是英国传教士印戛于1914年到瑞丽县等戛寨进行传教，他办起了学校，教授缅文的同时开展景颇文教学。第一批学生共有14人，当时学校和教堂合在一起，星期天做礼拜祷告，平时学文化。此后，基督教会在凡有教徒的地方都建了教堂和学校，景颇文便在中国德宏境内进行了传播和推广使用。1931年，在盈江县铜壁关乡洋伞河坝，由布龙共早诺、散蓬早汤、老谷邦等开办了第一所景颇文学校，学生200多人。第一位教师春雷拥就是盈江县新成当过(邦瓦)人。这之后，1937年、1940年、1946年、1948年、1950年，在盈江县都办有景颇文学校。与此同时，1934年，在陇川县的磨水、弄欠等地区也先后办过景颇文学校。1947年，在陇川县广山，由司拉山(原云南省政协副主席)开办的景颇文学校，对景颇文的推广、普及、改革等，都作出了积极贡献。可见，新中国建立前，景颇文在云南德宏地区已经有了一定程度的传播和运用。据20世纪50年代调查了解，新中国建立前像瑞丽等戛寨的景颇文教学，曾闻名于中缅边界一带，不仅中国青年，还有不少缅甸青年也专程来此就学。

新中国建立后，党和政府对民族自治地区采取使用民族文字的政策，这对景颇文的普及推广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1954年，在中国科学院的帮助下，对原景颇文进行了改进，确定和颁布了《德宏景颇文改进方案初稿》，并且按新的文字方案编写和出版了景颇文教材，在各民族学校使用双语教学，受到了景颇族群众的

欢迎和拥护。1955年,云南省民族语文工作者和景颇族知识分子对这套文字方案又做了一些改动。考虑到国内外景颇族使用的习惯,仅改了一些明显的缺点。如将韵母"aw"取消,改为"o",将"wi"取消,改为"ui"。1956年,中国科学院少数民族语言文字调查第三工作队景颇语组和景颇族干部,又对1955年方案作了进一步修改完善工作。1957年,提出了景颇文改进方案,规定以德宏州景颇语为基础方言,以盈江县铜壁关区的恩昆话为标准音。1957年3月,在云南省少数民族语文科学讨论会上通过了《景颇文书写规则(草案)》。1964年10月,德宏州人民委员会主持制定了《景颇文方案(草案)》。1965年2月2日,中共德宏州委正式公布了景颇文改进方案。现在,《景颇文方案》已获得政府最后批准,景颇文也就获得了我国法律的承认。

最初汉森创造的景颇文,共有46个单字母和复字母,后来这套方案在实践运用过程中有过几次较大改动。1940年,景颇族知识分子把原方案的4个腭化声母和4个元音取消了,字母减少到38个。1941年,人们感到取消4个腭化声母后更不完善,所以重又补上这4个腭化声母,据实际情况新增加了3个腭化声母,字母总数又增加到45个。这套文字方案基本能表达景颇语,学习使用都方便,所以长期使用至今。新中国建立初期,景颇族会这套文字的人很少,不到总人口的10%,云南省曾用这套文字出版过一些画册和《团结报》。

1957年,景颇文的改进方案规定,景颇文共有声母40个(其中单字母17个,双字母18个,三字母5个),韵母39个(其中单元音韵母5个,复元音韵母4个,带辅音韵尾的韵母30个)。共用23个拉丁字母表示(无q、v、x),声调在文字上没有表示。

文字不过是一种语言的书写符号,本身并没有阶级性,就像语言没有阶级性一样。但过去受极"左"思潮影响,会产生认识偏差。像景颇文这样由外国传教士创制的文字,很容易被认为是"帝国主

Prat Nnan Na Lakung Lama Hta Hkan Nna Pati A Magam Go Maden Shaja Mung Masha Yong Hpe Woion Nna Galo Shapro N-gun Sharot Zinghka Ga

Kyang Zemin Kongtung ko gawan hkom ai shaloi hko ai mungga

Pati ginjo dinghkung mu madu, tingnyang up, ginjo hpyen rapdo madu Kyang Zemin, Kongtung Maumyin Gauju myu mare na ningbo ni a "tsun mahta lam masum" sharin shapan zuphpong sa lom ai hpang, shata 2 nhtoi 21 ya ko nna nhtoi 25 ya shani du hkra Kongtung mungdo gaba hkan bai gawan hkom nna, prat nnan na pati a magam shakut ningshong sho hpungtang magam sharot na bungli myu

景颇文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义的文化侵略",从而不能给出实事求是的评价。据专家分析认为,在所有外国传教士为我国少数民族创制的文字中,景颇文可能是最好的一种。群众长期实践的检验和景颇文本身显示的作用都有力的证明了这一点。

景颇文创制以来出版发行了大量出版物。首先是在缅甸,1906年出版了汉森的《克钦词典》,1926年创办了景颇文报刊,此外还有其他大量书籍刊物。在我国,《德宏团结报》景颇文版自1955年创刊后,向全国发行,至今已近五十年,每周发行两期,已发行近4000期。1980年,德宏州文联创办了景颇文文艺刊物《文

蚌》。1957年建立的云南民族出版社至今出版了大量景颇文书籍，如《景汉词典》、《汉景词典》以及教材、文艺书籍等110种、百万余册。德宏州民族出版社，1981年7月创建以来，出版的景颇文书籍、教材、挂历等达数百种、120余万册。景颇族内容丰富的民间文学、史诗、童话等都得到及时的整理，如《目瑙斋瓦》、《孔然斋瓦》、《太阳神的女儿们》、《景颇族创世纪》等。

一部分居住在德宏州潞西、陇川、瑞丽、盈江的景颇族，人口大约有7万多，他们是景颇族的一个支系，使用载瓦语，属藏缅语族缅语支。喇期和浪莪的语言也与载瓦语较近。在国外，这种语言主要分布于缅甸北部。

载瓦支系曾先后使用过两种载瓦文，但由于这两种文字均不能准确表达载瓦语语音，都没能通行。1887年，外国传教士为了传教，曾在缅甸创制过一种载瓦文，这种文字以正写和倒写的大写拉丁字母组成。传教士用这套文字出版了《马可福音》、《宗教问答》、歌本和一些教材、读物。从1934年起，法国传教士威廉（Wiliam）等人，曾在德宏州潞西县东山区传播过这种文字，至今还有少数人在使用它。1927年，缅甸操载瓦语的知识分子参考景颇文的方法又创制了一种载瓦文，曾用它翻译出版过《旧约全书》、《上帝的回答》和赞美诗等读物。

现行载瓦文是新中国建立后创制的，我国专家在对载瓦语进行全面调查后，于1956年提出了载瓦文试行方案。1957年，总结了试行方案中存在的一些缺点，为了尽量与汉语拼音方案取得一致，中国科学院第三语言工作队和云南语文工作者一起，对试行方案作了改进，提出了《载瓦文方案》（草案）。这个方案较1956年的试行方案更加简明易学。方案确定之后，便及时培训了师资，编写了各种课本。但1958年，由于极“左”路线的干扰，载瓦文的试验推行工作被迫中止。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应广大干部群众的强烈要求，1982

年,德宏州政府将“关于试验推行载瓦文的意见”上报云南省人民政府,并及时得到批复。1983 年,德宏州政府将这一意见作为正式文件发出,载瓦文的试行工作再次开展起来。现行载瓦文方案是在 1957 年改进方案的基础上,于 1983 年又略加改进的方案。这个方案共有声母 44 个(其中单字母 20 个,双字母 19 个,三字母 5 个),韵母 44 个(其中单元音 5 个,复元音 4 个,带辅音韵尾的 35 个),3 个声调在文字上没有表示。

现行载瓦文主要使用于德宏州的潞西、陇川、瑞丽、盈江、梁河等县和畹町市。从 1983 年试验推行以来,德宏州在很多中小学开办了载瓦文课,编印了大量课本、教材,还编辑出版了数百种文艺作品、科技读物、政治读物和儿童读物。1984 年,载瓦文版的《德宏州语文报》创刊(内部发行),1985 年 8 月开始编印载瓦文版的《团结报》(每周一刊,公开发行)。1987 年 4 月,德宏州人民政府批准推行现行载瓦文。使用载瓦文是载瓦人民多年来的迫切愿望,不长时间,这一推行工作即取得很大成绩。但由于一些困难,目前在整个载瓦支系,掌握载瓦文的人所占比例还是很小的。

本节参考文献:

1. 祁德川主编. 一个世纪的追求——景颇文创制 100 周年文集. 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1999
2. 徐悉艰. 景颇文. 见:中国少数民族文字. 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1992
3. 徐悉艰. 载瓦文. 见:中国少数民族文字. 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1992

第十节　拉祜文

拉祜族人口有 453705 人(2000),主要居住在云南省西南部山区澜沧江东西两岸的思茅、临沧地区,此外,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玉溪市等地也有少量分布。历史上拉祜族以擅长猎虎而闻名,"拉祜"的意思是用火烤吃虎肉。关于拉祜族族源目前有两说:一说为云南境内最早的土著民族之一,一说为青藏高原南迁的民族。大多数学者倾向于后者,认为拉祜族源于古代氐、羌族系。

10 世纪,拉祜族先民脱离大理政权,开始大规模南迁。元明时期,拉祜人民多处于傣族土司统治之下。直至清代,汉文献才开始记有"倮黑"、"目舍"、"缅"、"苦聪"等族称,拉祜族民族共同体开始形成。清朝统治时期,拉祜族人民先后联合各族人民发动了 20 多次起义,失败后又进行了一次迁徙,最终形成现在的分布格局。1987 年,经国务院批准,原苦聪人正式归属拉祜族。

拉祜语属汉藏语系藏缅语族彝语支,分拉祜纳、拉祜西、苦聪 3 个方言。使用拉祜纳方言的人约占总人口的 80%。方言间差别不大,基本上可以互相通话。基本词汇与彝语多属同源,语音结构与语法特点也颇近似。由于长期的民族交往,拉祜族人民多能使用汉语和傣语。

拉祜族原本没有文字。20 世纪初,缅甸克伦族一位名叫巴托的人设计了一套拉丁字母形式的文字,在当地的拉祜族人中使用。后来外国传教士由缅甸进入云南澜沧糯福地区传教时,把这套文字也传入我国拉祜族地区。这套文字习惯上被称为"老文字"。新中国建立前,这套文字在我国拉祜族地区使用面比较窄,只在传教

地区使用，并没有被广大拉祜族群众所掌握。但在国外，缅甸、泰国和老挝的拉祜族仍在使用这套文字。出版物主要有一些宗教读物，如《赞美诗》、《新约全书》等。

AWLSIQ VE LIRSID THIAORCEQ
THAR QHADIER AWD TAF LIE TAD
KEORJID VE HIED ZI QHALTHAT
KAF KAWRCIA TEDMAL VE
YADXEUL THAR SHIFMAF TAF LIE
MEULVADXAD KEOFLA MULA ZI

Cia Ceormer Kuadto kaqte ve phawd chafni
thad qot ve heotcawdjad ve tawdkhawd

Cokoq coya cod shu ciq, kawrcia cudshif, coya ceweid cudshif Cia Ceormer, Kuadto Maoqmer Kaocou siq shifmafpaf kaqpuq"Shaciad"maf yil huiq khawrkhai qhawrnawq, 2 hapa 21 ni tal lie 25 ni Kuadto kaq te phawd chaf ni ve, awlsiq awlyad awlqhaw tad keorjid phawd hied zi lie ciqshur

拉祜文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20世纪50年代，中科院语言研究所少数民族语言调查第三工作队、云南民族学院语文组、云南省民委民族语文研究室和云南省少数民族语文指导工作委员会工作人员与一些拉祜族知识分子一起商讨研究，共同拟定了一套《拉祜族文字方案》(草案)。这套文字方案于1957年3月经"云南省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科学讨论会"讨论通过，报经云南省人民政府批准试行。这套文字现在称

“拉祜文”，又称“新文字”。新文字是在老文字的基础上总结经验经改造而成。

拉祜文是我国拉祜族使用的一种拉丁字母形式的拼音文字，它以拉祜纳方言为基础，以澜沧拉祜族自治县城区及其近郊的语音为标准音，采用26个拉丁字母表示拉祜语的30个声母、18个韵母和5个声调。

拉祜文试验推行后，出版了一些通俗读物和小学课本，深受群众欢迎。不久，由于“左”的干扰，很快中止了试验推行工作。改革开放之后，拉祜文获得了新生。1980年，首先在澜沧拉祜族自治县恢复使用，随后在双江、孟连、西盟、耿马等县有拉祜族群众的地区也先后开始组织扫盲，培训师资，在小学开设拉祜文课程等。1987年11月，澜沧拉祜族自治县县委宣传部办了拉祜、汉两种文版的《澜沧通讯》，试刊期间，每月3期，内容十分丰富。拉祜文图书的编译出版工作也得到较大发展。1957年至1966年，共出版拉祜文图书18种22270册。1979年至1986年，云南民族出版社出版的拉祜文图书有48种231511册。1987年还出版了拉祜文挂历，受到拉祜群众的欢迎。

本节参考文献：

1. 张蓉兰. 拉祜文. 见：中国少数民族文字. 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1992
2. 中国大百科全书·民族卷. 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
3. 郝时远主编. 中国少数民族分布图集. 北京：中国地图出版社，2002

第十一节　瑶　文

瑶族现有人口 2637421 人(2000),主要分布在广西、湖南、云南、广东、贵州等地,其中广西最多,占全国瑶族总人口的半数以上。瑶族自称繁多,因生活、地域、服饰的不同,有“盘瑶”、“过山瑶”、“白裤瑶”、“背篓瑶”、“八排瑶”、“红瑶”等三十余种称谓。主要的有 3 种:“勉”、“布努”和“拉珈”,其义是“人”和“山里人”。新中国建立后,统称为瑶族。

瑶族具有悠久的历史。隋唐以前,西南诸民族多被称为“蛮”,瑶族即源于“武陵蛮”或“五溪蛮”。宋代以后,瑶族主要分布在湘南、桂东北和粤北一带的山区,故有“南岭无山不有瑶”之说。宋元以来,以瑶族人民为首的反抗统治阶级的斗争风起云涌,席卷岭南。明代以来,瑶族已成为我国西南比较闻名的民族之一。瑶、苗、壮等在史籍中出现的次数逐渐增多。苗瑶关系密切,解放前,很多人认为瑶原来就是苗,即一部分苗人为躲避徭役和迫害,退入山区,成为“无徭人”,便以“瑶”称两粤境内的苗人。瑶族与壮族的关系也十分密切。另外,几乎所有史书在谈到畲的时候,都认为其是瑶的一支,他们的风俗习惯、图腾崇拜、迁徙传说很多同瑶相似或相同。瑶族以农业为主,兼营林业。各地瑶族都有自己的生活习俗。瑶族的服饰最有特点,五彩斑斓,样式繁多,比较突出的有“红瑶”女子的红绣衣。

各地瑶族一般都使用自己的语言作为日常交际工具,也有一些地区的瑶族直接使用汉语或壮语。瑶语主要分为勉语、布努语和拉珈语 3 种语言,这三种语言均属汉藏语系。大约有 70% 的人(自称为“勉”或“金门”等)使用勉语,属于苗瑶语族瑶语支。勉语

以下又分为勉、金门、标敏和藻敏4个方言,各方言之间通话有不同程度的困难。还有一部分人(自称"布努"、"努努"等)使用布努语,属于苗瑶语族苗语支,他们说的话接近苗语。布努语分为布努、包瑙和努茂3个方言,各方言间一般不能通话。还有少数人使用拉珈语,属于壮侗语族侗水语支,说的话接近侗语。拉珈语没有方言之分。

古代瑶族没有自己的文字,采取刻木记事的方法,叫做"木契"或"打木格"。1983年,国家先后为勉语和布努语各制订了一套拉丁字母形式的拼音文字方案(草案),现在民间试行,尚未推广使用。用于勉语的瑶文采用了广西金秀瑶族自治县的瑶文方案,曾办点试行。用于布努语的瑶文拼音方案,只在云南富宁县一带用于群众扫盲。现在,瑶族的书面用语一般通用汉字。

20世纪50年代,国家曾组织人员对瑶语进行普查,并拟订了《瑶文方案》,但因种种原因,瑶文创制工作中断了。1982年底,北京的瑶族干部及学者再度呼吁创制瑶文,并提出了以广西金秀盘瑶"勉语"为基础的瑶文方案。1982年冬,广东省民委主任唐辉同志(瑶族)利用在京开会空余,与中央民族学院语言研究所的几位老师商定了瑶文培训班的开办事宜,并亲抓具体工作。1984年4月10日,广东省首届瑶文培训班在乳源瑶族自治县开学。培训班聘请了中央民族学院的老师讲课。正式学员有39人,主要来自广东。广东当时有瑶族九万多,其中三万多是"过山瑶",这次广东来的学员主要是"过山瑶"。另外广西田林县、云南富宁县和湖南的江华县也派了学员参加。开办培训班的主要目的是为了以后在瑶族地区的学校用瑶文教学,用瑶文扫盲,搜集民间文化遗产,培养瑶族语文骨干等。

新创的瑶文是一种拼音文字。培训班采取了声、韵、调整体认读的方法,效果极佳。学员们二十多天即能掌握,多数人可以用瑶文写书信、应用文,翻译民间故事、歌谣等。连南瑶族自治县的房

水养同学，还用瑶文翻译了7万字的《连南瑶族民间故事》一书。

新创制的瑶文首先以勉话为基础进行试验，比较符合我国讲勉话的瑶族占大多数的情况。东南亚、欧洲、美洲的瑶族也以讲勉话的人为最多。现在，国际上已有两种瑶文。一种是美国的瑶族使用的拉丁字母式的拼音瑶文，一种是泰国的瑶族使用的泰文字母创制的拼音瑶文。美国的瑶文是一位美国语言学家帮助创制的。他们还铅印了课本，从小学就开始普及。当他们得知中国也有瑶文方案后，便主动提出制订国际统一瑶文方案的设想。1984年4月，他们还派来一个五人代表团，与我国学者探讨瑶文统一的问题。我国学者坚持瑶文必须向汉语拼音方案靠拢的原则，美国学者也表示了同意，他们说瑶族的主体在中国，还是以中国的瑶文方案为主。双方取得了一致意见。泰国参会的瑶族代表也表示今后愿意使用统一的瑶文。由此可见我国创制的瑶文，当时在国内外都引起较大反响。

我国的瑶文虽已创制出来，"国际瑶文"也有了雏形。但这毕竟还是一种方言文字，瑶语的方言土语比较多，要设计出代表整个瑶语的文字方案，还有很多问题要解决。我国瑶文还未经有关政府部门批准，处于试行推广阶段。但瑶族群众对学习瑶文的积极性很高，并取得了一定成效。1983年以来，云南一些地方开办了瑶语文师资培训班，培养了一批重要的师资力量。富宁等地在一些瑶族聚居区开办夜校，一些村小还开展瑶汉双语教学，提高了瑶族学生的学习积极性。

由于瑶族一向有使用汉文的传统。各地的瑶族小学也都使用汉语文进行教学。在流传的歌谣和传说的抄本中，也偶尔使用一些汉字来注音或用汉字的结构另造新字。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认为，瑶族居住过于分散，又有很多人通晓汉语，继续学习汉文比较切合实际。根据广大瑶族人民的意愿，各地有关部门都正在帮助他们学习汉语文。

本节参考文献：

1. 毛宗武、蒙朝吉、郑宗泽.瑶族语言简志.北京：民族出版社，1982
2. 中国民族语言学会编.中国民族语言论文集.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86

第十二节　达斡尔文

达斡尔族现有人口132394人(2000)，主要分布在内蒙古东部的莫力达瓦达斡尔自治旗，黑龙江的齐齐哈尔等地。新疆的塔城市、霍城县等地也有少量分布，他们是清代乾隆年间(1736—1795)迁去的。达斡尔是辽代契丹人的后裔，至康熙初年，文献中出现"打虎儿"的译名，以后又常被译为"达胡尔"、"达虎里"、"达呼尔"等。解放后，根据本民族的意愿，统一定名为"达斡尔"族。

一些历史学家根据语言、历史传说及某些习俗，认为达斡尔族祖先是契丹人的一支。12世纪，辽王朝灭亡后，契丹族一支远徙外兴安岭以南，黑龙江以北，走上形成单一民族的道路。14世纪中叶以后，形成了现在达斡尔分布的区域。他们在这片土地上定居，从事农耕、狩猎和牲畜饲养业。17世纪中叶，沙俄势力东扩，侵入到黑龙江流域，达斡尔族进行了英勇抵抗，形成了我国黑龙江以北地区居民第一次武装抗俄斗争。以后，他们渡过黑龙江，向西迁徙到嫩江流域。后来，清廷征调该族青壮年驻防东北及西北边陲，才有一部分达斡尔人徙居到呼伦贝尔、爱辉，以至新疆的塔城。

达斡尔语属阿尔泰语系蒙古语族。由于居住分散，形成了布特哈、齐齐哈尔、海拉尔和新疆4种方言，方言之间基本可以通话。一般达斡尔族兼通汉语，居住在内蒙古的兼通蒙古语，居住在新疆

的兼通哈萨克语和维吾尔语。达斡尔族没有本民族的文字。清朝的时候，达斡尔族主要学习和使用满文，并借用满文字母拼写本民族的语言。辛亥革命以后，汉语文在达斡尔族中逐渐普及。还有一部分地区的达斡尔族兼通蒙古语文和哈萨克语文。

达斡尔族在清朝时使用过一种带有辅助性质的文字，即满文字母的达斡尔文。它是一种借用满文字母来音写达斡尔语的文字，产生于19世纪30年代。这种达斡尔文习惯上也叫满文，为同真正的满文区别开来，在一些文献上被称为"用满文字母拼写达斡尔语"、"满文字母记音"、"达斡尔文"等。这与满族文化对达斡尔族的影响有重要关系。康熙年间（1662—1720），在布特哈地区的达斡尔人即开始建立满文学堂，之后在齐齐哈尔、墨尔根、瑷珲等达斡尔地区都先后创办了这样的学堂。这些地区还出现了很多满文私塾，使满文在达斡尔族中十分普及，出现了一批能够熟练使用满文的知识分子，其中一些人还创作了一些满文达斡尔语和满文满语的文学作品。

最早使用满文字母的达斡尔文进行系统创作的是近代著名作家和诗人敖拉·昌兴（又名阿拉布登、阿木古朗，字芝田）。他是达斡尔文士，咸丰元年（1851）以佐领职，奉命巡查额尔古纳河、乌第河源。归后将巡边经过撰写成《乌春》（即叙事诗）。著有《京路记》、《调查乌的河源》、《田舍诗》、《依仁堂集》等。他精通满、蒙古、汉、藏等文字，除用满、汉文写作外，还用达斡尔文著有诗、词、歌谣、散文和游记等百余篇。其后又出现了诸如玛孟起（玛玛格奇）、庆同普（孟庆元，又名乌尔恭博）等著名诗人及作品。本族的知识分子还用满文字母的达斡尔文编撰了辞书，如《满洲达呼尔词汇》、《满汉达呼尔合璧辞典》等。一部分用这种文字撰写的资料还流传到了国外。清末以后，达斡尔族民间仍使用这种文字续写族谱、对联及通信。解放后，在布特哈地区仍有一部分人使用这种达斡尔文。这种满文字母的达斡尔文对达斡尔文化事业的发展起到了巨

大的作用,使部分珍贵的文化遗产得以保存,使我们能欣赏到早期达斡尔文人的优秀作品。著名达斡尔族革命家和教育家郭道甫先生在1931年发表的《呼伦贝尔问题》一书中,就将其直呼为"达呼尔文"。

Sorgaasen usuwuini sonsoj,
Sanaa jurwudee xingeeliibi.
Jaasen usuwuini ejij,
Julkuj parxieyaa elwudee,
Bensen uwei aaj,
Benderseer ixkiebeibi.
Muten uwei qig tualaan,
Mooxiej mokiej bajaabeibi.
Huuyi hudulwu erindini,
Hulwuo towoj garliibi.
Jao ald taliiyu,
Jiduj tondookon jorilgan.
Miangan nirgis huriiyu,
Miaakaal uwei qieqliibi.

达斡尔记音符号 《达斡尔语课本》

民国以后,达斡尔族的有识之士们曾试图用俄文字母或拉丁字母为达斡尔族创制一套新式文字,最终都因种种原因未能如愿。新中国建立后,党和政府为了解决达斡尔族民族文字的创制问题,做了大量工作。1980年,内蒙古自治区达斡尔历史语言文学学会制定了一套《达斡尔语记音符号》,这套记音符号成为该学会统一使用的记录达斡尔语的工具。《达斡尔语记音符号》是以《汉语拼音方案》为基础制定的,它在字母形式及读音方面基本上同《汉语拼音方案》一致,这给群众学习掌握记音符号带来了极大的方便。很多人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即学会了字母的认读和拼写,有的

人还可以用记音符号拼写出各种单词和短文。

《达斡尔语记音符号》公布以后，在一些文化教育工作者中进行了试教。先在内蒙古的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鄂温克族自治旗及锡林浩特、呼和浩特等地举办了试点班。1985年夏，在呼和浩特举办了一期有来自新疆和内蒙古各地学员参加的记音符号培训班。试教工作得到了各地党政领导的大力支持，同时受到达斡尔群众的热烈欢迎。这些年，已有一些文化教育工作者掌握了记音符号，并开始使用它编词典、记录民间文学作品，或用于其他研究工作中。

很多达斡尔学者对记音符号的出现抱有极大的热情和社会责任感。为了便于学习和普及这一文字，他们很快就编出了一些工具书和课本。如开英编写的《达斡尔、哈萨克、汉语对照词典》，1982年即由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1985年2月第一次印刷。恩和巴图编出了《达汉小词典》，1983年7月由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额尔很巴雅尔和恩和巴图还于1985年1月编写了《达斡尔语记音符号试用教材》，当年7月，在呼和浩特举办的第一期培训班上，对教材进行了补充修改。1988年3月，作为《达斡尔语读本》正式由内蒙古教育出版社出版。达斡尔语记音符号，目前还在试验阶段，故正字法等还存在一些有待研究的问题。单就影响来说，这套记音符号也未能取得像当年满文字母那样在达斡尔语中的地位。

本节参考文献：

1. 敖拉·额尔很巴雅尔，莫尔丁·恩和巴图．达斡尔语读本．呼和浩特：内蒙古教育出版社，1988
2. 仲素纯．达斡尔语简志．北京：民族出版社，1982
3. 丁石庆．达斡尔语言与社会文化．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8
4. 孟志东主编．达斡尔族研究(1—4辑)．呼和浩特印刷，1989

第十三节　羌　文

羌族有 306072 人(2000),主要分布在四川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的茂县、汶川县、理县和松潘县的部分地区,另外四川绵阳地区、甘孜藏族自治州以及贵州省也有少量分布。羌族自称"尔玛"或"尔咩",意为本地人。

羌族是个历史悠久的民族。三千多年前的殷代甲骨文中,就记载有羌人的活动,那时,他们主要分布在我国的西北和中原地区。秦汉之际,羌人主要活动在河、湟、洮、岷一带。东汉末年三国之际,羌人最为强大的时候,甚至有问鼎长安的力量,西边诸侯也向羌人借兵,逐鹿中原。隋唐时期,吐蕃势力开始强大,"西山八国"的众羌部落征战不断,逐渐衰落。部分羌族被藏族同化,部分被汉族同化。今天的羌族是古代羌族保留下来的一支。

羌语属汉藏语系藏缅语族羌语支,分南北两大方言,每个方言内部各分 5 个土语。方言之间有较大差别,北部方言内部差异较小,南部方言内部差异较大。羌语除本民族使用外,阿坝州黑水县的藏族也使用它作为交际工具。羌族虽然还保留着自己的语言,但目前大约有一半人已失去自己的母语而转用汉语。愈是在交通、文化比较发达的地区,这一情况愈明显。在交通不便的偏僻山区,羌语使用比较频繁。现在实际使用羌语的约有 15 万人左右。总体上看,使用羌语的人有越来越少的趋势。羌族没有自己的文字。

还在解放前,我国一些优秀的知识分子就非常关注少数民族语言的情况,他们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对羌语进行了初步调查,发表了数量可观的论文。比较著名的学者有闻宥、傅懋勣和张琨

等。新中国建立后，国家对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调查研究非常重视。1956年，组织了7个工作队对少数民族语言进行全面普查，其中少数民族语言调查第七工作队川北组就是负责羌语和嘉绒语调查的。1956年5月，川北组在金鹏先生领导下，对黑水县的羌语进行了试点调查，以取得经验。1957年夏，由二十多人组成羌语普查队，分4个小组对羌语进行了普查。这一普查对羌语的进一步研究，进而创制文字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后来由于一些错误思想的干扰，羌文的创制工作被迫停止。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得到尊重。羌族重新提出了创制文字的要求。1988年，阿坝州政府正式提出为羌族创制文字的报告。同年，四川省民族事务委员会向省政府提出了创制羌文的报告。经省政府同意后，1989年夏，由四川省民委牵头，正式成立了四川省羌族拼音文字方案创制领导小组。

小组经过紧张细致的工作，最后确定，以北部方言为基础方言，以北部方言中最接近南部方言而且是最大的一个土语雅都土语的曲谷话为标准音。这一意见不仅得到广大羌族干部群众，也得到黑水县使用羌语的藏族群众的欢迎。确定了这个语音系统以后，经反复讨论协商，最后形成了拉丁字母形式的羌族拼音文字方案。方案中包括40个单辅音和8个单元音。复辅音声母、其他韵母，均出现在附录之中。

方案确定以后，很快就编出了扫盲课本和小学一年级课本，还编出了《汉、羌文对照词汇手册》，在标准音地点进行试教，取得了良好效果。1990年11月，在成都召开了《羌族拼音文字方案》审定会，方案通过审定。1991年3月，对方案进行了必要修订。同年10月，四川省人民政府批准了这个方案，并报国家民委审查。1993年3月，有关专家对方案进行了认真鉴定，得出结论，认为这套方案“设计合理，能够科学、系统地反映羌语特点，是一个好方案”。

这些年来，羌文的创制和试点推行取得了明显效果，受到羌族

各界的肯定,羌文正在日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它满足了羌族群众多年来要求创制自己文字的愿望,便于广大羌族人民学习,同时有利于保存羌族的文化遗产和科学知识的传播普及,有利于发展羌族人民的文化事业。人们用羌文记录了大量传说、故事和唱词,羌汉对照的《羌族释比经典》已完成数百万字的整理和翻译工作。

本节参考文献:

1. 孙宏开编著.羌语简志.北京:民族出版社,1981
2. 徐平.羌村社会——一个古老民族的文化和变迁.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
3. 刘光坤.麻窝羌语研究.北京:四川民族出版社,1998

第十四节　土家文

土家族现有人口 8028133 人(2000),主要分布在湖南、湖北的西部和重庆的东南部,贵州也有一些。土家族自称"毕兹卡",意为本地人。两千年前即定居在今湘鄂西一带。土家族的来源目前有三种说法:一说来源于秦灭巴后,定居于湘鄂川黔交界的巴人;一说来源于湘西土著与入境的巴人、汉人融合而成;一说与云南彝人同宗来源于唐中叶的乌蛮。

土家族居住的湘鄂西地区,属于丘陵地带,海拔多在 400 ~ 1500 米之间。境内山峦重叠,江河交错,具有发展农林牧副渔的良好条件。风光旖旎,山川秀丽,发展旅游更是有着得天独厚的条件。"西兰卡普"是土家族著名的传统民间工艺,又称土家织锦。土家织锦色彩斑斓,质地厚实,图案古朴,与蜀锦、壮锦合称中国三大名锦。

土家语属汉藏语系藏缅语族土家语支,分两个方言,即北部方言和南部方言。通常讲的土家语是指北部方言。南北两个方言差异较大,互相不能通话。土家族大多数通汉语,只有永顺、龙山、古丈等少数聚居区还保留着土家语,这些人大约有四十多万。土家族没有本民族文字,通用汉文。历史上也有人用汉字作为记音符号记录土家语。如1930年编纂的《永顺县志》,其中使用汉字记录的土家语词汇有一百五十余个。如:用"墨"表示"天","理"表示"地","那"表示"人","碗"表示"日","舒舒"表示"月","热署"表示"风","墨者"表示"雨","苦咱"表示"山","夸"表示"官","马那"表示"民"等等。永顺县的曲目"小摆手",其唱词也是用汉文记录的土家话。如"盖地欧阿拍烂苦打则,六豆阿拍岔叉桶打则,欧列个嘎墨格那波。"汉语的意思是,"在土王的保佑下,谷子长得像牛轭,绿豆长得像雀窝。"

1983年春,为了发展土家语地区的文化教育,解决土家族人民的文字问题,吉首大学民族研究室的土家族学者彭秀模、叶德书两位先生,在湘西州人代会期间,广泛听取了人民代表和政协委员的意见后,开始着手土家文创制工作。他们结合以前对土家语地区四次大调查的情况,综合研究分析,最后确定以土家语北部方言为基础,以龙山县猫儿滩镇星火村(叶家寨)语音为标准音,制订了拉丁字母形式的《土家语拼音方案》(草案)。《方案》制订后,邮寄给国内一百三十多位语言专家征求意见,得到很多专家的支持和赞许,并提出宝贵意见。当年秋,两位先生综合专家意见,对方案进行了修订。1984年1月,修订后的方案在《吉首大学学报》公开发表。这一方案得到国内语言学家的肯定。《土家语拼音方案》有很多优点,诸如,用拉丁字母设计的拼音文字能准确拼写土家语的北部方言;与《汉语拼音方案》基本一致,有利于规范和学习;采用字母标调,打字简单,音节界限明显;便于运用计算机技术。

在土家文的推广使用上,人们做了大量工作。首先编写了土

Arkov: partair partair kaxpuv tav,
ngaf sef covnier lixhongx gav.
lofbux curcur laxniex bav,
ongvgar der Iavsuv sifdix tav.
Rongv: partair partair kaxpuv tav,
nif anx covnier Iixhongx gav.
nif ngaf dav pirweir tavlanr huaf,
nif enrjir qivmor sar axdav tav?

汉译:哥: 扒台扒台织土花,
我在你后檐把土挖。
两眼直望到日西斜,
中饭都不来送一下。
妹: 扒台扒台织土花,
你在我后檐把土挖。
千万莫把脾气发,
你来怎不把信搭?

土家文

家语课本。1986 年 7 月,叶德书先生编写了一套《土家语课本》(一、二册)。先是油印、铅印,1992 年 1 月,由湖南教育出版社正式出版。作为基本教材,在湘西土家语地区小学试用。这套教材深受当地土家族群众欢迎。再者为开展土家语地区的文化教育,进行了"土家·汉双语双文接龙教学实验"。在教授土家文字的同时结合汉语教学,这一实验取得极好效果,小学生和一些青年文盲迅速提高了自己的文字水平。这一做法得到中外学者和专家的赞扬和肯定。

本节参考文献:

1. 田德生、何天贞.土家语简志.北京:民族出版社,1986

2. 叶德书.土家语课本.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2
3. 叶德书.土家语常用口语半月通.北京:民族出版社,2003

第十五节　独龙文

独龙族现有人口7426人(2000),主要聚居在云南省怒江傈僳族自治州贡山独龙族怒族自治县境内,85%的人口分布在贡山独龙江河谷两岸。怒江两岸、云南维西及西藏察隅等地也有少数散居人口。独龙族历史上没有统一族称,往往以自己的居住地、河谷名称自称。元明清汉文史籍中,曾被称为"撬"、"俅人"。新中国建立后,根据本民族的意愿,定名为独龙族。

独龙族先民最早活动在滇西北的金沙江、澜沧江流域,后发展到怒江流域。大约在明清时期,陆续迁入独龙江流域和缅北的恩梅开江、迈立开江流域,形成今天的分布格局。独龙族先民属古代氐羌部落集团的一支,与贡山的怒族关系极为密切,彼此在语言、传说、血缘、族谱等方面都有紧密联系。解放前,独龙族还保持着浓厚的原始公社制残余,生产力水平十分低下,以刀耕火种的农业为主,辅以采集渔猎。解放后,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独龙族居住的贡山地区,处于滇西横断山区,属于典型的高山峡谷地貌,亚热带季风气候。这里气候温和,山河壮丽。独龙江河谷集雄、秀、奇、险于一体,有冰斗雪峰、林海雪原、高山湖泊,再加上独特的民俗风情,这里将成为极有价值的科考、探险、旅游胜地。

独龙语属汉藏语系藏缅语族,语支未定。研究人员认为,它与景颇、僜等语言比较接近,有划为同一语支的可能。独龙语内部比较一致,方言分歧较小。分为独龙江方言和怒江方言。贡山独龙江流域的独龙族使用独龙江方言,分布在贡山一区及西藏昌都察

隅县一带的怒族也使用独龙语，属怒江方言。独龙族历史上没有文字，靠刻木结绳记事、传递消息。

独龙族是个跨境而居的民族，居住在缅甸北部的独龙族有数万人，主要分布在江心坡、坎底及坎底西北的广大地区。他们是从中国迁去的。他们来中国通常以氏族及家谱关系通报，若系同族，则称“陪切”，见到中国其他民族，则自称“俅族”。19 世纪末，在缅甸北部传教的传教士，以独龙语为基础，创制了一套用拉丁字母拼写的主要用于传教的文字。1951 年，缅甸的独龙族，江尾列尼池人白吉斗·蒂其吉创造了一种拉丁拼音文字，以其所在的氏族“日旺”命名为“日旺文”，这一文字流行过一段时间。但日旺文不能完整地表达独龙族的全部语音。

声母：

b[b]	p[p]	m[m]
f[f]	w[w]	d[d]
t[t]	n[n]	l[l]
g[g]	k[k]	ng[ŋ]
h[x]	j[dʑ]	ch[tɕ]
ny[ɲ]	sh[ɕ]	y[j]
z[dz]	c[ts]	s[s]
r[ɹ]	q[ʔ]	by[bj]
py[pj]	my[mj]	gy[gj]
ky[kj]	hy[xj]	bl[bl]
pl[pl]	ml[ml]	gl[gl]
kl[kl]	br[bɹ]	pr[pɹ]
mr[mɹ]	gr[gɹ]	kr[kɹ]
hr[xɹ]		

韵母：

单元音韵母：i[i] e[e] a[a] v[ʌ] o[ɔ] u[u] eu[ɯ]

复元音韵母：ei[ei] ai[ai] oi[ɔi] ui[ui] ua[ua] ue[ue] eui[ɯi] uai[uai]

独龙语拼音方案

后来，我国独龙族人木立门·阿柏参照日旺文，经过多年研究，采用拉丁字母形式，设计了一套《独龙语拼音方案》。云南省少语委对这套方案的制订进行了协助。《独龙语拼音方案》以独龙江方言为基础，字母形式上尽量保持与日旺文的一致性，以便境内外独龙族群众之间的文化交流。《独龙语拼音方案》有声母 40 个，韵母 76 个，声调 3 个(在文字上不表示)。1983 年 12 月，经云南省少数民族语言文字指导工作委员会讨论通过，同意试行。同年 9 月，开始在独龙族聚居区推广。贡山县的小学使用这套文字进行教学，取得很好的效果。同时，这套文字还用于扫盲、交流等工作，受到当地人民的欢迎。

本节参考文献：

1. 孙宏开.独龙语简志.北京：民族出版社，1982
2. 周耀文.中国少数民族语文使用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
3. 谢蕴秋.云南境内的少数民族.北京：民族出版社，1999

附　录

第一节　女　书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丰富多彩。在山清水秀,风景如画的湖南江永县,竟然有一种让人感慨不已抚案而叹的文化奇葩,抑或是世上仅有的性别文字——女书,这是当地女性专门使用的文字。

江永属湖南零陵地区,相传华夏始祖五帝之一的舜帝征服三苗之后,"南巡狩,崩于苍梧之野,葬于江南九嶷,是为零陵。"(《史记·五帝本纪》)这里唐时称永州,与零陵是一地二名。江永属南岭山脉的山地丘陵地区,群山逶迤,峰回路转,江水蜿蜒而过,人在云山雾海中出没。清康熙年间(1662—1722)所修《永州府志》载:永州"居楚粤之要,踞水陆之衡,遥控五岭,衡岳镇其后,梅庾护其前,潇水南来,湘江北会,此形胜大都也。"1949 年 11 月,永明县解放,1955 年 1 月,经国务院批准,将江华县的几个区划入永明,将永明县改名为江永县。

江永县位于湖南省南部,湘桂粤边区。东西宽 55 公里,南北长 63 公里,总面积 1626.03 平方公里。全县共有 17 个民族,26 万余人,其中汉族近 18 万人,瑶族 7 万余人,其他依次为壮族、侗族、彝族、黎族、苗族等。全县有 4 个镇,14 个乡,两个国营农场和 1 个自然保护

区。江永为盆地，处五岭环抱之中，境内大小河流有200多条，分属两大水系，一为潇水，属长江水系；一为桃水，属珠江水系。两水流域之间的上江圩、桃川，都是全县的富庶之地。女书主要流行在江永县东北部的潇水两岸，以上江圩乡为中心向四周辐射。

这里的名山秀水，自古便孕育了一些美丽的神话传说。屈原在《湘夫人》中写道："九嶷纷兮并迎，灵之来兮如云。"有人便说女书是湘妃留下的。近来又有人说，宋时上江圩荆田村出了位进士胡先和，"官文华殿学士"，他的姐姐玉秀，才学冠世，受到宋哲宗的封赏，"恩赐御书楼，给大夫禄"（《永州府志》），女书就是她创造的。再一个传说是，上江圩乡有一个姑娘，一生下来就有九斤重，叫"九斤姑娘"，她聪明能干，纺纱、绩麻、织布、绣花，样样都比别人强。姑娘们都喜欢和她交朋友，她朋友很多，四面八方都有，为了和远处的人联系，九斤姑娘于是造出字来，姑娘们都争着学，就成了女书。这些都是故事，不足为凭。

女书，史志不载，族谱碑文不述，现存文献，最早没有超出清代的。其传习是家教亲授，世代相传，谁也不知流传了多少年。女书研究，是近年的新课题，这方面还只取得一些初步成果。专家对于女书产生的年代概括起来有三种意见：一种认为女书的源头可以追溯到三千多年前的先秦时代，甚至更早的殷商甲骨文时代。一种意见认为女书产生的时代较晚，不会早于明末清初。第三种意见认为，女书是男尊女卑的封建时代的产物，可能产生于中古时期，不会早于魏晋，它是大量借源汉字加以变异形成并逐渐完善的。

江永女书曾在当地妇女中盛行，世代沿袭，但一直默默无闻，在旧时代无人重视，男人不重视，外人不重视，官府也不重视。最先关注女书情况的是原江永县文化馆工作人员周硕沂，他1954年下乡时，偶然见到女书，便开始收集、研究。1956年，周硕沂参加湖南农村文艺会演时，在住所门口贴了一副用女书写的对联，引起多人注意，其中湖南省博物馆文物工作队的李正光尤感兴趣，会演一结束，

他即赴江永,与周一起下乡调查,并写了一份"女书"调查报告。1957年,周硕沂、李正光先后被划为"右派分子",1979年才得以改正。在极"左"思潮影响下,女书被当作封建遗毒,在历次政治运动中,都被作为"妖书"、"妖字",遭到批判。直到20世纪80年代以来,女书研究才逐渐引起国内外学者的注意和重视,逐渐兴盛起来。

女书是指在江永县上江圩乡及其邻近一带,汉族妇女中流传的一种汉文异形字。男人不认识,也无人学习。女书既指文字,也指由这种文字形成的文献。这种文字至今仍在当地一些高龄妇女中使用,年轻人并不学习,现已濒临灭绝,懂得女书的几位老人近年相继去世,女书很快会成为一种死文字。据专家统计,从当时收集的资料看,女书共有1200多个基本单字,其中常用字有700多个,基本上能比较完整地记录当地的语言。女书是一种类似方块汉字的文字,借用了很多汉字的偏旁部首,书写时字体为斜体。

据研究女书多年的清华大学教授赵丽明分析,女书应该是一种异形汉字,这表现在使用女书的基本是汉族妇女,女书记录的语言是一种区别于湘方言、西南官话的江永上江圩一带的汉语土话。女书脱胎于方块汉字,是汉字的变异,是借源于汉字系统改造的再生文字。据统计资料看,1200多个女书单字中,80%多借源于汉字改造而成,暂时不明来源的自制字占不到20%。这其中有整体借用汉字的,有的是把方块体写成斜体,或是反写,使用古体汉字和简体汉字;有的是将汉字形体稍加改变;有的是变异较大,但仍保留汉字痕迹;再就是借用汉字构件另外组字。女书虽然也是一种汉字,但在本质属性上却与方块汉字不同。汉字基本上是表意文字,而女书是一种单音节音符字的表音文字。女书既不同于汉字的语素—音节文字,也不同于日本假名的字母—音节文字,而是一种音符字音节文字,介于汉字与日本假名的中间阶段,填补了文字发展史上的一块空白。

女书是中国劳动妇女追求光明、追求美好生活的伟大创造精神

的体现。在旧社会神权、君权、族权、夫权四重压迫下，农村劳动妇女，不甘枷锁的束缚，勇敢抗争，用自己的聪明才智，创造文字，相互交流，世代相传，这是多么坚忍不拔的精神，多么伟大的毅力。女书的整理和研究具有语言学、文字学、社会学、民族学、人类学等多方面的学术价值和意义。女书文献存世稀少，原因主要是封建社会所谓正统文化的排挤和歧视；再者当地的风俗，女书主人去世后，要带些女书去阴间陪伴，很多女书被作为殉葬品烧掉，只有少数留作纪念；“文革”中，女书被作为封建迷信销毁。现在能够识读使用女书的人越来越少，女书可能会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消失殆尽。

专家对于这一问题已加以重视，一些人开始收集整理女书文献，研究成果不断问世。2002年11月，湖南岳麓书社出版了周硕沂

减租减息折代金（解放歌）

渣：液体当中的沉淀物。

【注音】tsu41 (一)(二)(三)(四)(五)(六)

【释义】

查：考证，核实。

不得查访不敢收（胡飘与石文）

何不与我查分明（玉堂春）

茶：用茶叶做成的饮料。

茶不思来饭不想（高氏自述）

茶锅没柄我难把（银仙自述）

搽：用粉末、油类等涂（在脸上或手上等）。

搽油带粉罪不小（王五娘）

锄：挖地和除草的农具。

锄头得到锄头敲（河边稚竹）

女书　《女书字典》

编的《女书字典》。字典的音、意、形、源体例完备，兼有词汇和语法。共收录女书文字1800多个，按国际音标音序排列。每个文字都有

"注音"、"注"和"释义",并且附上相对应的汉字和例句。著者是江永县文化局退休的老人,研究女书多年。《女书字典》对这一文化遗产不致湮灭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一文字的确应该被抢救记录,否则我们又将失去一个了解人类,认识、解释世界复杂过程的窗口。

周有光先生指出:日本早期,片假名主要由和尚使用,平假名主要由妇女使用,因此也被称为"女书"。女人识字太少,不得已自造简单的假名。男人认为它不登大雅之堂,不屑使用。朝鲜的谚文字母是国王颁布的,不是民间创造的,但知识分子看不起它,长期不热心使用,一度主要由文化较低的妇女使用,因此也被称为"女书"。这两种字母经过长期的冷落,最后才和汉字混合使用,成为文字的主要部分。而女书则趋于消亡,这是什么原因呢?

对于女书的衰落,赵丽明教授有这样的见解:女书盛开于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制度的鼎盛期,凋零于女性登上历史舞台之际。它的诞生令人悲哀,而消失却应令人欣慰。这是因为虽然女书是一种对男性文化的抗争,但从它产生之日起,实际上是一种消极、无奈的抗争,甚至有聊以自慰的意思,女书并没有给女人的命运带来任何实质性的改变,而女书的灭亡,却源自新中国女性地位的提高。女人真正可以和男人一样光明正大地受教育、上学、工作,享受同等的权利,女书还有什么存在的必要呢? 的确,女书是女性自发要求、参与推动社会进步的产物,它的消亡,也正反映了社会的进步。

本节参考文献:

1. 谢志民.江永"女书"之谜(上中下卷).石家庄:河南人民出版社,1991
2. 赵丽明.女书与女书文化.北京:新华出版社,1995
3. 史金波等主编.奇特的女书——全国女书学术考察研讨会文集.北京: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5
4. 周硕沂编.女书字典.长沙:岳麓书社,2002

第二节　小　经

2003年底，在南京大学的校园里举行了一个别开生面的展览会——由该校民族与边疆研究所主办的“我国部分穆斯林少数民族中使用的‘小经’文字展”。小经被认为是我国最早的汉语拼音文字，至今仍在一些地方使用。这一展览吸引了众多学者和专家的关注。

小经，也称“消经”、“小儿锦”、“小儿经”、“狭经”等，是我国回族创造的一种拼音文字。这一文字采用阿拉伯、波斯字母体系来拼写各地回族的汉语方言，共有36个字母，其中4个字母是特有的。除了回族外，小经文字还为东乡、撒拉等信仰伊斯兰教的少数民族所使用，是回、东乡、撒拉等民族共同的书面语，据推测已有五百多年的历史，堪称我国最早的汉语拼音文字。小经文字主要流行于我国西北地区，特别是在一些汉文教育普及程度较低的偏僻地区。过去这一文字很少引起人们的注意，甚至在很多重要史书上都没有提及。随着人们文化程度的普及和提高，现代化进程的加快，此文字的使用范围越来越小，古老文献正在日益散失，抢救和保护工作已刻不容缓。

目前，国内外学术界均已十分重视对小经的研究。早在20世纪80年代，南京大学就率先开始了这方面的研究。南京大学民族与边疆研究所“小经”课题研究组历时近二十年，多次前往西北各省进行实地调查，收集了大量有关小经文字的文献资料。为了呼吁全社会关注、保护和抢救“小经”这一珍贵的信仰伊斯兰教的少数民族文化遗产，课题研究组特别将收集到的比较有代表性的材料制成图片，举办了展览。

小儿锦 《纪事》

整个展览共分为“前人研究成果”、“经学文献”、“工具书和词汇”以及“世俗文献”几大类。据南京大学民族与边疆研究所所长刘迎胜介绍，这几类资料中“世俗文献”最为难得。他说：“目前国内外收藏小经的只有日本京都大学和南大，但日本收藏的主要是经学文献，没有世俗文献，所以他们的研究结果认为小经这种文字

已经死亡。但从我们考察的结果来看,小经并没有消亡,在西北很多汉语不发达的地区至今还在使用。而且它不仅仅是一种经堂语,更渗透在百姓的日常生活中,我们收集到的这些世俗文献资料就是最好的证明,这是我们特有的,非常的珍贵。”世俗文献资料中有用小经文字写的账本、遗书、唱词,还有解放前地下工作者用小经做的工作笔记,目前南京大学收集到的最晚的一件小经世俗文献资料是一对青年男女在2002年11月底写的一封情书。

南京大学民族与边疆研究所的展览还将在全国巡回进行,希望能唤起整个社会对少数民族文化遗产保护事业的重视。

在白寿彝先生编辑的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回民起义》1—4卷中,收有同治元年(1862)陕甘回民起义时,佚名著者使用小儿锦对起义缘由纂写的《纪事》,这篇文献曾在回族群众中广为流传。解放后,北京东四牌楼清真寺教长庞士谦将《纪事》译成汉文,于1952年8月发表。

本节参考文献:

1. 宋莹、舒健.我国最早的拼音文字现身南大.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2003
2. 姜帆、郭奔胜.最早的汉语拼音现身南京大学.新华社南京2003年7月6日电
3. 白寿彝.回民起义(三).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